

SHANBEI HONGJUN ZHENGZHAN JISHI

冯捷 著

陕北红军

征战纪实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红军征战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大英雄发火



刘志丹同志



谢子长同志



参加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左起第二人王世泰。
第二排左起第三人吴岱峰。第三排左起第一人郭洪涛。



到达陕北的红二方面军一部。



到达陕北的红三方面军一部。

延安红军少年团演出歌剧。



准备东渡黄河
开赴抗日前线的中
国工农红军一部。





吴起镇，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
红军到达这里，
接着同陕北红
十五军团胜利
会师。



一九三五年九月五日，
由鄂豫长征到达陕北的红
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
二十七军在陕北永平镇会
师，成立红十五军团。这是
会师时的情景。



红二十五军三团一连旗帜。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红军征战卷

陕北红军征战纪实

冯 捷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西北第一枪

这是共产党领导下打响的第一枪，她对西北，乃至中国的红色革命意味深长。

第二章 会 面

天上下雨地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刘、谢的握手，把黄山坳中的两块红色风景握在了一起。

第三章 子午岭

子午岭并不重要，但子午岭发生的这一次拼杀，对西北红军却举足轻重。它能打了，也敢打了。

第四章 三把火炬

三把火炬聚集在黄山坳中，使红军力量更加壮大。当然，成分也就更为复杂。然而，只要干柴火，遇上火星，就会燃烧不止。

第五章 诘 难

红色的革命被不知革命的人左右了，刘、谢从马背上先后落马。

第六章 在废墟上燃烧

红色无法抹去。即使在废墟中也会燃烧得亮丽。

第七章 整 军

为什么总有忧愁？那是你心中没有绿洲。为什么地上总有阴影，那是你走路老低着头。

这支队伍正向正规化迈进。

第八章 又一面红旗

红二十七军的诞生，使黄山坳中出现了又一片红色的风景。

第九章 哭“青天”

人不能言语，天饮泣。在这“红色”的黄土高坡上，天降素缟，大雪哭子长。

第十章 十五军团

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的会合，使西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西北，西北红军成为整个红军的一部分。

第十一章 毛泽东 刘志丹

毛泽东的出现是历史的巧合吗？如果没有西北红军和陕甘苏区，如果没有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出现，历史将会怎样演绎她后来的壮丽。

毛泽东在陕北出现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救了一个刘志丹。

第十二章 东 征

志丹在东征中牺牲了。他不该死得这么年轻，他率领的队伍正长着羽毛。

他咋走得这么匆匆，就一去不再回头……

附 录：

刘志丹年谱

谢子长年谱

二十六军大事记

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组成十五军团大事记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大事记

后来者有谁知晓 有谁知晓
辉煌壮丽的长征曾步履维艰
哪里的山水庇护这支溃不成军的队伍
谁家的灶火肯为六千饥肠点燃
围追堵截 饥寒交迫 九死一生时节
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也四顾茫然
一张旧报纸 为越过万水千山后
走投无路的队伍铺平坦途
一群扎白羊肚子手巾的汉子
毛眼眼的婆姨
在崖畔上凿出窑洞——
这中国革命新的家园
从此我们知道了：
陕北有个刘志丹
从此后许多人终生
吟唱信天游 惦念着小米饭

.....

第一章 西北第一枪

这是共产党领导下打响的第一枪，她对西北，乃至中国的红色革命意味深长。

带伤的沙雀子水边飞

要过上好光景咱去了就没想回

—

1927 年的中国大地上阴云翻滚，血雨腥风。一贯很少挂有笑容的蒋介石那张在该轻松的欢乐场合也布着凶光的脸色变得更加阴冷了。在上海的晨曦中，他一翻脸来对付他的共产党盟友时，苏联的顾问也撤走了。他随即聘用了德国人。蒋介石的刽子手们砍掉了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头颅，以致到后来，他们的胳膊酸疼得都举不动屠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惨遭杀害，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革命被压向了低潮。也就是这时候，那位今天被人们几乎神化了的高个子湖南人毛泽东再一次站立了出来。他与他的同志们一起站了出来，用实际行动宣布了他们对反革命屠杀的回答。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震撼着中华大地。党的“八七”会议像一枚催熟丸，全国各地的武装斗争如火如荼，许多共产党人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夏明翰在绝命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郭亮给妻子的遗言是：“望善抚吾儿，以继余志。”他们坚信，革命者是杀不绝的。那么，让我们不妨把目光朝前聚焦推到 14 年后，提前饱览一下 1941 年的那个春日的毛泽东站在窑洞前，沐浴着陕北高原如洗的阳光，说出的现在看来是深刻道出了当时历史本相，却被很多人当成《天方夜谭》来听的一句话：“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而且，一轮红日一旦升起，就燎原了整个中华大地，直到今天，乃至永远。

然而，秋收起义时期的毛泽东当时绝不会想到，他所以敢于发表这样的宣言，凭借的竟是那么一片贫瘠的黄土地，这片土地热情接纳了一支身经百战、跋涉两万五千里远程的褴褛的队伍。他会和一群扎白羊肚子手巾

的汉子、毛眼眼的婆姨们在崖畔上凿出窑洞——中国革命的新家园。他也不会想到他的将士们人人将吟唱信天游，个个惦念小米饭，一住便是十三年。这片黄土地是那样干涩、贫穷，她早已像一个饱经忧患、满目疮痍的穷妇人，被天灾人祸蹂躏得体无完肤。我们不妨略费些笔墨，给她画一幅成为摇篮前的风景画。

这个原名叫肤施（现称延安）的地方就位于黄土高原的中部，地理学家称之为“陇东、陕北高原”的地区。这里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其范围，东以黄河与山西分界，西至六盘山东麓，南到渭河北山，北面是浩瀚的毛乌素沙漠。整个高原以陕北为中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约1000米，最高处达2400米。由于黄土颗粒极细，土层深厚，质地疏松，植被覆盖差，降水稀少而集中多暴雨，所以，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每逢大雨，黄流乱注，奔腾如蛟龙。地表被水切割成支离破碎的梁、峁、丘陵，千沟万壑，七弯八岔，很少有较大面积的冲积平原，这里的人们生活极端困苦。有一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人23岁时，以为自己像个冒险家，来到中国寻找“东方魅力”。那次的西北之行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而活活饿毙。他把那一段经历叫“噩梦般”的时日。“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因为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他眼前活活饿死。他就在一本叫做《红星照耀中国》的书中是这样客观的描写的：

“……这种景象真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把什么都卖了一一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斯诺还说：“……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伎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

其实，辛亥革命以后的陕北，即为地方军阀井岳秀一人所统治。为了把事情说得清楚，我们又不得不把井岳秀作一番介绍。此人陕西蒲城人，原是国民党陕西陆军第九混成旅陈树藩部的一个工兵营长。1913年9月，井率部第一次来到陕北，镇压了几处“神团”反抗割烟苗的斗争后，旋即

返回关中。1916年冬，已升任步兵团长的井岳秀，再次率部进入陕北。1917年5月，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井为陕北镇守使，驻防榆林。从此，陕北成了井岳秀的地盘，开始了他统治陕北的生涯。以后，历经吴佩孚、段祺瑞、冯玉祥册封，迭次升迁，由团长而旅长而师长。1933年，蒋介石任命他为陆军第八十六师师长，后升任二十二军军长。尽管数易其主，步步高升，但他始终不挪窝，陕北自始至终就自然成了他的独立王国。直到1936年春，因手枪走火毙命，他整整做了20年的陕北土皇帝。在他的统治下，陕北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群众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那么，井岳秀又何以愿意守着陕北这块贫瘠的荒土呢？因为，再贫穷的土壤里只要用种子和大于它无数倍的血汗浇灌也会产出吃食的。陕北同时又是生产小米、糜子、高粱、玉米、小麦、荞麦、土豆、白菜、萝卜及多种豆类杂粮的地土，也是羊、牛、毛驴存生的地方。所以，井岳秀借手中的武装并把持政权，向各县委派县长、警察局长、税收官员、民团头目，设立监狱，与地主豪绅沆瀣一气，对人民实行严密的封建军事统治。劳动人民在政治上不仅毫无民主权利可言，就连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常常无辜被捆绑，遭毒打，受监禁，甚至被杀害。经济上，备受盘剥，除了正税以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大烟税、印花税、牲口税、畜屠税、羊税、白地捐（强迫种植鸦片，不种也得缴纳捐款），还有什么开拔费、年节费等等。

另者，土匪横行，是人民群众的又一大患。西北地区人烟稀少，沟深林密，正是土匪藏匿和出没之地。

这些土匪往往又被军阀利用，有的还转化成了军阀。兵匪勾结，残害百姓，更加深了人民群众的痛苦。

正如一首民歌中这样唱道：

前川里糜子后川里谷，
六个月无雨禾苗苦，
千石板上栽葱扎不下眼，
老财逼租心真狠。
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

吃糠咽菜一辈子穷，
东山日出西山落，
挣死挣活没法活。

.....

“他们为什么不造反？”埃德加·斯诺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他愤怒地挥着拳头，又无奈地耸耸肩膀，他觉得：“他们的消极无为使我深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就像又一个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起初不明白毛泽东们为什么一到陕北就像找到了家门，“就在这片沟壑遍布、河流干涸，狂风怒号，红沙飞扬的黄土高原上，毛和共产党将深深地扎下根来”一样，索尔兹伯里也耸耸肩，摊开两只大手，笑说：“他们在陕北安了家，不是只呆一周、一月或一年，而是住许多年。毛在吴起镇也只停留了 3 天，在那里却直到 1947 年 1 月 10 日，这 10 年是革命的酝酿时期（这是革命孕育成熟的 10 年）。”

其实，这又是一个简单得胜于任何雄辩的真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贫苦群众，已经被逼到了绝境，为了求得生存，只有铤而走险了。他们常常自发地组织起来，同反动的军阀官府、豪绅地主作斗争。早在 1914 年，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知事采纳恶棍赵国安的计谋，设立“羊圈税”，按养羊户的羊圈清点羊只数目，每只羊收税 6 个铜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人们拥向县衙，剜掉了赵国安的双眼，迫使县知事取消了“羊圈税”；同年，张九才领着农民三四千人杀了县知事，分了土豪劣绅的一些财物；还有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李自成就出在此地。当然，这些手持锄、耙、铲、钎的农民们由于他们的斗争都是盲目自发的，骤起骤落，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又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只为了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最终还是失败了。然而，后来在这块黄土地上所演义的故事，所发生的具有史诗般壮美、丰厚的率直的故事，不但令中国人叫绝，连斯诺也不得不折服，他真诚万分地向世界人民宣布：“我错了。中国农民

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他强调：“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无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做希望和自由的象征。”至于索尔兹伯里就更一目了然地点出了一个人，“这位陕西‘罗宾汉’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是他“突破重重包围回到了陕北，人们纷纷前来投奔，他很快重建了二十六军……”“到 1934 年，他在陕北已经创建了一个根据地，包括了 20 个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共有 5000 人。”毛泽东也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陕北的男女老少更是无人不晓，他们亲切地叫他老刘，自豪地用他们最为亲切而质朴的信天游歌唱他——

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
我那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当红军的哥哥跟的是刘志丹。

说到刘志丹，话题就太多太长，当 1927 年 10 月 12 日，我党在陕北打响第一枪时，刘志丹正被追随蒋介石反共的冯玉祥实行“清党”，与 20 余名共产党员一起在豫陕押送出境。据说这个叫“礼送出境”的内幕，实则是冯玉祥想借湖北军阀之手杀了刘志丹等人，所以，才把他们从武威用一列闷罐子车送往湖北。然而，天王有眼，神灵相助。火车途经一个小站时，随着天空一声炸雷，顿时乌云翻滚，倾盆大雨瓢泼而下，小火车身患“暴病”，戛然瘫痪。在那血腥恐怖的时期，人心阴冷之极，突然间被响雷炸醒，车站上人声枪鸣，狼烟四起。刘志丹等人赶快四下出逃。有人说他是钻爬在火车底下挤出身体的；也有人推测他趁人乱马翻时，脱去外衣溜出的；甚至人们带有感情色彩地企盼，老刘一生最爱人民，是除去衣帽搀扶一位大娘提着包袱出站的。不管是传说也好，推测也罢，刘志丹命大逃过了这次劫难。后来，党派他去了上海，尔后，返回陕北。

其时，党在陕北打响第一枪时，另外一个和刘志丹齐名的传奇人物像火星一样闪亮在天空。他的名字叫谢子长，陕北的人民唤他“谢青天”。同样，村民们用他们最能抒发生活中的思虑、积怨、恩德、追求和向往的信天游来念唱着谢子长——

豌豆开花结龙头，

十八九开始交朋友。
高粱地里带豇豆，
为照哥哥踩下一条路。
芦花公鸡飞过墙，
我把哥哥照过梁。
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
三年二年忘不了你。
有朝一日见了面，
知心的话儿都拉遍。

那么，谢子长又是怎样在陕北这块黄山坳中受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响的第一枪呢？

二

送走了石谦，谢子长与唐澍、李象九对在突变的形势下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研究。决定：由唐澍回西安向陕甘区党委请示汇报，子长和李象九加强连队的军事训练，严阵以待，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谁知不到一个时辰，石谦被害的噩耗传来。使谢子长不得不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他已经感到形势越来越严峻，若不赶快行动，恐怕井岳秀会把共产党埋下的种子一粒一粒地敲碎而达到消灭之。

石谦，原是井岳秀部的一个连长，驻防清涧、安定一带。因为脚跛，人称“石拐子”。1927年秋，石谦升任团长，到处招兵买马，扩充部队。绥德党组织抓住这个机会，利用李象九与石谦交往甚密，又是同乡关系，派李打入石谦部。9月，李象九被任命为连长，组建第三连。在谢子长的帮助下，招收了一批比较进步的贫苦农民和青年学生入伍，称为“学兵连”。不久，谢子长所带的民团也加入石谦部，编为第十二连，谢子长任连长。党为了进一步掌握石谦部队，从绥德四师、榆林中学等地抽调了一批党团员充实连队，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发展党团员，建立了党团组织。1927年初，石谦团改为旅，石任旅长，下辖3个营共13个连，李象九升任营长。这时，像借鸡孵蛋一样，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共产党的核儿一天天似滚雪球样地长大着。在李象九、谢子长等人影响下，石谦本人对革命的态度，也

由观望、等待，到宽容、同情。后来，国共合作在全国范围的影响，使得石谦很快接受了我党的建议：全旅官兵在宜川集义镇进行政治军事大集训。通过这次集训，确实使石谦和大部分官兵真正地从内心里倾向革命，部队面貌也焕然一新。可就在这节骨眼上，随着蒋介石的翻脸不认人，冯玉祥开始反共，井岳秀也就积极追随，大肆镇压陕北的革命运动。他下令封闭绥德四师和延安中学，开除榆中进步学生。各地的农协、工会等革命团体被迫解散，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遭到逮捕和杀戮。尤其成为他心腹之患的，便是我党在石谦部的革命活动以及石旅官兵的“赤化”。对于这点，井岳秀又恨又怕，一直在寻找杀机。靶子就不偏不倚地选在石谦头上了。

凉飕飕的秋风卷着枯枝落叶在原野上呼号着，四处显示一派凄索的秋冷。耿直侠义的石谦是无论如何也搞不清世事为啥会如此变幻莫测的，蒋总司令咋说变就变了脸，一下子大开杀戒？井司令咋就那么灵醒，马上一翻掌心给他送来一封密令，要秘密处决谢子长、唐澍和李象九？这消息如同五雷贯顶，把骑在马上石谦搞得壅蔽难奈。他想：我石谦做人最信奉的是“义气”二字，谢子长和李象九为我石某人冲锋陷阵，立了功，争了面子，赢得了井司令的几次嘉奖，我能忘记吗？那次南下攻打澄县，自己被敌围困，眼看就要当俘虏，要不是子长率部解救，自己不早完蛋了？再说谢子长、李象九平日里待自己一片真诚，咱不能撇开这“情义”二字，去做那不仁不义的事，不能，决不能！可是，这是井司令的命令呀！细想起来，老井待咱也不薄，自收编以来，连连提拔，委以重用。我石谦能有今天，能忘了司令吗？当然不能。人，当以知恩图报，我石谦这辈子就是豁出命来，也要报答司令的恩惠呀。可是，这密令咋个办？哎，一个萝卜两头切，难哪！嗯，也许司令对子长和象九这些人并不了解，只是听了别人的谗言，我要亲赴榆林，向司令说明：谢子长、李象九和唐澍都是勇敢之将，不可妄杀。他甚至满怀把握地相信只要井司令了解了真情，就会收回密令的。石谦也真是个憨直的主儿。不过，他更可爱的是，他并没忘记把这件事去告诉谢子长和李象九他们。同时也想，跟他们商议商议，看是否能找个两全之策。

没等石谦从马上跃下，谢子长、李象九和唐澍已在十二连连部门前等候。石谦踏进连部，还未坐稳，就急切地从衣兜里掏出那封密令放在桌子

上。“请大家看吧！”说完，拿起烟袋“吧嗒吧嗒”吸起烟来。

子长拆开信，李象九和唐澍也凑过去，三人一起看到的是：

益斋见信如面：

顷接上峰旨意，“剿灭乱党，格杀勿论。”据悉，你旅以谢子长、李象九、唐澍为首的共产分子，宣传赤化，造谣惑众，危害治安，甚为激烈，实为军纪不容。望以党国为重，迅即设法除之，以绝后患。则我军幸矣！你我幸矣！切切此意。

井岳秀

他们看完信，相互对视了一下。李象九转身一拳砸在桌子上，愤愤地骂起井岳秀“可耻！”唐澍双臂环抱在胸前，盯着墙壁不言语；子长沉思了一会，自从“四·一二”大屠杀开始，他就料到井岳秀不会放过他们的。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加强了对石谦的争取工作。他也清楚，虽然目前把石旅的武装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的目的还没有完全达到，可石谦今天能把井岳秀的密令亲自送给他们，这说明他们的工作是有成效的。至于石谦能不能完全脱离井岳秀，还没有把握，他想再努力争取一下。

谢子长问道：“旅长，你准备怎么办？”

石谦转过身，轻松地说：“我去榆林，给司令陈言……”

唐澍打断石谦的话：“使不得，你去榆林，只能是自投罗网。”

“哎！”石谦解释道，“司令请我去榆林为他祝寿，我正好借这个机会，亲自向他说明我不执行他的命令的原委，请求他收回成命。”

谢子长看着石谦诚恳地说：“旅长，不能去！唐澍说得有道理。你此次去榆林，如果不提着我们三人的脑袋，肯定是凶多吉少。

石谦想了想，为难地皱起眉头，说道：“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没执行命令，就得前去请罪。至于后果嘛？我也考虑过咧，大不了把我的官撤了，我再回家种田。这总比背信弃义，杀害朋友让世人永远唾骂强吧！”

他们三人面面相觑，李象九说：“不行啊，问题恐怕不像你想得那么简单！”

石谦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我这样做也是为他司令好，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子长见石谦对井岳秀是抱有幻想，便想苦口婆心地劝导下去。

石谦却反而强调：“他是让我去祝寿，我若不去，他不是更会产生疑心吗？”

唐澍倒是出了个点子：“可以备上一份厚礼，另派专人代你祝寿。你以患病为名，不去榆林。”

石谦沉思良久，还是拿定了主意：“我想，我还是去一趟，能说通司令更好，即使说不通，也算为朋友尽了心，也了却我石谦的一桩心事。至于我个人的安全问题嘛，我会留神的，请诸位放心，井司令还不至于……”

大家见不能劝服石谦，心里都不是滋味。子长怅然地望着石谦，欲言又止。最后，改换口气说：“那么，再派几个精干的随从给你带上，行吗？”

石谦摇摇头：“不用啦，带的人太多，司令也会起疑心的。”

于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说道：“那就只有请旅长自己多多保重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十二连全体官兵列队持枪，送旅长起程。

谢子长、唐澍、李象九和几个随身官兵将石谦一直送至廖公桥。在石谦的再三劝阻下，谢子长等人才勒住马缰，目送石谦远去。也许无论怎样，这毕竟是在人家的母鸡肚子底下孵蛋，动静不能太大吧，大家都快快地返回，谁也不说一句话，气氛更显得沉闷、冷寂。

果真，石谦从安定一到榆林，首先受到了井岳秀的特殊恩宠。井司令亲自派他的贴心副官把英勇善战的石旅长安排到上等客宅，精心照顾。石谦也就更是感恩戴德地拜寿。寿毕，井岳秀又专门宴请了他。

石谦肚子的酒肉连着心一块滚热饱满，他满足地回公馆一横身躺在炕上。卫兵通报张鸣盛求见。对于张鸣盛这位井岳秀身边的奴仆一样的参谋官石谦并无好感。只因还算是个熟人，况且，他正酒足饭饱好心情，便下炕迎接。

“听说石旅长明天要走，老朽特来拜见！”张鸣盛恭谦地哈着腰。

石谦道：“谢谢，请上炕。”

张鸣盛脱鞋上炕后，陪着石谦躺下来抽开大烟。

石谦打了个饱嗝，原恐他又来出啥馊主意，没想到他一进门便抽开大烟来，也就不再多想。

“报告，门口来了一位军人，说井大人有信，要亲手交给旅长。”卫兵进来报告。

石谦说：“请他进来。”

“石旅长！”一个军人走进门后，从身上掏出一封信。

石谦听到声音，坐了起来。那军人左手递信，右手便掏出手枪，“叭叭”地连发几枪，石谦“啊唷”一声，立时倒在血泊中。

卫兵听到枪响，赶快跑进来，送信人已不知去向，石谦也已断了气。

井岳秀贼喊捉贼在全城实行戒严，“捉拿”刺杀他得意门将石谦的凶手，以障人耳目，结果当然一无所获。

8月22日，井岳秀在“痛失”石谦之后，任命反动之极的康子祥营长代旅长，命令师长高双成调李象九营到延安“改编”，谢子长连队开往宜川“换防”。企图各个击破，拔掉李、谢这两颗钉子。

明眼人一眼便可看穿，杀害石谦，当然不是井岳秀的最终目的，分化共产党力量，然后零敲碎打，彻底歼灭，才是井岳秀的高谋远略了。

谢子长和李象九其时正准备召集人马开会研究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措施。也就在这时，那位生于河北易县，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唐澍从区委汇报工作回来了。

这是个漆黑阴冷的深秋之夜，而安定县的一孔土窑洞里却彻夜闪亮着一盏火苗，呛人的劣质烟草味把夜熏得更加难耐。从窗洞门缝里不时挤出两声几句陕北汉子犟直的争议声：“就是种庄稼，也还会遭受冰雹、旱涝哩，何况搞革命呢！”

“子长，你就发个话，我们是逼上梁山的水浒英雄，早已截断了后路。”

“现在就是天塌下来，地陷进去，咱也得干哪……”

一阵争吵过后，一个凝重而深沉地声音说道：“起义，是党的决定，也是我们惟一的出路。可我们的人马虽有一千多，在整个陕北，还是很弱的，不利的是，愿意参加起义的连队又比较分散……”不用说这是谢子长在说话了。

又一阵沉默，再一阵商议后，他们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而且，摆出了背水一战的架势。

“起义后，应打出工农革命军的红旗。只要我们把红旗一打起，成千上万受苦受难的民众是会拥护我们的。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是会加入队伍的。同志们，想一想吧：人民是多么盼望有一支工农自己的队伍啊！打起革命的红旗，将会在陕北引起多么大的震动！”

.....

眼瞅着窑外已有亮光，他们的谈话伴着油灯和草烟的呛味依然酣畅浓烈。

是啊，这一时期来整个安定县像个火药筒，过分沉闷之后终将要爆炸了。军阀、土豪、贪官横行压榨，石谦之死的愤懑积怨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我们总不能伸长脖子像切西瓜一样，让人家砍呀。”所以，三人一夜商议，定了，他们也顾不了那么多，先拉起杆子，硬干！

.....

现在，敌人行动比预料的快得多。6个营的兵力将宜川包围了，构筑了掩体工事，组成了交叉火网，整天枪炮声不绝。

子长又一次走进指挥部焦灼地喊着：“我的李旅长，赶快出击吧，我们左翼敌人的战斗力弱，从这个地方，可以突击出去。”

可李象九仍然一副斯文劲，一边翻看《孙子兵法》，一边带点讥讽地说：“我的谢营长，何必那么着急呢！”

听了这话，子长劈手夺过那本书，吼道：“敌兵分几路包围宜川，起义军将面临十倍于我的重兵压境形势，你还看《孙子兵法》，‘爷爷兵法’都不解决问题！”

李象九哈哈一笑，轻松地踱着方步：“诸葛亮5个人还唱空城计哩。咱

们这么多人，还怕啥！宜川凭山环水，自古易守难攻。只要凤翅山在手，便固若金汤。”

对于象九无所谓的样子，子长心里很不是滋味。自打讨论起义的那一天起，子长就感到两人之间仿佛有了一堵无形的墙。不能理解对方怎么想，可他还得说：“雷进财不是我们党的骨干，守凤翅山，靠得住吗？……”

“唔？”象九一摆手，打断子长，“凤翅山，嘿，可说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开！没有5个营的兵力，休想……”

李象九话没说完，枪声炒豆一般响起来。他霍地站起来：“哪个方向？”

突然，雷进财衣貌不整地跑进来：“旅长，我该死，凤翅山失守……”

李象九像被蝎子蜇了一下，跳起来：“雷进财，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继而又像泄了气的皮球，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瘫软在椅子上。

子长气得脸色铁青。雷进财是守卫凤翅山的连长。这凤翅山，立在宜川的东门外，像一道屏障坚在那里。地形险要，山坡上都是开阔地。只要山顶把守严密，是难于攻上去的。可是，听枪声，战斗也并没有那样激烈，即使守不住，也不像那么快退下来？子长心中犯疑了。他望着雷进财，这个一贯和李象九关系密切的连长，正痛哭流涕地给象九请罪哩。

子长的心中更乱了。凤翅山失守了，这就是说，宜川守不住了。敌人占领了山顶工琪，子弹可以打到城内的任何地方。部队该向哪里撤呢？思想中的乱麻正缠绕不清时，他又想到那个问题：凤翅山是如何失守的？他慢慢走出旅部，正巧，雷进财连的雷恩俊恰在门口，这是位秘密党员。他悄悄告诉子长说：进财要叛变了！”

听了这话，子长的脑子“轰”地一下，全身的血液好像要奔流出来，气得双手发抖，猛地，他调转身，招来几个人，大步奔回旅部，走到雷进财跟前，趁他不备，一把拔出了他腰间的驳壳枪。手一挥，“把这家伙捆起来！”

几个小伙子冲上前，三下五除二，把雷进财捆了个结实。

李象九莫名其妙。

子长厉声喝问道：“雷进财，你为什么私自撤出阵地？你这个叛徒，你

还开会要投井岳秀！是吧——”子长扯开他的衣扣，从内衣口袋里搜出敌师长高双成的亲笔信。信中要他带兵投降，并对他封官许愿。

不由分说，子长拉起雷进财，下令处决了这个叛徒。

当子长返身回旅部时，刚才还趾高气扬的李旅长，一边吩咐马弁收拾东西，一边命令部队当晚突围。

子弹火网一般在夜空中交织着。不时有战士跑来报告情况，宜川城已危在旦夕。

谢子长整理好队伍，提着枪跳在一张桌子上高喊：“同志们，最严峻的时刻到了，要保住这支革命队伍，就必须豁出性命冲出去。大家要镇定，听从指挥，杀开一条血路！”

又一个出师不利，还没等与敌人正式交战，就损失了一半兵力。

看到起义军要突围，敌人像发疯一样地射击着。飞在高空中的子弹“嗖嗖”地怪叫着，打在身边的子弹“噗噗”地钻进土里，子弹给夜幕结成了闪光的网。

战斗中，任何情况都是瞬息万变的。

突然，紧随二营的驮辎重的 100 多匹骡马乱了营。马狂嘶，骡子乱跑，驮子翻倒，把后卫的三营冲散了。三营却以为二营被敌人打退了回来，匆匆返回城里，关上城门。

看到一片乱糟糟的样子，左侧翼的谢子长提着枪跑了过来。他问了问三营，都说弄不清情况，便派通信员前去侦察。直到听了通信员返回报告，才知是两个营的部队是因人员未做好准备，仓促上阵，加之骡马受惊，不战自溃的。

大家都互相凝望着、等待着。空气也凝止了。谢子长被无数双眼睛照得浑身发热，久蓄在心底的情绪仿佛就要迸发出来。然而凭理智，凭几年作战经验，忠诚、勇敢、智慧的全部内容就是：保持头脑清醒。他听听四周枪声，看了看夜色，对李象九说：“李旅长，不能迟延了，必须趁黑夜冲出去。我带一营作为突击队。”

李象九同意了。

说来也巧，等子长部队来到南门下时，枪声也已稀落了下来。敌人以为打退了突围，起义军不敢再出城了。子长就在这个间隙里迅速打开城门，带队伍冲了出去。

敌人很快反应过来，密集的子弹立时打了过来。小钢炮也啸叫着，炮弹在四周爆炸，火光照亮了半边天，烟雾罩着大地。

战斗又推至白热化。

第一道防线到了，敌人火力正面封锁。枪炮猛烈如飓风。子长一招手，警卫员吴明带着战士机灵地跃到侧面，把手榴弹投到敌人的堑壕里，然后，趁着烟雾，猛扑上去，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

第二道防线更艰巨。堑壕里的敌人不仅猛烈射击，两面山上的敌人也铺天盖地地拥上来。

硝烟如浓雾。子长身边不知有多少人倒下了，眼前还有些什么人，他也看不清楚，只觉得身后有一支尽管人不太多，却钢铁般坚强的队伍。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精力越来越充沛，思想反而单纯了，行动更加沉着。

一营，不愧为子长的队伍，一些人倒下了，后来的人紧紧跟上。几百兵丁，一下子仿佛攥成了一只拳头。人少一个，拳头紧一层，每个战士的思想、意志、力量都拧在一起，决心、仇恨、怒火，都凝聚在枪尖刀刃上。

他们硬是从枪林弹雨中杀开一条血路，就着浓烟血腥突围了出来。

击溃党家屹崂的守敌后，部队进行了清点。仅仅剩下 391 人和 17 匹马了。其他两个营都被冲散，只有一营还较完整。

高原的黎明到来得要早一些，一会儿工夫玫瑰色的阳光就照亮了千山万壑。还没等人把个盹打圆，猛地，四周又响起了枪声。子长回头一望，后边的敌人又追上来了。川道里，是整队整队的敌人；四面山上，是星星点点的敌兵。那些身着黄衣服的敌军，一边打枪一边喊叫，马队在大道上奔驰，扬起一股黄尘。

“不能停，得马上走！”谢子长又挥起驳壳枪，“同志们，冲出去！”

就这样，又一次突围，破肝裂胆，流血牺牲。

当起义的部队撤至韩城西庄时，时间已到了 12 月的严冬了。连续几

个败仗，数次突围，伤亡颇巨。加上一些人半路逃跑，现在只剩下 200 来人，一个个少衣没穿，情绪低落。冰花冷箱不免也挂在了谢子长那张瘦长脸膛和沉重的心绪上。吃罢一碗稀米汤中沉着几块土豆疙瘩的晚饭，他一个人在田间走着、想着……突然，一阵“嘚嘚嘚”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打断了他的沉思。望着那一股黄尘，谢子长不敢卜猜是凶多还是凶少……

三

马蹄径直停落在谢子长面前，未待他看清楚，两人翻身下马，其中一位扑过来一下子抱住谢子长。

“子长！”

谢子长抬头，见是去省委汇报工作的唐澍回来了，另一位是阎揆要同志。

子长一把握住唐澍的手，只说了“起义失败了”几个字，眼泪差一点砸在地上。

唐澍点了点头：“我都知道！”

空气突然冻住了似的，恐怕掉根银针也能碰出声响。

不知是有意缓和气氛，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唐澍振作了一下：“子长，我可给你带回好消息了。”他说这话时，脸上果真有一份欣喜之色，眼睛里也熠熠闪光。可谢子长的心里像灌满了铅，沉甸甸的，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他只是漠然地问道：

“能有什么好消息？”

“湖南的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什么井冈山？”

唐澍急忙从身上掏出一张报纸和传单递给子长。

阎揆要看着子长，笑道：“这是一颗星，会给你亮光的。”

见唐澍和阎揆要对视着，兴奋地笑了。谢子长这才急急打开报纸。报纸上登着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的消息。传单是省委编印的，内容写得要详细一些，说中国红军有了第一块根据地。

“毛泽东，根据地。”这消息在子长心中猛地一震。谢子长似乎参悟了些什么，又仍有些懵懵懂懂。他焦急地问唐澍关于“根据地”的问题，建立根据地又为什么非要到井冈山去！……

橘红色的煤油灯火苗儿把窑洞照得通亮。唐澍向开会的旅、营干部们说：“毛泽东同志认为，在强敌面前，不好立脚，只能到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去建立据点。过去，只想着在城市一下子把革命闹成功，现在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困难很大，只能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

这又是一个新鲜思想！联想组织清涧起义的经过，大家讨论着，估摸着致使起义失败不就是犯了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两大忌吗？子长深思着：看来，这次从山沟里跑到韩城来，也不一定正确！

在研究下一步部队行动计划时，谢子长和李象九又发生了分歧。谢子长仍不改初衷，坚持部队向陕北进发，去攻打延安，最后撤到敌人力量最薄弱的陕甘边。他激动地说：“打仗要讲天时、地利、人和，就是要重视主、客观因素，要从实际出发，人家毛泽东同志去深山立足，这有一番道理的。我们在哪里选择落足地？我看陕北最合适。陕北的敌人力量比关中弱，我们容易站住脚。同时，那里我们的群众基础好，便于我们开展活动。现在，高双城旅正在宜川，延安城的守备薄弱，我们可以一举攻下延安，一方面鼓舞士气，壮大我们的力量，一方面还可以将立足点移往陕北。”

唐澍听后，立即表示支持他的意见，并反复说明：“井冈山道路虽然在苏联没搞过，可在咱陕北，说不定真能搞成哩。”

阎揆要思谋了好一阵，也表示赞同。

只是李象九固执己见，一味地摇头。他甚至讥笑子长：“就靠这二三百人攻打延安？谈何容易！”

唐澍道：“那你的意见呢？”

李象九叹口气，说：“能有自己独立的山头当然好，可那只能是一种幻想而已。我们那时的1700人还站不住脚哩，现在，只剩下十分之一了，还想干啥？如果不想叫敌人连这点老本都吃掉，我看还是老办法，找个靠山。以前，我们在安定能泰然稳坐，就是因为我们有石谦作靠山。现在我们像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还有狂风恶浪不断地袭击着我们，我们就不能设

法找个救援物吗？王保民想收编我们，我看完全可以考虑。这个人很不错嘛！咱们到韩城后，人家发来棉衣，送来大洋，很讲义气。我们投靠他是不会吃亏的。人嘛，只有能屈能伸，才能成就大事。”他瞪了子长一眼，“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人，必然要吃大亏的。”

谢子长是个火急性子的人，听了李象九这番话，心里非常激愤：“那不等于投降嘛！”

李象九反唇相讥：“如果这也叫投降，你不也投降过石谦吗？”子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霍地站起来：“我们好不容易才脱离了国民党反动派，为党拉出了一支革命武装，怎能再拱手送给人家呢？是的，我们是遭受过挫折，可这世界上有多少事是一帆风顺地取得成功的？河水还要七曲八拐才流入大海，人活一世还会遇到三灾六难呢，何况这艰巨、伟大的革命，能不受一点挫折！跌倒了，爬起来再干，连士兵们都懂得的道理，难道我们连士兵的觉悟都不如，也难怪底下人看不惯我们当中有些人……

李象九是一旅之长，最高司令官，他也一拍桌子：“我们接受王保民的收编，就不是革命了？这才是为了继续革命。至于有些人在底下搞小动作，拉帮结派，我今天就不在这个会上宣布就是了。”

子长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李旅长，石谦为什么死的？你该没有忘记吧！同志，现在已经不是国共合作时期了。如果还不想放弃革命，就只能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中往外拉队伍，而不是把自己已经拉出的武装再送回给国民党。革命的军队只能掌握在党的手中……”

“想着容易干着难，谁不知道咱们现在山穷水尽了。”李象九阴阳怪气道。“咱们是共产党的起义军，是革命武装。而不是投降派。”子长也争道。李象九脸一变：“子长兄你说话咋这么难听……”

谢子长与李象九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唐澍知道，所有在座的人都坚决反对李象九的主张。但他是旅长，又一味固执己见。他觉得会议再这样开下去，也不会有啥结果，就宣布休会。

事情再明白不过了，自从宜川撤离后，李象九一直无精打采。井岳秀又派高双城等部围追堵截，在艰险之时，他更打不起精神来，活像进了一趟地狱的人，浑身软塌塌的，连说话也有气无力。进入韩城地界后，高双

成的部队不再追了，李象九长长出了几口气，抱头整整睡了三天。到了王保民的旅部，王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把李象九灌得迷迷糊糊。看来李象九接受收编的决心已定，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很可能就会葬送这支革命的武装力量。

谢子长、阎揆要、唐澍一回到驻地，立即商量对策。认为趁王保民尚未改编之机，二次举行起义是必要的。他们很快召开了党的会议，决定以白雪山、史唯然的两个连为主，再带上那些不愿意留在王旅的人，抛开李象九，重新组织军委。遂即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下编4个队。唐澍为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部队日夜兼程，很快隐入韩城以北的群山之中。

部队起义的第三天，到达了宜川城南的高家湾。这里只有一条小小的街道，住着二三十户人家，是宜川到韩城的必经之路。如果不去宜川，是可以绕着高家湾后边的西山直接去延安的。可是，侦察员前来报告说宜川守敌只有一个连，又勾起了谢子长攻城的念头。

冬季的夜异常寒冷，天上的星星也似乎怕冷，大都没有露脸。这正是奇袭的好机会。在谢子长的一再说服、鼓动下，唐澍同意了攻城的计划。

被当地群众称为“船城”的宜川城，它的一头是七郎山。这七郎山立在城南，城墙沿山脊而筑，把七郎山一劈两半，一半在城内，一半在城外。谢子长摸到山脊城墙下时，敌军一点也没发觉。

该登城了，可战士们一下傻了眼，城墙很高，是石块砌成的，无法攀缘。谢子长摆摆手，示意大家暂时停止行动。随即，他沉着地从身后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几把刺刀，几上攀跃，“嗖”“嗖”“嗖”刺刀便成梯子状插在城墙上。他略微活动一下身子，然后，像灵巧的猴子一样，踩着刺刀一步一换地爬上了城头。战士们都看呆了，从心里为他叫绝。

绳头从城头上扔了下来。

战士们顺着绳子迅速爬上了城。

天渐渐有点亮光，守卫七郎山的敌人突然发现红军游击队进了城，劈头盖脸地射击了。

几个战士相继倒下，鲜血像火一样烧红了谢子长的双眼。他赶紧重新组织力量，向七郎山碉堡冲去。

“嗒嗒嗒……”敌碉堡里的机枪齐声响了起来。这时，凤翅山那边的碉堡也喷出了火舌。

没想到，谢子长在这里又一次尝到了凤翅山的厉害。

凤翅山比七郎山高出一大截，从凤翅山上射击，可以打到山上任何地方。

红军被迫钻到一个个掩蔽体里，简直抬不起头。

谢子长懊恼透了，握枪的手不住地发抖。这才意识到由于自己的鲁莽行动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可是，检讨已来不及了，战士们牺牲得太多了，他们什么也听不见了！谢子长恨不得狠狠抽自己几个嘴巴。……他噙着眼泪，一滚身子，碰到了一个人。

“老唐……”他们一句话没说完，却被一阵枪声打断。

唐澍这时才艰难地又爬到他跟前：“情报搞错了。刚才捉住一个俘虏，他说敌军有一个营。我看，得赶快撤！”

子长的牙关咬得咯咯响，狠狠地看了凤翅山一眼，点了点头。

唐澍下达了撤退命令，部队边打边退，又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撤退中，连长史唯然和阎红彦失散了。白雪山带人去打虎头山，没打下来，把白雪山也弄丢了。损失真是太惨重了，他们带着七零八落的队伍，连夜向延长转移。

寒冬腊月，部队衣薄粮缺，很多人中途牺牲，不少人开了小差。剩下的人连日跋涉，又冻又饿。没想到，刚进入延长县的七里村，敌人却又突然追了上来。唐澍、子长急令部队快步前进，好不容易躲过敌人的锋芒。

前面就是安定城。安定县民团一听谢子长的队伍回来了，没打一枪，就急忙撤出了城。老百姓才不管那么多，老谢是他们心中的恩人，都呼拥着迎接，杀猪宰羊地欢迎他们。谁知瓦窑堡的守敌一听红军进了安定，马上派骑兵追了过来。唐澍、子长不敢恋战，更没心思，也没心情吃老百姓

锅里的肉，就又向安塞转移。

安塞守敌是高双成的一个营。这个营的人大都是亡命之徒，打仗又刁又狠。未待红军接近他们，就派一个连迎头打来。唐澍、子长见状，当即部署应战，命令一排正面抗击，其他人沿山撤走。谁知，敌人放了一阵排子枪，红军战士正开始奋力还击，企图要压倒敌军火力时，偏偏背后又追来了从瓦窑堡方向来的敌人骑兵。部队措手不及，一下子被冲得七零八落。几经苦战，摆脱掉敌人后，子长跑到一个山嘴子上，插起一面小红旗，以此为号，集合突围出来的同志。终于到了保安的瓦子川，清点人数，才发现仅仅只剩下 29 人。简直不像队伍了，有的人满脸满手都是血；有的人浑身衣服烂成了条条。谢子长望着大家，心里真不是滋味。唐澍久经沙场，比较沉着，他对大家说：“同志们，咱们打了败仗，清涧起义是失败了，不过，用不着垂头丧气！咱们是无产阶级的队伍，要为穷人打天下，战士们是有志气的，打散了还会回来。大家把眼光放远些，一两个战斗打败了，算不得什么……”战士们本来心里就沉甸甸的，经他这么一安慰，反倒受不了了，有人干脆放声哭起来。

突然，哨兵前来报告说，敌人又追过来了。

看来，整队出去是来不及了，谢子长和唐澍简单研究了几句，宣布部队就地解散。大家便三三两两地钻进山上的梢林，各自向外面逃去。

子长拉着唐澍、阎揆要钻进拐沟，又往西北方向走，一连走了两天，也没敢踏实地吃碗饭、睡个觉。直至摸进保安与安塞的交界处一个小村子里，正好是子长来过的地方，还有几个人认识他，都拉他去吃饭。舒舒坦坦吃了顿饭，3 个人往炕上一躺，就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直到第 2 天早上才醒过来。

睁眼一看，老乡又把饭做好了，是一盆黄米干饭，另外还有一盆洋芋酸菜熬猪肉。子长鼻子一酸，这都是老百姓过年的饭食，现在却端来给自己吃，想想牺牲的战友，看着唐澍：“哎，我没脸吃呀！”放下饭碗，两手一抱头，呜呜咽咽哭起来。

唐澍见他这样子，心里也很难过。

阎揆要用筷子拨拉着饭，问道：“你是不是灰心了？”

子长默默地摇了摇头。

挫折使子长掂出了干革命的分量。他虽然没有颓丧，却总陷入自我责备而不能解脱的境地。唐澍觉得这种情绪非常有害。他和阎揆要暗暗对视后，轻声地问：“子长，你知道伍员逃国的故事吗？”

接着，唐澍给他讲起了春秋时期，楚平王和伍子胥的故事。讲完后，唐澍说：“古人常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共产党人，并不是报个人的私仇，而是报民族和阶级的公仇。伍子胥报仇费了那么多周折，我们要闹革命，要推翻一个旧世界，岂在一仗两仗的胜负得失？”

听完唐澍的话，子长猛地坐起来，浑身打起了精神。

吃完饭，3人便要继续向前走。农家老太太拉住他们说：“你们这个样子，不叫人家捉住才怪哩。”

3人低头一看，这才发现身上仍穿着已经稀烂的军服，都不由得感激老太太的提醒。最后在村民们的帮助下，他们东家寻西家凑，备齐了3套衣服，3人俨然一副农民的装束打扮。

子长他们一再表示感谢。那位老太太宽厚地笑道：“好娃娃，快别说这些，只要你们闹成了事，咱穷家百姓也有好日子过了。”

就这样，告别了乡亲，3人一起化装前往西安。

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装暴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失败了。但它却在西北地区第一次举起了工农武装斗争的大旗，燃起了工农革命的火焰。它是继“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向当地国民党反动势力打响的第一枪。它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同时，它还为我党在西北地区培育播种了一批革命种子。

四

1928年。

寒流侵袭过的中华大地，春还是如期降临了。一丛丛新绿从苏醒了的土地上托出，杨柳枝头缀满了星星点点的叶芽，田野里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

勃、万物更新的景象，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

古城西安。

晚霞把它的剪影描画得更加沉郁和伟严。钟鼓楼、大雁塔，如血初染。

只一会儿工夫，夜幕如同黑色的纱幔轻轻罩住了这座古城。

在东郊一所叫八仙庵的房子里。李子洲、魏野畴和潘自力、刘继曾等几位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人正在开会。门外放风的人匆匆进来，说：“李老师、魏老师，门外有人找。”

几个人一听，很快疏散开。只有魏野畴和李子洲走了出来。魏野畴、李子洲可是我党的两位杰出党员。魏野畴原名魏风际，陕西省兴平人，是陕西地区最早的马列主义传播者，陕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系学习期间，就和李大钊有联系，“五四”运动时，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曾与陕西省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李子洲等，在京共同组织共进社，团结陕西旅京进步学生，进行革命活动。1921年夏天由北京回陕西的李子洲在华县咸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历史、英文教员。通过教学活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革命活动。他一到任首先对华县的旧教育制度和教育情况进行了调查。极力反对当时中学4年的旧学制，提出3年制新方案。并草拟了教学改革计划，对陈腐庞杂的旧教材，力主改革，认为旧教材对学生是浪费光阴，是“无异把粪便拿给学生吃”。他还非常重视女学的倡办。1922年3月1日，在他的倡导下，华县成立了女子师范学校。他以无限的热忱宣传新文化新思想，通过各种组织形成，给学生灌输马列主义。利用课外活动时间给学生讲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邀请当时在北京学习的朋友、共产党员王复生等去咸中教课，向学生介绍党团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等。1923年，魏野畴第二次从北京回陕到榆林中学任教。利用国文课给学生讲授唐诗中反映群众呼声的诗篇和鲁迅先生的作品外，还公开讲解马列经典《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以及《社会科学概论》等。组织学生会，指导学生会创办了《塞声》杂志。刘志丹便是他不可多得的优秀门生之一。当时一篇由刘志丹写作的抨击井岳秀等反对势力的《官逼民反》的文章就刊登在此杂志上。文章一刊出，一时间满城风雨，引起了井岳秀的警觉。继而连

珠炮般，刘志丹又一篇《扫除朽骨》揭露井岳秀抓了大批人，占了大块地，学着皇帝的样儿给自己修墓的文章终于让井岳秀坐不住了，开始对罢课学生进行镇压，对学生家长实行威吓逼迫，要他们叫回自己孩子，以免赤化。1925 年春天，广东革命政府开始扫除境内的反革命势力，全国工农运动风起云涌的消息像春风一样激荡着魏野畴和他的学生们。刘志丹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全省学界在三原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魏野畴自己甚至没有想到他抱着“拓荒”心情，来陕北这块以为贫穷落后的不毛之地，竟忽然发现这里是一块沃土，一片绿洲。他教学之余，还挤时间积极从事翻译、编著工作，翻译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美国劳工运动史》，修订了他在北京读书时编写的《中国近世史》等。到了 1924 年，反动派借口他“左倾”，迫使他离开了榆中。不过，他在短短的一年中，已经培育出了如刘志丹、谢子长等党的优秀人才。

魏野畴和李子洲在门口眺望着，借路灯这才看见八仙庵外街道上的一棵大树下，摆着一个卖吃喝的小摊。摊主不时地叫喊：“凉粉，醪糟。”——一身农民装束，头上扎了一条白毛巾的谢子长正坐在小凳上喝醪糟。老远看见魏野畴和李子洲过来，忙放下碗。

“魏老师，李老师，你们好！”

“你好！”

魏野畴、李子洲示意到僻静处去说话。他们绕过八仙庵，来到护城河边，沿河漫步，边走边谈。

“自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冯玉祥部宋哲元在陕西制造了更加森严的白色恐怖，他们出动法西斯组织‘铲共团’和大批密探，到处侦查破坏我党团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了与国民党的反革命镇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陕西省委于 3 月 29 日领导、发动了一部分学生和农民，打死了曾捣毁我区党委所在地——宣化观小学的反动豪绅刘铭初，打伤乐育小学反动校长田宝丰。这一斗争，打击了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争。”

“太好了！”没等魏野畴把话讲完，子长就挥着拳头欢呼。

“这一下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更疯狂镇压该地区的革命运动了。”

李子洲见四周没啥动静，接着说道，“他们先后封闭了渭南县中学和渭南东关小学等我党活动据点，抓走党团员和革命群众四十多人，收缴了我党所掌握的高塘自卫团的武装，并企图进一步消灭我党在渭华地区的党团组织。面对敌人的反扑，省委决定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在陕东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陕东工农民主政权。……”

正说着，突然间，从草丛中跳出四个特务，掏出短枪，推弹上膛，逼住他们，厉声命令：

“不许动！”

谢子长从衣服底下拔枪反抗。一个大个子从背后抱住了他，下了他的枪。魏野畴和李子洲也被其他人抱住。这时，特务头子赵志俭从草丛中站立起来，狡猾地笑着说：“看你们今天到底有多大能耐。走，押上走！”

特务们趾高气扬地押着三个人向前走去……

正巧，一位中等个，白净英俊的青年军官，带着十多个副官、马弁，迎面走来。看见特务押着三个人，那军官先是一惊，继而，稳住了神，拦住质问：“为什抓人？”

赵志俭上前敬礼，立正报告：“报告长官，这三个家伙，都是共产党要犯，小的亲眼看见，他们妄图谋反……”

没等赵志俭说完，那军官走上前来，接连抽了他几个嘴巴，厉声斥道：“混蛋！你没有证据，当众造谣，诬陷好人，制造混乱。上！”

十几个副官、马弁一拥而上，缴了特务的枪。

赵志俭连忙跪倒，苦苦哀告：“长官，你看看，我们是省党部宋书记长亲自派来的。”说着，双手递上特务的“派司”。

那军官看也不看，说：“你们这些土匪，我见多了。”说着，又对他的副官、马弁们说，“曹副官，你带人把他们押到前边，仔细审查，就地处理。”

特务们忙跪倒求饶：“长官饶命！”“小的们有眼无珠……”

副官押着特务们走后，那军官又对马弁说：“将他们押进城内，我要亲自审理。”

两个马弁押着魏野畴他们向前走，拐过了城角，来到僻静处，见四下无人，军官忙走上前来，解开绳索：“魏老师，李老师，委屈你们了。”

魏野畴，李子洲迎上前来，拉着军官的手说：“刘志丹同志，今天多亏你呀！”

谢子长也拱手说：“老同学，你在黄埔军校毕业了？没想到，在这儿见面！”

这位英俊的军官就是刘志丹，当年井岳秀曾用 200 块大洋买过他的人头。

刘志丹于 1903 年 10 月 4 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祖父刘士杰是清同治年间的拔贡，秉性刚直，喜欢打抱不平，颇受乡亲敬重。父亲刘培基是乡里的秀才。志丹出生时，他在金汤小学教书，后来经商，一度担任地方民团文职副官。志丹 6 岁，随母回到金汤镇北 30 里的山村老家楼子沟，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稍长，就读于永宁山本县县立高等小学堂。1922 年来到离家六七百里的榆林，考入陕西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思潮影响，志丹迅即跟上时代的潮流，开始了他艰苦奋斗的革命生涯。1926 年秋，志丹在黄埔军校毕业，随军远征。这时，冯玉祥从苏联回国，成立国民军联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要求我党选派干部到其部队工作。同年冬，志丹奉命被派往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次年春，豫陕正处在革命高潮中，被赶出陕境的吴佩孚余孽刘镇华部，还盘踞西山区作乱，志丹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代表，去豫西收编刘镇华的军队。刘曾企图以重金收买刘志丹，要志丹在冯玉祥面前替他说好话。刘志丹立场坚定，严词怒斥刘镇华的收买阴谋，使其不得不答应接受收编。后刘志丹又奉命回陕，于 1928 年 1 月上旬在许权中旅工作。

刘志丹握着谢子长的手，说：“是啊，我们能在这里见面也是蒋介石、汪精卫逼出来的！黄埔毕业，参加北伐，分在冯玉祥部下，今来西安执行公务，有幸古城相会。”接着，刘志丹又说道：“敌人已经动手了，你们赶快离开这里，注意隐蔽。”于是，他们便分头走了。

这是个阳光很好的日子，刘志丹依然是军官打扮，骑马出了西安，直

奔洛南的三要司。那里住着许权中旅。是党费尽心血保存下来的一支革命武装，由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和中山军政学校学员组成的。而这两个单位的各级领导人员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掌握的惟一的军事力量。1927年7月，冯玉祥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编，命令史可轩率领这支武装去河南“整训”，实际上是阴谋伺机消灭它。中共陕西省委当即决定，拒绝命令，不赴河南，由史可轩率部开赴陕北山区独立发展。7月14日，史率部向渭北山区进发。7月29日，盘踞富平县美原镇的地方军阀由生春将史可轩杀害。部队北进受挫后，退至临潼县康桥镇，由许权中回队统一指挥，暂属于国民党冯子明部。冯任命许权中任旅长，先后驻防临潼县关山镇、泾阳县云阳镇及三原、高陵等地。1927年底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精神，部队又南渡渭水向商洛山区进发。行至蓝田县许家庙，许权中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冯子明策动的阴谋叛变活动，纯洁巩固了部队。后来，部队到达商洛后归属李虎臣部，李又委任许权中为旅长，全旅共有1290余人，1020多支枪，有共产党员50多人。1928年1月17日，部队移住洛南寺坡、三要司。当冯玉祥转向后，反动派就千方百计想把这支部队调出潼关，并吞消灭。当时，冯玉祥对待自己收编的杂牌军，也是“大鱼吃小鱼”，各部之间互相疑忌倾轧，彼此勾心斗角。我党就利用这个矛盾，“找主求生”，才得到合法的存在机会。

刚到村口，志丹下了马，一群穿军衣的跑来，又是敬礼，又是喊“刘教官”，他们都是许旅的青年军官，大部分是中山军政学校出来的，聆听过刘志丹的课哩。几个军官就领着志丹去旅部。走进街心，忽听风箱呼呼噜噜，铁锤叮当叮当响。军官们说：“这是兵工厂干活。部队有5门迫击炮，就是没炮弹。农民们用土铁正给咱们造炮弹呢。”说着来到龙王庙，志丹看见院子里的工人正铸弹壳，沿墙根摆了一堆木柄手榴弹，屋里供桌上堆着迫击炮弹的成品。志丹问：“机器哪里来的？”几个人笑说：“哪有机器？杨书记出的主意，把个铁匠炉一改装，就成了工厂。”那位叫杨伟林的人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大革命以前的老党员。西安解围后，在省政府管财务，如今是许旅的党委书记。可是平常，他只穿大褂，在部队出出进进，所以，大家都当他是旅长的“上宾”，只见他一撩长褂，不好意思地笑着：“找了几个老铁匠帮忙，自己瞎折腾，指点着就造起炮弹来了。”志丹一拍他肩膀：

“杨伟林同志，你太不简单了，又能文，又能武。”

来到旅部，许权中旅长高兴地拉着刘志丹的手说：“景桂同志，可把你盼来了。”许权中三十来岁，微黑冷峻，中等个头，韶关讲武堂的学生，在中山军政学校当过总队长。

志丹洗着脸问道：“听说队伍里出了叛徒，没受损失吧？”

杨伟林说：“多亏发觉得早，先除了叛徒，才转移到这儿投了李虎臣的，现给了个新编第三旅的番号。”

许权中感叹道：“从离开西安后，投奔过两个军阀。真好比跟虎狼打交道，阴谋暗算，防不胜防。投李虎臣算是第三次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哩？”

志丹一听，激动地说：“所以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上、军事上完全统一的自己的队伍。为了有自己的武装，大路只有一条，实行武装起义。”

5月8日，如洗的阳光温暖着大地。陕西省一个叫高塘镇的小山坡上举行着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热烈庆祝西北工农革命军诞生。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唐澍任总司令，许权中任军事顾问。

刘志丹在会上热情洋溢地讲了话。群众热情很高，整个山镇沸腾了。街头、山沟、河滩之间，排满了整齐的军队，上好刺刀端着枪，一排排地走过来走过去。孩子们成群结队地跟着机枪营呼叫跳跃。

想起几个月来的工作，刘志丹感慨万分。

他刚来部队没几天，便开始整顿部队。首先肃清了部队内部的坏分子，撤换了那些不称职的指挥员。然后，发动群众，斗争了恶霸地主阮化生，公审了豪绅何豹子。在群众的要求下，这两个坏蛋当场被枪毙。搜集地主恶霸在山中的存粮，解决群众吃粮的问题，并给部队备足粮秣。这时，省委又把唐澍调来，使他更为欣喜。他们一起抓紧部队建设和练兵习武。一天到晚，刺杀声，打靶的枪声，报靶的红旗，爆破的雷鸣，各种声音交响在山谷里。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明白，这是武装起义的前奏。只要省委一道命令，部队马上就会打起红旗来。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李虎臣却要部队去攻打潼关，消灭马鸿逵的队伍。

原来，李虎臣发动反冯战争后，急令何毓斌去围攻西安，他怕冯玉祥回师陕西，所以，命许权中去进攻潼关，企图扼守这个要道，阻止冯玉祥。去不去呢？就像一道横坎卡在路当中。志丹和他的同志们犯难了：我们养兵蓄锐是为了起义，若是为地方军阀去争权夺利，岂不白流血汗。不出兵，又怕暴露了自己的意图，他们一时定不下决断来。

在一个月光如昼的夜晚，刘志丹和唐澍等人坐在窑洞外的空地上，仰望天空，数落着天上星斗，又作彻夜商谈。

天亮了，曙光照耀着山河。志丹拍拍衣服上的土尘，向唐澍道：“就这么定了！”

最后，他们终于决定不参加攻打潼关的战争，迅速起义，去渭华配合当地农民的武装斗争。并得到了省委的支持。他们真是心花怒放。为了不暴露起义意图，当晚便离开巡检司，向潼关方向前进。同时，派了雷天祥带一个营先去渭华（渭南、华县）。

到了潼关，他们担任正面进攻。

正巧，马鸿逵也来了个假投降，以便拖延时间，调孙连仲军来支援潼关。

李虎臣信以为真，静等马鸿逵投降。

唐澍认为：这正是离开潼关的最好时机，就立即进行了部署。

部队拉出潼关，走了 30 多里路后，在南源以西的一个村庄里，宣布了起义。全军上下顿时欢腾若狂，大队人马蛟龙似虎直奔渭（南）华（县）。

到了高塘镇，见到了地方党的领导人，那人欣喜地说：“你们来得正好，这里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起义了。如今正需要这样一支武装力量。”接着，他详细地向志丹他们介绍了这一带的情况。

听了这些情况，他们才知道这里的革命运动正闹得热火朝天。广大群众已组织了陕东赤卫队（大队长是李大德，副大队长是薛自爽，党代表是冯养浩）先后出击了大王村、算王村、王家崖等十几个重要据点。现已发展成为一支有 100 多人，五六十支长短枪的武装。

在陕东赤卫队的配合下，他们开始打土豪。前边是打着枪的军队，后

面是整齐的农民队伍，唱着歌，浩浩荡荡的直向大土豪的住处拥去。像疾风扫落叶一样，一两个晚上，渭南、华县一带的反动政权就被他们摧毁了，反革命武装和地主团、队被我军民打垮了。各村庄成立了自卫队和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组织、宣传委员。在崇凝镇还成立了“崇凝区苏维埃政府”。部队正式编成5个大队，每队约200人左右，第一大队队长为赵松生，第二大队队长是谢子长，第三、四、五大队分别由武培漠等担任队长。另外还有一个手枪队和一个骑兵团。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的大会就像是在疾风中燃起了烈火。革命的火焰燃烧得更加旺盛了。

“革命起来了！”这声音像春雷，像疾风，南从秦岭，北达陇海线，在那广约2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滚动着。到处是沸腾的人群在进行斗争，打土豪的声势更为壮阔。“火化契约”的运动普遍开展了。在渭南大豪绅薛春和被农民处死后，华县的郭、王、刘、庞四大豪绅都吓坏了，有的叫他们的儿子拿着农民借债的文约，跑到借债的农民门口，低声下气地说：“大叔，我把文约拿来了，当着你的面烧了吧！不再向你要钱了。”大家真像过大年一样，街上、村上的红旗飘扬着，革命的洪流不停地回荡着。乡村和城镇，大人和孩子都唱着：

农民苦，农民难，
一年四季不得闲；
农民苦，农民难，
打的粮食叫地主收完。
共产党，领导咱，
打土豪，打劣绅，
为咱农民把冤伸……

一天傍晚，杨晓初从大庄回驻地箭峪口，刚从很难通行的小街道挤出身，身后跟着一位老大娘。她穿着一件打补丁的衣服，拿着3个热鸡蛋赶上来，喊道：“老总，你跟苏主席住在一块吧？请你把这几个鸡蛋捎给他。”

“苏主席？”杨晓初纳闷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来了！但他不姓苏呀，

他是潘自力同志？刘志丹嘛？他也不姓苏呀……

老大娘看出他不解的神情来了，就打着手势补充道：“现时里咱们中国不是有两个政府吗？一个是蒋介石蒋秃子的政府，一个是苏维埃政府，咱们穷人的政府头头不姓苏吗？”

“哦！”这才使杨晓初恍然大悟。他高兴地扶着大娘，“是姓苏，姓苏。谢谢大娘，我给你捎去！”

谁知新生活刚刚开始过了没半个月光景，敌人就开始进攻了。消息一传来，正在田里锄地的农民，跑回家拿起了火枪；在山坡上砍柴的，放下扁担拿起了长柄斧……农民们纷纷武装起来，他们高呼着：“保卫农民协会！”“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奔向火线。

敌人一个旅，从渭南出发，顺着瓦塔至龙尾坡间的土坎，像笨猪一样，慢慢向前爬动着。他们刚到龙尾坡的南端，就遭到我们埋伏部队的突然袭击，丢下大片尸体逃了回去。

没过两天，敌人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次竟把田金凯的一个师也调来了。东从崔家村，西到段家村的龙王庙，在两块大原上分了几段，成扇面形直向我军步步围攻。敌人每到一个村子就放起大火，大王庄、贺王庄全村都卷起了火焰。高塘以北，成为一片火海。

大家看到这种情形，个个气愤极了。其时，陕北还没有游击战的经验，只好拉开战线，硬碰硬地阻击敌人。敌人兵力又数倍于我，因此，情况十分紧张。特别是魏家原阵地上，只有一个连防守，而敌人却派一个团来进攻，我们的总指挥部就设在离魏家原不远的高塘镇，不用望远镜也可以看得清，敌人正集中炮火，掩护他们的步兵，连续不断地向魏家原冲锋。他们的架势就像赌场上发了疯的赌棍，拼着家底孤注一掷，好像只要拿下魏家原阵地，就能全部消灭共产党似的。但多少次的战斗，都被这个连打垮。之后，敌人又派了一股大部队，从崔家村东边向我正面部队的身后迂回，企图先搞掉魏家原再攻占高塘镇。这时，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先看穿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他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也似的跑回三教堂村，举起木锤，当当地敲起钟来。没有一个钟头，四乡的农民扛着锄头、长枪、阔刀都聚集起来。薛自爽粗略点了一下人数，竟有四五百人之多，他再把这些农民

分成小队，喊了声：“跟我走啊！”“哗啦啦”一群农民的队伍像潮水似的拥出了村庄。

他们赶到崔家村，敌人刚分成散兵队形，正一群一堆地往山上爬。这时，刘志丹派人送来命令，他知道农民们作战经验不足，硬上要吃亏的，便通知薛自爽随机应变，打强敌的空隙。只见薛自爽一挥手让大家趴下。过了一会儿，他又“冲呀！杀呀！”地喊叫起来。几里长的阵地上喊声、杀声，声声震天，此起彼落。霎时间，敌人像遇到猛烈的虎狮和熊熊的炮火袭击，急忙转身往回跑。哪能便宜了你？要知道，农民有农民天性的拗直，他们紧紧咬着敌人不放，土炮、锄头、木锤一齐劈头盖脸地向敌人下“暴雨”。这时，高克林带着一个排赶来，集中火力向敌人再射击。敌人终于你挤我，我拥你，像一群蚂蚁，溃退了下去。

正面的敌人一看侧面的退了，顿时也慌乱起来，大有如山倒之势。

我们四五百农民和高克林带的一个排趁热打铁，向敌人又发起侧击。整个正面阵地的敌人像得了流感，一群传染一堆，都混乱了，乱糟糟地逃回了华县。

刘志丹就是这样一位善于抓紧时机，结合实际情况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和鼓动工作的指挥员。第一次反击胜利后，他把赤卫队战士、干部集中起来，坐在司令部门前的地坪上，风趣地给大家讲起《水浒传》上李逵救母，力杀四虎的故事。唐澍便插话说：“在我们工农革命军中也有一个‘李逵’，他就是我们的赤卫队队长薛自爽同志。”刘志丹接着说：“对，薛自爽就是我们工农革命军中的‘李逵’，他回家探亲，被渭南县保安团包围了，他沉着勇敢地背着母亲冲出敌人包围，母亲因负过重伤牺牲了，他很快回到赤卫队……”大家对薛自爽报以热烈的掌声。

打退敌人二次进攻后，志丹又召集了军委会，分析敌我形势，他说：“我们虽然取得了两次胜利，但仍处于敌军四面包围之中，敌数十倍于我，加之冯、李言和，冯玉祥肯定会回师陕西，大军压境，我们与敌人硬拼，势必粮尽弹绝，全军覆灭。我们应立即作转移到陕北的准备，到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他还说：“如果情况太紧急，可向秦岭以南撤退，再谋新图。”

正如刘志丹所料，6月19日，敌人又发动了第三次进攻。这次，敌人

调动了一个军的兵力，其中有孙连仲的一个师，魏风楼的一个师，还有一个炮兵师。逃到县里的大地主、大豪绅们像墙头上的草，一见风向倒了，赶快支援敌人，一块来了，他们成了敌军的急先锋和带路人。

我们跟数十倍于我的敌人，激战了两天两夜，指挥所前沿阵地被捣平了，人员伤亡甚大。然而，阵地并没有放弃。第三天拂晓，大地主薛良臣引路，带着敌人一个团，直向我们西路部队后侧箭峪口袭来。企图把我们的退路切断。

当侧面敌人到了侯家崖时，薛自爽把胳膊一抡，喊了声：“赤卫队跟我来！”迅速把队伍带上去，占领了侯家崖村西的土坡，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抗击。经过几天几夜的残酷激战，他那号称 100 多勇士的赤卫队，现在仅剩下十来个人。

中午，许权中把骑兵队带来时，见到薛自爽已经是身体多处负伤，头上、胸部都绑满了白布条，脸也被硝烟炮火熏得漆黑，衣服破得到处露肉，就像星条旗片挂在他身上。但是，他那双黑眼睛奕奕有神，说什么也硬是扭着不下火线。

许权中率领的骑兵队，一直坚持到天黑，击退了敌人三四次进攻。这时，刘志丹下令部队逐渐向秦岭以南撤退，相机而动。于是西路部队撤退到箭峪口，占领着山头掩护许权中队撤退。

敌人以强欺弱，见我骑兵队向后撤退，又调动了所有的部队反扑。后撤部队与他们接上了火，战斗又到了白热化程度。

天黑下来，部队接到上级指示，要东路队从街峪口，西路部队从箭峪口，一齐向南山转移。

就在我撤至箭峪口时，一颗子弹从薛自爽胸部穿过，他跌倒在地上。人们忙去扶他，他瞪着两只大眼严厉地说：“我活不了了，枪不能让敌人拿走，给你们，你们快退，别再管我。”怎能把这样的好兄弟留下呢，战士们就强硬背上他，一直退到箭峪口不远处，这位烈性直憨、勇敢无比的关中汉子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了。骑兵队的同志，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冒着敌人的炮火，挖了一个坟穴掩埋了薛自爽的尸体（后来，气急败坏的敌人，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砍成肉块）。

是夜，骑兵队的同志们守住箭峪口，掩护大队在秦岭山上宿营。

清冷的星光挂在天幕上，把夜推得更远更深处。夜虽平静，可大家的心不平静；同志们怀念牺牲了的战友，思念家中的老小，更担心大部队会不会和敌人遭遇。

这时，一阵急催的马蹄声敲碎了夜的平静，惊震住了人心中的不平静。省委交通员来报告，由于叛徒出卖，省委机关被破坏，省委书记李子洲等人被敌人逮捕，于6月18日壮烈牺牲。新省委和中央断了联系，要刘志丹立即去找中央。

大静过后，人们的心中便是大恸，继而又担忧不安了。

夜深了，似乎一股黑云压了过来，月儿退下去了。刘志丹的心里沉重极了。他点着根烟，一边沉思着，来到山上的谢子长处。两人一夜未合一眠。商议、交待、告别……临走，刘志丹说：“宋哲元指挥的这次进攻虽然退了，估计李虎臣还会来。这南山终不是久留之地，如有机会还是要分散向陕北转移。”

谢子长会心地点点头。

夜深星寒，明天不知是阴还是晴。

第二天中午，当骑兵部队进入蓝田县境许家庙一带时，又一个沉痛得令人窒息的消息传来：东路部队撤到雒南县的保安镇，刚过两岔河，赵松生率第一大队突围出来，敌人又以3个旅包围了唐澍率领的队伍。战斗异常激烈，他们打到最后只剩下4位同志，还继续坚持了4个小时。唐澍在那里光荣地牺牲了。事后听说雒南县方少海团，把唐澍的头颅割下，挂在城楼上。敌人真是惨无人道啊！

唐澍……

刘志丹骑在马上，豆大的泪珠再也不受控制地滚动下来……

在李虎臣几个旅的镇压下，起义部队只得取消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一部分人跟许权中去河南，一部分人化装分散活动。

大家都分开了。唐澍、廉益民、吴浩然、李大德、赵雅生、薛自爽……这些牺牲的同志们，该以怎样的心情和你们握别呢？不，你们不能走，我

刘志丹这就去找中央，我们一定要坚持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一定要将星星之火燃遍西北大地。“我坚信！我坚信你们的鲜血凝炼成的革命的火种一定会燃烧出一个红彤彤的新家园！”

大家目送着刘志丹，消失在一轮晚霞中，盼望着刘志丹为他们寻得中央，接种火苗。

第二章 会面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刘、谢的握手，把黄山坳中的两块红色风景握在了一起。

骡子走前马走后

深一脚浅一脚又上了路

—

转年就到了 1929 年。

天麻麻亮，雾气蒙蒙，西安城里那些卖菜的，卖吃食的，就忙着收拾筐担，准备应酬主顾。只见晨光朦胧中，一辆马拉轿车，摇摇晃晃驶过街道。赶车人坐在车辕上，扬着鞭子，高声吆喝牲口，鞭子响得又清又脆，来到城门洞，城门还紧闭着，好多男女围成一堆，等候赶早出城。赶车的跳下车，收住鞭子，向哨兵点点头说：“老总，我们家老太爷有病，夜里打发我进城请医生，请你通融通融吧！”

哨兵斜了一眼，不搭腔，赶车的忙递上烟卷，说：“请老总赏光。”哨兵指着墙上的布告说：“你看见告示没有？城里正搜查这个人，上头没打招呼，就是皇帝老子来了，也休想出去！”赶车的扫了一眼，布告上写着核桃大的字：

“缉拿渭华暴动匪首刘志丹”。

下面还写着衣着相貌特征，画着影形图。

哨兵又补充一句：“人走了，谁担得起？”

赶车的忙从怀里掏出个大信封，双手捧着递过去说：“请老总看看这个护照！”

哨兵接在手，抽出信瓢瞅瞅，一个字也不认得，只见上面盖着大红官印。捏捏信封，还有硬货，猜想是银元，立时满脸堆笑地说：“原来是张医生。”挑开轿车的门帘，看了看，见那医生，温文典雅，洋草帽，金丝眼镜，白纺绸衫，穿戴得整整齐齐。哨兵连连点着头说：“认识认识！”把信封塞进口袋里，忙去摘下铁链，拉开城门，哈哈腰说：“对不起！耽误你们了。”

医生欠欠身子，抬抬眼镜，算作还礼。赶车的鞭子“吧塔”一甩，轿车出了城。

那伙做生意的男男女女趁势往外挤，都被哨兵挡回去。

出城二三里，转进一条土沟，轿车“吱扭”一声停下来。赶车的拿鞭杆敲敲车篷，说：“先生，车轴坏了！”

医生探出头问：“到了吗？”

赶车的笑说：“谢天谢地，总算过了虎口！这哨兵是个笨蛋，还说同你是老相识！”

医生也笑起来：“他认得银元上的袁大头！”

赶车的说：“说不定他真以为，刘志丹是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呢？”

医生说：“真长成那副模样，今天就出不了城了。化了装也不灵，人家一眼就认出来这个怪物不是？”说着，摘了眼镜，脱下纺绸衫，打开小包，穿上一身蓝制服，又把脱下的衣服包好，交给赶车的说：“这些东西，我留着无用，你还是带回去。对省委的同志说，一路平安无事，叫他们不要担心！”

赶车的把小包塞到车板底下，也嘱咐说：“大路上贴满了告示，你也不要大意！”

这位医生就是刘志丹。

上个月，他被省委派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当时，党的“六大”刚开过，志丹读了“六大”文件，认识到目前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党的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六大”总结了革命武装的经验教训，既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发布了民主革命十大纲领，确定革命任务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陕西省委根据“六大”精神，结合西北的情况，对今后工作，重新做了部署，派出一批干部，到白军中做秘密工作。刘志丹被派往陕北，担任特委的军委书记，从事军事活动，等时机成熟，再打起红旗，实行武装割据。

前些日子，志丹就要动身的，不料，有叛徒告密。敌人出动大批军警，

沿门挨户搜捕他。他在榆中上学时的一位女同学把他藏在一个杂货铺的后院，憋了一些日子，才躲过去。今天，好不容易得着机会，由后院翻墙出来，由交通员送出了城。

志丹穿行在田间小路上，放步紧走着。

真是人患天灾，今年又逢陕西大旱灾，夏秋苦旱，天高无雨，刀镰不动，庄稼苗子都枯死了。省委曾派黄子文、陈冠英等到渭北帮助农民解决糊口问题。他们提出了“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杂税，官逼民反，若要不反，离死不远，大家起来，实行共产”的口号……

志丹拿了把黑阳伞，也不打在头上，顾不得烈阳似火，顾不得疲劳饥渴，只是两脚不住地往前赶路。中午时分，已过了铜川，擦擦额头上的汗，稍作休息，便开始爬山，到第二天正午，又到了洛川。

这座小县城，坐落在土塬上，孤孤零零，毫无生气的样子，却见路边的土墙上，也贴了两张悬赏捉拿刘志丹的告示。志丹微微一笑，略一迟疑，还是拿着伞走进南门一家小店。拣了个红漆小桌子朝里坐下。刚叫掌柜的泡茶，后面跟着进来个人，中山服，黄皮鞋打扮。掌柜的忙又赶过去，张罗说：

“书记长来了，请坐。看茶！”

那人嫌他啰嗦，挥挥手叫他下去。只是两眼像滚豆豆一样，在志丹身上乱转。

刘志丹听见招呼，一回头，四目相对，吃了一惊。他稍作镇定，干脆直呼道：“黄舜尧！”

黄舜尧认出果真是刘志丹，转身就往外走。

志丹伸手拉住说：“黄先生，一向少见，别忙着走啊。”

黄舜尧只得站住，绿豆眼转了几转，立刻装作刚认出来的样子：“原来是刘先生！我看见有人上塬，心里就奇怪，天气这么热，又是晌午头上，有啥急事，这么不要命地赶路。万万想不到，在这种时候，刘先生还敢露头！”

志丹不动声色地说：“人生在世，总得走路。下几个雹子，还怕砸破脑

袋？”

黄舜尧说：“还是刘先生想得开。既然这样，请跟我去歇两天吧！”

刘志丹说：“哦，我还要等两个朋友！”

黄舜尧见说，也坐了下来。心想：量你也逃不出掌心。嘴里却说：“那更好，大家一起谈谈！”

刘志丹不理他，叫道：“掌柜的，打酒！”

自从国民党叛变后，黄舜尧就在各县主持“清党”，新近才当上洛川县党部书记长。也是冤家路窄，就给碰上了。

刘志丹叫跑堂的摆上杯筷、酒菜。一边叫再添两副碗筷，一边给自己斟了酒，端起来略让一让说：“黄先生，失礼了！”

黄舜尧也虚应一声：“请便！”跷着腿，眯着眼，看门外有谁进来。

掌柜的跑进跑出，端茶递烟，忙着伺候黄舜尧。

刘志丹本不胜酒，端起酒杯，无非沾一沾唇，做做样子，随即又叫：“炒菜！”“拿馍来！”连叫几声，见无人支应。志丹进了柜房，问道：“怎么回事？”

掌柜的只是不言语，端着托盘，给黄舜尧送上两盘饺子。等了会儿，怕志丹见怪，又忙陪着笑说：“先生，请等一等。”

黄舜尧没有留意，嘴里吃着饺子，两眼却溜着大街。

刘志丹见后院有道短墙，正好脱身。刚想迈步要走，不提防掌柜房中跳出个穿军装的，一把抓住刘志丹的胳膊，拖向后院，一边说道：“我等你好几天了，今日落到我手里，看你往哪儿跑！走，上公安局！”说着，两人已到了后院。

刘志丹抬头仔细一看，是马罗武，越发地感到奇怪。

罗武悄声说：“快走吧，我救你来了。”

刘志丹来不及细问，跟着罗武出了角门。

黄舜尧吃到半截，还不见刘志丹回来，觉得事出蹊跷，忙放下筷子，

叫来掌柜的，问道：“那个人呢？”

掌柜的说：“你们的人把他抓走了！”

黄舜尧一愣：“那人什么样？”

掌柜的说：“大个子，黄军装，说是公安局的。你进前门，他进后门。说你等着捉拿那人的同党，叫店里不要声张！还叫我 给你包水饺来的。……”

黄舜尧气得跺着脚吼道：“放屁！走了共产党，回头我找你算账！”提起志丹丢下的那把阳伞，气急败坏地往公安局跑。

刘志丹和罗武一出城，怕人追赶，不走大路，只抄小路，顺着洛河川，马不停蹄地跑出几十里，天也黑了，找了个小村子住下。幸好罗武事先在店里买了几个馍馍，弄了一包羊杂碎，两人胡乱吃了。主家端来两碗米汤。两人不肯过分打搅，借了一领席子铺在门洞里，躺下歇息，这才顾得上说起话来。志丹惦念着他儿时的伙伴们：“快说说，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小盛没和你在一起？……”

罗武和小盛都是刘志丹小时伙伴，那年闹抗税失败后，罗武便跑到朝邑县投奔熟人，在县政府当传达。他把小盛也叫去，给县政府打杂。小盛不愿意伺候那些县老爷们，又跑到南梁梢山里揽工去了。那几年，兵荒马乱的，地方上过路军队太多，要粮要车，见天打人，没人敢管钱粮，县长就派了大个子罗武顶这差事。他刚接手，吴新田的军队就派差，要一万辆大车。朝邑县有多大？哪里出得起！

罗武去找县长。

县长说：“我又不是开车马铺的，你自己弄去。”

逼得罗武走投无路，钻进了烟馆子，一天没敢露面。

当兵的们把县长拉到了大堂上，打了个屁滚尿流。县长没地方出气，就把罗武关进了监狱，自己也卷铺盖走了。

后来，他在狱中也不知道为什事老百姓闹事包围了县城，县政府无人敢露面，散了摊子，他才趁乱出来。心想：还是当兵的厉害！就跑到洛川，投了杨衰的队伍，在营部当上了个副官。不多久，营长看中了他，说：“看样子，你像是个老实人，不知信不信得过？”

罗武一拍胸脯，道：“有话只管明说，我不会坏了你的事！”

营长说：“有个发财的机会。上边发下来一批烟土，充这个月的军饷。你运到外地去卖了，倒一倒手就是钱，得的利，咱俩平分！”

罗武不干。心想，咱来当兵就是恨透了那些欺压人的人，咱咋能再在队伍上欺压士兵呢！

营长骂他不识抬举。过几天，又叫罗武造假名册，吃空额。

这些人面畜牲的东西光知道喝兵血，打起仗来，弟兄们还得替他们卖命，罗武不但没有与营长同流合污，还当众揭了他的老底。下边一听到就闹腾开了。营长气了个半死，说他鼓动风潮，反抗官长，要军法从事。刚把罗武关了禁闭，恰好又赶上狗咬狗，井岳秀收了杨袞的枪，把军队给解散了……

罗武一抬头，见志丹正聚精会神地看着自己，不好意思地抓抓耳朵，“如今树倒猢猻散，各走各的路！我知道你要来，就等你做伴儿。”

刘志丹奇怪起来：“你怎么知道的？”

罗武笑了：“咳！墙上贴满了告示捉拿你，想必你要到这边来了。这几天，大小客店我都挨个儿查问到了，就是不见你的影子。刚才，突然见你不知从那搭蹦出来，竟然跟那姓黄的一搭喝酒，我就捏了一把汗。想助你一臂之力，又怕打草惊蛇。只好绕到后边，等待机会。幸亏他也是一个，没敢当场下手。”

志丹说：“多亏你费这番苦心。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还敢找我，不怕受连累？”

罗武急得嚷起来：“看你净说些什话？我闯荡小半辈子，到处受欺，碰钉子，正要找你说条明路，还怕什么连累！”罗武说到这儿，突然眼睛一亮：

“景桂哥，去年秋天，我在洛川看见杨袞枪毙刘含初。那人死得英雄，绑到刑场上，还大骂国民党。我问营长，刘含初是做什么的。营长说是共产党，专门杀人放火。我看不像，又去问文书。文书说，共产党要闹共产，除暴安良，打富济贫。我说，这是好人嘛！难怪杨袞要杀他。前几天，看见告示，说你也是共产党。我就明白了，在党的既然专跟老财作对，共产

党一定是个好党。我白天黑夜，都盼你过来，把我带上，一起闹共产。”

志丹被深深地感动了，觉得罗武的每句话都发自肺腑。辨别善恶是非，全凭的是朴素的阶级感情呀。便说：“你说得对，共产党闹革命就是要翻转这个世界，不许人欺人。把那些贪官污吏、地主豪绅，连同蒋介石统统打倒，叫穷苦人当家主事！这就是条明路，咱们一起干吧，你经得多，见识广，心眼又实诚，能到革命队伍里来，会顶大用的。”

罗武心里滚热，说：“这可是天大的美事呀！我在社会上，东闯西撞，受够了罪，谁看得起我？难得你这样高看我，把这条命交给你也甘心！只要革命用得着，做饭、喂马、跑脚，我都舍命干！”

夜越来越深了，他们越谈越激动。罗武竟急不可待地问志丹：“咱们要去什么地方？”

本来，刘志丹打算从洛川上走，经延安走大路去榆林找特委。如今看来，这条路不好走，沿途都有卡子，贴了告示捉拿他，不如绕路走保安、靖边。前些日子，永宁山的同志还有信，要他顺路把保安县的工作也整顿整顿。如今身上又害了疥疮。在渭华打仗时，经常露宿野外，那地方地气太潮，现在化了脓，也好回楼子沟找个土法治治。便对罗武说：“咱们先去永宁山，听说李宜如也回来了，看看那里的情况再拿主意。现在是咱们最困难的时候，只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一点一滴地积蓄革命力量，三拳两脚打不出天下。干革命，这一代干不完，下一代接着干。水滴穿石头，铁梁磨绣针嘛。只要不怕困难，革命定会胜利！”

.....

又一个星星撒满天的晚上。过了河，远远听见山上有三弦声，大概是瞎子在说书，永宁山平平静静，跟当年没什么两样，好像动乱、斗争、血火，都离这里很远。

王子宜的窑洞里刚刚开完党小组碰头会。子宜打开炕席想把文件藏起来，只听一声狗叫，紧接着，就有人小声敲门。

“崇义（子宜）！开门。”

声音挺熟悉，会是谁呢？王子宜也来不及细想，赤着脚跳下炕，打开

了门。只见曹力如一步迈进来，王子宜大吃一惊。力如是在子宜之前从榆中毕业，去北京杨虎城办的无线电学校学习的。他一把拉住力如，“你咋回来了？外面情况怎样？就你一个人回来？……”

力如神秘地笑了笑，说：“你别急，你看后边是谁？”

话音未落，一个身穿大褂的汉子一步迈了进来，将他的肩膀重重一拍，哈哈大笑。

嘿！正是日夜想念的刘景桂刘志丹嘛！子宜惊喜得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上下打量着他。他头戴一顶旧礼帽，身穿一件半旧的阴丹士林蓝大褂，消瘦的脸庞格外的粉白，看不出有什么倒过霉的迹象……

子宜激动地说：“做梦都没想到，你俩个一起回来了。真是太好了。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子事呢？”

曹力如脱下鞋子，一边往外倒沙土，一边说：“娃儿没娘，说来话长。”说着，盘腿坐在炕上，“我从无线电学校出来，听说魏野畴老师在陕西杨虎城的部队当政治部主任，也赶到那里。经魏老师介绍，在杨虎城的第一师当了政治部主任处长。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协助魏老师搞‘军运’。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部队开到安徽，国民革命军开始‘清党’，只有这支部队没有动，因为局势千变万化，杨虎城又跟魏老师有那段历史，一时下不了决心。‘八七’会议后，魏老师开了训练班，积极准备起义，安徽地方党也要闹暴动。杨虎城还是下不了决心，蒋那边又逼他‘清共’，杨两头为难，再犹豫不定就会引火烧身。便来了个‘金蝉脱壳’，一甩手跑到日本去了。临走交代参谋长，‘是朋友就留下，不是朋友就送走’。意思是既要‘清党’，又不要得罪人，他觉得都是陕西人，自相残杀，没有好处，不如留个后路。于是，魏老师领着我们和农民一起，搞了个‘皖北兵暴’，不幸失败了，魏老师也牺牲了。”

听到这个噩耗，大家都非常悲愤。志丹紧锁眉头，在窑地上走了几圈，然后，走到水缸旁，从缸里边舀了一马勺水，一口气喝光。然后说道：“蒋介石、国民党杀害了多少忠良精魂呀！这笔账一定要清算！”

只一会工夫，葛明山、杨跃云、冯文方等人都挤进了窑洞。那亲热和激动劲儿比婆姨们挤一起挤挤嚷嚷还热乎呢！葛明山、杨跃云都是小学同

学。冯文方则是绥德师范毕业，在国民党联军中当过营教导员，大革命失败后回来的。都是些有见地有作为的青年人，都想干一番革命事业，如今聚在一起，就有了说不完的话。

大家又扯了一气，这才知道，志丹和力如并不是一起回来的，他们只是走到下寺湾，住在一个店里才碰上的。真是太好了。大家又说笑了一阵，力如说：

“我要进城去咧，景桂你走不走？”

志丹说：“你先走吧，我要在子宜这搭住几天，咋样？子宜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子宜忙说：“只管住下吧。我现在已经‘官拜’本县教育局的督学员了，没问题的。”

“是啊，我听说你们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工作，搞得很不错。你们这些‘共产分子’，都成了国民党县党部的‘要员’，连县政府开庭议事，你们不到场都不行的。”他说着，笑了起来。

子宜告诉他们：“现在国民党县党部的书记是曹继之。”

力如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知他现在咋样？”

刘志丹说：“在西安时，听省委的同志曾介绍过，他是杜衡在西安发展入党后派回来的……”

子宜说：“是啊，他从西安带回组织关系，分在我们党小组。因为他同时又带有国民党证和省党部的介绍信，所以，一回来就担任了县教育局长和县党部书记，还把我们几个人也带了进去，现在国民党的县党部基本上被我们的人掌握了。”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刘志丹从大革命失败讲到南昌、井冈山几次起义，又从渭华暴乱讲到“六大”，他说：“失败不要紧，跌倒了再爬起来。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恰如干柴遍地，一遇火种，就会烧塌天的！我们就要做火种，依靠人民群众，拉起武装，建立根据地，革命一定会蓬勃发展起来。”……

刘志丹一直在王子宜窑洞住了4天，4天中给这些党的骨干们灌输进去

了许许多多马列主义的营养和坚持革命到底的雄心壮志。

第四天一早，志丹说：“我该回家了。”正准备走，他的弟弟刘景范赶着毛驴来接了。原来他是因近来谣言多，心中不安，到县城来打探消息的。于是，兄弟二人一同下山回芦子沟去了。

二

刘志丹走后，按照他们事先商量好的，王子宜来到教育局找到曹继之局长，告诉他刘景桂回来了，请他给安排做教育局的督学员，以便利用合法身份，借巡视教学为名在全县各处走动，进行工作。

曹继之倒是二话没说，一口赞成，并立即拉着王子宜一起去见县长。

县长叫崔焕之，是国民党员，曾经在榆林中学任过教，说来还是他们的老师，是个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平时很能和他们说得上话，只是有些胆小、怕事。他听说刘志丹回来了，很高兴，把水烟袋一放，忙说：

“啊，刘景桂回来了？让我看看去。”

子宜忙说：“他回家了，让我代他问候老师您哩！”

崔县长听了，更是面露喜色。

曹继之又把刘志丹夸了一番，说他如何有文才，这些年在外面又历练了不少武略，实在是少见的人才。

崔县长听着，不住地点头。

曹继之在王子宜的示意下，趁机叫苦，说教育局摊子大，人才不济，流露出要请县长任用刘志丹到教育局的意思。

王子宜掌握火候，又在一边不断旁敲侧击，替局长帮腔。

崔县长深思着：“景桂是个有抱负的青年，当有作为，这没什么含糊。只是，如今，咱们县上……”

王子宜一看不太好了，崔焕之有意要把志丹留在他身边？便连忙截住他的话头，说：“教育是革命之本，如今咱们县上各区学校大多不成样子，万事莫若开头难。老师若是不反对，我倒觉得，可否先让景桂到教育局任

个督学，帮我们一把。待各区学校工作纳入正轨，再奉迎老师另任高职。”

曹继之也跟着说：“我已问过他本人，他说也无不可。”

崔县长这里又慢腾腾地抱起烟袋吸着。停了有一会子工夫，才说：“等他来时，我问问看，他如果愿意去教育局，我岂能从中作梗？”

后来刘志丹去见了崔县长。没过多久，他就担任了教育局督学员。紧接着，他要曹力如到高小任了校长。并调整了本县各区的小学校长人选，成立了保安县第一个党支部。支部就设在永宁山，志丹兼任书记，曹力如任组织委员，王子宜任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党的工作便像雨后春笋，进一步开展起来了。

安排就绪，刘志丹先到榆林，尔后，又到特委去。

时间过得很快，在北方高坡上，秋夜的寒气已过早地渗入肌肤了，算算时日，已到秋末。

一天，曹力如突然跑来，要王子宜到吊坪镇他家里去。

夜里，王子宜他们赶到了曹家。只见窑洞漆黑。开了门，才见了灯光。原来，他把窗户全用棉被捂得不透一丝光亮。

啊！只见刘志丹和谢子长都在炕上。

王子宜和志丹打过招呼，便问谢子长：“啥时候到的？”

他淡淡一笑，挑起一双细长眼，说：“我已经在景桂家住了好久了。”

一阵寒暄后，谢子长谈了清涧暴动失败的经过和教训。然后说：“这次回来，志丹是军委书记，我是委员。省委派我们回来，还是要搞武装。志丹这次去特委传达省委指示，和特委书记杨国栋干了一架。那家伙让国民党吓破了胆，自己不敢搞，还不让别人干。省委让志丹回来搞军运，他却让志丹留在榆林开个店。志丹便发动大家和他斗了一场。刘澜涛等特委的同志都支持志丹。‘官司’打到省委，省委决定由志丹任特委书记，撤了杨国栋的职。”

大家都很高兴，对杨国栋一向的作派是很了解的。所以，都兴奋地注视着志丹。

刘志丹竟一时被这种气氛弄得不好意思起来，他红着脸，文雅地笑笑，竟如姑娘一般秀美。难怪芦子沟的人都说他“俊”呢。志丹谦虚地笑道：

“我也没什么了不起，凡事依靠组织嘛。这次特委决定，不但要注重军运，也不能放松‘匪运’。”

当时的陕北地区，地贫财主狠，山高地形险，很多老百姓活不下去，就十几人或几百人啸聚山林，各种武器枪支都有，打家劫舍，当了土匪。由于他们大部分是受苦人，所以，特委常常派人进去做工作，瓦解和争取他们，改造成为我们的武装，这种工作就叫做搞“匪运”。

刘志丹喝了口水，接着说：“现在宜川县后九殿山中有一股‘绿林好汉’，有几百条枪，为首的叫杨庚武。他是大革命时的党员，后来失掉了关系，但他不甘心投降国民党，就在后九殿一带占山为王，当起土匪来了。为了加强争取这支队伍的力量，我已派李力果打进去工作。至于军运，由于苏雨生部已经被杨虎城收编，开到西安那边去了，咱们原先准备去甘肃搞苏部的计划就落空了。下一步怎么办才好？大家还得仔细研究一下。”

“虽然我们几次暴动都失败了，但是，我们陕北有一句常话：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大家还是要勒紧腰带，干起来。”谢子长说。

在场的人情绪都很高昂，一致认为，搞武装是方向。但怎么搞呢？有些人心中仍没有底。

王子宜想到了民团，便说：“我们县的民团不也是武装吗？枪还不少呢！”

这一句话就像一眼火炮点燃了。

曹力如一拍大腿：“对，搞他们。是缴械还是全面拉出来，我看都有把握。”

谢子长也表示有搞头。

刘志丹沉思了一下，说：“是啊，我们应该把身边的这支武装控制起来。不过，咱们目前在民团的力量还是非常薄弱的。”

大家仔细一想，是不那么简单，商量了好久也未定下来。

鸡已经叫三遍了，大家只好休息。

又一连几个五更熬下来，他们又开了几次会，终于定出了一个基本上挑不出任何毛病的方案：“利用我们目前的有利条件，通过合法斗争来夺取这支武装！”刘志丹说。

说起永宁山的民团，那可是历史悠久了。陕北高原由于连年遭旱灾，收成不好，苛捐杂税倒增加了几十种，什么地亩税、血税、人头税、羊圈税、烟囱税，挑担东西过街也要收几个铜子的税。劳动人民挣扎在如麻似网的天灾人祸的死亡线上，不少人就去拉杆子，投土匪。所以，当时陕北土匪多如牛毛。一般有点资产的人家，都要弄几支枪看家护院，富裕一些的寨子更是寨墙高垒，戒备森严。保安县原先在县川，依山面河，易攻不易守。为了防土匪，搬到洛河川里的永宁山的寨子里。

永宁山是洛河环绕下的一座石山，四周是石崖，只有一条路可以上去。县城搬来后，搭了个吊桥，就成了天然的城堡。

民团早年间叫团练，进了民国就叫民团，有几十个本县子弟，十几支枪。现任团总是本县的一个大爷，姓陆名登高，字仰之。没念过书，却懂点武术，因每日除了抽大烟就是搓麻将牌，身子骨瘦弱，对团里的事很少管。可他是个大地主，和本县大户都有联系，以势压人，连县长也得让他三分。

支部决定从他身上开刀。

一开始，先放了个“烟雾弹”。党团员四出活动，没多久，全县都在议论：“陆仰之是个草包，连个驴也吆不走。除了认识麻将和牌九上的那些画画，斗大的字认不下一石。”“说是个团总，既没读过兵书，又没上过阵，只会派粮要捐。”“以前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现今刘景桂、曹力如这些出去上过武备学堂，当了军官的武举，又参加过‘扫北（北伐）’，能文能武，真刀真枪领兵在沙场上打过仗的人，不比陆仰之强万分！”“是啊，不能放着将才用蠢才。”……

陆仰之一转一听，回来像吊死鸡，只剩一点气息了。

大家看看陆仰之坐不住了，条件已经成熟。就由曹继之、曹力如和王子宜拿了四乡父老签名的“条陈”，去见县长。

曹力如单刀直入：“近来本县城内，四乡关于民团有许多议论，县台想

必早有所闻了吧？”

县长说：“我也听到一些，不过……”

曹力如立即把“条陈”递了上去：“父老乡亲让我们代呈条陈，请县台过目。”

“怎么？还有……”县长很吃惊，忙戴上眼镜，接过“条陈”，边看嘴里边“嗯嗯”。

王子宜说：“请老师三思，这可是关系到全县城安全存亡的大事！况且……”

正说着，听差的进来报告：“陆团总求见。”

真是热闹处卖母猪，越发热闹了。

县长还未开口，陆仰之已摇摇晃晃踱了进来。见子宜一伙人在这里，脸上立即有些不自在，冲着县长一抱拳，说：

“唐突了，蒙县台厚爱，兄弟我在民团效力已有多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哩！谁知，近来却有些干不下去了！”说着，又是摇头，又是叹气，不住地用眼睛狠狠地瞪着王子宜一伙人。

王子宜看他竟先摆谱，便说：“怎么？莫非团总近来手气不佳？”

大家一听，哈哈大笑，连崔县长和进来的倒茶听差也忍不住乐了。

陆仰之顿时面如猪肝，刚想发作。

曹力如站起来对县长说：“陆团总找你有公干，我们还是暂且回避的好。这个‘条陈’可就留下了。望老师仔细考虑。”

陆仰之一听，却把手一摇，说：“不必走开，我正要当着县台大人的面向各位老师请教哩！”

“哦？”

县长说：“也好，有话当面谈清。”

他们几个相视一笑，便都坐了下来。

“近来咱们县吵得乱七八糟，谁不知道，原因就在县上那些个学生孩。

×他妈受人教唆，不专心念书，跑到街上胡说八道，飞机（非议）县政，挠（搅）乱民心，连我的民团都让他们快给弄垮了。你们这些学生如今做了老师，不知教学生守法循礼，放纵学生挠（搅）乱治安，还游说、说四乡绅士，拆、拆本团总的台，你……你们……”

他一番话讲下来，已是满头油汗了，端起茶盅喝了个精光，抹了抹嘴，正准备再讲下去，曹力如站起来，说：

“学生乃国民一分子，更读书识字，非不学无术之辈可论。况且，团政非县政，路不平有众人铲，民众议论团总不称职，怎能和非议县政相提并论呢？又怎能和搅乱民心、弄垮民团扯到一起？”

曹力如一席话，气得陆仰之跃起身，拍着胸脯叫道：

“我陆某人虽不才，也是本县父老乡亲推选，县台委派的。你们这些毛草小子×他妈，到底想把我陆登高怎样？”

他恼羞成怒，指手画脚，口吐脏话。

曹力如使了个眼色，便按志丹事先说定的，转身向县长抱拳说道：

“老师明镜高悬，陆仰之文不识丁，武不服众，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况玩忽职守，无所用心；乃至团练疲惫，民怨沸腾；以前因蜀中无大将，方至陆某人长期位居团总，如今景桂等人多已归乡，有此将才，不可不用，否则，值此兵荒马乱之年，怕是要贻误乡梓！”

县长听了这番辩论，再加上素来对陆仰之的骄横多有不满，如换上自己的学生当团总，也省得遇事受人挟持。于是，问道：

“登高，你看如何？”

陆仰之一看县长不给自己撑腰，铁青着脸说：“只要县中父老认为陆某不如刘景桂这个洋学生，兄弟情愿让给他。”

县长连连点头。

子宜他们也齐声说好。

于是，当场决定：三天后由县长主持，在县高小开场，选举民团团总。请县里士绅、父老投票断之。

选举民团团总，这可是件十分新鲜的大事。不出一袋烟工夫，已轰动了全县城。

当晚，刘志丹他们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认为支部以前的部署一步步落实了，现在关键在选举了。

有人讲：“那些顽固士绅，财大气粗，又和陆仰之关系密切，弄不好会倾向于这个草包，你说咋办？”

志丹分析：“他们之间也有矛盾的，就看我们的工作如何做了。”

曹力如说：“我们大家可以利用各种关系，比如亲戚关系，捻香结拜拉关系，尽量多交结人，把选票拉过来。”

曹继之说：“学校和民团也不能放松。”

.....

最后，志丹说：“我看就这么办，但要特别注意掌握会场，陆仰之是个流氓，要防止他捣乱。”

他分派曹力如去民团活动，曹继之组织学生，子宜掌握会场。大家连夜分头进行工作。

这是个好日子，秋高气爽。县高小学堂里张灯结彩，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

“尊重选举！”

“慎重考虑，请选刘志丹！”

“请选曹力如！”

.....几个学生又吹喇叭又打鼓，吸引了不少人，真是热闹。

县长走来转了一圈，很满意，在正中大红票箱后面的太师椅上坐下。

刘志丹和陆仰之分别坐在两旁稍后一点的木椅上。下边全是赶来投票的“选民”，有商铺店号的老板，有士绅，还有来凑数的农民。室内乌烟瘴气，一片嘈杂声。

县长看来人差不多了，正要吩咐开始选举，只见挤上来一个人，鬼头

鬼脑地在陆仰之耳边叽咕几句，陆仰之马上得意起来，对县长说：

“外面又来了一批选民，请县长做主让他们进来。”

县长不耐烦地说：“那就让他们快点。”

一声令下，外边挤进来几十个人，有一半是弯腰驼背的老头子，还有几个满脸横肉蛮气十足的人，谁都认识那是陆家护院的家丁。

这时，志丹递给子宜一张纸条，上边用铅笔写着：“学生”两字。子宜忙退出会场，向等在外面的曹继之一招手，他马上领来事先安排好的几十个学生，吵着也要参加投票。

陆仰之一看，急了，连忙表示反对。

志丹笑而不语，看着县长。

县长向陆仰之说：“哎！你邀来参加选举的人，景桂并无二言，如今这些学生，我看也可以参加。”

陆仰之说：“县台错了，这些都是孩子，学业未成，乳毛未干，怎能参加选举，怕是受人雇佣的吧。”

陆仰之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他自己花钱雇人来选举，反诬蔑我们。刘景桂他们雇人。而且，这些学生的父亲都在场，一听陆仰之的话，心有不悦，顿时，全场大哗。

志丹说：“县长，大家都是一县人，谁不认识谁？到底谁雇人，大家心里明白。如果陆团总愿意，咱们可以查查到底谁雇人。”

陆仰之一下子变哑巴了。

志丹又说：“况且，学生也已成年，都是本县一分子，此选举是全县大事，学生如何参加不得？”

县长见陆仰之无话可说，就宣布让学生参加。

选举揭晓，刘志丹和曹力如的票数最多，陆仰之落选了。县长宣布由刘志丹任民团团总，曹力如任民团副团总。在场的人都鼓起掌来。

陆仰之气得不行，跳起来大嚷：“选举不民主，肯定有人作鬼了，不能算数！”

他的几个亲戚、家丁和雇来的人，也跟着乱嚷嚷，替陆仰之帮腔；一些顽固士绅也说：“我们都同意陆团总，为何只那么点票？”他们要县长亲自监票，看其中是否有作弊行为？

“每人一票，总数又对，怎能有鬼？”县台摆出了县太爷的威严，作色道。

.....

后来，志丹他们才知道，选举中是有名堂的。原来，我们的学生写完了选票，就主动帮那些不识字的老头们写，凡是选陆仰之的，他们都写了刘志丹。有些糟老头子不识字，数了数选票上面写的是三个字就放心了，却忘了刘志丹也是三个字。大家听后，笑得肚子疼。

刘志丹他们掌握了民团，针眼前这一胜利，一是把全县教育系统的工作狠抓一下；二是针对民团这一合法工作，抓紧改组使它成为我党领导下的，又有合法地位的一支革命武装。

中秋前后的北方，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平均。没有冬季从内蒙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夹着冰苞的阵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人们：在这些天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和损害的。一早，谢子长又来到刘志丹家，准备按特委决定到甘肃去。那儿有个陇东民团军的司令叫谭世麟，为了扩大势力，正在招兵买马拉队伍，说是谁能拉起一连人，就给他个连长；谁能号召一团人，就给个团长，而且还给防地和发给军装、番号、给养。安顿好民团工作，刘志丹准备和谢子长一起动身。突然，冯文方跑来了，从怀里掏出一支枪：“你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我没看错。大革命失败，我还带回一支枪，正不知做什么用，你们拿去吧，将来好闹红军！”

志丹和子长对视了一下，感动地说：“这枪眼前是个无价之宝，还是留在县上，当个鸡婆子，将来孵出一窝小鸡。”

冯文方听后激动地说：“是啊，只要二位携起手来，我们陕北就会红火起来。”

刘志丹和谢子长对视着，心中充满了无比的坚定。他们的握手将把黄山坳中的两块红色的风景握在一起。

三

1930年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前夕，冯玉祥将甘肃、宁夏的部队调往河南参战。为了控制后方，他委任包头土匪出身的苏雨生为骑兵第四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苏雨生本来就官瘾十足，这个机会等于给他创造了一个升官发财的有利条件。他灵机一动，来了个“借题发挥”，将师改为军，自称军长。可他也知道徒有军的空架子还不行，必须扩充实力，于是到处招兵买马，不管什么人，只要愿意打他的旗号，他都接收。所以，刘、谢两人的到来是他瞌睡碰见了枕头，喜出望外，他知道这两人在陕北的影响，而且能打仗，会带兵。以他们的名义拉队伍，一定不成问题。因此，他很慷慨地一来就给封官，谢子长被苏雨生任命为第十旅旅长，刘志丹被任命为第八旅十六团团副。

一天，谢子长来到刘志丹团部刚刚坐下，陕北特委派往宁夏从事兵运工作的马云泽就兴冲冲地跨了进来。

子长一把拉住马云泽的手，高兴地说：“嗨，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刚才我们俩还在谈论你哩！”

马云泽也笑道：“怪不得我的耳朵一直发烧哩，原来有人在背后议论我！”

“哈哈！”三个人都笑了。

志丹说：“听说特委要派你来，我和子长算来算去，你这一两天也应该到了。”

接着，他们谈了目前的情况。

子长讲道：“我来这后，苏雨生让我任第十旅旅长，可实际上还是个空架子。不过，这倒给了我们发展自己武装的一个极好机会。我们从陕北招收了300多名学生兵。这些人大多数是党员，政治素质较好，本准备作为十旅的基本骨干，因为十旅还未组建起来，就暂由八旅的王子元代管。八旅旅长是谷联舫，下有两个团，第十五团团团长王子元，团副张东蛟，第十六团团团长张廷芝，团副是志丹。九旅旅长是石子俊。”

马云泽问：“整个部队中由党直接掌握的旅团有多少？”

子长说：“只有王子元的十五团，我们必须加强这个团的兵运工作，我和志丹商量过，以后凡是到十旅来的同志，一律充实十五团。你这次来，有件事我想让你亲自办。”

马云泽问：“什么事？”

子民说：“我想让你再返回陕北，在绥德、米脂一带做些工作，通过地方党组织动员一批党团员来充实东蛟团。”

马云泽马上痛快地答应了。

刘志丹情绪也很振奋，他说：“自党的六大召开后，革命形势的发展异常迅猛。毛泽东将秋收起义的部队带上井冈山，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后又进军赣南、闽西，开辟了新的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领导的弋阳、横峰起义部队，在赣东北发动游击战争，建立了闽浙赣根据地；黄安、麻城起义后的工农革命军建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贺龙以洪湖为中心，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邓小平也建立了左右江的革命根据地。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在湘赣、湘鄂赣等地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现在，红军力量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全国的红军已经达到数万人，分布在十几个省份。”所以，我们西北地区也要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根据地。现在，我们是借苏雨生的‘水’，养我们自己的‘鱼’。”

“是啊，”子长也说：“我们既然借用着他的‘水’，就必须时刻注视着这‘水’的变化。否则，有朝一日‘水’情有变，我们就必然会吃亏。”

“而现在的情况是：苏雨生拼命地扩充实力，势必会影响‘五马’（马鸿奎、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青宛）在宁夏一带的统治地位。‘五马’向来把宁夏当成他们的命根子，怎能允许苏雨生这个外来户插足呢？因此，苏雨生的势力发展越快，他们之间的战争来得就越是迅猛。从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苏雨生决不是‘五马’的对手，一旦战争爆发，苏必败无疑。”

志丹又说：“这样，我们刚刚搞起来的一点武装，就会白白送进虎口。我们应该避开锋芒，保存实力。如果苏马战争爆发，党所领导的全部人员立即回到陕北、陇东和庆阳五属区，以护军为名，发展部队。”

.....

果真不出谢子长和刘志丹所料，“五马”向苏雨生开战了。苏雨生部像一堆垒起来的沙粒，一触即溃。

苏雨生带着七旅退至陕西彬县；石子俊脱离了苏雨生，率九旅和八旅，退至下马关；谢子长与刘志丹则带着队伍转移到甘肃庆阳地区。

谢子长和刘志丹到庆阳不久，就接到了盘踞在庆阳地区的五属清乡司令谭世麟的一封信。信中的意思再委婉也能看明白，谭是想收编他们。

正在刘、谢犹豫之时，特委来了指示：要他们接受谭世麟的改编，继续“借水养鱼”。于是，这支队伍被收编为庆阳五属清乡司令部直辖第三团，驻守陕西吴起镇三道川一带。谢子长为团长，刘志丹任副团长。

然而，无论事态万般变化，队伍到了什么地方，心中坚如铁的信念是不变的！他们一到三道川，就动手做起了宜川后九殿杨庚武的工作。谁知，延安的军阀高双成也看中了杨的这支武装力量，此刻已先下手为强者，逼迫杨接受了改编。谢、刘只拉出了杨部的周维琪营。

就这样，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且有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味道。原苏雨生部的八旅十六团团团长张廷芝也跑回了老家。

尽管张廷芝狐假虎威、奸猾狡诈，可这时他的二百多人马全被石子俊带到下马关去了，他自己已经没多少本钱。所以他摇身一变，在刘志丹面前谦虚真诚无比，和志丹套亲戚，论同乡，表示愿意在谢、刘手下干事。不久，子长和志丹对部队进行了改编，果真认命第一营营长为张廷芝，第二营营长由志丹兼任，第三营营长为周维琪。

时隔不久，张廷芝突然来到团部，对子长和志丹说：“石子俊把我的几百人马全拉到下马关，我再三思量，非把这些人马要回来不可。”

子长问：“你想石子俊会给你吗？”

张廷芝说：“硬要，肯定不行。”

志丹问：“那你准备怎么个要法？”

张廷芝说：“让我带上一二百人马到下马关，假称投靠石子俊，落脚后，瞅空子下手，准能成功。”

子长眉头一皱，不客气地说：“张老弟，你是不是嫌我这地方水浅了？”

张廷芝心中一颤，不由地“嗯”了一声。

刘志丹一双犀利的目光逼着他：“你若是另有打算，明说明讲才够朋友。”

张廷芝故作不满地说：“原来二位大哥对我这样不信任。我本想拉回部队，壮大我们势力，可却遭到了二位大哥的如此猜疑，我真不知怎么讲好？”他开始发咒道：“二位大哥对我恩重如山，我张廷芝岂能做那不仁不义的伪君子？我若有半点歹意，老天报应，叫我遭雷打电击……”

子长心想，如果能拉回部队，当然是件好事，但此人一贯奸猾狡诈，不可不防。他与志丹交换了一下眼色。说：“张老弟如此忠心，我们岂能不信？只是我们近来另有任务要执行，不能派更多的人给你。这样吧，你带上周维琪营的 30 个轻骑前往，可以吧？”

张廷芝一怔，说：“这 30 个人马，我怎么好动手？”

志丹笑笑，说：“我看 30 多个人马正合适。你想想，石子俊明知你的大部分人马在他那里，你如果带得人太多，反会引起他的疑心，事情倒不好办。这件事只能凭心计，不能靠人多。你张老弟鬼心眼多，不是正好可以用在这件事上吗？”

张廷芝不高兴地说：“看来你们还是信不过我。”

子长笑笑：“这你就见外了，信不过你，我们就不会给你这 30 个轻骑。你也该体谅我们的难处，我们也是吃人家的饭，受人家管，动静也不能闹得太大吧？”

张廷芝怏怏地走了。

又一个静夜，子长和志丹并肩走着。张廷芝已走好几天了，怎么一直未见回来？……

谁知第二天中午时分，张廷芝突然带着大批人马来袭击团部和二营营部。

他们原先以为张廷芝会率部投靠石子俊，没料想他竟会率部攻打团部和二营营部。由于毫无准备，兵力也不足，仓促应战，部队一下了就被打散了。子长和志丹带领一部分人，且走且战，撤退至永宁山。

这时，阎红彦又像从月球上下来一样，孤落落立在他们面前。

子长惊道：“你可回来了，其他人呢？”

阎红彦只端起马勺喝水。问得急了，闷声道：“全被张廷芝吞掉了。”

又一颗灾星一样的消息猝不及防地砸在人心上。

阎红彦是陕北安定人，1925年入党，曾参加过清涧起义，从事过兵运工作。二十出头年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宽宽的脸庞上写满了疲惫、愤慨及灰落落的情绪。

张廷芝带着三十几号人马到达下马关后，谎称投靠石子俊，哄得石子俊得意忘形，设宴相迎。当天夜里，便就缴了石子俊手枪队的械，带着他的旧部百余人，星夜撤离下马关，策马返回。

路上，他集合队伍训话：“弟兄们，这次随我出征，劳苦功高，我感恩不尽，要给大家庆功洗尘。我们走时，子长和志丹两位大哥也说过，只要我们胜利归来，他们也到安边城内和我们一起庆功。今天，咱们就不到三道川，直奔安边城吧。然后，我再派人去请谢、刘二位团座来。”

大家都高兴地鼓掌。跟着他来到了安边城内。他倒真的摆了宴席。大家劳累了多日，吃喝过后，便去睡觉了。

夜半三更，张廷芝带他原旧部人马突然包围了骑兵团，并缴了他们30个人的械，把他们连窝就地软禁起来。

后来，听说张廷芝的老子张鸿儒见儿子出师得手，就匪性大作，又把自己的百余骑兵拨给张廷芝，由他统一指挥。

“第二天，张廷芝便带着全部人马奔袭三道川。”阎红彦气愤地说：“本来周维琪营可以迎战的，可他早被张廷芝用金钱和‘美人计’买通了，一心想着当张家的女婿客，便拱手交了枪。周维琪交枪后，张廷芝便直向团部和……”

子长打断阎红彦的话，“别说了！”一抱脑袋蹲在了地上。

阎红彦望着他，“哎”，一跺脚，也直叹气。

谢子长站起身，沉痛地说：“张廷芝对周维琪搞拉拉扯扯那一套，我倒听说了一些，就恐他上当，曾派马云泽去给他做工作，要他提高警惕。可周维琪却不以为然地说他不会上当……最后问题还是出在他那里。我怎么

就没有……”

刘志丹也深深地吸了口气，“咱们可是用君子之腹量小人之心，干了一件大蠢事。”他说。

子长懊恼地直砸脑袋：“是啊，咱们引狼入室，弄得倾家荡产，这个教训可是沉痛的！不过，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我们就不会犯类似错误了。”

志丹也调整了情绪，像笑话一样地讲了一个叫人心酸的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和尚，别人都用钟槌敲钟，他偏偏用脑袋去撞。他认为用脑袋撞出来的声音才是真音。他第一次撞了，人笑之，第二天又去撞，人笑他傻，第三天、第四天……头上敲出了包，人笑他痴之……直至后来，他终于撞出了最亮最悦耳的钟声，人们敬佩之。他死后，还为他塑像以资纪念。

……

“是啊，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是要靠一种永远撞击的信念的，头破血流不要紧，砍掉了脑袋不就碗口大一个窟窿嘛！”子长点起水烟袋，火星一明一灭把夜给烧得忽闪忽闪的。

阎红彦一咬牙，竟唱起了信天游——

一碗碗凉水一张张纸，

谁昧上良心谁先死。

一碗碗凉水一炷炷香，

谁昧上良心谁先见阎王。

一根干草十二节，

谁坏良心谁吐黑。

我坏良心白蛇哑，

谁坏良心变驴马……

第三章 子午岭

子午岭并不重要，但子午岭发生的这一次拼杀，对西北红军却举足轻重。它能打了，也敢打了。

白天里想你墙头上爬

到夜晚想你没办法

一

凛冽的北风呼啸着。

谢子长踏着厚厚的积雪，疾步而行，脚下不断地发出“喀嚓、喀嚓”的声响。经过一年多的苦风霜雨，死里逃生，他虽然显得憔悴了一些，苍老了一些，然而也显得更深沉、更成熟、更坚定了。他的步伐也就更疾迅、沉稳而坚实。

这是 1930 年冬“三道川事件”后，谢子长受北方局指示，到天津参加纠正立三路线的会议。随后，他化装成商人，先到北平，后又到河南的郑州、新乡等地进行考察。这时，军阀混战的狼烟烽火刚刚熄灭，被战火洗劫过的中华大地，哀鸿遍野、饿殍满地。谢子长一路考察，一路苦苦思索。解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责任感深深地压迫着他，他恨不得自己能有分身法术，分成数十个、数百个、数千个……一齐投身到革命中去……

和谢子长三道川分手后，刘志丹则从兵运工作的失败中，总结了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要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不能只利用现成的旧军队，利用军阀只能是暂时的，应该准备条件，自己独立去干。”

9 月，刘志丹回到保安县永宁山，与曹力如、王子宜（志丹走后由他任永宁山民团团总）等同志一起制定了独立组建革命武装的计划。

与此同时，得到情报，军阀谭世麟仍望刘志丹去任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营长之职。并命令驻合水县太白镇陇东民团军二十四营营副尽力协助。据此，刘志丹与永宁山党组织反复研究，最后决定：趁此机会收缴二十四营的枪械，消灭这支民团，组建革命的武装。

10 月 1 日，刘志丹在保安县地下党的帮助下，带领四五十人，在甘肃

合水县太白镇袭击了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击毙敌正副营长，缴获长短枪 50 余支，骡马 10 余匹。在此基础上，组织起来一支革命武装。不久，这支队伍发展到 150 余人。此后，这支革命武装在安塞、保安、合水、庆阳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消灭了反动民团和土豪，扩大了革命武装的政治影响，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前来参加革命队伍。

然而，由于刘志丹率领的队伍活动频繁，声势渐大，引起了国民党军队的注意。陕北军阀井岳秀命令高双城部前来“围剿”。

1931 年 2 月中旬，为摆脱敌重兵“围剿”，刘志丹率部向甘肃一带转移。一路上，他们依然不忘“宗旨”，积极宣传我军政策，使赵连璧、唐青山、贾生财三股绿林武装 300 余人投身革命。

刘志丹率部进至合水县固城川麻义村进行了整编。整编后，刘志丹任总指挥。率部再向南进军，在甘肃张皮塬遭军阀陈珪璋部谢牛旅袭击。激战中，部队损失过半。冲出重围后，为保存骨干，休养生息，刘志丹率骨干百余人到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旅苏雨生部挂名建军，被编为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杨树荣、陈鸿宾任副团长，马锡五任军需，驻防于陕西旬邑县织田镇。这期间，刘志丹又联络旧部，筹备军需，扩大队伍。此举遭苏雨生戒备，故意制造事端，在彬县秘密扣押刘志丹作人质，并威逼部队交出武器，后经党组织营救，刘志丹脱险出狱。

数日来，天上的灰云飞来飞去的不住地流动着，日光隐在山峰沟壑上面露不出它那薄弱的光线来，显得沉冥而萧条。永宁山上，王子宜、曹力如、杨跃云一行几人正在沟崖上谈着话，只见山路上尘土飞扬，一阵疾驰的马蹄声由远而近。骑马人到了眼前，看见他们，翻身下马，叫道：“子宜！力如！”

他们一看，原来是刘志丹一行数人，个个满面尘风，浑身都被汗湿透了。几匹马零零星星驮挂了些东西，都是气喘吁吁的。

看来，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志丹喘着气：“出事了。咳！一言难尽。”

见大家不解的惊慌神情，他又说：“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让张廷芝这个狗日的给下了枪，还要把我们斩草除根。”

子宜正要细问。志丹忙道：“可能后面还有追兵，咱们还是进寨子谈吧。”

大家立即起身进了永宁山寨子，吩咐团丁拉上吊桥，关了寨门。

来到教育局，刘志丹讲了“三道川事件”的经过。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

刘志丹说完，又走动了两圈还是不能完全平静下来。他说：“我们的队伍中有很多党员不愿意交枪，被他们打死或是扒了衣服赶走，听说我的军需官马锡五也让他们抓起来了。谢子长走了。张廷芝要斩草除根，派人到路上截杀我……”

一股风吹得窑门和窗板“咣当”直响，院子里的枣树、柿子树不用说早已枯黄凋谢，天地间的萧条又干烈之气，好像到处弥漫。

王子宜走过去关好门窗，倒了一杯水端在志丹面前。见到了自己从小熟悉，一块长大的革命伙伴，回到了故土，志丹就像一个浪迹归来的孩子投入母亲的怀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摇着头，又用牙齿狠狠地咬着嘴巴，白净的脸上那双大大的眼睛要喷出火来，他望望这个，看看那个：“干革命咋就这么难呀！……”

旁边有几个人已经哽咽起来。

志丹用泪眼盯着王子宜，难过地说：“我把你的兄弟也没能带回来……”

一阵沉默之后，王子宜走到志丹面前，说：“志丹！别难过，他只要死不了就还会回来的（事后知道他死了）。咱们陕北有句歌谣不是说：‘只要两人情义好，冷水泡茶慢慢浓。’你怎么一下子不像你了，你不是也常说，干革命不能急躁，不怕流血吗？现在的问题是今后怎么办？”

王子宜话音刚落，一个团丁闯进来报告：张廷芝派一营骑兵已到了寨墙下，吵着要进寨子抓人，让我们给挡住了，现在正吃喝着让县长出来去见他呢！

曹力如说：“妈的，让他狗日的来！你们等着，我先去看看。”说着，就跑出去了。

志丹和子宜商量了一下，王子宜便出门往县衙跑去。

谁知王子宜还没走几步，迎面过来两盏灯笼。是崔焕之县长披着衣服

急急火火、战战兢兢地跑来了。

一见面，他就嚷着：“快，快去找力如集合团丁，土匪围了寨子咧！”

王子宜说：“不要紧，力如已经上寨子去了。咱也去看看再说。”说着，就拉着崔焕之上了寨门。

他们向外一看，只见一片光亮，吊桥外边有百十名骑兵，一手高举松明火把，一手执缰，每人长短两件武器。为首一个，正在仰脖高喊：

“少废话！快放吊桥，打开城门。我们要进去抓逃犯！”

城上民团中有人喊：“抓什么逃犯？”

下边又是一片喊声：

“刘志丹！”

“谢子长！”

那为首的又叫道：“他们是不是都窝藏在里边？快交出来！”

大家听了都吃了一惊。

曹力如喝道：“刘志丹是不是逃犯，我们不知道！是我们县人倒不错，可他如今不在。”

“你们敢不认账？”

“你们交不交？”……

曹力如一听，火了，“你们是什么人？到底要怎么样？”

那个看上去是个头头的粗大汉子倒显客气，他答话说：“我是陇东民团的营长蔺士殿。我们是奉命行事，不让我们进去搜一搜，兄弟回去也不好交差呀！”其实，真是人防野兽，野兽更怕人。他一看力如厉害起来了，自己却软了下去。

崔县长拉着子宜，说：“他们既然不是土匪，景桂又未回来，就放他们进来，招待一下算了。这年头，你能惹得起哪个司令呀！”

王子宜说：“老师，话虽是这么讲，但如今兵荒马乱的年头，黑更半夜，空口白话，谁敢担保他们进来不出事呢？”

崔县长一听打了个冷颤揉揉眼睛，赶快说：“是啊，是啊……荒唐，真是荒唐，是不能、不能放他们进来。”

这时，只听曹力如又喝道：“你们是陇东民团军，我们是陕西民团。各守地盘，谁不认识谁，井水不犯河水的。黑更半夜，如何肯让你们进来惊扰我百姓？你们如果懂事，就好好商量。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

县长一听，就毛了。忙摇头说：“哎呀，你们应付了就是咧，不要攀我了。”

曹力如走过去说：“看来，这事非县长出面不成。你就出面唱个白脸吧，把他们安顿一下，天亮就好办了。”

县长只能来到前面，对城下说道：“兄弟是本县之主崔焕之，和你们素不相识，无论如何，你们要黑夜进城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过，四海之内皆兄弟。列位既然来了，岂有不招待之理，暂请在城外委屈委屈，天亮后，本县亲自为你们接风洗尘就是。”

曹力如言词犀利，还能唬吓一下。崔县长讲话带着颤音，底气不足，他们根本不买他的账，声言再不放他们进来就要攻寨子了。

崔焕之浑身发抖，一个劲问力如和子宜：“这可咋办咧？”

王子宜和曹力如正商量，是不是干脆来个先下手为强，和他们拼一下。刘志丹突然出现在寨子上。他轻蔑地说：

“啊！是藁士殿来了。张廷芝还挺看重我的嘛，来了一个营。”

他转过身，对力如说：“要进，放藁士殿进来，队伍不能进。你带他来见我。”

说完，拉着腿肚子转了筋的崔县长下寨子去了。

力如冲着下边喊道：“藁营长，你要进来可以，但队伍不能进来。”

他们在下边商量了一番，就答应了。藁士殿只带着几个马弁、护兵进了寨子，由曹力如领着去见县太爷。

过了很久，只见藁士殿垂头丧气地出来了。崔焕之满头冒汗地张罗着，要这边给寨子外的那帮人送酒送肉送粮草。看见子宜，说：“没事了，真是

吓死人咧！”

曹力如送走了蔺士殿，从后边赶上子宜，高兴地说：“志丹真了不起，把张廷芝骂了个狗血喷头，镇得蔺士殿连一句硬话都没敢说，就回去了。”

大家走进县政府的窑洞里，志丹把放在桌子上的盒子枪往腰里一插，说：“我刚才教训了蔺士殿一顿，让他转告张廷芝，他狗日的忘恩负义，将来我要和他清算这笔账的！现在嘛，也不能让崔焕之太为难了，更不能连累了大家，我还是走吧！”

子宜难受了一阵子，说：“要走，还是早走为好。”

力如说：“我先去探探风，你再走。”

过了一阵，力如回来说：“景范兄弟派人来说，谢子长也跑回来了，现在在川口等着呢。”

志丹说：“我这就走，这样吧，马留给你们，那些军装、军旗，你们负责连夜给窝好，说不定将来哪天就派上用场了。”

大家来到后山，用绳子把志丹他们吊下去，王子宜和曹力如也跟下去，趁夜晚摸到 10 里路外的村子。力如到相识的人家给他们备了几匹马，眼看着他们乘月色奔延安去了。这次送别，给他们心中不知又涂厚了一层期盼还是挂念，他们只坚信，志丹还会回来的。

因为他和他们几乎是在这种人世的绝境中营造了精神的斗士，并在这一样浑黄的土地上生息、战斗，他们愤恨自己的贫穷，他们又离不开那一眼眼窑洞。他们的家乡似乎永远是他们的流放地。他们的流血像家乡草木一样，一枯一荣。

不久，刘志丹果真就又回来了，带来了好几个精壮的小伙子，到永宁山又来找我王子宜。

子宜见他精神很好，就笑着开玩笑。“志丹，你准是又要干老行当了！”

刘志丹笑笑：“特委决定我们还是要搞武装，我就在清涧、绥德几个县又拉起了这几支枪，这些小伙子都是好娃哩！”

曹力如照样一头扎了进来：“好我的志丹哩！怎么，你不怕拿头，倒是枪杆子寻着往你怀里钻。咳，你不是说，搞武装得有个立足点嘛。外边情

况复杂，地形也不熟，咱们这里熟门熟路，各方面条件又好，为啥不在这儿立脚呢？”

王子宜也说：“你还怕没人没枪？把咱这搭的民团都拉出来。如今，老百姓都是咱这种穷光蛋，树起共产大旗，怕没有上千人来投你要造反？”

刘志丹动情地说：“其实我也有在本县开展武装斗争的打算，这也是我回来的目的之一，如果条件成熟，那是完全可以的。可目前的形势，敌强我弱，老百姓要吃亏的。现在我们应努力积蓄革命力量，保留革命火种。永宁山这把革命火炬将来会烧红半边天的！”

.....

就这样，刘志丹又一次在永宁山住下了，晚出晨归，整夜间在外边跑，他像块吸铁石一样，不少打散的部下，像王庭光、姜仲祥等人又闻讯赶了回来，聚集在志丹身边。他的群众关系非常好。五十多年后，王子宜回忆说：“有时我们一同出去，碰上揽羊的老汉，都管我叫王先生，苟是却把志丹叫老刘。他跟什么样的人都能谈得来。这使我非常折服。”

住在吴起镇的一位 77 岁、曾在刘志丹手下工作过的名叫袁耀秀的红军老战士说：“那一年，刘志丹 26 岁，身材比一般人略微高些。他英俊、清瘦，脸总是红扑扑的，常常带着微笑。他能言善辩，有着一副洪亮的嗓子，对着上千人讲话，每个人都能听清他说的每一句话。

“每当刘志丹走在保安街上，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常常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地讲几个钟头。大家都知道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在这偏僻的穷山沟里，就连地主也并不富有）。地主贴出告示——不管饥荒还是干旱，佃农必须交租。刘家也要刘志丹写这样一个告示。他说，岂有此理，人们连饭都吃不上，哪有粮食交租纳税。他不仅不写告示，还来到佃农中间，组织他们抗租。他问道：‘这样的情况你们究竟还能容忍多久？’刘家的许多佃农纷纷响应他的号召，起来反抗。政府也被迫宣布暂停交纳租税。”

“刘志丹是位人民英雄，人人都知道他，并传诵着他的光辉事迹，亲昵地称他为‘老刘’。他们说，他把自己家的财产都没收了。”

.....

我们还是把话题拽回来，看看在永宁山时刘志丹的一个晚上的情况吧。

刘志丹和曹力如敲开王子宜家的门，“太白镇你知道不？”劈头就问。

子宜说：“咋不知道，离此地 100 余里路的甘肃合水县太白镇嘛，我去过的，那儿有陇东民团军的队伍住着。你问它干啥？”

力如说：“干啥？下他们的枪？你看咋样？我的支部书记同志。”

原来，志丹的老部下，共产党员杨树荣今天从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那儿回来。他是刘志丹留在谭部的关系。说谭并不知道三道川那档子事，在杨树荣面前吐露说他很器重刘志丹，准备还让他担任骑兵第六营的营长。所以，刘志丹决定将计就计，搞掉太白镇那股反动武装。可陇东民团军有张廷芝这个坏蛋，志丹是没法再回去了。太白镇的驻军是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外号“黄儿子”，也是个反动透顶的坏蛋。志丹和他有过一面之交，所以，打发杨树荣先去太白镇见“黄儿子”，告诉他：刘志丹率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前往甘肃，不日路过太白，让他准备好粮草，号好房子。曹力如则按志丹的指示，从民团中抽调 10 来个党员，又从公安局等处调了 20 多匹马，换上刘志丹上次窝在这儿的军装。深夜，由刘志丹亲自带领这 20 多名骑兵神出鬼没地出发了。

志丹装成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营长，带着队伍到了太白镇。只说是路过，打搅打搅了。

“黄儿子”以前认识刘志丹，又听说过他很多传闻，心里有疑惑，可并没太多深思，再者，他刘志丹就是有三头六臂，毕竟在我黄某人的地盘上过宿一下而已，掀不起什么大浪。

他请刘志丹进屋抽大烟，曹力如、马锡五领人趁机分别把住营部各个出口，然后悄悄来到屋门口。

一切就绪后，马锡五拔抢先打死了守在屋门口的“黄儿子”的两个护兵。里边“黄儿子”刚想翻身下炕，志丹抬手一枪，送他见了阎王。那个副营长还没反应过来，杨树荣一枪把他打死了。别的屋里的大兵正在赌牌耍钱，听见枪声，刚想出来看看，只见门口伸进几颗手榴弹。曹力如带着人喊道：“不交枪就把你们炸成肉酱。”他们稀里哗啦地把枪都扔了出来，有的大兵吓昏了头，连烟枪都扔了出来。

第三天，他们就胜利回归了，多了一倍人，都是自愿参加刘志丹队伍的，骡马一人一匹还有余，驮满了枪支弹药等军需品。

太白镇夺枪胜利后，下一步又该如何发展？部队的士气开始高涨。王子宜和曹力如先讨论起来。力如建议，以永宁山为根据地向外发展。子宜也认为虽不能马上打出红军、共产党的旗号。但可筹粮派款，打富济贫，“老财们保管有‘冤’也没处去伸呢！”

刘志丹笑着说：“你们说得都很对。崔县长昨天找我，苦苦哀求我不要让他坐蜡，希望我把队伍带开，否则，张廷芝找来，他的性命倒无所谓，只怕百姓们生灵涂炭。我想也是个道理，就答应队伍开拔。现在的问题是先到哪里去？”

到哪里去？便成了话题的焦点。大家你一个主意，我一个想法，纷纷议论、商讨着，似乎人人都是诸葛亮，个个说得有道理。

二

井岳秀有个老习惯，清早守着大烟灯，抽到半晌午，长起精神，才问问公事，这习惯可是有着 20 多年的黄历尘日了。自从刘志丹打了太白民团后，他就不那么自在了。睁开眼头件事，就是叫参谋，问南路的情况。那些消息，也着实叫他心惊。一个说，保安东岭上出现了革命军；又一个说，革命军到了南边瓦子川大梢林了；安塞县报告，革命军打了真武洞；靖边县又报告，革命军打了镰刀湾民团；穷苦人都跟上革命军走了。……打土豪，分牛羊，抗粮，抗款，抗税，到处组织农民会、贫农团、妇女会。南路几个县都风传着：“红了，红了！”

井岳秀坐卧不安，下了道命令：要驻守延安的旅长高双城带兵“讨匪”，限期 3 个月，不肃清“革命军”就要撤职。

高双城着了慌，如今天寒地冻，不要说打仗，光走路也得扒层皮。队伍出去几天，四望茫茫川道，遍野飞雪，哪里去找革命军的踪迹呢？再说那伙“共匪”人人是鬼精灵，个个是飞毛腿，来无方，去无向，这不是海里捞针嘛。

其实，革命军就在这深山雪林里。

那天夜里，告别了王子宜等同志，也为了对崔县长的“承诺”吧，志丹单身走了 20 里路，来到洛河川的一个拐沟子里。那沟叫葡萄沟。这儿方圆十几里，全是梢山，也就是山上长满了茂密的树木，不同于陕北一般的黄土丘陵。他颇觉满意，再回永宁山。就把部队拉了进去。算算时辰，从打完太白镇后其实只有一天时间。

这里虽然荒无人烟，早年间还是住过人的，一进葡萄沟的山梁上，有一个古寨子，几排窑洞虽破旧不堪，修理一下还可住人。从此，刘志丹就带着队伍又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王子宜、曹力如一伙回县后立刻组织人，筹备了一些粮食衣物，背进了山。

志丹对他们说：“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广泛地开展游击战，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子宜，你回去后立刻让特委和省委取得联系，看省委还有什么安排，我先带着队伍在安塞、合水、靖边一带活动。”

一住下，志丹天性中热情、率直、向上的气质便显现出来了。他与身边的人不但拉家常、讲马列主义，说《水游》，道《三国》，还不时地给大家鼓气。他说：“其实干任何事情都一样，关键是自己得有一股子不退的劲头和不败的信念，它是一个人的信仰，也就是主心骨。就说封建军队吧，由于自身不结实，就好比纸糊的灯笼，经不得风雨，一旦戳破外壳，就会崩溃，一崩溃就不可收拾。”

“前一段时期，我们共产党里也有人动摇过。他们说：‘谁摸得准？形势瞬息万变，叫人不易捉摸。现在风和日丽，转眼也许来场狂风暴雨’。这中间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靠自己的头脑走人民群众的路，两湖工农起来了，咱们的老先生们跟着人家叫工农运动过火。只许反动派杀人，不许工农动手动脚，一味让步，这怎么得了！那时，达江（省委党员，在中心军政学校当农运班主任）给我看了《向导》291 期，上面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可惜只登了一半！”志丹笑笑，又开始给大家讲起了毛泽东这个传奇而伟大的人物，只是那时候，刘志丹的士兵们眼望着刘志丹，心里想像着毛泽东该是什么模样？他难道比刘志丹还知道得

多？还爱穷人？他们到底是天上的星星，还是晚上的月亮，到了白日一定像太阳？……憨厚而贫穷的农家出身的汉子们只能靠他们朴素的心愿去想像了。

趁刘志丹在山林中给战士们说古道今，讲革命道理的当儿，让我们来插叙一下刘志丹的家世。

刘志丹的父亲叫刘培基，14岁进学，成了秀才。“秀才也不能当饭吃”。于是，他便学了手艺，跟着纸扎匠当徒弟。出了师恰遇年成好转，上下川道人口多起来，镇上慢慢有了店铺，破坏的房子要重盖，倒塌的庙宇要重修，过红白喜事的人家，也舍得多花几个钱，做纸扎活，油漆门窗的匠人，都忙起来。刘培基赶上这个年月，就找了几个帮手，大包大揽，两年光景，赚了20两银子。有了本钱。便又开了个柴草店，供来往客商的牲口草料，一心要“兴家立业”。

刘培基17岁那年娶的亲。妻子是金汤镇王家的女儿。王氏自幼丧父，跟着寡母苦熬日月，练出一把管家的好手，推碾碾磨、针线手工，样样精干。一过门，就当家。加上刘培基会做生意，刘家的日子从此好转，买了马，置了牛。隔不多久，家里添个娃娃。刘培基的父亲刘士杰，是清朝同治年间的拔贡，镇上的教书先生。刘老先生为人正直，不畏强暴，开通明理。贫寒人家，都敬重他。刘士杰见生下个男孩，眉开眼笑，忙翻开书本起名字。因为是8月生的，学名叫“景桂”，字“子丹”。老爷爷持着花白胡子一遍又一遍地高声吟诵：“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只是这学名，家里从来没人叫过，老老小小只管叫奶名“来生”）。刘士杰哪里料到，如今怀中的“来生”后来竟成了穷苦百姓的救星——“刘志丹”。

辛亥革命那年，皇帝倒台，保安县哥老会起义，杀了旧官，老百姓推选了县长。刘士杰虽生在荒僻山区，却最留心国事。眼目下朝廷腐败，今日割地，明日赔款，丧权辱国，社会黑暗，心中觉得不平。如今改称共和，想必会万象更新，有了奔头。谁知事隔不久，陕西督军又派兵“讨乱”，把民选县长砍了头。那些民军有的被捉走，有的被杀掉了。刘士杰大失所望，一咬牙，跑回山里务农。暗想：气不过，还躲不过！当下便带着一家老小，回到金汤镇北30里的芦子沟，那是刘家祖上居住的地方，只剩下刘培基仍留在镇上做生意。五十来岁的老人，发了狠心，起早贪黑，重理家业。清

旧窑，打新窑，开荒种地，植树造林。窑背上，山脚下，种了些桃、梨、李、杏，圈起菜园、瓜园，垒起羊圈、马圈，盼望着后辈儿孙能在这里安居乐业。

当地人常说：“好男儿不吃 8 年闲饭。”刘志丹 6 岁就由爷爷带着边念书边干活。不到六七年光景，就把那四书五经，全读过熟记。

随着志丹的长大，刘家的日子越过越旺兴，就有长工到他家揽活打工。志丹和他们亲如家人，还把其中一位叫银万的老汉认了干大。暑往寒来，又一年冬天农闲，志丹和兆平（远门兄弟）除了干些零活，就去读书。有时也到亲戚家走走，打听些新鲜事儿。听说榆林城里有个学堂，办得不错，志丹想外出求学。跟爷爷一说，爷爷当然点了头。他心里高兴，找新书，翻报纸，一心做好出远门的准备。

过了腊月二十三，刘培基由金汤镇回来了。志丹见那脸色，出门的念头就凉了一半。

果被，刘培基开口就说：“这年头活不得了。”

老人嫌儿子心里存不住事，就瞪了他一眼：“活不得就造反。”

刘培基只得好言：“这回可不同，南北讲和了，陕西要大打。7 个省出了兵，来打靖国军。有人算了算，咱省里住着 20 万军队，别说真枪真炮硬碰硬，光草料一项，老百姓也供不起！前两天，捐税又下来了，咱一家就得 100 多块，真要命！眼看这草料店也得关门！”

爷爷说：“当初就和你说过，老老实实种地，从土里挖碗饭吃就算了，你偏要……”

“嗯！”刘培基说：“这可是刘家兴业的大事，所以，我想让来生和我一起去照看店业，也让他早……”

没听完父亲的话，志丹就暗暗在心里较劲……

第二年，志丹依然来到了保安县城。县高小就是当时开办的新学。它除了仍讲些八股文之类的课，还开设了算术、地理和世界历史。最受人们注意的是：新学是官办，读书不收学费。这样，有点潮流思想的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子弟送去就学。

王子宜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这些县城内的娃娃，首先成了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学校开始办在县衙门对面的学堂里，后来搬到城外永宁山上，那里有一座庙，早已断了香火，做了我们的校舍。地方不太大，学生也不多，只有一位老师，叫李子才，是从西安请来的大学生，很年轻，但见过大世面，课教得很好。记得是民国八年（1919年）的一天，我们高年级班的同学正坐在教室等老师来上课，只见李子才老师后边跟着进来一个长得眉目清瘦的少年。李老师微笑着介绍道：‘大家认识一下。他叫景桂；是本县芦子沟刘家人氏。’说到这儿，李老师提高了嗓音，喜悦地说：‘刚才试过了，文章写得很好，真是难得……’大家开始议论起来，我仔细地打量着他：中等身材，白净面皮，稍宽的额头和直鼻梁，那一双大大的眼睛格外深沉、文静。他在大家的注视和议论下，显得有些不安……”就这样，刘志丹进了学堂，为他以后的革命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和气质养成。

自从刘志丹把队伍带到保安、安塞的交界处，打了几家土豪，给穷人分了东西，队伍也扩大了。就撤到永宁山南边的瓦子川，在石峁弯安下指挥部，树起“人民革命军”的旗帜。扎下根后，大家的情绪异常高涨。他们还经常唱一些信天游抒怀自己、调节情绪，当然，也思念家人。刘志丹又颇为喜爱信天游。他不但会唱很多曲，而且对信天游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说：“它让人千思百嚼，回味无穷，浮想联翩，还可为我们这些‘赶脚汉’消除寂寞，排忧解难呢。”大家都喜欢听志丹哼几曲，他说他上中学时还演过戏，男扮女装哩。

刘志丹的队伍撤出去几条川，康家沟、蔡家砭、刘家老庄、定边集、旦八寨子附近，都有人活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这些地方老百姓被欺压怕了，见了兵就逃跑。开始刚到，战士们吃完饭，把钱放在锅里，还写个条子：“我们是人民革命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公买公卖。”然后，又满处贴上标语：

“推翻旧政权！”

“实现工农民主政权！”

“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打倒土豪劣绅！”

“穷人要翻身！”

.....

慢慢地那些留下看家的老年人，见军队不打不骂，不抢东西，说话和气，认定了“这是好人中的好人”。不等动员，就跑到梢林里找回了家里人。一传十，十传百，不几天，军民便成了一家人。一起开会，拉话，打土豪，又分牛羊牲畜。群众喜欢他们，还拉着战士，要捻香“拜把子”，一生一世做弟兄，这也是这里的风俗习惯，照他们的想法，拜了把子，才是最亲密的人。

有的叫他们“革命军”、“游击队”、“红军”，有人干脆叫“刘志丹的队伍”。说来说去一句话，都是一家人。

贫农团、雇农工会……各种群众组织，都成立起来了。年轻的小伙子三三两两，结伴来参军。

打罢了真武洞、镰刀湾回来，缴枪多了，收了二三百农民战士，队伍也该整顿整顿、训练训练了。刘志丹便把队伍拉到石砭弯大练兵。打靶、上操、讲政治。于是，群众就编排《信天游》来唱他们了。

李闯王造反黄河边，

革命军练兵石砭弯。

要把那世事颠倒颠。

受苦人跟上刘志丹。

.....

一场鹅毛大雪把地处深山密林地带的石砭弯封压得严严实实。志丹从外面回来，却见战士们抱着松柏枝子，忙着装点门面。急忙进窑里一看，他们把炕烧得热腾腾的。有拉有笑，有说有闹。兆平研了一碗墨，炕上摊着纸，正替老百姓写对联，见志丹进来，就说：“还是让景桂哥来吧，我的字不好。”

志丹一问才知道要过旧历年了。这几天，忙着练兵，把过年的事情给忘记了。心想，许多人头回离家，一定把年看得很重，应该叫大家过得快快活活。便叫供给主任道：

“罗武同志，你去买些猪肉，给大家会餐。”

罗武正拿个铅笔，趴在桌上算账，见志丹嘱咐，忙说：“不用你操心，吃的喝的全都齐全了，好几天以前，老百姓就送来了。”

志丹问：“付钱没有？”

罗武说：“我正为难哩！送一回，退一回，没人要。”

正说着，参谋葛明山在外面嚷嚷着：“老马，快来卸驮子，又送吃的来了。”

罗武出门一看，好家伙，窑前排着七八条毛驴，都驮着东西，猪肉，粉条，油炸糕，油酥馓子，黄米馍馍，还有两罐子黄米甜酒。

.....

政治部主任霍力坚也来找志丹商量军民联欢的事。他说：“各村都捎了话，请咱们去过年，光这个村的十来户人家，家家也要请吃饭，简直应付不了。我想，不如咱主动些，把各村代表请来联欢。”

志丹说：“好。这也是个政治工作，你安排一下，最好也派几个人到各村当客人，还带点礼物什么的。”

力坚说：“这事好办，上次打真武洞弄到的布匹，还存了不少。山里缺布，一家送几尺。”

志丹说：“好吧，人来齐了，你出面讲讲话，苍沟马大爷来请过好几回了，入乡随俗，今天又是他孙子满月，我去看看。”

马大爷本名马海旺，是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周围百十里，哥老会的人都听他的。志丹采取了不少对策做他的工作。好在老头正直，也爱给人帮忙出气，远近都有威望。当初在永宁山竞选团总时，志丹找他谈过话。在绅士里活动，他也出过力。队伍进了梢山，他又帮着探信儿，买东西。如今到了年下，再忙也得看看……

一时村村寨寨窑里窑外热闹翻腾。

端锅的，拿碗的，提壶的，送盘的，忙得不亦乐乎。猪肉味、羊肉香，窜了一道庄，绕了几道梁。划拳、喝酒，说笑声震翻了山沟。东头的王婶

子、西头的黄嫂子，送来两盆饺子。

突然，哨兵跑来报告说，永宁山来人找老刘。

原来，志丹他们在那儿热热闹闹地搞了一段时间，声名大振，不少土豪劣绅闻风而逃，劳动人民欢欣鼓舞。这就引起了当局的惊慌，忙调兵进行“围剿”，一时风声又紧，而且，剿兵即到。这时，特委转来省委的指示信，王子宜便立即骑毛驴赶到下寺湾去。

大年夜里，本想和老乡们通宵联欢，不料发生敌情，只好通知战士们早点睡觉，老乡们也回了家。后半夜，雪下得更大了，队伍怕惊动老百姓，悄悄集合。

谁知老乡们一夜根本没睡，都贴着窗看着他们，呼啦啦来了一大群，拦住马头不让走。有个妹子竟站在雪花中，含着眼泪唱开了信天游——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

远路的朋友徒枉然。

山坡上的小草根连着根，

什么人留下活离分？

走不完的大路过不完的河，

快刀刀割不断你和我。

树叶落在树根底，

忘了娘老子忘不了你。

红豆角角熬南瓜，

什么时候和你能一搭？……

这一声声清亮亮的歌儿把整个夜都拧出了水，又结成了冰。冰块块又在人们心中化成了泪泉泉，战士们不忍看她一眼，只是低着头踩那冰碴碴。

老乡中有人哭了。

战士们也在悄悄抹眼泪。

夜都不会言语了，只有雪花在小心地下着。

刘志丹好说歹说，再三保证，以后还回来。老乡才松开了马缰绳。

他们心里过意不去啊。把猪肉白面，一应过年物品，都打上驮子，赶上毛驴，一路相送。

送了一天的路，脚印子被雪铺了一层又一遍。

志丹苦苦劝说，恨不得下跪去求哩，这才三三两两一搭里往回返，叮嘱的话儿却筐筐篮篮、山山峁峁的一怀揣了几堆堆。

部队行军，走了一天一夜，雪仍不止。

积雪越积越深，脚步越走越滑，一个拉着一个的衣角，往前上山，几乎是爬。

天快亮了，志丹叫大家就地休息一下。又冒着雪往前走。

夜里过了子午岭，来到平正川。人困马乏，刚想宿营，侦察员报告：“东边敌人追上来了。”刘志丹马上传令：“走路的骑马，骑马的走路，连夜急行军，通过葫芦河。”说着。自己把马交给步行的一位同志。大踏步走到前边。大家屏住气，紧紧跟上。又走了一天，到太白镇西边，要翻过桥山中段，走到山脚下。人不言语，马乏了。打死也不肯走。人们只能下来，在前边拉着缰绳。鸡叫二遍，爬上山顶，总算甩脱了敌人，队伍才停下来休息。

桥山上，雪急风猛，战士们顾不了那么多了，倒下便睡，有的坐着睡着了。渐渐的人都埋在雪花里。

刘志丹睡得正甜，突然打了个冷颤，被冻醒了。他睁开眼看看，一片雪光，天亮了。摸摸脸上身上全是雪，怀里还抱着个雪疙瘩。他站起来使劲抖了抖，立时感到彻骨的寒冷，上下牙格格打架。志丹四下里望望，天连地，地连天。只见前后左右，人们横躺竖卧，身上都盖了一层雪，像一座座雪丘。马全低着头在雪中啃干草，冻得打响鼻。

志丹绕过一个个“雪丘”，心头突然滚热。铺雷盖雪，还睡得这么安然！这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难道风雪冻不透他们身？冻不透他们的心？

理想？信念？这就是自己常想的，常说的？他们还用我说吗？他们本身是火，可以融冰化雪哩！……

志丹想着、问着，心里湿乎乎、滚腾腾的。他怕冻坏了同志们，招呼大家起来活动活动。他先推推脚下一个大个：“罗炎！”

罗炎猛地抓了一把雪，跳起来：“行动吗？”

志丹摇摇头，替他拍打着雪：“快叫大家起来，睡久了会冻病的。”

罗炎这才又揉揉眼睛：“值日班长，快吹哨子！”

正月初三，刘志丹的队伍来到了古城川。

古城川有个堡子，当地人称作“古城”。堡子内没有人家，东西两边，各有个村子，叫古城村。队伍就住在东村。

当晚，志丹召开了干部会，研究编制、配备干部。刘志丹是总指挥，霍力坚是党委书记，把队伍编成4个大队，一大队长赵宝魁，阎小盛、姜海银分别任二、三大队长，四大队长由力坚兼着。

第二天一早，宣布编制。志丹讲了话，南下甘肃宁县，一边打土豪，一边打土匪民团，往前行军，壮大自己。

哨兵跑来报告：“发现敌人。”

是陈珪璋手下谢牛的一个旅，从宁县来袭击。

陈珪璋的队伍从前就跟赵宝魁打过仗，还几次托人说合，要收编，都被拒绝。这一阵听说队伍闹大了，更是眼红。谢牛手下也是亡命徒居多，打仗又刁又狠。

敌人说来就来，交战已不可避免。志丹对力坚说：“快做准备！”命令一大队正面抗击，派出护兵路大昌去调二大队上来，三、四大队向东撤退。

赵宝魁和陈珪璋第二次交锋，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提着盒子枪，带着人，飞奔出村。到了塬畔，敌人一个连已到脚下，宝魁喊了声：“打！”战士们猛虎扑食，齐扑上去。敌人见来势猛烈，扭头就跑。赵宝魁紧追，敌人大队拥上来，正好阎小盛带着二大队，从侧面又一个猛扑。敌人顶不住，扭头又跑，就像一群黑老鸦，天晚找不着宿处，满天乱飞。小盛追了一程，捡的有枪，也有毛皮帽子。

忽然，敌人的骑兵插到背后，把我三、四大队给截断了。大行李、骡

驴子、粮食驮子冲得四散八落，人挤人，马踏马，整个塬上，只见敌人的马群往来冲杀。赵宝魁一下急红了眼，见马就砍，见人就杀。顿时雪白中一片红河。一匹白马闪电似的迎面奔来，赵宝魁把刀一横，削掉了多半匹马嘴，那马带着刀，四脚腾空，马上的人跌下来，一头倒插葱栽在雪地上。宝魁上去一刀，结果了敌人，回过头，又去找大队了。

顿时间，白雪红血，一片汪洋，耀射银天。

四处枪声零乱，左一堆，右一堆，分不清哪是敌人，哪是自己人，血雪中，东倒一匹死马，西倒一具死尸。遍地撒的是粮食、骡驮架子、破布片、烂麻袋。

刘志丹一方，也被敌人骑兵割成几段。志丹身边只跟着力坚和一个警卫班。他们且走且战，敌人越聚越密，眼看四面要合拢了，阎小盛提着短枪，领着十来个人，一路冲杀过来。两股人胶着起来，再打不散，倒来了个反冲锋，敌人一下子退了半里。

志丹命令：“撤退！”

敌人的步兵又攻上来了。

兆平和罗炎赶到，俩人拦住敌人就打。

被掩护的志丹他们走远了，兆平和罗炎的子弹也打光了。只好用大刀矛子杀开条路硬冲出来，去找志丹。

刘志丹跑到一个山嘴子上，瞭望着远方，命令：“插起红旗，集合队伍！”

宝魁看见红旗，跑到这边山上，累得脸色焦黄，赤着的两脚，被冰碴子扎得稀烂。一停下，就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啃雪。

.....

一场遭遇战，打到了天黑，还没有结束。志丹数数人头，力坚、宝魁、兆平、小盛、海银、罗炎还在，可罗武、强平、玉先……却不知下落。队伍打散大半，500多的人马转眼只剩下200来人，同志们的情绪很难平静下来。

刘志丹艰涩地咽了下唾液，低声说：“同志们，不要垂头丧气……”他自己却哽咽了起来。咬咬嘴唇，他又说起来：“同志们，抬起头来，咱们是

无产阶级的队伍，是为咱穷人打天下，战士们都是有志气的，打散了还会回来……

按志丹的打算，只要出了森林，暂时找个立足点，休息几天，同志们身体一恢复，就可以转移到山边边上，找个人烟稠密，富足的地方，打些土豪，筹些粮款，扩大部队，然后再进山。

选来选去，觉得旬邑县织田镇最合适。那地方既靠山区，群众条件也好。1928年，当地的群众领袖许才升，领导过旬邑县的农民起义。再一层，附近没有别的敌军，和苏雨生防区接近，有以前那段关系，短时间内不至于打起来。从小石崖起身时，志丹就派阎小盛到织田镇打前站。说来小盛也聪明，脱下老羊皮袄，换了身俘虏衣服，就走了。

部队一路南下，又打了几家土豪，弄了点经费，到了织田镇。阎小盛、马罗武领着镇长、商会会长出来迎接。

刘志丹有点纳闷。原来，罗武去苏雨生部队，带回两驮子军装、药品、子弹。苏雨生还派人送到织田镇，正碰上小盛。

这织田镇是座小土城，房屋破败，街面冷落，百姓们也穿戴单薄，身上的破棉袄都是碎块块，包不住棉花。刘志丹看着凄惨，就访穷问苦，尽力救济一些。

第二天，织田镇正逢集，刘志丹趁这机会上了戏台，给群众讲了话，鼓动大家和他们一起打土豪、闹革命。

谁知过后不久，出了一件怪事：大土豪刘日新抗粮上吊死了。刘日新是旬邑县数一数二的老财，在国民党部还挂着名义，常到西安走动。志丹赶快吩咐：开个群众大会，说明事实真相。不过，多少还是闹了点风波。

这时，省委来了指示：要部队就在这一带活动，要争取和苏雨生联合。苏雨生正跟西安杨虎城谈判，请求收编。

刘志丹掏出烟袋锅，装上烟叶，使劲吸了几口，沉思半晌才说：“这问题得多考虑考虑。”

力坚刚从省委回来，忙解释说：“对当前的局势，省委已作过分析。认为蒋阎冯大战结束，敌人内部矛盾虽有缓和，但是蒋介石两次‘围剿’中

央苏区，都遭受惨败，这个矛盾又要尖锐起来，两广已组织政府，通电讨蒋。在陕西方面，蒋介石虽把陕西交给了杨虎城，但是很不放心，屁股后边跟着顾祝同 3 个师，住在潼关不走，明明是来监视，这等于在杨虎城喉咙里扎了根刺，吐不出来，也吞不下去。看来蒋、杨彼此戒备，冲突只在早晚。杨虎城和西北各派军阀方面，也有大大小小的矛盾，各有各的打算。省委打算抓紧这个时机，联合各派势力，建立反蒋大同盟，从中扩大革命力量。各派杂牌军都派人去联络。初步计划，先搞 5 个旅，苏雨生也是个争取的对象。省委的意思是叫你去见苏雨生。”

刘志丹经过周密谋划后，准备去见苏雨生。没料想，第二天，苏雨生派副官到织田镇来接志丹了。

刘志丹带护兵路大昌随行，临行，他嘱咐力坚说：“我这一走，不知何时回来。这地方只能临时打打游击，筹筹粮款，随来随去，不是长久之地，山区才是根本。赵宝魁已把张皮塬打散的人集合起来，我写信对他说，就在合水一带打游击，暂时不要过来。有事也好互相策应。还有小石崖、篙窰堡、永宁山等处，也要经常联系。”

力坚让他多留心。

志丹说：“古书说，文事必有武备。谈判能否成功，要看实力，家里要加强戒备。”

力坚催他：“你放心走吧，这里交给我，万无一失。”

刘志丹到了彬县，苏雨生派汽车出城接到公馆，当天设宴招待，次日又游玩花果山、水帘洞。

阳春三月，天气温暖祥和。

尽管苏雨生换着花样，百般热情、万般殷勤地款待着刘志丹，然而刘志丹最终还是识破了他的阴谋。

刘志丹毫不动摇自己的立场，并痛斥他：“你为一张委任状就出卖了朋友，那么，你到底和共产党好，还是和国民党亲？”

苏雨生早已被利欲熏心，根本不会理睬刘志丹的痛骂，并下毒手将刘志丹打入大牢。

最后，在杜斌丞等人的营救下出狱。

刘志丹热泪盈眶地握着杜斌丞的手说道：“望老师保重。”然后和他的战友们一起疾行在荒野中。刺骨的北风把每个人吹得东倒西歪，可大家还是坚定地走着……

第四章 三把火炬

三把火炬聚集在黄山坳中，使红军力量更加壮大。当然，成分也就更为复杂。然而，只要干柴火，遇上火星，就会燃烧不止。

荞面饸烙杂碎汤

死死活活相跟上

一

1931年夏天，刘志丹出狱后，对陕甘边界的南梁山区从军事、经济、自然环境诸方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综合考察。之后进军南梁，发动群众建立武装。

所谓“南梁”，这不是本地人的话，而是保安县人的叫法。这地区，在保安县南边，满布森林，又是接连不断的大山梁。保安县洛河川的人，总是向南一指，说：“南边山梁上，好大的树。”灾荒年月，逃难的人来多了，洛河川的人又说：“南边山梁上人口多了。”以后人们就都称这里是南梁了。

《刘志丹》那本书上还说了：更准确点，如今这里叫“南梁堡”。因为这里偏僻荒凉，兵匪如麻，百姓到处修了堡子，一有动静，都带上干粮，背上铺盖，抱上娃娃，往堡子里钻……不管叫“南梁”也好，叫“南梁堡”也好，刘志丹以前路过几回，都没停留多久，这回下次心把这个地区做个调查研究，然后“因地制宜”，后来，还真闹成了事，建立起一块根据地。当然，这块根据地的创建可是付出比以往只多不多的血和汗，乃至，悲欢离合、受冤蒙难。

经过一番艰难和困苦之后，志丹决定先把队伍开到保安一带，休整两天，迎接杨棋的队伍一同到南梁。

忽然，侦察员报告：张廷芝骑兵由北面来到二将川。黄慕石队伍由南面来到大风川。

黄慕石干了半辈子暗探，最狡猾毒辣，打听出刘志丹在稻水湾集结队伍，姜海银也投了他，便勾结张廷芝来“围剿”。

刘志丹想：在梢山里可没你们占的便宜。马上布置：阎小盛带二大队

去牵制张廷芝，赵宝魁、姜海银的一、三大队对付黄慕石。

已到了深秋时分，细雨连绵，四下阴云低垂，寒风飒飒，战士们冒雨行路，淋得透湿，离二将川不远，天黑下来，找了个村子住下，生火烤衣裳。

院里有人叫道：“抓住个探子！”

小盛忙问：“什么事？”

哨兵说：“抓住个探子！”

那人也叫起来：“我是路过，再说探子，抽你两耳光。”

小盛借灯光一看，原来是葛明山。 。

明山高兴地骂道：“你是啥队长，连我也抓，昨日鬼的！”

小盛笑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明山：“先给我弄碗饭吃。”

小盛对哨兵笑着说：“你们可真没有眼力，张廷芝还没打上，倒抓了个二猫子，还得管饭吃。”

大家都笑了。

原来，葛明山去四川扩兵。听说张廷芝队伍开到二将川，猜到必定有鬼，就来打探的。

正说着，侦察员回报来了：张廷芝带狗腿子蔺士殿，领着骑兵来了。

小盛把队伍埋伏在梢林里，拉上明山跑到小山包上观察敌情。果然，蔺士殿带着 100 多人，从北面大模大样地过来了。那家伙不知这里有游击队，连个尖兵也不派。

小盛对明山说：“把这些马夺来才好哩！”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叫一个中队诱敌追击，自己带一个中队埋伏下来，准备夺马。

蔺士殿一队人马，都斜挎着枪，嘻嘻哈哈，扯开嗓门唱着下流小调。忽听见前面山坡上，“叭叭”两声枪响。有人闭着眼就喊：“肯定是刘志丹的人！”

蔺士殿忙叫去追。那伙人顺着山城，都上了山峁。坡上长满格针，马进不去。蔺士殿叫道：“下马去追，不要叫跑了。”

一时他们都下了马，交几个人把马牵上。

小盛见敌人追远了，跳起来打了个呼哨，战士们一拥而上，夺了马，守马匪徒慌了手脚，乱放两枪，急忙逃命。

蔺士殿听见山下枪响，知道中了计，忙吩咐手下人往回跑。

山上的游击队返身追下来，匪徒们连滚带爬，窜进北沟，又被小盛的骑兵冲得七零八落。

这伙人出来的四条腿，转眼都变成了两条腿，被游击队打死不少。

张廷芝折腾了一阵，无心作战，连夜退回老窝，游击队趁势进入二将川。

明山夺了匹小青马，当下辞了小盛，回滔水湾报信。进村见一群人拥着宝魁正说笑得热闹。原来，这边的黄慕石，拉上合水民团打头阵，宝魁给他下了埋伏，打死 8 个，活捉 30 多个，收了 30 多支枪。

志丹一听，说：“今天好好庆祝庆祝，去年这时候，咱们消灭了‘黄儿子’。今年这时候，打了两个胜仗。”

正张罗着要会餐哩，忽然，志丹的表哥王兆平从人堆里挤进来，掏出封信递给刘志丹。刘志丹看着，兴奋得满脸放光。举着信告诉大家：“同志们，又有好消息了。晋西游击队失败后，有 27 个人过了黄河，他们和商贩队合起来，编成个大队。因为商贩队的大头目姓史，就叫‘史大队’。史大队已到了保安，马上就要和咱们会合了。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后边的话早已被欢呼声淹没了。

晋西游击队一来，先到了特委。

晚上，在一个土炕上，马文瑞代表陕北特委向晋西游击队负责人介绍了陕北情况。

马文瑞是陕西米脂县人，典型的陕北汉子的长相，白白净净、方方正正，中等个，既沉稳又不失活跃。1926 年还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 年转为共产党员，曾担任过绥德县委常委、县共青团团

委书记，领导过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后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并兼任中共陕北共青团特委书记。1931年又兼任中共保安县委书记。

在马文瑞的介绍和建议下，阎红彦、师储杰、杨棋、杨仲远等人研究决定，将晋西游击队和保运队两家统一指挥，并改名“陕北独立支队。”队伍制定了约法三章的纪律。（即：第一服从晋西游击队队委会的领导；第二不许抢拿穷人的东西；第三不许调戏妇女。）

在此期间，谢子长受特委指示，在宁夏、兰州一带搞兵运，没有固定地点；刘志丹正在南梁发动群众，组织武装。

阎红彦最后站起来宣布：“会就开到这里，现在大家分头准备，即日南下。”

南梁的刘志丹正派了几个人去找阎红彦、吴岱峰他们。

随即，志丹又给商贩队的领导人师储杰写好了信，请他们到南梁会合。再派人送信给赵羔子、白文秀、高生华、郑大爷请他们给军队弄些粮草，递送消息。回头去叫明山通知小盛，也到南梁等候。

刘志丹带着队伍，一直来到南梁堡北边的玉皇庙川等着欢迎。

只见迎面过来了五六个人，志丹猜是“史大队”的。紧往前赶了两步，最前面的是位中等个头，圆脸大眼的人，认出是杨仲远。以前他也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过。

两人多年不见，格外亲热。志丹紧紧地握着仲远的手，说：“你们辛苦了！”

仲远笑道：“大家都一样嘛！”

没等仲远介绍，志丹一把又拉着一个留着小胡子、短下巴颏的人说：“这是杨棋同志吧！”

杨棋上去拉着志丹的手：“咱们没见过面，可是早就熟了。整个陕北谁人不知刘志丹，连国民党也得借高额大价买你这个‘神宝’呢！”

杨仲远原来是个老党员，在国民党军队中做过兵运工作，后来组织一部分人起义，成立了一支军队。失败后，又参加晋西游击队。这支队伍，是山西省委组织起来的，丰来在吕梁上打游击，因为敌人重兵“围剿”，打

得只剩下 30 多人，弹尽粮绝，无法坚持。山西省委机关又遭到破坏。最后，他们才乘羊皮筏子西渡黄河，到达陕北，最后只剩下 27 人。过了河就打仗，队长拓开宽牺牲了，政委王思学被党派到北京汇报工作去了，剩下的就由杨仲远负责，经过陕北特委的关系，就和老史、杨棋的商贩队合兵一处，特委又派了些人进去，队伍已发展到二三百人，来南梁找到志丹会合。

志丹听后心里激动，猛想起一年前派来联系的那个年轻人，杨棋的侄子杨可箴。便悄悄问杨棋：“可箴怎么没来？”

杨棋叹口气，说：“这孩子雁门关战斗中牺牲了。”

志丹不无感慨：“太可惜了！”

忽然，一阵锣鼓喧天，一个老汉带着一群青年后生，扭扭搭搭过来了，一边敲打小锣小鼓，一边唱着自编的歌。

这是南梁附近的农民前来庆贺游击队会合的。

晋西的人说：“陕甘边界老百姓真好！”

志丹也自豪地说：“把土匪、民团一扫清，这里就可以成为陕甘根据地的基础。”

早有几个年轻的战士已夹进了扭动的队伍里，又笑又舞。

会唱歌的姑娘又唱起了信天游——

拴马桩上拴红马，

当红军的哥哥到我家，

葱花花来油点点，

当红军的哥哥吃了上前线。

三春起走了到如今，

难活活不过人想人。

荞面圪坨羊腥汤，

死死活活咱相跟上。

.....

二

谢子长到达南梁后，和刘志丹、杨仲远商议后首先成立了新的队委会，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仲远、胡庭俊、白锡林、党永亮等人为委员。

紧接着，他们就召开了队党委扩大会。

会上，他们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以及今后的行动安排。

谢子长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为了适应这个形势，省委指示我们必须整顿部队，高举红旗，建立一支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开辟渭北和陕北苏区。我认为这个指示是非常正确的。从 1928 年秋开始，我们曾多次在地方民团和军阀部队中搞兵运，但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我们要利用敌人，敌人也在利用我们。敌人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和条件下允许我们的存在，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和条件，他们就要缴我们的枪，杀我们的人。他们决不允许我们‘借’他们的‘水’，养我们自己的‘鱼’。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支独立的、完全由我们党掌握的自己的革命武装。目前，西北地区军阀山头林立、矛盾重重，他们各自为政，相互并吞。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抗日反蒋高潮兴起，为我们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要抓紧这个时机，在陕甘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特别是陕北和渭北一带，从大革命以来党在群众中就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谢子长越说情绪越亢奋，连自己都感到讲话的思路越来越明晰，他接着说道：

“乔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处，不但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而且，这里地域开阔、山大林深，便于迂回。我们的工农红军一定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发展和壮大起来。”

“总结清涧、渭华、旬邑起义失败的教训和晋西游击队的经验，说明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革命的武装力量就无法立足，更无法发展壮大。”

大家的情绪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一个个抢过话头找战斗失败的根源，议下次战斗的方向。

刘志丹也站起来说：“毛泽东、朱德同志在井冈山的胜利，也充分证明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应以南梁地区为根据地，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高举红旗，开展游击战争。为了实现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我们的部队必须首先进行整训。”

“是啊，”子长接着又讲道：“晋西游击队在阎红彦、杨仲远、白锡林、吴岱峰等同志的领导下，经过转战晋、陕、甘的艰苦曲折的战斗历程，保住并扩大了这支革命武装，为今后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我们的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懈，这是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的，必须进行整顿。我相信经过整顿，我们的队伍一定能够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队委会决定从各队抽出 12 人，组成一个支队，由阎红彦任队长，到乔山北段陕甘宁交界的曲子、环县、定边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谢子长率领部队进驻庆阳县的新堡，一边整训部队，一边开展群众工作。

11 月 20 日，部队到达宁县柴桥子，12 月底正式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马云泽任经济处主任。

反帝同盟军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送来一批学生军，三原县辛、午区和旬邑县也动员了一批农民群众来充实反帝同盟军。队伍开始壮大起来。

一个时期来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开展，使谢子长感动欣慰。但是，部队的建设问题仍然存在着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不良倾向。而一些错误的倾向却被大家认为是合理的，一时还无法纠正。谢子长为了部队的建设，费过多少神，然而，始终好像没理出头绪来。他正困惑着焦急着，刚好，被派往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的阎红彦回到部队。他通过西安地下党搞到一批枪支弹药。更令子长兴奋的是，他带回了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均取得了胜利的消息和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有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

谢子长如饥似渴地读着决议，心中豁然开朗。他经过整整一个不眠之夜的思索后，来到刘志丹的房间里。

看得出志丹也是彻夜未眠，他正舒展着胳膊驱赶浑身的疲劳。

谢子长拿着旱烟踏进门。

刘志丹笑着说：“我猜你也是一夜未眠。”

谢子长也笑了：“你不也一样嘛。”

他们在炕头落座后，谢子长掏出《古田会议决议》说道：

“这几天，我就一直在琢磨着如何抓好部队的建设问题，你看看，真了不起哪！毛泽东同志说党的建设，首先是政治上、思想上的建设，同时，也要在组织上进行建设。我考虑，军队的建设也应该如此。必须首先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建设，同时进行组织上的建设。而思想上、政治上的建设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党的领导决定着军队的性质与面貌。毛泽东同志还说了：必须在红军中建立政治制度，不断地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党的纲领路线的教育，克服军队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使军队完全服从党的领导，使红军的战斗力不断地提高。这些我们也做过了，但做得还不够，特别是在部队中存在着一些错误倾向还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刘志丹接过话头说：“对，我也觉得有几种倾向必须马上纠正，如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问题。目前，我们实行的让干部和战士同样地轮流做饭、喂马、站岗、放哨，这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表现，它使指挥员整天缠绕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中，无法集中精力全面考虑部队的政治建设和军事建设，使部队的整个建设受到影响。然而，由于大家对这种做法已经习惯了，反而觉得它是公平的、合理的，是官兵平等的具体表现。还有极端民主化的问题，部队的一切事情都由士兵委员会来决定，甚至连干部的任免也是士兵委员会来决定，这有它好的一面，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使指挥员的权力分散，该集中的东西集中不起来，反而影响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是应该马上纠正的。”

“咱们不谋而合了！”子长激动地说：“这些问题，我也早有感觉，但不知道错在哪里，读了《古田会议决议》，心里就全亮堂了。我考虑咱们马上召开队委会，专门研究部队的建设问题。同时，在部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再开办一个军政训练班，组织大家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和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专门轮训班、排长。另外，再建立一个列宁室，组织指战员学习

文化和革命道理，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只有部队的政治思想素质提高了，部队建设才能真正地抓上去。我考虑还应在部队内设立党委会，各队设政委，大队设党总支，中队设党小组，你看如何？”

志丹说：“你想得很周全，我完全同意。”他沉思一下，又说：“我考虑应该成立一个补充队，专门训练新来的农民和学生！”

子长凝神想了想：“有必要，新来的民兵和学生未经过专门训练，很可能把社会上一些不良习气带进部队。成立一个补充队，专门对他们进行训练，以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

.....

他俩越谈越兴奋，子长又问了刘志丹家里的情况。“上次在你家住的那几天跟过年一样，顿顿有可口饭，还想吃弟媳的荞面楂楂饭呢！”

这一段时期，谢子长、刘志丹们对开会似乎颇感兴趣，两人一个小会，十人一个党委会，这不，才过了不到两个月工夫，又开起了声势浩大的盛会。

1932年2月12日这一天，风和日丽，春光明媚。三甲塬细嘴子广场上红旗招展，人声鼎沸。简易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的横幅，会场周围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语，给这庄重的会场增添了热烈的气氛。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群众，兴高采烈地涌流进来。脖子上系着红领带的游击队员威武雄壮地站在广场中央，飘扬在枪尖上的小红旗和挽在马头上的红带子组成一片红色的海洋，映天耀日。

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典礼大会开始。

霎时，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整个会场洋溢着一派欢天喜地的热烈气氛。

旬邑县委代表王伯昌向游击队授旗。谢子长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主席台，他精神抖擞、神情庄严，面对着这面鲜艳的红旗，心中波涛翻滚，激情飞扬。他凝视着绣在旗中央的黄色的五星，凝视着五星中央的镰刀斧头，凝视着写在红旗上方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行大字，好像看到一团烈火正在他面前熊熊燃烧着，仿佛看到无数面鲜红的旗

帜插满中国大地……他双手接过红旗，将它高高地举在头顶。

顿时，口号声惊天动地，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了。

李杰夫代表省委宣读任命：

谢子长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政委兼队委书记李杰夫，参谋长杨仲远，参谋荣子卿，经济处主任雷云亭。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警卫大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庭俊；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棋。

谢子长代表指战员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结束，成群结队的老百姓吹着唢呐，抬着猪羊慰问子弟兵……

就在大会召开之前，领导意见发生分歧：李杰夫要打平原，子长要先在山里游击，所以，派刘志丹去省里，没有任命他为领导。虽是早春时节，风儿却带着黄沙，在塬上飞驰；干燥的空气把仅有的一点水蒸气吸干了，地上裂开了缝，人们望天叹气担忧今年又遭旱灾。刘志丹擦了把汗，迎风进了西安城。他是来省委汇报工作的。

一直逗留到傍晚，路灯刚亮，稀稀疏疏，照得马路上灰楚楚时，志丹才穿过西大街、拐进南大街，找到“长安洗染织补厂”，走了进去。

这是间铺面有一两间房大小的小店，掌柜的正低头看报。

志丹招呼：“伟林！”

掌柜的忙扔了报纸，把志丹拉进柜台，回头叫妻子“快把楼上的灯点上，去做饭”。李伟林的妻子李静一看就是个读书人出身，文静聪慧。与志丹打过招呼，便上楼去了。李伟林跑到门外上面看看，没有可疑形迹，这才笑笑，引志丹上楼去。一到楼上，又忙摆手，让妻子快下去。

伟林凑近志丹，对着脸细看了半天，才说“你倒没变样。报上登着‘旬邑羊坡头消灭共匪’，还‘悬赏十万元缉拿匪首刘志丹’。谁知你就日鬼地钻进他们心脏里来了。”

志丹笑了，风趣地说：“收了一份厚礼，也该登门拜谢。”

俩人寒暄过后，志丹又问：“你这几年过得好吗？当上资本家了。”

“见鬼。光这身打扮，西服革履，就累死人，整天得挺着脖子，不如穿大褂舒服。”

伟林是渭华起义失败后，跑到北京，在市委工作。北京市委破坏了两次，夫妻俩藏在乡下学养蜂，生活了几个月，又找上党的关系，调到陕西省委。伟林在省委搞宣传工作，李静是省委的妇女部长。公开的职务是开这铺子，实则作联络点。这位当年是北京师大校花的李静可是个老党员了，专门做上层妇女工作。她很沉静，当然也很聪颖。穿件紧袖玫瑰色长袍，头发向里卷个圈儿，端正的鸭蛋脸，眼里露着微笑，风度极为高雅。志丹见她托着个红漆盘子，端上四样小菜，一壶酒，忙说：“李姐，别忙了。”

李静笑着说：“给你庆功接风嘛。”打过招呼后又下去了。

志丹赞叹：“李大姐到底不同，有了她你省多少心！”

伟林说：“还不是穷凑合。我们结婚十几年，也多亏她，颠沛流离，四处安家，快四十了，还没个孩子，有时也感到一点寂寞，不过，也幸福。一心忙革命嘛，没点代价还行……”

俩人又一阵寒暄过去，志丹说了来省委的意图。

伟林说：“我昨天见过杜衡，正大发脾气。说军队为什么还不来三原？听说你们争执得很厉害，到底是啥问题？”

志丹说：“无所谓厉害不厉害。杰夫传达省委的决议，要在平原建立根据地，夺取中心城市。我和子长认为为时过早，他坚持……”

伟林记得渭华起义时、志丹就主张把队伍拉到陕北，便问：“你的想法没变吧？”

志丹说：“不，应该说比以前更明确。这几年东奔西走，吃了些亏，感到没一块较好的根据地站脚真不行。南梁地点适当，可攻可守，站稳了，再出来不迟。这不是凭空想像，毛泽东同志在湘赣边界就是这样做的……”

伟林不等志丹说完，忙从床下取出两本文件，塞给刘志丹说：“你还记得冯蕙琼吗？这是她去上海前留下的，叫我设法捎给你，你看看吧。”

志丹突然心头一热，终于把将冲出口的话咽了回去，冯蕙琼可是与他

共患难过一些日子的好同志！

志丹翻看着手里的书，一篇是《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一篇是《红四军党代表大会决议》。他聚精会神地又把自己整个儿埋在了书中，连李静送来的羊肉泡馍，他也没看见。

伟林几次催他休息，他一直看书到半夜，兴奋地说：“这两个文件好像就是为我们写的。里面提到的问题，我们几乎都碰到过。根据地的建设，军队政治工作，各种政策……真是搞革命武装斗争的百科全书！”

伟林这些年都是做地下工作，对于军事斗争的事不大熟悉，但是凭他同志丹过去的接触，他感到志丹很稳当，很慎重，不成熟的话他不会说。对于搞革命武装，建立根据地，他可是比这里的任何人都想得深、决心大，看得准，当然，付出的代价也最沉重。但他虽然受了那么多挫折，方向是对头的，而且，决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像寻找火种一样寻找光明。甚至真诚得能感动上苍，一次再次，不屈不挠，亲手搞起军队，失败了爬起来又干。因此，伟林相信，目前这一场争论，志丹也是对的。

伟林说：“除了我，一定还有人同意你的看法的。不过，要省委改变既定方针，恐怕也是有困难的。”

志丹坚定地说：“迟早会改变的！能看到这两个文件，我也不算白来！”

不过，夜深了，志丹的担忧又上来了，他自从来西安的路上，一直就在考虑：万一杜衡谈不通，又该怎么办？他也感到：杜衡不是个能够虚心听取别人意见的人。除了他自以为是之外，他执行的可是中央四中全会的精神。可这种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偏偏又行不通。志丹脑子里在翻来覆去地捣腾着……

刘志丹哪里知道，杜衡其实也很着急，只是急跟急不一样。

杜衡看过李杰夫的报告，他已经知道了刘志丹的来意。本想给刘志丹扣几顶“上山逃跑”、“悲观失望”、“右倾保守”的帽子，把他打发回去，可又怕压不服，治不住，多数人还跟着他跑，早晚是个祸根。因此，想来想去，索性撇开他刘志丹不理，派新提拔的军委书记张金下去督战，催游击队迅速行动，要打下几个城市，给大家看，堵住刘志丹他们的嘴。

是啊，刘志丹是万万想不到，当他在李伟林家等待时，杜衡在背后已搞开了名堂。而他却真诚善良地担心起省委机关是不是出了事，不然，省委为什么不接见他？

三

阳坡头战斗后，陕甘游击队在织田镇进行了休整。

2月19日，谢子长率领部队，渡过马栏河，进驻清水塬、土桥塬。

这时，敌人又调集了几个团的兵力，由富平、同官、耀县、淳化、旬邑、彬县等县民团配合，从东西南三面向游击队扑来，陇东军阀陈珪璋也配合正宁、宁县、合水三县民团在北面堵截。

面对游击队四面受敌，重兵压境的形势，如何确定部队的行动方向？

子长久久地徘徊着，他凝视着放在桌上的省委来信，心中波涛翻滚。自从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省委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部队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可他总觉得这个指示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主观主义的产物，执行它只能给革命带来危害。然而，那毕竟是上级党的指示，到底该不该执行呢？

志丹，你该到省委了吧？……若你在，还有个人商量、支持，子长望着满天星斗，叫着志丹。就在昨天，杜衡又一次来信批评了他，信中言词十分激烈，毫不客气地指责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让不进攻战略”，同时，指责他优待俘虏的做法是“对白军军官采取右倾主义的办法”，是“党不可饶恕的罪恶”。

今天，游击队政委李杰夫对他不执行杜衡的指示的做法很不满，多次批评、指责他，李杰夫干脆对他大发雷霆，说他是右倾逃跑主义……

对于这种种责难，子长抱定一个老主意：不管怎么挨批评，受指责，戴“帽子”，只要能使革命免受损失就行了。他现在沉住气，只一门心思等着刘志丹回来。

所以，不管李杰夫如何反对，子长还是率领部队向东南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2月20日，游击队到达耀县的照金镇。

在这里，最突出的战绩就是搞宣传，扩红征兵。这里的农民、矿工人人争当红军战士，这里的妇女、家属，个人是支前模范。我们抄录了一位叫屈堀的当地“艺人”写的一首歌来说明当时当地群众的心声吧！

当 兵 走

小鬼子在黄河岸边修了个大炮楼，

枪子儿不长眼睛飞得哧溜溜。

扔上你的放羊鞭，揣上酒葫芦，

你要有种的别守在家门口。

石头呀，我那好兄弟，

咱跟上队伍走！

实指望咱二人好它个天长地久，

没料想兵荒马乱赶上这年头。

拉着你的绵手手，实实是不想丢，

你要是个有情的就守住这空炕头。

凤英呀，我的小亲亲，

我还没活够！

当兵走，当兵走，’

咱跟上咱的队伍走，

好日子才开头。

.....

要求参加红军的人们被游击队员领走了。子长的面前又站着几位矿工。有一位抬起头望着谢子长，突然，双膝一跪，声泪俱下地说：

“谢总指挥，请你救救我们一家人吧！”

谢子长走上去，扶起他，亲切地说：“你家有什么危难？慢慢地说。”

那矿工用袖子抹去一脸泪水，说：“我是焦家坪人，我们那里的老百姓本来就够苦的，自宜君民团来了后，整天要粮要款，逼得许多人背井离乡、沿路乞讨。我家因交不起粮款，那帮狗民团们多次辱打我和我大。我大外出打短工，现在还不知在哪里？我来到煤矿做工，一年多了不敢回家……”

“宜君民团就是坏，在焦家坪川做尽了坏事，早就应该收拾他们了！”

“那帮家伙可是造下孽了，老百姓从牙根根上都恨死咧！”

……

有几个人附和着说。

子长一沉思，叫来侦察员详细地布置了侦察任务，又与李杰夫等几个干部一起研究部署了作战方案。

第二天五更时分，骑兵队按照谢子长的部署出发了。拂晓前，他们包围了焦家坪，在敌人还在睡梦中时，突然冲进团部，消灭了敌人一个连和一部分民团。

只一夜工夫，宜君的人们就从黑夜里看见了青天。

只一夜工夫，宜君的男女老幼都吟唱着谢青天。

红军游击队，

老谢总指挥。

砸开万年链；

全靠谢青天。

……

这一小仗打过，谢子长又率领部队，踏着朦胧的月色和白皑皑的积雪进入宜君县西北的艾蒿洼。

在艾蒿洼大大地发挥和锻炼了童子班的小战士。

战斗结束了，谢子长高兴地表扬了童子班在战斗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郑重宣布：命名童子班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王有福任队长。

想想几个月前，这童子班只有十几个人，都是些十四五岁的孩子。在成立陕甘游击队时，各单位都嫌他们年龄小，不愿意要他们。阎红彦说：“我要，我们这些人打不死也要老死，将来就要靠这些娃娃接班哩！”

红军队伍越来越壮大，声望越来越高了。

子长又率领部队向陇东进发。这时，陕军十七师和甘军十三师在陇东开战。谢子长想利用这个机会在陕甘边开辟革命根据地。

部队进驻宁县柴桥子这天，那个被杜衡派去谢子长部队的张金来了。张金外号“小广东”，二十多岁的人，新当上了军委书记，更是不可一世，杜衡点火，他就冒烟。

张金一到部队，不由分说，就下了一系列死命令：

先把部队拉到旬邑县史村塬，宣布成立二十里地的苏区。

再命令队伍一鼓作气，迅速攻下正宁县城三合镇，争取一个县的首先胜利。

谢子长说：“三合镇是在正宁县城，驻着正规军，有重武器，真不能打。”

李杰夫也似乎想协调一下：“老刘去省委了，等他回来再打吧！”

张金冷笑一声：“你又犯调和主义了不是？杜衡给了我尚方宝剑，我就代表省委！刘志丹代表谁？”

是啊，在他们眼里，刘志丹当然不能代表什么，更不能说军队的指挥权了。

再说刘志丹在西安，一直等着杜衡的消息，怎么也等不到。西安报纸上却登出大字通栏标题：《谢刘二匪窜犯三合被我全歼》。

刘志丹一看怔了，他虽然知道敌人惯于造谣，不可信。可是，这条消息却使他震动。部队去打三合，想必有点根据，杜衡避不见面，难道是上部队去了？

遇事总把人往好处想的刘志丹，因了这个秉性赢得了多少人的厚爱和敬重，同时也给自己、甚至革命带来过损失。

刘志丹先去找伟林商量：“你看这是怎么回事？”

伟林接过报纸细看一遍，苦笑道：“这只有杜衡知道。”

志丹说：“你陪我去见杜老师吧，或许他从杨虎城部队能了解一些情况。

志丹说的是杜斌丞。伟林立刻同意，他和杜斌丞在北大是先后同学，已经久不见了。

刘志丹穿上长袍，戴上礼帽、墨镜，走到大街上，看见到处贴的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货！”学生们拿着红绿旗，在街上敲锣打鼓，呼口号：“誓死不做亡国奴！”国民党省党部的招牌已被打得稀烂。

刘志丹和李伟林走到南门口后，就分开了。两人一前一后，免得目标太大。

刘志丹看见人们都在挤来挤去围了一大堆看墙上的标语，还是什么布告之类的。也就站住了脚，朝墙上瞅几眼。只见一张画像：大脑袋子，长腿长胳膊的，手指头像钢叉叉，脚大得像两只船。而且被涂染成青脸红发、锯齿獠牙，活像个凶神。刘志丹正犯恶心，只见上边五个大字“匪首刘志丹”像五颗黑蜘蛛扎进了他的眼睛里。

李伟林在背后拉了他一把：“走吧走吧，别影响了生意。”出了人堆，说道：“有啥看头，还不是吓唬吓唬老百姓，反而倒给你吹吹威风哩！”

志丹这才笑了：“这样倒好，说明老有人惦念我。”

“越是荒谬，越没有人信。”

说着，两人跳上洋车，躲开这是非之地，直奔大箱子庙街五号杜斌丞公馆。

刚一通话，杜老先生就迎到了屋门口。

这位气宇轩昂、身材修长留着人丹胡须的老人，今天一生长袍，更显得神情健旺。他见了志丹，就笑问：“稀客稀客！是从三合来的吧？”

刘志丹说：“我从李伟林李公府上来。”

“哦”，杜斌丞说：“你是不知三合之事了？”

刘志丹惊问：“出什么事了？”

杜斌丞说：“你们的队伍在三合吃了亏，损失了不少人。俘虏就要押解

到西安。我真不解，你们哪里不能去，非来这关中不可呢？”

志丹回答道：“这里历来是兵家的必争之地。”

“那就对了。”杜先生说：“问题是争得起争不起嘛！我可有句要紧的话要对你说。”

志丹严肃地望着老师。

“你听着。”杜斌丞把烟袋放在桌上，把手背在身后，认真地说道：“关中是十七路军的地盘。你们既然是红军，必定是水火不容的。恐怕要有恶战，行动可要小心！”

志丹不好多解释，只说：“这倒能看得出。”一番沉思后，志丹已定了主意，只是怕老师过分担忧，便故意换了口气，轻松地说：“再看看吧，将来有了根据地，希望杜老师回来。”

杜斌丞笑得很慈祥：“只要有那么一天，我这条老命不要也甘心去看看了。”

天快黑了，志丹要告辞，杜先生取出一支手枪和二百元钱给他。志丹不知怎么表达感恩之情，只是给老先生深深鞠了一躬。

从杜公馆出来，他再也不能在西安停留一分一秒，告辞李伟林，直奔三合。他此刻是归心似箭啊！

第五章 诘难

红色的革命被不知革命的人左右了，刘、谢从马背上先后落马。

风沙年年刮，太阳天天落
要起事就经得起几回合

一

攻打三合镇不只出乎刘志丹的意料之外，就连当时领导部队的总指挥谢子长也几乎是在犹犹豫豫的情况下参战的。

部队进驻宁县柴桥子这天，谢子长和李杰夫等人商议游击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本来，他们的意见就有分歧，彼此心里都不晴朗。谢子长一心想说服李杰夫从实际出发让部队南下；李杰夫一意执行省委方针，打算并展、迎接更迅速的胜利。两人就像两股相斥的正极，谁都暂时避免去碰击对方。

突然，哨兵带着几个农民代表，要求见总指挥。

子长见来人了，忙从炕上下来，走上前去，亲切地问道：“有事吗？”

一位高高正正的中年人，看样子是个文化人出身的农民代表先开了口：“自从军阀开战以来，这里的土匪、民团与官府勾结在一起，到处骚扰百姓，任意摊粮要款。一些军阀的残部也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激起了全县人民的强烈反抗，百姓们自动地组织起来，准备围攻三合镇。但是，我们的力量还不够，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请求你们配合我们参加攻城。不知行不行？总指挥同志。”那农民说得非常中恳。

“你们先回去，不要轻意盲动，我们商量商量再答复，你看行吗？老乡同志。”谢子长和蔼地解释道。

那伙农民便欣然离去。

他们一走，谢子长便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按理说，劳苦百姓自发地起来反对官府和军阀，我们红军是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才对。可是，这个仗有把握吗？他点着烟袋吸了两口，又起身踱到窗前，两道剑眉下一双大大的眼睛盯着窗外。

三合镇位于一块狭窄的小平原上，东、西、北，三面有高而坚固的城墙，南面一条深沟，是个易守难攻之地。镇内驻有两连步兵，还有一门迫击炮。万一攻城失利，不光游击队会受损失，带给百姓的损失会更大……

谢子长把自己的担忧还没说完，被李杰夫抢过话头：“哎呀，老谢，你咋不像你了，顾虑这么多。没有什么可犹豫的。立即攻城，争取一县的首先胜利。”对于谢子长连连违抗省委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李杰夫早就十分恼火，但人家是总指挥嘛，他又一时无可奈何。正好，有张金这个上方宝剑在这里。何况，张金一来就明确指出，省委要他们打三合镇，所以，他谢子长再犹豫就是顽强抗命了，李杰夫派人把正在戏园子看戏的张金找来。

这个张金一来，刚开始还在部队同吃同住。后来，抽闲去了几次戏园子，再后来，就沉迷了戏园子。据说戏园子有个有名的花旦“玉兰花”，演《花田错》，《小寡妇上坟》，令张金看入了迷，有空就跑戏园子，还跑到台上去给“玉兰花”敲鼓。戏园子混熟了，人家不敢怠慢这省府来的官爷，部队的具体情况他只做原则上指导，所以，小会小议，他是不亲自参加的。

张金从戏园子回来，本就觉得扫兴，一听说农民请求打三合镇，一下火了：“早就让你们打三合，这不，连农民都求上门了。不能把为人民打天下只喊到嘴上边，我看，你们不但对省委的意见执行得不坚决，对人民也不关心嘛。关键在于：有人主张上山退避，杰夫，你可不能犯调和主义！你是党的书记，要坚持党的方向。……”他的话匣子一旦打开，基本上是滔滔不绝的。“省委对你们是有过结论的：第一，游击队的主要纲领没有实行。一开始就应当分土地，农民只有得到土地，斗争才会积极。这一点，你们右了。第二，你们虽然在羊坡头打了胜仗，消灭了敌人，但是敌人方面死伤太大，也是缺点。我们的口号是：红军不打士兵兄弟，士兵兄弟不打红军，你们在战场上用火力射击士兵，等于取消了我们的口号；俘虏来的敌九连连长不杀掉，又放了，这是军官路线。第三，你们走过的地方，还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第四，捉豪绅是秘密逮捕，不是发动群众。分粮食又是在夜间，这都不对头。第五，在军事上的表现，不是进攻，而是退守，看见敌人力量大，就不敢前进，直到现在还没有到三合，第六……”张金一连念了十几条，最后重新命令李杰夫为军委书记，要他立即督战，

迅速攻打大城市，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正好符合李杰夫的心思，他赶快补充说：“昨天，山河镇的共产党也送来情报，他们准备组织城内起义官兵作内应，配合咱们攻城。”

张金接口道：“正好，就这样决定了。”

谢子长见张金和李杰夫已经把事情定了，也没有办法，只好安排作战部署。

谁知军民联合攻城的消息已经被敌人所探知，他们事先已做好守城的准备。

3月19日，游击队向三合镇的敌人发起进攻。

游击队悄悄地把三合镇团团围住，可他们刚刚露头，敌人的机枪就叫了，组织强大的火力进行反击。

一时间，滚滚的硝烟弥漫着整个战场，辛辣的硝烟味直刺人的鼻腔，令人感到窒闷难受，游击队到不了城跟前。

李杰夫要游击队拉开队伍同敌人对射。

谢子长提着枪站在前沿阵地指挥中心，心中很是憋气。本来确定的作战方案是夜间奔袭，可骑兵队在夜间迷了路，未能如期投入战斗。配合围城的农民因遇地主恶豪们的阻止也未能赶来，城内组织内应的窦巡官也被敌人逮捕。

突袭不成了，只好改为攻坚，可游击队没有重武器，打了一整天了，弹药消耗太多，毫无进展。

谢子长的眉头越锁越紧，他觉得这样打下去要吃大亏，赶快找李杰夫。要求：“换一种战术，咱们先围而不打，等城内断水粮时再攻。”

李杰夫同意了。

游击队一下围了十几天。

而张金借口回省委请示工作，早早溜走了。李杰夫又担任了军委书记的职权。

谢子长指挥战斗的特点是坚决果断，打起仗来冲锋在前。可是，这三

合镇，他却觉得很憋气。不懂打仗的李杰夫时时指手画脚，弄得他无所适从。

他们费了很大的代价围城，敌人眼下缺水，缺粮，估计挺不了多久，谢子长调整部队。

突然，敌人向三合镇增兵了，大有两面夹击游击队之势。

谢子长一看，情况十分危急，他便又一次找李杰夫商量：是否放弃打三合镇，赶快转移。

军委书记李杰夫倒背着手，来回踱了几步，眺望窗外，说：“总指挥，下命令吧，立即攻城！趁敌人增兵还未站稳，捅他一刀。”

谢子长不理，他没想到李杰夫对战事这么缺乏常识，硬要鸡蛋碰石头。

李杰夫一看谢子长不理不睬，心头的火也来了，他亲自动手。

啪！啪！

打响了指挥枪。李杰夫高喊着：“冲啊！冲啊！”

就这样，攻城战开始了。

战士们抬着云梯向城头跑去，敌人的机枪像扇面一样扫了过来，不少人倒下了。又一批战士抬起云梯冲过去，还没靠到墙上，又被敌人扫倒一片。

李杰夫还要强攻，突然，敌人打开城门，一队骑兵冲了出去。游击队立脚不稳，队伍被冲得七零八落。

增援三合镇的敌人也压了过来，游击队被迫由进攻转入了防御。战士们被分割到各个院子里和敌人对打。这时候，红军的弹药已经不多了，又缺乏城镇作战经验，对巷道交通都不熟悉，被敌人打死一些骨干，一下子士气大落。而敌人越来越多，不断组织轮番进攻。

一股敌人骑兵又冲过来了，端着枪，挥着战刀。杀喊声和马蹄声震天动地。

在镇子西北守卫的高岗慌了手脚，急忙往后退。眨眼间，敌人就冲到跟前，游击队又倒下了一片。

眼看防线就要被攻破，子长急忙组织力量抵抗，才把这股骑兵顶了回去。

仗，简直没法打了。谢子长满腔怒火，真想拼命把敌人的强大阵容给一刀砍碎，可这又谈何容易，打仗不是耍魔术，得实拼实。他强抑住火气，又来找李杰夫。

李杰夫看到那么多尸体和血，看到眼前活蹦乱跳的战士，转眼间就给打死了，心里着实有些胆怯，加之，敌人密集的子弹打得抬不起头，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东躲西藏，谢子长好不容易在一座房子的墙背后找到他时，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一点血色，帽子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谢子长拉了他一把，他抬头见是子长，心稍安定了一点，但牙齿还不住地磕碰着。

“咋办？”子长问他。

“你……你看着办吧！”他请谢子长自己做主了。

“赶快撤退！”谢子长命令似地说。

军委书记这下顾不得其他了，顺从地点了点头。

谢子长立即命令强龙光带两名战士骑马送通知。高岗一看来了骑兵，以为是敌人来了，吓得拔脚就跑。

“不要跑，不要跑，是自己人。”等强龙光来到眼前，高岗的枪也丢了。

部队边打边退，一下退到20里外的一个小村子。谢子长下令停止前进。

当大家都休息下来时，谢子长还在东看西瞧，一个人在观察地形。围攻三合镇，损失了几百人，他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牺牲了的同志。虽然这个决策是省委和李杰夫决定的，可是自己是部队的指挥员，也是有一份责任的，谢子长从内心里不能原谅自己。他想在此找一个回敬敌人的机会，多少挽回一些损失。谢子长观察了一阵，觉得这里地形不错，快接近平原的边缘，有不少的坡坎，不像刚才经过的路上，尽是开阔地带，如果在这里伏击，将是十拿九稳。于是，谢子长命令部队在此安营扎寨，以待战机。

第二天拂晓，他把部队全部拉到坡坎下隐蔽起来。他还在身边布置了几组神枪手，命令道：

“敌人不到 30 米，不准开枪！谁要开枪，砍谁的手！”

一阵工夫后，敌人的马队果然追来了。黑马、红马、白马……黑压压一片。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走在队伍最前边的是敌人的指挥官杨良康：

敌人越来越近了，300 米、200 米、100 米、50 米、30 米……

“砰！”

游击队中五十多岁的老机枪手张大山扣动了扳机，敌人指挥官来了个倒栽葱掉下了马。

敌人一下子愣住了，他们没有想到仓皇逃走的红军游击队会埋伏在这个地方。

就在敌人发懵的几秒钟，红军的排子枪响了，接连打倒几个敌人。敌人马队像炸了窝的黄蜂，到处乱窜。

红军战士趁势冲了上去，很快接近了敌人的马队。短兵相接地和敌人拼杀起来。晕头转向的敌人更加恐慌，分不清谁是红军，谁是自己人。

看，在敌人队伍里的那个战士，不就是我们的盛三毛嘛。

一个敌人见他面生，问道：“你是哪一部分的？”

三毛讥笑一声：“你自己的大（爹）都不认识了？”说着，“啪”地一枪打倒那敌人，夺了马匹：“先孝敬老子吧！”跑了出去。

好样的。就这么办！红军游击队像洪水一样涌进敌人队伍，一下子夺回了好几十匹好马。

形势变了，乾坤倒转，敌人马队在前面逃跑，红军战士在后面追赶。敌人指挥官杨良康已被击毙，群龙无首，只好四散奔逃。红军战士们在谢子长带领下，士气更加高涨，一路追杀，直撵到正宁城下的敌人大本营跟前，才鸣金收兵。

自从三合镇失利后，李杰夫像霜打的叶子，脑袋一直耷拉着。他担任军委书记后的头一仗，就一败涂地。苏区的土地也没分成，唉！这怎么向省委交待？

他正愁眉苦脸地想着，看见谢子长从他前面经过，他的气就更不打一处来。他近日越看这个姓谢的眼越黑。他觉得谢子长傲慢透顶，一直就不那么尊重他，言谈举止总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他尤其见不得谢子长看人时的那眼神，眼角往上一挑，都是居高临下的样子，最叫他忍受不了的。每逢开个会，谢子长请他讲话，还爱用那眼角瞟他一下，含着轻蔑，就像是对待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一样。

这时，他突然想通了，他终于找到原因了，他觉得谢子长这样的人是故意和他作对的。要不，他对自己尽快分完土地的命令为何不置可否，无理拖延，以至一打仗，就把事情给冲了？他说打三合镇，谢子长一开始就不高兴，难怪仗也打得黑火背气……

李杰夫是越想越气，越气就越觉得自己想得对。一定是谢子长嫉妒他，嫌他官大了，故意消极怠工，不好好指挥部队打仗，给他暗地里拆台。难怪他从一开始就不让进攻，要改换战法，后来又撤退，等到撤退了又为了表现自己，再次进攻……他把这些往一块一联系，就认定了是谢子长有意出他的洋相，想借此赶他下台。

斗争，这就是斗争哟！省委书记杜衡曾经就告诉过他，谢子长和刘志丹是反对中央和省委路线的。莫非这个谢子长也像魏延、刘志丹一样，从娘胎里出来，脑袋后面就长着三块反骨？

……

李杰夫正思索着，谢子长进了门。

谢子长说：“刚才旬邑地下党来报告，说大队敌军清乡去了，守军只有警卫团的两连人和部分民团，警戒疏忽，防守不严，咱们打不打？”

哼，报告事情连个称呼也不唤，而且，紧逼对方就范的口气。李杰夫眼珠转了转，突然计上心来：上次打三合镇，你说正宁县城不能打；这次打旬邑，也是县城，我倒要先看看你是什么想法。于是，他轻笑一声，反问道：

“你说呢？”

谢子长稍稍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思绪，说：“这次是个好机会，不应该错

过。再说，还有地下党配合，估计问题不大。”

李杰夫一听，冷笑道，他果然同意了。他用鼻子“哼！”了一下，想：好啊，这次攻旬邑，你倒是不怕机关枪，不怕守军了！

谢子长看着李杰夫，耐心地等他考虑。他根本没想到李杰夫脑子里正转溜溜地七拐八弯地想着鬼道道。见他半天没说话，子长以为他一下子拿不定主意。就解释道：

“旬邑守敌的精锐部队不在了，剩下的是十三师警卫团的两个连。这两个连以前和咱们打过交道，净是些大烟鬼，没多少战斗力。咱们如果用奇袭的战法，是可以取胜的……”

这一番话，实际上是一阵耳旁风。李杰夫根本没有注意听谢子长的这番解释，也没有去分析敌情。他只是拨弄着自己的算盘珠子：把你谢某人再考验一次吧。如果这次真能打胜，就更加证明你谢子长时时想出风头，处处在表现自己，故意给我使绊子。于是，他心不在焉地答道：

“打就打吧。”

谢子长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当下，便吩咐部队准备好云梯和杆子，并做了短暂的战前动员，整个队伍都做了毫无疏漏的安排。

天黑部队出发了。

整整走了一夜，赶到旬邑城前正好天亮。

连日来，部队行军打仗，战士们虽然疲劳得厉害。可由于谢子长亲自带兵攻城，一路不断鼓动士气，使队伍调整到积极而紧凑的战前状态。大家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战斗情绪，没有一个人掉队落东西，更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的。

4月21日清晨，谢子长下达了攻城命令。

担任前卫的15名神枪手的冲锋枪，在一声令下齐声吼叫了起来，子弹泼水般地射向敌群。

敌人冷不防受到了如倾盆大雨的猛烈攻击，一阵愣怔后大乱，下意识地纷纷四处逃窜。

谢子长一挥手，亲自带领战士一个猛冲冲到城下，又一个飞腾，逼近城墙，迅速搭起云梯。

子长在城墙根冒着飞溅的砖石碎屑，又组织了一组连环枪。

刚才龟缩回去的敌人被“雨水”泼醒后，趁红军游击队排子枪停息的间隙，探出头来，正要打红军攻城的战士，不料，又被红军战士的连环枪打得抬不起头来。

谢子长当机立断，奋臂一挥，命令战士们：“上！”

战士们顺着云梯爬上去了。打头的战士王胜勇准备跳进城墙跑道，不料，西门楼的敌人用火力压着他，加上跑道太窄，他一个鹞子翻身却一下落进了城内。

第二个冲上城头的是马佩勋。他吸取了第一个战士的教训，先端起冲锋枪对准西门楼敌火力点扫了一梭子，然后，利用敌人躲避的瞬间，纵身蹿进墙豁口里。

几乎是与此同时，谢子长也爬上城头。马佩勋见总指挥亲自冲上来了，一下子增加了无穷的力量。他一咬牙关，又端起冲锋枪朝西门楼连扫几梭子，打得敌人吱吱哇哇一阵乱叫，当即死伤好几个。

又有几个红军战士冲上来，向西城楼扔过去几颗手榴弹，敌人被炸得连滚带爬地溃退下去。

红旗插上了西城楼。

“红旗！红旗！”战士们呐喊着，顺云梯往上拥。

城头攻下了，城门打开了。游击队战士一拥而入。

谢子长领着队伍直插旬邑县府。

打开旬邑县城，这是陕甘游击队破天荒的一次胜利。然而，谢子长却未被成功所陶醉，他知道敌人肯定会反扑，下午，就带部队撤出了城。

换了新武器，又补足了弹药，战士们一路欢欣鼓舞，有说有笑。只有李杰夫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儿：好你个谢子长，不把你拉下马，我这军委书记就当不顺当。他边走边盘算，用什么办法挫败谢子长。

看来一场劫难就这样无可回避地降临了。

二

李杰夫一回到驻地，就给省委书记杜衡写了一封密信。信中的内容不得而知。无非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加进了他的猜测，强调了谢子长如何和省委对着干的强硬态度。杜衡对此信颇感兴趣，立即亲自来到游击队驻地。

据说杜衡书记喜穿长袍，经常以“理论家”自居。今天，是来部队巡视工作，便一反常态，换上了军装，还专门弄了一支小手枪，煞有介事地挂在腰间。

省委书记来到部队，当然要作报告。杜衡拿出演说家的派头，高谈阔论。从国际形势谈到国内形势，从共产国际讲到陕西省委。当他讲到羊坡头战斗和出击旬邑时，他不无自得地说：“羊坡头打胜了，旬邑城也打开了，这证明省委领导的正确嘛！有人说，不能打县城，要钻梢沟，说我们力量小。这不是被事实粉碎了吗？谁说红军没有力量？羊坡头战斗就是明证。谁说红军不敢攻打大城市？旬邑大捷就是铁的事实！……”

对杜衡的演讲，会场里的人们心情各异。谢子长没有听出杜衡的话外之音，只觉得他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因此，贪就贪吧，反正你代表的是省委，一切功劳当然是属于上级组织的，谢子长往好的方面去想了。而李杰夫就不一样了，他一时闹不清杜衡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所以心中感到不踏实。他不明白，谢子长这些日子里明明对抗省委，可杜书记为什么在话里不点明？旬邑的战斗本是谢子长自作主张，偶然取胜，杜衡为什么大肆表扬？李杰夫心里竟也挂满了吊桶七上八下：难道杜衡对我有看法？他想，我给省委的报告没有传到？他误解了？他想不出一个结论来。

大会结束了，杜衡却要求队委们到他的住处开小会。

李杰夫最先来的，他想探探口气。这时的杜衡像是换了一副模样。背靠在从地主家里借来的太师椅上，半仰半坐地跷着二郎腿，悠闲而自得。李杰夫想要开口，见又进来两个人，只好把涌到嘴边的话咽下去。

人基本上到齐了，杜衡咳嗽一声，清清嗓子，脸上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他以低沉地口气说道：“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解决一件事，就是谢子长的右倾逃跑问题。”

大家都很惊奇。

杜衡转向谢子长：“你先说说，为什么三合镇损失那么大？”

谢子长事先毫无准备，杜衡的话使他不禁一愣。但他对三合镇一仗的失利始终有一种内疚之心，觉得对不起长眠在那里的那么多兄弟。现在，提起来仍然痛悔如初，只听他慢慢地说道：“三合镇我们损失了好几百人，我是有责任的。作为一个总指挥，没把情况吃透，就贸然行事，结果吃了大亏。现在来总结，我觉得原来的部署不太合适。敌我力量悬殊太大，我们要硬攻，执必失败。”

杜衡想听的远不止这些，他气急败坏地打断谢子长的话：“就没有你指挥上的问题？”

谢子长这时候已感觉到了杜衡拿他开刀的另一层意思。可他又想，党内嘛，总是有斗争的，各种观点，各种想法都可以摆出来。自己尽管当时不同意打三合镇，但并没有坚持。所以，还是应该深刻地检查自己。他说：“指挥上当然也有问题，事先力量没有部署好，高岗的防线差点被冲破。也没有进行街巷战斗的训练，就去打这样的仗……”

在场的人实在看不过去，觉得杜衡是有意刁难。而谢子长呢，又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次失利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军委书记的瞎指挥。虽然谢子长对这些避而不谈，有人站起来接过话茬，说：“这次战斗，没有计划好，就匆忙上阵。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军委领导同志……”

一看矛头指向了张金和李杰夫，杜衡坐不住了，他们是代表省委的。他立即打断那位同志的话，“不要转移话题，主要是解决谢子长的右倾逃跑问题。唔，李杰夫同志，谈谈你的意见。”

李杰夫一看这个局面，脸上担忧的阴云霎时消散。会议开始时，他就猜想着杜衡的目的。刚才杜衡这样质问谢子长，他便断定杜衡看过自己的报告了。于是，他显得很亢奋，他起身指着谢子长说道：“这次失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谢子长指挥无能，消极怠工。对于省委的这个决议，他压根

儿就不同意。”他又一转话锋显出几分为难情绪：“有些话我本不好明说，可……哎，子长也太不检点了，还骂省委领导无能，是瞎指挥，要显示自己的高明。”

听到这些话，谢子长又气愤又悲哀，他浑身发抖，真想吐到李杰夫脸上。

杜衡脸面开始作色，他不知谢子长还对省委领导有大不敬之举。

李杰夫越说越动情了，“子长兄口口声声强调红军力设薄弱，不能进攻城镇。可事实呢，并非如此吧，打旬邑执行了省委的决定，就很顺利嘛。三合镇守敌和旬邑不相上下，不但打不下，还损失了几百人马。我看，谢子长不光是右倾逃跑，梢山主义、最主要的是反对省委，反对杜书记的领导。”

一时，会场爆炸了，有人起来和李杰夫辩论，有人质问谢子长为什么一意孤行……

谢子长沉默了。

时令已进入秋末初冬季节，落光了叶子的树木在飒飒的寒风中不停地抖动着，蜿蜒的山间小溪已经结上了溥薄一层冰。

谢子长用草藤紧束着腰，袖着双手朝伤病员的破土窑洞走去，山风不断地掀起他那袒肩露肘的破衣衫。他紧紧腰间的草藤，刚迈开脚步，一件老羊皮袄落在他的身上。他扭过头，只见站岗的小王站在他眼前。小王紧缩着身子，嘴唇冻得青紫。这是老乡们送给他们的，也是全队惟一的一件皮袄。所以，规定作为站岗放哨人员的专用品。

谢子长将皮袄重新披在小王身上，“现在，你最需要它，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占用。”

“可是你的身体不好……”

“这是纪律，不要让我带头违反纪律。”谢子长说。

望着子长远去的背影，几颗泪珠从小王的眼中滚落下来。

三

刘志丹日夜兼程，回到部队一看，情况真叫惨痛。七八百人的部队，只剩二百来人，一个个破衣烂衫，武器钱缺，从羊坡头缴获的弹药也都打光了。还有不少伤员，无医无药，躺着呻吟。看着李杰夫、任鸿远垂头丧气的样子，刘志丹问道：“为什么把部队搞成这个样子？”没有人回答，人们不知怎么答复。刘志丹吼道：“为什么把部队搞成了这个样子？”

大家沉默着，没有人说话，刘志丹知道这是省委一伙人坚持占领城市，要分土地，建立一村一乡或一区一镇的苏维埃政权，打击右倾机会主义的“上山路线”的恶果。

一个老战士吭吭哧哧地说：“自从宣布成立 20 里地的苏区，不到三天，敌人打来，苏区垮了，地也没分成。”

任鸿远说：“他们认为，仗没打好，一怨谢子长无能，二怨部队成分不纯，要狠狠整顿部队。把谢子长赶走了。老谢走的时候只带了 30 多个伤病员。……”

是夜，寒星闪闪，秋风萧萧。刘志丹的屋里挤满了人，都想知道他有啥打算。

刘志丹沉思良久后，对一起从省委来的王思学说：“下一步怎么办，我有个想法，你先带几个人，到旬邑去把东西弄回来，把老谢一定叫回来。然后回区，再动员些人来，不然，怎么办？只剩一二百人，搭个空架子，顶什么用？还有，派个人去西华池找何鹏，把他那个连拉过来。”

思学说：“能行。照这么办，咱们能弄到五六百人，就又起来了。”

没有多少日子，幸亏徐一知从午字区送来 100 多人，补充了队伍。再过了些时期，王思学也把张汉民送的药品、子弹运回来了。伤病员得到治疗，情绪逐渐有些稳定。刘志丹把这个烂摊子加以整理，渐渐又变成一支士气高昂的武装队伍。他把部队重新编制，分成三、五两个支队。每个支队各分 3 个大队，1 个骑兵队。

李杰夫近来有了些变化，吃了些亏，长了见识。他拿着杜衡的指示，感到无所适从。指示有二十来条，什么“加强两条路线斗争”，什么“一切

都要经过士兵委员会讨论”……他来找志丹谈心了。

就在这时，杜衡又代表省委来了指示：要红军游击队分兵两路，一路向西，切断西兰公路；一路向南到三原，配合渭北斗争。概括一句：还是老一套，全力夺取几个城市，建立城市苏区，坚决反对“上山”、“退避”的右倾观念。还有一条，刘志丹担任总指挥，杜衡是实在放心不下，怕他把部队拉到南梁去。所以，杜衡随后也赶到渭北的午字区，要就近亲自指挥。

难题又出来了。刘志丹考虑：不执行，就得分裂；执行吧，实在是没有把握，没准又一次把队伍推向火坑。

这一个多月，陕西的局势确实也发生了变化。陕西敌人的注意力已放在甘肃，对陕西便有点放松。“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军阀各有打算，蒋介石和杨虎城都看上了甘肃。杨虎城估计：日本人如果一再进攻，蒋介石还是不抵抗。山西的阎锡山是个老滑头，也不会拼老本儿。万一山西不保，陕西就成了前线。自己不找个退路怎么办？就看上了新疆。去新疆势必先占领甘肃。再一层，他虽帮蒋介石打败了唐生智，蒋介石才把陕西交给了他，但蒋介石对他并不放心，两人中间始终如隔一条沟。说不定蒋介石反手就来收拾他，这又不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不得不防一手。占上了甘肃和新疆，对付起蒋介石来底气就足了一大截。

蒋介石又是另外一种谋算，新疆是中苏边境，拿到手，一来可以作他日后对付苏联的准备，二来可防中国红军取得国际援助。所以，必得先抢占甘肃。

甘肃军阀多如牛毛，陈珪璋、马廷贤、马仲英、马鸿宾、雷仲田、鲁大昌等等，各有几千人，各占一块地盘。最大的军阀是陈珪璋，占据陇东十四个县。这些人，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好比饿狗抢骨头。

杨虎城近水楼台，抢先插进一条腿，自知甘肃一口吞不下，便先稳住陇南的鲁大昌，联合势力最大的陈珪璋，共同打兰州的雷仲田，给陈珪璋许下愿，拿下兰州，叫陈珪璋当甘肃省主席兼第一路军警备司令。没想到一打下兰州，陈珪璋还没有上任，杨虎城的部下杨子恒就把他打死，把部队消灭了。军阀们正在甘肃闹得火热。

刘志丹先与李杰夫恳谈，晓以利害，并争取他的支持。当然，刘志丹自己也退了半步，不建立南梁根据地，固然是一个不足，但借机能打些小胜仗，振奋士气，扩大队伍，补充弹药，按目前情况来说，也是个不小收获。如今有机可乘，就捞它一把，也未尝不可。李杰夫竟同意他的意见，他说：“我现在才看出：不知虚实，不明进退，不顾利害，不愤战略策略，实在行不通！回头想想，我会出一身冷汗！”

部队开始行动。

焦家坪。

刘志丹带着大队人马，手里举起枪，喊着。“冲啊！”

红军游击队如翻江倒海之势向村子冲去。

敌我双方厮杀在一起，我游击队员英勇冲杀，敌民团节节败退，大部分举手投降。

阎红彦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地走了过来，后边还跟着三个人，一见刘志丹，他像控制不了自己的兴奋，高声喊道：“总指挥，战斗结束，大体清理，打死打伤敌人 50 多人，俘虏 70 多人，缴获长短枪 110 多支，还有很多弹药。”

刘志丹说：“好！叫刘约三他们护理好伤员，组织好担架，准备转移。”

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陕西省委以“梢山主义”为罪名撤销了谢子长总指挥职务后，任命刘志丹同志为总指挥。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奔袭马栏镇，突袭焦家坪，剿灭黄陵民团。使革命的武装不断壮大。

然而，又一次反复开始了。省委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求游击队到平原和城市作战。

刘志丹坚决抵制，被扣上“梢山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罪名。

于是乎，陕西省委又调任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暂任副总指挥。

这走马灯似的变换不知何时到头。一时间天空又阴云密布，部队情绪再一次跌入低谷。很多人想不明白的是：因为什么，领导人也要换来换去，可又都离不开刘、谢二人。

部队又要开拔了。

黄土坡上一股风刮过，直往人的鼻子眼里和牙缝里钻。张铁栓吐出来，它们再钻进去。它们让他的年轻的眉头，胡子和宽板牙齿都变成了那种浑黄的沙土色。他嚼几下，牙齿间就会磨出一阵“咯噌咯噌”的沙子声。他站起来，拍拍手里的沙土，想起了村子里张三家的那当子与民团没有了结的事，决定去找老刘唠嗑唠嗑去。

第六章 在废墟上燃烧

红色无法抹去。即使在废墟中也会燃烧得亮丽。

刚返青就遇上倒春寒

干革命咋就这么难

一

赶走了谢子长、阎红彦，又让刘志丹靠边站后，杜衡一下子轻松了很多，他想，搬掉了几块大石头，眼前清静了许多，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干它一阵子了。

杜衡不但目中无人，简直有些得意忘行了。他选的第一仗便是痛打庙湾子。

庙湾子可是个“马蜂窝”，四五百民团都是土匪出身，人人能打仗，个个不怕死。同时，在陕甘游击时期，庙湾子就和我们红军是统一战线，他们曾给我们的人送枪送弹帮过不少忙。现在，我们的一些伤病员还在庙湾子养伤呢。

“这正是我们苏区的一颗钉子，我们必须拔掉它，许多同志与民团勾勾搭搭，就是在这里犯的错误。”杜衡说。

“我再次请求您，杜军长，慎重考虑一下二十六军日前的处境，考虑伤员安危，考虑二十六军的前途命运。”刘志丹几乎是用一腔子热血在喷泻了这一席话。

“都考虑过了。你不要再找任何理由，马上出发。”

再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了，就像阴实实的阴雨天，看不到一丝丝明缝缝一样，大家都无话可说了。

果真庙湾子一战大大败北，敌人不但居高临下打败了我们，还将十几个伤员的脑袋像砍南瓜一样砍下来，挂在了城门楼子上。

这时，杜衡的脸上才露出了惊慌之色。

刘志丹早已预料到情况的危急，带了一小部分人马从后面接应过来。

敌人的火力明显减弱了，杜衡才在别人的掩护下向外冲杀着。

荒凉的山坡上，长着几株小树小草，一种白里闪着火红的花儿，星星点点喷放着，也许这叫做山丹丹花。又一座新坟，墓碑上刻着红二十六军三连战士王长江的姓名。

二

照金根据地的薛家寨，万仞石山，刀砍斧削一般。石崖上是一排排的崖窑。远处是滚滚的麦浪。

时间已到了 1933 年。

在下一步的行动上，杜衡又一次和刘志丹等人意见分歧，矛盾异常尖锐。省委书记杜衡坚持自己的决定，将军队开赴关中平原攻打城市，而刘志丹则建议要建立壮大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最后，刘志丹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努力用血的教训说服杜衡，坚持力争，阻止了游击队随二十六军南下，并精心安排了游击队和照金根据地的工作。

然而，未待实施刘志丹的方案，部队刚到渭河边，就遭遇了从西安方向过来的一群敌军。由于敌众我寡，不到几个时辰，田野里逐渐露出黑压压一片敌军，他们不动声色从四面将我军包围。

杜衡见机要回西安向省委汇报情况，联系二十九军和红四方面军配合行动而溜了，将一场恶战留给了刘志丹和同志们。

刘志丹准备利用当地群众的支持，和敌人周旋一个时期，缓解一下部队的伤亡，也许还能多消灭敌人而保全自己。真是应了一句俗语又无巧不成书。传来了杜衡叛变的消息。

就在杜衡叛变的同一时间里，疲惫不堪的二十六军在大雨中急速行军。大部分人戴着草帽，他们说话都要大声喊，对方才听得见。雷声暴雨不时地发作，有意跟我缺衣少吃的战士们作对。

王世泰说：“打了 4 天了，供给跟不上，部队太疲劳了。老刘，咋办？杜衡该到省委了吧？”

刘志丹也在喊叫：“传话，保护好伤员和少先队员。要挺住！急行军不能停，雨大时敌人不行动。到箭峪口补充给养。同志们，挺过去就是胜利！”

一个伤员在用树枝扎成的担架上喊着：“扔下我吧，反正我活不了了，抬着拖累部队。”

抬担架的战士不吭声，只是往前走着。

那个伤员挣扎着，扑通一声摔在泥里。

刘志丹走过去，帮忙把他抬上去：“用绳子捆住，一定要抬到宿营地！”

杨棋赶过来说：“大家都想退回去。不回去，连照金也完了，不能死在终南山。”

刘志丹召集王世泰、汪锋、杨棋、吴岱峰、高金纯圪蹴在雨中开会。

刘志丹说：“进亦险恶，退亦险恶，进尚可与敌人周旋，退就只能决一死战，再以党内是非而论，中途返回，无论胜败都难以分清曲直。”

又有一战士跑来报告：“3个伤员自杀了，怕连累部队。”

刘志丹赶到现场时，3个伤员已经自杀身亡。抬担架的战士哭着说：“他们说反正活不了，抬着拖累咱二十六军。”

大家沉痛地低下头。人人脸上不知是雨水还是泪珠都在闪烁。

“岱峰、金纯你们去看一下，给其他伤员做做思想工作。”刘志丹说。

3具血淋淋的红军遗体并排放在一棵大树下。血水、雨水、泪水流在一起。

战时的情况错综复杂，说变就变。陕西国民党当局原以为红军初出茅庐，不是对手，有各县民团在，再摆上一两团主规军，是足可以对付的。他们感到压力最大的地方，一是甘肃，各派力量正在那里网罗实力，你争我斗；二是陕南，四川军阀虎视眈眈，以图北展。这两方面，把十七路军的主要力量牵制住了，关中只放了少量警卫部队。谁知红军乘虚而入，打了羊坡头，又打旬邑城，打了乾县、永寿几个镇子，回头又威胁同川，三原告急，西安震动。豪绅地主跑到城里叫屈喊冤。青年学生也闹起来，围了省政府，打了国民党右派头子戴季陶。闹得火烧眉头，顾不住眼前了。

正在这时，蒋介石跟日本人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腾出手“全力剿共”，同地方势力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因此，陕西绥靖公署也忙着调兵遣将，来“围剿”红军。井岳秀花了老本，把高双城旅4个团调来3个，左协中团出动一个营，陈佐武团、张瑞楼团都越过延安南下。十七路军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杨子恒一个团从甘肃出动，四十二师师长兼渭北绥靖司令冯钦哉调两个团来三原、耀县，警卫团也向旬邑一线集中。再加十七路军的直属部队特务团，共有8个团兵力。情况一摆，就可以看出红军的日子将会多么维艰。杜衡的叛变，几乎使刘志丹率领的这支队伍遭到灭顶之灾，使他们辛辛苦苦扩展的土地成为废墟。

然而，红色是无法抹去的，即使在废墟上，那是火焰的东西就会燃烧不止。

第七章 整军

为什么总有忧愁？那是你心中没有绿洲。为什么地上总有阴影，那是你走路老低着头。

这支队伍正向正规化迈进。

芦花公鸡当院里站

共产党不是那自由汉

—

谢子长、阎红彦被原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撤职，开除军籍后回到省委。经省委复查，撤销了对谢子长、阎红彦的处分，派往上海临时中央学习。之后，中央派谢、阎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工作。这时，陕北革命武装遣敌疯狂进剿，损伤惨重。党中央北方局就任命谢子长为西北军事特派员，重回陕北领导革命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并不以此为满足，1933年初，又侵占山海关和热河等地，并准备大举进攻华北地区。为了推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走向抗日，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党员和干部，分赴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部工作。同时，派出大批党员和干部，组建革命的武装。谢子长和阎红彦受命赴张家口开展抗日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组织下，5月26日，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向全国发出了抗日通电，宣布反对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卖国条约——《塘沽协定》，提出了武装反抗日本侵略军和收复失地的口号。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抗日同盟军的行动马上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不到一个月，同盟军发展到10万多人。为了加强党对热察前线及抗日同盟军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线工作委员会，谢子长和阎红彦参加了前委的领导工作。

前委会派谢子长、阎红彦到包头孙殿英部组织“兵变”。谢子长、阎红彦很快就与孙殿英部工作的地下党员、副团长刘振远等人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了前委的指示。他们秘密进行兵变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可是，阎红

彦的活动引起敌人的警觉和怀疑。敌人收缴了他的枪，并将他押送上火车，驱逐出包头。

阎红彦被赶走，使谢子长十分焦虑。第二天晚上，他正思忖如何寻找阎红彦，没想到阎红彦却突然闯进门来。这使子长惊喜异常，他一把拉住阎红彦的手，问道：“你到哪里去了？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阎红彦笑笑，说：“昨天，他们将我送上火车。我想，我们的兵变计划还没实现，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我为什么要离开包头呢？不，我必须返回来，配合你实施我们的兵变计划。想到这里，我便利用押解的敌人上厕所的机会跳下车，到了张家口，向党组织汇报了情况，提出了重新返回部队的要求，得到了组织的同意。今天，我就又乘火车秘密潜回部队。”

子长高兴得什么似的，又一次紧紧地握着阎红彦的手，激动地说：“红彦，你这是硬着头皮往虎穴中闯啊！”

阎红彦说：“进虎穴，入魔窟不正是你的家常便饭嘛！”

“哈哈。”两人同时笑了。

谢子长收敛笑容，说：“不过，你还是谨慎为好，平时轻易不要出面。孙殿英这人对共产党从来是不客气的。从他闯荡江湖那天起，就学会了耍两面派。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他曾依附于阎锡山、冯玉祥，后又投靠张学良，驻军平绥沿线。抗日同盟军成立时，他曾对冯玉祥将军表示：‘如南京来攻，我将出兵绝其后路。’可是，蒋介石一施加压力，他又表示，‘本人始终服从中央，绝不参加内战。’他这个人，只要政治上需要，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现在，我们是在他的虎口里拔牙，时刻都得谨慎小心。”

阎红彦轻轻地点点头。

“既然我们的活动已引起敌人的注意，以后就改变一下活动方式，把公开宣传改变为秘密的串联，把不易为士兵接受的宣传内容改为易为士兵理解接受的浅显道理，也许宣传效果会更好一些。”谢子长说。

于是，他们就着油灯，开始详细地研究了应变策略和起义的具体部署，直到窗纸微微发白。这才伸伸困倦的身躯，喘了口气。

在谢子长和阎红彦的组织和策划下，孙殿英部的一个团举行起义。

起义部队开到商都以北的武部，谢子长和阎红彦对部队进行了整顿。不久，这个团被编为中共张家口前委领导的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第一团。李锦峰、宋文梅又从何柱国部拉出一部分队伍，也充实到这个团来。接着，刘振远、许权中、强龙光也组织兵变，拉出几支部队编入十八师。

十八师组建起来后，许权中任师长，杨晓初任参谋长，谢子长协助许权中工作。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分兵三路，由张北出发开赴抗战前线，对日作战。不到一个月，先后恢复了康保、宝昌、沽原、多伦等战略要地，将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然而，倒行逆施的国民党蒋介石却以“妨害中央统一政令，破坏整个国家”为借口，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来破坏抗日同盟军，并从军事上对抗日同盟军实行围攻，使抗日同盟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8月初，冯玉祥被迫离开察哈尔引退。

8月8日，前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抗日同盟军中党领导的基本队伍第五师、第十六师、第十八师教导队及党政军领导机关，包括后勤在内撤至张北，继续坚持抗日。张家口做最后撤出的准备和应急计划，凡一切已经公开暴露的人，分别派往华北各地和各部队中去工作，进行紧急疏散。9日，前委率部队一万多人撤至张北。

部队撤至张北后，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压力下，一部分高级将领由动摇妥协而至逃跑，部队也陷入混乱状态。为了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8月27日，中共前委在张北二泉子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有人主张部队由东而南，沿长城绕北平的怀柔、密云，前往三河、蓟县、遵化、兴隆，以平东北燕山山脉一带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人主张沿长城而南，经赤城、延庆越平绥路，绕涿鹿、蔚县抵来源、易县，进入河北西部太行山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与河北中部农民运动结合，开展游击战争。有人主张向西，沿阴山山脉以南、经大青山绕绥远包头至五原、临河一带建立根据地……

谢子长一直沉默着，直到大家的意见都发表得差不多了，他才发言。

他用深沉的目光扫视了整个会场一周，然后不紧不慢地说：“同志们各抒己见，从不同的角度谈了许多有益的意见。不过，我反复考虑过，总觉得部队还是过平绥线，到陕北并与红二十六军会合为妥。”他停了停，又说：“现在，孙殿英部还在包头一带，我们还可以进行策动，再拉出一部分人来壮大部队……”

阎红彦打断子长的话，说：“如果领导同意，我愿意再去孙殿英部开展兵运工作。”

阎红彦的话音刚落，一位负责人便气势汹汹地指着谢子长和阎红彦说：“你们什么也不懂，只知道你们陕北！你们这是大西北主义！”

又有人用大帽子来压人了，使子长十分生气。但他想想过去，还是用理智克制住自己，说：“这是在党的会议上，大家都抱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谈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都能冷静一些。”

谢子长的几句话虽然语调平和，但是句句落地有声。一向很自信的这位负责人，感到他的尊严受到刺伤；便用讥讽的口气说：“那好，你就谈谈你的高见吧！”

谢子长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以为在燕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有利的条件是，那里地处抗日前线阵地，人口稠密，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比较容易发动群众的抗日武装斗争，而且可以以燕山山脉为依托，便于我抗日同盟军建立根据地。但是不利的条件则是这里离北平太近，敌人的统治力量强大，而且敌人的兵力又都集中于交通干线上，于我军的活动和发展极为不利。在河北西部太行山地带建立根据地，有利的方面是这里人口较为密集，我党在这里有较好的基础，而且地形也有利。可是这一带敌人兵力集中，我们要打破敌人的进攻，长期立足，亦很艰难。在五原、临河一带建立根据地，有利的条件是可以相机打通国际路线，可以与陕西的红二十六军相呼应。而不利的因素则是这里属蒙古地区，人烟稀少，气候和自然条件都差，部队的行军、宿营、补给将会成为困难。而且，这里党的工作基础差，不利于部队的发展。而部队到陕北，从政治上看，那里地处偏远，敌人的统治力量薄弱，有利于我军的发展。从军事上看，那里山大沟深，回旋余地大，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且有二十六军的配合，我军容易

站住脚。从群众基础看，陕北党的活动开展较早，党和红军的影响已在群众中扎下根，部队在那里活动，一定会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

对于谢子长的长篇大论，这位负责人不耐烦了，他打断谢子长的话说：“你把部队拉到穷山沟，让他们吃什么呢？”

他蛮不讲理的态度一下子激恼了阎红彦，他站起来质问道：“这是党的会议，为什么不让人把话讲完？”

负责人见有人当面敢顶撞他，大为恼火，继续蛮不讲理地说：“因为你们的意见不正确！”

阎红彦反问：“那你认为正确的意见是什么？”

他怔了一下，环视会场一圈，像回答阎红彦，更像给大家说：“当前时局艰难，斗争复杂，我主张党退出同盟军，部队完全交由吉鸿昌指挥。”

阎红彦一听，火气更大，他提高声音，几乎是喊着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这位负责人自然受不了这种指责，两个人便争论起来。阎红彦见对方盛气凌人，净拿大帽子压人，便愤怒地退出会场。

会议最终还是否决了谢子长、阎红彦他们的意见，决定：继续坚持抗日路线，首先将部队开往商都，然后，“由商都出平地泉、蔚县，向南发展，与直（隶）中、直（隶）南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建立北方新苏区和新红军。”

会后，部队便由张北西行，至绥远境内。为了扩大抗日救国的宣传，推动抗日运动，前委又决定部队南下平津。这时，谢子长、王大成等人受命返回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武装。

谢子长来到张家口，住在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的一个小店里。

张家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这天黄昏，谢子长来到张家口火车站，车站内人来车往，熙熙攘攘，显得十分嘈杂。小摊贩的叫卖声和警察的吆喝声不断地在上空回旋着，那些乱七八糟地堆放在地上的货物，又为这杂乱的车站增添了几分纷乱。

子长穿过拥挤的人群，朝开往北平方向的列车走去。突然，人群中闪

出一个便衣特务，将子长拦住，阴阳怪气地说：“啊，谢子长！对不起，请跟我走一趟！”

谢子长一怔，但他马上恢复了镇静：“你认错人了吧？”

“认错人？哼，别装洋蒜了！识相点乖乖跟我走，要不……”

特务的“不”字还没说出口，谢子长突然朝他的胸部猛击一拳，他四脚朝天地仰倒在站台上。谢子长急忙隐入人群中。

“抓……抓共党！”这个特务从地上爬起来，边喊边追。顿时，警察、特务、哨兵像掐了头的苍绳似的，四处乱窜乱撞，整个车站乱成一团。

夜幕渐渐降临，车站内黑乎乎的一片。谢子长趁着混乱，迅速地钻进站台附近的仓库棉花垛的风洞里。

“呜——！呜——！”刺耳的警报声大作，整个车站戒严了！全城戒严了！

警察和特务们像一群急于寻食的饿狼，在大街小巷内奔跑着，搜寻着，火车站上更是显得异常紧张、纷乱。警察和特务们大声吆喝着，旅客们被逐一检查，被弄乱了的大包小包扔了一地。敌人忙活了半天一无所获，只好抓了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带去交差。

开往北平的列车，终于在乘客们的强烈要求下开动了。

一阵骚乱后，车站内又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谢子长从棉花风洞口伸出头来看了看，只见四周无人。他估摸，快午夜了。他想这儿不是久留之地，得赶快想办法离开。但是，往哪去呢？敌人肯定还在搜查，抓不到我，他们是不会死心的。

突然，“呜——”一声长笛提醒了子长，他心中一喜，便从风洞中钻出来，悄悄地向列车走去。

列车进站后，喘着粗气停在铁轨上不动了。

这是了趟开往北平的列车，警察和特务们又忙活起来了，跑去把守各个出入站口，检查过往行人。乘客们拥挤着向出站口走去，显得十分嘈杂。谢子长趁着混乱，不慌不忙地走上一节车厢，他点燃了一支烟，闪身站在

两节车厢之间，细心观察车厢内 的情况。一会儿，列车开动了，谢子长走进车厢，走到一位衣着华贵的夫人旁边，指着她身旁的空位子，彬彬有礼地说道：“请问，这里有人吗？”

那位夫人抬头看了谢子长一眼，说：“请坐吧！”

“谢谢！”谢子长说着坐了下来。

那位夫人见他举止大方，彬彬有礼，便主动与他攀谈起来，“请问，先生是张家口……”

“皮货商行的。”

“到北平有生意？”

“有点生意去看看。”

“你们商行经营的皮货不少吧？”夫人来了兴趣。

“宁夏的、内蒙古的，还有一部分是从大同方面来的，太太若是需要，价钱可以从优。”

这位夫人一听价钱可以从优，马上来了兴趣，便与谢子长热热乎乎地拉扯起来。

突然，车厢门开了，一位胖墩墩的乘警走进来，他左瞧瞧，右瞅瞅，检查、询问过几个人后，来到谢子长身边。

谢子长摆出一副阔商人的派头，神态傲气地拿出香烟递给乘警和那位夫人，自己也点上一支，然后十分礼貌地说道：“请坐！”

那位夫人也笑眯眯地说：“坐吧，一天跑来跑去的，也挺辛苦的。”

乘警问：“你们是去北平？”

“是呀！”那位夫人说。

谢子长也附和道：“对，是去北平。”

乘警把眼睛盯在谢子长身上，“请问，先生是……”

那位夫人抢着说：“他是位经营皮货的商人，先生如果需要皮货，就请找他！”

子长大方地点了点头。

乘警见这位阔绰的夫人与子长这般情景。明白了事理似的点点头。心想：这年头，有钱有势的人还是少惹为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了吧。便又客气地点点头，说声：“对不起，打搅了！”便转身离去。

谢子长从北平下了车，朝昌平方向走去。

谢子长离开部队后，前方战事一天比一天吃紧，前委为了加强十八师的指挥，调派刘振远为师长，许权中为副师长。同时，调谢子长前往协助指挥作战。十八师在刘振远、许权中的率领下，由热河折回，经独石口、镇安堡沿潮白河南下，出明十三陵到达昌平县境内。

谢子长到达部队后，与刘振远、许权中协力，指挥部队边打边走，在小汤山打垮了守敌。部队在小汤山休整两天，敌人又追剿而来，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装甲车与国民党军队配合，向十六师发动进攻。十八师奋起反击，边战边退，沿顺义县境内退至三家店一带。这时，国民党军队又从西、南两面进逼，日军从东边压来。十八师被困在中间，四面受敌，突围是不可能了。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主要干部分别离开部队。谢子长与许权中安排其他同志撤离后，最后随部队转移到北平。

这时，我党在张家口的干部也先后转移到了平津地区，谢子长新婚不久的妻子尤祥斋派到宏文中学。这个学校的校长是地下党员白超然，尤祥斋在这个学校，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谢子长到达北平后，也住在宏文中学。这里便成了革命同志的家。谢子长、尤祥斋夫妇恩爱而谨慎地生活着。

回到北平不久，在北方局李华生的安排下，谢子长见到了从陕北来到北平的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崔逢远、鲁学曾、常学恭（后被捕叛变）。

他们告诉了谢子长陕北的情况。游击队正在安定县、延川县、清涧县、绥德县和神木、府谷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听了他们的介绍，谢子长十分激动，他说：“我离开陕甘还不到一年，情况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真想回去看看。”

李华生说：“他们几个来北平，一方面是向北方局汇报工作，另一方面

是向北方局要人，要你和阎红彦回去重新领导红军开展斗争。北方局已经研究决定任你为西北军事特派员，领导西北的武装斗争。”

崔逢远、鲁学曾一听高兴地说：“那太好了！太好了！”

谢子长更是激动得握着李华生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

二

1933年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曹士荣回到照金。刘志丹任临时红二十六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王世泰任红四团二连连长，黄子文被派到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工作。

10月16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孙友仁团及民团数千人、配合炮兵，向照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军被迫撤离薛家寨。

10月18日，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攻克合水县城，毙伤俘敌200余人，缴枪200余支。

11月3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会期三天。会议作出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十二师，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11月8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莲花寺正式成立。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辖红三团、红四团、政治部、供给处和直属警卫连。共计300余人。红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 and 红四团少年先锋队改编组成。团长王世泰、政委李映南，下辖3个连，一连连长赵国卿，二连连长王有福，全团共计200余人。红四团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李志柏，二连连长高占胜，共计100余人，战马60匹。同时，师、团成立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杨森兼任师党委书记。

11月中旬，红四十二师进入宜君县杨家店子，一举歼灭敌一个整连，毙俘敌120余人，缴枪120余支。

12月初，在红四十二师的配合下，地方党组织先后在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村将农民、手工业者、妇女组织起来，组建了农民联合会。同

时，新组建了南梁、小河沟、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五个赤卫大队，共计 1000 余人。

而 1934 年，对于西北红军来说同样是个多事之年。

1 月上旬，红四十二师南下，帮助三路游击队扩建游击区。师长王泰吉经党组织批准，前往敌占区开展兵运工作。红四十二师师长由刘志丹接任。不久，王泰吉在淳化县通涧被旧部出卖被捕，押往西安，在敌人面前视死如归，英勇就义。

是月，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廉家砭召开师党委会。会议对高岗破坏群众纪律，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和处理，决定撤销其师政委职务，调到第二路游击队任政委。同时任命杨森接任红四十二师政委。

2 月，国民党反动当局调集 8 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3 月上旬，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由南梁出发，从宁县、正宁南下，迅速进入照金以北地区。

3 月 29 日，红四十二师袭击了国民党庆阳县第四自治区驻地高桥，俘敌区长以下 30 余人，缴获枪 30 余支和大批给养物资。嗣后，对元城发起攻击，红三团一举攻占元城街道，消灭谭世麟民团一个连，毙俘守敌 100 余人，缴获枪 100 余支和部分军用物资。然后，师主力直扑李家梁子，又歼谭世麟一个骑兵连，缴获枪 50 余支，战马 50 余匹。

4 月 2 日，红四十二师在西华池全歼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子恒部王子义团两个整营另一个机炮连，共计 600 余人，缴获步枪 600 余支，重机枪二挺，迫击炮二门、弹药数十箱、战马 50 余匹。

5 月初，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进至三里塬歼敌 2 个连，缴获枪 100 余支。战斗中师政委杨森负伤，张秀山继任师政委，骑兵团团长由赵国卿继任，政委由高锦纯继任。之后，在高凤坡、和尚塬、瓦子川连续作战，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5 月 28 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荔园堡召开会议，会议总结了反“围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调整加强了红四十二师和游击队的各级领导，决定加

强陕甘边区特委的工作，成立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

三

谢子长回到了安定，他没有料到安定的情况发生了如此变化。

大家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纷纷出主意、表决心。

谢子长又说：“是啊，大家不能灰心，挺起身子，从头干起。咱们共产党人就像毛脑柳树一样，割了这一茬儿，那一茬还会长出来。他们越是抓，越是杀，起来革命的人就越多，敌人的末日也就来得越快，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我们就要干革命，就要彻底消灭这些吃人的魔鬼。你们也看到了，他们是不会让我们过好日子的，所以，我们只有豁出命来干，才是惟一的出路。”

敌人在疯狂地镇压革命的同时，为了强化其反动统治，在各乡各村建立了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和铺保，倘若谁敢“通共”就得株连全保。

为了不给乡亲们惹麻烦，谢子长转移到马圈坪山上的山窑里。

谢子长刚进了山窑，刘明山、谢绍安、薛兰岗也陆续来了。谢绍安装成上山寻草的，提着个大筐子，筐底放着一些馍馍。他放下筐子，又从怀里摸出一包旱烟递给子长。谢子长高兴地说：“我正想抽烟，谁带烟锅子了？”

谁也没带烟锅。谢子长在地上挖个窝窝，将烟叶放进去点着，用掏空的高粱秆去吸。

大家看到他这样子，又见他消瘦了许多，不知道是风吹霜冻还是饥饿所致，他的脸上结了厚厚一层死肉。身上的衣服捉襟见肘，只有披着的那件老羊皮袄略显新点。再瞅瞅这个山窑，深不过1丈，高、宽却不过5尺，人进来后只能坐着、躺着。地上铺着一层蒿草，窑口也遮了一些蒿草，呼呼的北风直往里灌，冻得人直打哆嗦。谢绍安望着，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子长见他流泪，忙问：“绍安，你这是怎么啦？”

谢绍安用袄袖子擦了一把眼泪，说：“三大，你在外边就是这样生活的？”

子长明白了，他笑笑：“干革命嘛，哪能不吃点苦。许多人都把命赔上

了，我们吃点苦又算什么。”他扔掉手中的高粱秆，坐直身子，说：“我们今天流血牺牲，是为了明天不流血牺牲嘛！”

见大家不吭声，子长说：“来，打起精神。今天，我找大家来，就是想商量一下，下一步我们怎么干。”

“你这次回来带部队了没有？”薛兰岗问。

“没有。”子长说。

大家的头都又低下了。

子长发觉他们情绪低落。心想：一支队的失败对大家心灵的损伤实在太大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大家的信心重新树立起来。对，先开办个学习班，好好武装一下他们的思想。只要大家的革命热情激发起来，一切都好办。我先培训他们几个，然后用滚雪球的办法，把更多的群众发动起来。“我准备办个学习训练班，好让大家学习革命的道理。”他说。

几个人都怔怔地望着子长。

“干革命得首先武装头脑。头脑武装不好，就干不好革命。这个道理，你们学一学就知道了。”谢子长说。

“你说怎办，就怎办吧。”刘明山说。

2月5日，训练班办起来了。

崔玉虎、南贵成、刘志清、薛兰岗等人来到马圈坪塬畔山的山窑里，大家围着火堆，坐在蒿草上，听谢子长讲历史、讲政治、讲军事。

谢子长的理论一下子像播种机，把一粒粒新鲜而饱满的种子播进了每个人的心田。他们也像根正苗红的禾苗一样吸取着阳光雨露。

谢子长讲到了：根据地是革命军队的立足地。要建立革命军队，必须有兵源。军队建立起来后，要吃饭、要穿衣。军队开展革命斗争，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家园”，也就是革命根据地。

他还讲到了：1927年清涧起义和1928年渭华起义都失败了的原因，主要就是没有根据地。

没有根据地，革命就成了无根草，大风一吹就漫天飞。所以说，只有

建立革命根据地，才能更好开展武装斗争。

那么，革命根据地能不能建立？建立起来后能不能存在和发展？谢子长认为，毛泽东同志在 1928 年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能。”理由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谢子长讲完，让大家讨论。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发言。他又启发大家，“一个革命者不仅要能打仗，而且要会写文章，会讲话，会宣传，要文武双全，有勇有谋，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革命家，大家没文化慢慢学，开会时不善于讲话就慢慢练，能说多少说多少，说错了也不要紧。”

经子长这么一启发，大家讨论开了。

李胜堂抹了抹嘴，站起来问道：“那我们住的这个山窑算不算根据地？算不算革命的家？”

“算！”

“不算！”

大家纷纷表示自己的看法。

“当然算了，我们在这个山窑里落脚，还要在这个山窑里起家，你们这些人都是革命的种子，今天在山窑里萌芽，将来还要在山窑外开花结果。”

接着，大家又讨论了一支队的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训练班结束了，大家便开始秘密地串联起来。一到夜晚，就分头深入村庄宣传和发动群众，天快明时带着乡亲们为他们准备的炒豆子、炒面和水再回到山窑。

后来他们又成立了临时政府、妇女会、识字班，经常能听到他们的读书声和唱歌声。有一日，天冷得出奇，白皑皑的雪铺天盖野，呼呼的北风不停地刮着，气温一下子降至摄氏零下 30 多度。那孔没门没窗的山窑如同冰窖一样，坐上不到半天，就冷得人四肢麻木，浑身打颤，谢子长不断地起来活动身子，然而，那身单薄的衣裤还是无法抵御无情的严寒。他的脚趾、耳朵都冻烂了，淡淡的黄水不断地往外流，他忍着剧痛坚持活动着。可是伤情越来越严重。同志们看着他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不由地落下泪

来。子长哈哈一笑，竟唱起了信天游——

山丹丹开花红崖洼，
我送我的哥哥呀当红军。
山林的核桃河畔上的枣，
当兵就数上当红军好。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
闹革命的道理我宣传。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看哥哥越比往常亲。
哥哥你参军闹革命，
妹妹好把你等。
前沟里下雨后沟里晴，
“革命到底”你记定。
山坡上的蒿草根连着根，
穷人和红军心连着心。
天上下雨地上滑，
多杀白军不要想家。
雪打墙来冰盖房，
白军的狗命长不了。
棉花地里带芝麻，
世事太平了再回家。
不想你眉眼不想你人，
单盼你捎回来胜利信。

这首民歌本来是妇女唱的，经子长尖着嗓子这么一唱，十分诙谐有趣，惹得大家捧腹大笑。似乎天气一下子不冷了。子长笑着说：“一个革命者，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乐观。”

后来，他们不但在农民群众中建立革命武装，还创办军工厂。自己造枪造炮，搞武装。

2月20日，谢子长与同志们一道转移到溜土沟的山窑里。下午，他们正在讨论工作，郭二冒闯了进来。他每天佯装上山放羊，实际上是为子长他们站岗放哨。

大家一愣。

他阴沉着脸，一串串眼泪从脸上滚下。

“出什么事了？”子长问。

“任志贞、白德胜，还有强世清、强世英都被敌人杀害了。”

这消息像一声炸雷轰顶，大家都呆了。

谢子长紧咬下唇。泪水从他眼角流了下来，突然，他紧攥拳头狠狠地向山窑墙壁上捶去。

山窑内响起一片哭泣声。

几位同志被捕，子长的心中十分难过。他一回到安定，就与地下党联系，要求设法营救他们。他又给南梁的刘志丹去信，要求他派人协助营救，可是志丹的人还没到，他们就被敌人杀害了……

谢子长与同志们一起走出山窑，面向几位烈士牺牲的七楞山、凤凰山排成一行，默哀致悼！

我们一定要恢复一支队，尽快与红二十六军会合。他想。

第八章 又一面红旗

红二十七军的诞生，使黄山坳中出现了又一片红色的风最。

炕头的娃娃山顶的草

春风一吹就长大了

一

正像谢子长估计的一样，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敌人惊恐不已。为了镇压革命，他们疯狂捕杀革命群众。在小小的安定县城内关押了 20 多名“政治犯”，他们今天杀一批，明天杀一批，不几天就杀害了许多人。

一批批战友的牺牲，一批批群众被残害，使谢子长悲愤至极，他决定攻打安定城，营救被关押在城内的“政治犯”。

谢子长召集郭洪涛、贺晋年、谢绍安、刘明山、李胜堂、路文昌研究作战部署。

安定城位于秀延河畔，三面临川，一面靠山。城墙全是用石条砌成，又高又坚固。城墙上有青砖砌的墙口，各堵口可以相互照应。东、南、北三个城门上分别筑有高大的门楼。国民党的县政府就设在县城内。县政府由大堂口、二堂口、三堂口三部分组成。所谓“政治犯”就关押在二堂口内。敌人在城内驻兵 300 多人，张建南营 200 多人驻守在伪县政府东面和北面，李丕成民团六七十人驻守在西门，折坤德民团三四十人驻守东门。这些情况，谢子长已了解清楚了。但是，游击队没有攻城的重武器，在人数上也少于敌人，取胜的把握有多少呢？子长反复考虑后认为：这一仗只能速战速决，目的达到后马上撤离。

7 月 17 日，谢子长率领着部队从南家新庄出发，悄悄地向安定县城进发。

夜，黑沉沉的。

安定县城还在沉睡中，街上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城门楼上的马灯半明不灭地亮着，斜挂着枪的哨兵在灯下打着瞌睡。

午夜，游击队先来到安定城西。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上了墩山。原

先，墩山可以直通城内和其他几个山头。可是胆小怕死的敌人为了防御，在山的一侧挖了一条宽 10 多米、深 20 多米的壕沟，切断了道路。游击队派出一支队人马，迅速地摸到炮楼跟前，突然发起攻击，并很快占领了制高点。这时，贺晋年又带领一个支队，架起云梯，翻过壕沟，冲入城内。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胜堂带领在东门打响，一路由贺晋年带领直奔监狱。贺晋年一边打枪，一边吹号。响亮的号声和密集的枪声顿时吓得敌人乱作一团。

敌营长张建南从睡梦中惊醒，忙问：“怎么回事？”

哨兵回答：“红军攻城了！”

张建南听见枪声从山上、北门、东门同时响起，知道大事不好，急忙命令民团去抢占山头。可城内的交通要道全被赤卫军堵死。敌人的传令兵根本无法通过。民团接不到张建南的命令，只顾自身招架，根本无法配合作战。

张建南扯着破锣嗓子，两次指挥着主力向凤凰山出击，都被压了下来。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院子里乱转乱跳。

“营长，红军已经进城了，保护营部要紧！”副营长说。

一句话提醒了张建南，他赶快命令部队：“集中兵力保护营部。”

在敌人盲目地射击时，贺晋年一路已经冲到了监狱前，刘明山对准监狱大门的铁锁“啪啪”两枪。大门被打开了。战士们一拥而入，分头打开牢门。刘明山大喊一声：“同志们，老谢救你们来了。赶紧往山上撤！”

狱中的同志们听到枪声后，知道红军进了城，早就有所准备。等晋年、明山、文昌他们冲进去后，便相互砸开脚镣。有的人被敌人折磨得无法行走。战士们就背的背、抬的抬，把他们全都护送上山，交给赤卫队。

当贺晋年、刘明山、谢绍安把部分营救出狱的同志们送上山时，东方已经泛出了鱼肚白。谢子长命令部队迅速撤离战场，向马河川转移。这时，大家才发现谢子长的侄儿谢绍斌只顾在狱中为别人砸脚镣，自己却没有撤出来。还有很多同志没有撤出。

红军撤出战斗后，张建南这才省悟到红军是来抢“犯人”的。他正要

出门，电话铃响了。

张建南抓起耳机：“井大人，是，我是张建南。”

电话里立即传来井岳秀的严厉之极的声音：“你不是说红一支队已消灭了吗？吹的什么牛？”

“消灭了，支队长、分队长和分队指导员都在押。支队政委的头还挂在安定城门上。”张建南说。

“放你娘的屁！”井岳秀在电话里发火道：“我的驼队被红一支队截走了，还给我开了收条。我命令你，给我追回来！追不回来，提头来见我！”

电话啪地搁断了。

张建南出了一身冷汗。

又一个士兵跑来报告：“城门上红军政委的头不见了，挂的是团总的手。”

张建南大惊。“谁的？”

士兵说：“李丕成团总的。”

张建南一拍桌子：“谁干的？”

士兵说：“贴了一张布告，是红一支队干的。”

张建南从墙上拿下枪：“走！”他边走边骂：“妈的，这么几疙瘩人就敢来与我较量，给我追！”他说罢先跨上马，朝红军撤走的方向追去。

张建南的部队气势汹汹地顺着秀延河川向马河川扑来。刚进入马河川后，一阵枪声从山头响起。张建南翻身下马，指挥着队伍反击。这时，薛兰斌带领几百名赤卫军在各个山头同时呐喊起来。来看热闹的老百姓也上了山头。漫山遍野的人群，震天撼地地喊杀声终于使张建南胆怯了。他掉转马头喊了声：“撤！”便没命地朝县城奔去。

谢子长今天显得格外振奋。山窑里，他拄着一根棍子，兴奋地说：“换了人头，截了驼队，干得好！红一支队的威风又扬出去了。用截驼队的钱和烟土，买武器，我们的一支队就又恢复了。”

贺晋年进来，“敌人给剩在牢中的同志们用尽刑法，现在张建南恐怕要下手了。”

“我已派人到南梁去找志丹了，南梁苏区搞得热火朝天，红二十六军已经恢复起来了。志丹派部队一到，马上劫狱。”

冬日的南梁荔阳堡。像正午的暖日一样既显温暖又高远热烈。

红二十六军的同志们穿着整齐的服装，精神抖擞地操练着。

一队 10 多头牲口驮着粮食向村中走来。赶牲口的人兴高采烈地喊着号子。旁边有人搭腔道：“唱得好啊！再来一首。”

赶牲口的人说：“你们村里编唱刘志丹总指挥的歌儿也不少，唱一首嘛！”

“哈——”那人笑了，扯起嗓子唱道：

老刘号召闹革命，

遍地穷人都响应。

军民团结一条心，

要把中国全闹红。

“哈——”赶牲口的人又一笑。“唱得好！”旁边人再搭腔。赶灵人干脆直起嗓子大唱了。

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

我那当哥哥的红军回来了。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当红军的哥哥跟的是刘志丹。

一杆杆红旗当空飘，

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

你当你的红军我劳我的动，

咱们二人一搭里闹革命。

.....

“好！” “好！” 众人一齐拍手叫好。

指挥部里，刘志丹、习仲勋、王世泰三人正交谈着。警卫进进出出传

送着文件。看得出整顿后的部队已经走向正规化。

“现在南梁根据地发展快，各级地方武装起来的也不少，可是，指挥力量还显得赶不上来。”刘志丹说。

“可以从王世泰的部队中抽调提拔一批出任。”习仲勋说。

王世泰道：“总指挥决定，我来执行。”

刘志丹又说：“四十二师中的一些连营长，有独立指挥能力的抽一部分，到庆阳、合水、保安游击队去担任队长、政委。”

“杨丕胜、张忠考、刘约三这些骨干都能出任了。”王世泰提议。

刘志丹说：“世泰，你先准备个意见，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后再定。”他又指示：“根据地不断扩大，地方工作任务越来越重，仲勋把下一步的工作提个计划，会上研究。”

通信员进屋报告：“报告，刘总指挥，谢子长派郑习武来，要见总指挥。”

刘志丹、习仲勋和王世泰忙说：“快请！快请进！”

陕北游击队员郑习武将谢子长的信交给刘志丹说：“啊！我终于把任务完成了。”

刘志丹把信看完，又交于习仲勋和王世泰过目。

“中央北方局任谢子长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回到陕北。”刘志丹笑道：“这下可好了。老谢回来，陕北根据地很快会恢复壮大的。我们也能通过老谢和党接上关系。”他转身对警卫说：“安排郑习武同志好好休息。明天上路。”

习仲勋说：“敌人可真残忍，杀害了我们很多好同志。安定监狱还有我们的同志没有救出来。”

王世泰表示：“一定设法营救！”

刘志丹说：“是啊，这是紧急任务。我们要派部队去。老谢回陕北不久，可能经济上也困难。明天先派两人和郑习武带些银洋，给老谢讲，随后派部队上陕北，听他指挥营救狱中同志。”

月亮已爬上中天，冷风飕飕地吹着。另一眼山窑里。

谢子长部署道：“我们的行动一定要在正月十五之前。”

谢绍安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三大，枪装在棺材里运时，让井岳秀的人扣住了。”

谢子长一咬牙：“再筹钱去买。”

刘明山又跑了来：“刘志丹送来 200 块银元，说队伍随后就到。”

谢子长看着门外，深情地自语：“志丹啊，你可救了大哥的急了。”

二

安定一仗，使敌人大为震惊。他们急忙调来敌六十六师和地方民团，向安定、清涧、神木三个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

只有数百人的陕北游击队，面对数千敌人的围攻，形势非常严峻。为了集中我党陕甘和陕北的军事力量，粉碎敌人的“围剿”，把陕甘和陕北两块根据地早日连接起来，谢子长决定亲自率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与红一、二、五支队及 200 多名赤卫军南下南梁堡，与红二十六军会合。

南梁堡地处陕甘两省的交界处。刘志丹和二十六军住在南梁堡的阎家洼子。

谢子长率领游击队和赤卫军日夜兼程，行军数日后于 7 月 25 日到达阎家洼子。

陕甘边特委军委主席刘志丹和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四十二师党委书记龚逢春、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站在红军队伍的最前边迎接谢子长。

两支队伍会合后，大家一下子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之中。

7 月 28 日，阎家洼子召开了陕北、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

会议首先由龚逢春宣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局代表给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北方局委托特委转来的这两封信，是批评二十六军的。大家的眉头都紧紧地蹙起来，对这种不切合实际的批评尽管心里不服气，但是，考虑到在这偏远的地区，要上级机关完全了解情况，那也是不

可能的。因此，大家都沉默着。

下来，由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介绍陕北根据地和陕北红军游击队恢复、发展的情况。后来，陕甘、陕北的同志都发了言，大家一起讨论了两块根据地的形势和今后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最后决定：由谢子长率领王世泰、黄罗斌的红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和红军开展武装斗争，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军事“围剿”。

红四十二师的负责人在发言中首先检查总结了红四十二师的工作，接着批评了高岗在政治、军事和生活作风上的错误，这时候，有人提出高岗继续担任四十二师政委不合适，应该由谢子长兼任四十二师政委。

经过大家的一致讨论同意，撤销了高岗的师政委职务，决定派他去上海临时中央局受训，四十二师政委由谢子长兼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职务由贺晋年接替。并决定：红二十六军红三团北上和陕北游击队联合作战，粉碎井岳秀对陕北的“围剿”。

三

粉碎敌人第一次军事“围剿”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8月底，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十四支队在绥德东区土地岔成立；接着十二支队在绥德县梁家甲成立。

9月上旬，七支队在府谷木瓜村成立。

随着红军游击队的发展，陕北红色区域也迅速扩大。这使国民党反动派如芒刺在背，坐立不宁。他们急急忙忙调兵遣将，准备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军事“围剿”。

1934年8月28日，陕北特委与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清涧县惠鄢里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决议。决定将陕北游击队一、二、三支队扩建为一、二、三团，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在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

9月18日，安定崖窑沟红旗招展，人声鼎沸。红一支队、八支队和红三团集中在村子的一个场院里。场院四周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临时搭

成的主席台挂着“陕北红军第一团成立大会”的横幅。场地周围站满了欢天喜地的群众。

谢子长站在主席台上，脸上闪现着难以抑制的激动。他用高亢而富有激情的声调宣布：“陕北红军第一团成立大会现在开始！”

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来。

接着，谢子长讲了话，热烈的口号声和掌声不断地从会场上爆发出来，整个会场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

“现在进行授旗仪式！”谢子长庄严宣布。同时，将一面绣有“陕北红军第一团”的红旗授给贺晋年。

经久不息的掌声又响起来。

贺晋年双手接过红旗，将它高高地举过头顶，激动的泪花终于冲出了眼眶，淌了下来。

谢子长又宣布贺晋年为红一团团长、马佩勋为政委，路文昌为参谋长。

贺晋年以红一团团长的身份讲了话。

王世泰代表红三团向大会祝贺。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中国革命万岁！”

口号声震天响。

会议在热烈的口号声中结束。

接着，二支队也于 11 月 4 日在清涧大马家山改编为陕北红军第二团。9 月 18 日，三支队于神木王家庄收缩编入了陕北红军第三团。

1934 年 10 月，蒋介石从陕、甘、宁、晋调集了 5 万军队对西北红军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的军事“围剿”。

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曾在攻打“河口”中负伤，伤势已开始恶化的谢子长再也在病榻上躺不住了。他亲自提笔给刘志丹写信，要他前来陕北，共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大事。

接着，谢子长又参加了陕北特委在柳沟召开的粉碎敌人第二次军事“围剿”的战略方针讨论会。

根据谢子长的作战部署，1935年1月，陕北红军开展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

1月20日，红一团与延川九支队在青坪川王家圪崂全歼延川民团200余人，俘敌团总高善亭。为了便于作战，30日，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将红一团和红二团集中起来作战。

2月1日，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率一、二团和四、五支队，歼灭安定南沟岔守敌高桂滋部四九九团五连一个排。

2月10日，强攻安塞吊儿沟民团。敌依仗崖窑，据险顽抗。红军发动赤卫军、少先队和群众，挖土埋崖窑，并击溃由安塞前来解围之敌，迫守敌投降。

3月17日，红军在清涧阎王砭设伏，击毙高桂滋部五〇一团八连连长，俘敌30余人，同时击溃“剿共义勇队”四五十名敌军。与此同时，一直活动在神木、府谷地区的红三团也打开冯家峁寨子，消灭该寨地主武装。红军在一个多月内，五战五捷，给“围剿”红军的敌人迎头痛击。

这时的谢子长不但负伤，加之从北平回陕北后，一直在野外风餐宿露，身体状况就恶化了。斗争的形势也空前紧张，根本顾不上休息和治疗。自给刘志丹写信后，他就急切地盼望着刘志丹的到来，想好好研究一下共同打几个胜仗。

第九章 哭“青天”

人不能言语，天饮泣。在这“红色”的黄土高坡上，天降素缟，大雪哭子长。

好端端的青天三尺雪

老谢你啥话没说走远咧

一

国民党第二次“围剿”陕北苏区之敌，兵力之重，布置之周密、来势之猛、速度之快，均大大超过了第一次“围剿”的程度。凶恶的敌人，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吸取了第一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重新调整了战略部署，采取了新的进攻措施。当时，陕北苏区的形势十分严峻，战争的空气笼罩着苏区大地。

在军事上，敌人首先集中了 6 个师 30 个团，共计 5 万余人的重兵，摆在了“围剿”我陕北苏区的第一线。

北线由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的 7 个团布防在保安（今志丹县）、定边、靖边、横山、佳县、神木、府谷、榆林（师部和伪专员公署所在地）；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的 4 个团布防在延安、安塞、延长、延川、清涧、米脂、瓦窑堡、绥德（师部和伪专员公署所在地）。

东线由晋军七十一师布防在黄河东岸各要点，并派遣该师二〇六旅两个团西渡黄河，布防在吴堡、宋家川、辛家沟、义和镇、定仙娥。

南线由敌四十二师冯钦哉部 4 个团布防在宜君、黄陵、洛川、宜川、富县、甘泉。

西线由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 7 个团布防在甘肃省的合水、华池、庆阳、曲子镇、环县。并在西南线，蒋介石的嫡系六十一师杨步飞部 6 个团布防在淳化、旬邑、长武和甘肃省的宁县、正宁。

与此同时，敌人还不断强化苏区的反动地主民团、还乡团、铲共义勇军等反动的地方武装。破坏、抢劫、暗杀、制造白色恐怖，配合国民党反动军队对我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蒋介石还为了达到既“围剿”苏区，又监

视、控制进而吞并地方杂牌军的目的，还派出了以毛侃为首的参谋团进驻绥德城内督战。

当国民党反动派完成了在外线上对我苏区的大包围后，企图限制我军的活动范围，逼我在不利地区被动应战，达到其在大包围圈内的分割“围剿”之目的；当敌人争得一地之后，采取驻点筑堡，构成网状，伺机捕捉我小分队；并实行步步为营，隔断我军与群众的联系；妄图置我军为无水之鱼而涸死。

在政治上，敌人加强反共宣传，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建立“肃反会”；秘密搜捕革命干部，煽动和欺骗革命干部，群众突击自首；设立坐探据点，时时刺探我军情报；派出间谍勾结内奸，潜入我党、政、军、群参组织内进行长期捣乱和破坏。敌人企图利用这些卑鄙的手段、破坏我党的基层组织，群众组织和政权组织，使我苏区的各级组织处于瘫痪状态。

在经济上，敌人封锁了通往苏区大大小小的交通要道，增设关卡，严禁军事物资、工业品和群众生活日用品等进入苏区。同时，还令苏区内的各种反动组织、敌特对交通要道、群众生产工具和牲畜等，进行大肆破坏。妄图通过经济上的大封锁，困死我们。

针对敌人的这些战略部署和行动方案，刘志丹根据敌我双方兵力等情况，深刻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复杂形势，从实际出发，制定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陕北苏区第二次“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行动方案。

加强政权建设。迅速调整、充实、健全各级党、政、军、群领导机关，使各级领导机关都形成一个适应新形势、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充分做好战前宣传、动员和教育群众等工作。紧紧依靠苏区人民，广泛动员苏区的一切力量，出奇制胜地打好第二次反“围剿”战争。2月18日，发布了由刘志丹亲自起草制定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动员令》。并于5月2日，西北军委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勤动员条例》、《处决土豪劣绅法令》等。

在军事上做了严密的部署。

1935年5月1日，在赤源县的白庙岔成立了八十四师的指挥机关，组建了司令部、政治部和经济处。任命杨棋为师长、张达志为政委，朱子休为参谋长。并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为总指挥，白坚为总政治部主任，范子文为秘书长，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苏区内外各游击队，还决定八十四师司令部为前敌总参谋部。

二是成立陕甘边军分会和陕北军分会，统一指挥游击队打到敌人后方去，形成反包围的态势。

命令陕甘边军分会主席刘景范同志统一指挥南梁、照金两，地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步兵第一、二两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消灭、钳制敌人，扩大自卫的力量；并做好根据地内的坚壁清野工作，保护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命令陕北军分会马义以绥德、清涧根据地为依托，统一指挥清、绥、佳、吴游击队，并组编成7个纵队。

命令红二十六军骑兵团，由师长杨森率领，插到咸榆路东侧的宜川、韩城、合阳一带，积极发展游击队，钳制敌人，破坏交通线、敌人的仓库、兵站等军事设施；奔袭中小城镇，歼灭小股敌人；发动群众建立秘密的革命据点。

以上这些就是插入外线的我军对敌人形成反包围的部署。

并且，组成红军主力兵团。将红二十六军的步兵三团、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的红一、二、三团和抗日义勇军组成拳头兵团。集结、隐蔽在秀延县境内的玉家湾、黄家川、魏家岔一带，养精蓄锐，准备打击清涧与瓦窑堡突击到苏区中心之敌。

特别选择了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为我军打击对象。其理由是：高部是第二次“围剿”我陕北苏区的主力部队，骄横残暴，突击我苏区中心地带，对我军威胁最大。加之，高部虽装备精良，但需有充足的弹药和大量的补给品等。笨重的设备和大量的补给品必然导致行动上的迟缓等等。

最后，注意选择有利战场。瓦窑堡与清涧之间45公里的地段上，秀延河贯穿东西。顺川是通行大道，川道上多村庄，南北多山，地势起伏，沟壑纵横，利于设伏隐蔽。进可攻，退可走。更主要的是当地群众基础好，

除瓦窑堡、清涧县城为敌孤立据点之外，广大乡村均为苏区，保密条件好。此段又是敌人东西南北联系的必经之地，故是重点消灭敌人的天然场所。

完成上述组织上、军事上的布置之后，刘志丹为了达到首战告捷，给来犯敌人迎头痛击，打击其嚣张气焰，鼓舞苏区军民斗志，便率前总机关的其他领导同志，亲临预选战场附近进行实地考察，做到心中有数。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反“围剿”战争即告开始了。

二

1935年1月19日，谢子长又一次望着窗外，心急如焚，部队怎么样了？志丹为什么还不到来？

薛兰岗突然一掀门帘，兴冲冲地喊道：“三舅，刘志丹到陕北来了。他说明天来看您。”

谢子长的眼中马上放射出明亮的光芒。他高兴地问：“是真的吗？”薛兰岗点点头。子长说：“那太好了。太好了！”

知道刘志丹要来的消息后，谢子长整整一天都显得十分激动。第二天，刚吃过早饭，他就迫不及待地打发儿子谢绍明到村口去迎接刘志丹。

一会儿工夫，刘志丹与郭洪涛、惠子俊、白坚一起骑着马来了。

刘志丹刚一跨进门，谢子长好像突然来了精神，他居然坐了起来，与刘志丹握手。

刘志丹动情地说：“老谢，你怎么就病成这样子了？为什么不早给我说呀？”

谢子长更是激动，他噙着泪花，用颤抖着的声音说：“我早就盼着你来哩！我估计你快来了。你来了就好了。”他越说越动情：“好志丹，看样子，我是不行了，领导陕甘和陕北的军事重担就要落到你肩上了。也只有你的肩膀才能有力量挑起这副担子啊！”

刘志丹的心里一阵酸楚，说：“老谢，不要这么说。你要活着。你应当备信心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党和人民需要你！你的病能好的，一定能好的！”刘志丹已泪流满面。

在场的人的心情个个都十分激动。

刘志丹用手摸着子长的被子，说：“被子太薄了，要换一下。你这个同志我晓得，总是为别人着想，从不考虑自己。”

子长劝大家：“只要伤好了，能继续革命，能工作，被子薄没有关系的。”一阵简短的沉默。

面对子长这样无私的胸怀，谁也不能，也不会开口说话了。

志丹在子长身边坐下来，说：“你的信我看到了，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陕甘革命的形势很好，这一两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从总的力量来比较，我们还是相对的弱小，从陕甘边和陕北这两块革命根据地来看，陕甘地处偏僻，跨越两省边界，人口稀少，经过反复斗争，群众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陕甘可以以桥山、苍山山脉为依托，南可出击关中，西可出击陇东，北可依托陕北根据地继续向前发展。陕北群众条件好，对壮大红军十分有利。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发展扩大根据地，使陕北革命根据地、神府游击区和陕甘革命根据地连接起来。形成犄角之势，造成红色割据。因此，党的领导亟须统一。愈早统一，对革命的开展愈有利。只有把两个地区在组织上统一起来，才能够集中力量，更有力地对付敌人。我这次来陕北，除了汇报反‘围剿’的计划外，就是准备与你与陕北特委的同志交换意见，解决这个问题。”

谢子长不住地点头，等刘志丹说完后，他接着说：“我完全同意志丹的意见，应该迅速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军事指挥。同时，成立西北党的工作委员会，统一两地区党的领导。”

志丹说：“那么，两个特委赶快派出代表研究吧！”

郭洪涛说：“好。”

谢子长兴奋地说：“陕北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今后的工作重点深入发动群众，迅速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志丹和大家都表示赞同。

接着，他们又进一步讨论商议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军事行动计划。

最后，大家的话题又回到了成立西北军事委员会的问题。子长说：“应

该很快行动起来，不能再迟疑了。至于军委主席的人选，我看志丹最合适。”

刘志丹忙说：“不，老谢，你是西北军事特派员，你当军委主席最合适。”

谢子长轻轻地摇摇头，恳切地说：“我这个病是不治之症，即使是不死，也是上气不接下气，实际上不能工作。不要用我的名义了，工作你来搞，这副担子你挑起来。”

刘志丹固执地说：“不，老谢，你是老大哥。在陕北，群众最熟悉你，了解你，你的威信比我高，还是你当军委主席最合适，我可以做你的助手。”

谢子长见刘志丹不肯接受，就认真地说：“我是北方局派来的军事特派员，我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名义，确定你担任军委会的主席。”

刘志丹不吭声了，但谢子长并没有说服他。

志丹要走了。他与子长握手告别后，转身对站在旁边的史秀云和其他人说：“要精心护理好老谢，及时把他的病情变化向特委汇报。”接着，他又对郭洪涛和白坚说：“保卫人员少了，增加几个吧，还能跑跑腿，买点东西，送个信。咱们没有好西医，就为老谢请个好中医治病。”他又转身对史秀云和照顾子长的人说：“再找两条被子，两套衣服，要常给他换洗。”

志丹与郭洪涛、白坚、惠子俊恋恋不舍地走了。谢子长久久地凝视着他们离去的方向，突然激动地说：“志丹，他真好！他真好啊！”

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周家岭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选举惠子俊为西北工委书记，谢子长为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不久，刘志丹任主席。

谢子长的病情已让人十分担忧了。刘志丹凝视着前方，想着谢子长受伤的事情，嘴里不住地感叹：“真是一条硬汉子！”

那是张家炮台战斗后，子长带领红军迅即开往清涧县打河口的事了。

河口位于黄河边。从毛乌素沙漠里发源的无定河，经过榆林、米脂、绥德、清涧等县，在这里汇入黄河。河口的地势极为险要，突兀兀的一座山，山上修有碉堡，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河口村里也筑有工事，特别是敌二十二军五团三营的董营长来这里镇守后，防守更严了，连黄河中来往摆渡的舢工也被取缔活动，说是要防备山西游击队打过陕西。

这个董营长表面看弱不禁风，却是一个得力的“剿共”专家，是井岳秀的一条忠实走狗。自他来到河口后，先是加固了碉堡，然后，又在村子周围修筑了工事。工事前后，都挖了堑壕。

听说红军要过河口，他高兴得直转眼珠子。他知道红军武器装备较差，多采用夜袭和游击战的战术，就重新调兵遣将，加强了防卫力量，决心和红军决一雌雄。

谢子长带着红军是连夜赶到河口的。半夜，他们包围了河口，和敌巡逻队一遭遇，巡逻队就缩回了脖子，钻进乌龟壳里去了。谢子长一看得了势，心中高兴。过去，都说董营长不好对付，看来未必吧。他急忙部署兵力，和王世泰的红三团分兵把守，决心拔掉河口这颗钉子。

然而，他没料到，敌人的防守是很严密的。红军刚刚向村头靠近，敌人工事里的枪就响了，几位红军战士应声倒下。再往上冲，又牺牲了几个同志。

前进受阻，谢子长心急如焚。他仔细一看，敌人工事的前边是块斜坡，无依无托，不好隐蔽。但是，不夺取这个工事，就不可能进村，更不可能拔掉敌人这颗钉子，还是要下决心攻上去。

偷袭变成了攻坚。这时，天色已渐渐变亮了。子长一挥手，又一批红军战士冲了过去。

枪声像雨点一样扫了过来，好几个战士又倒下了。剩余的一些同志慢慢往后退。有几个冲得快的，已快接近敌人的工事了。可是面前，有一条深深的堑壕把他们阻拦住了，靠那几个人，是休想冲过去的。

“嗒嗒嗒！”敌人的机枪又响了。那是从山顶的碉堡里射出来的，夹带着火舌和罪恶，向红军战士扫来。那碉堡又修得特别巧，四周的坡地上，无处不能着弹。谢子长望见那几个冲到堑壕边的战士，只是翻了几下身，就不动了。他的心里像刀割一样，右掌在泥地上狠狠一砸，回过头对王世泰说：“你指挥部队，我就不信拿不下这个碉堡！”说着，就要往上冲。

周围的同志赶紧拦住了他：“总指挥，你不能上，你得指挥！”

“老谢，还是我们再组织力量，你得考虑咱这几百号人啊！”王世泰说。

“子长。”

“老谢！”

“总指挥！”

.....

劝阻声、哀求声，谢子长一概听不进去了。他脑子里只想到，我用优势兵力来攻这样一个连队还攻不下，怎能开辟陕北根据地！他把这次战斗看得太重了，几乎是赌博。于是，又重新组织了几十个人，一齐发起攻击。

“吹号！”谢子长命令。

“哒哒嘀！”

红军又一次冲锋开始了。谢子长把帽子向后一推，挽起袖子，将枪顶上了子弹，要冲上去。

通信员又一次拦他，死死地扯着他的衣服不放手。

谢子长生气了，狠狠地骂了一句，又让王世泰去组织掩护。

他不顾一切，猛地跃出了掩蔽体，高喊了一声：“冲啊！拿下山头就是胜利！”

红军战士们在谢子长总指挥的鼓舞和率领下，刷刷刷地冲了上去。

谢子长冲在最前面。突然，觉得有人当胸推了一掌，他差点打个趔趄。他知道，一颗子弹射中了自己。

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

谢子长感到胸部上的疼痛阵阵加剧。他觉得全身的血都要汩汩地流出来了。像是把全身的筋一根根地往外抽。头脑中晕乎乎的，眼前一阵黑，一阵白。他知道，自己伤得不轻。可是，不能倒下！这样会影响军心。不能倒下！他命令自己。他抬眼望了一下，阵地上已经倒下了七八具红军战士的尸体，还有十来个已负伤的战士，正被往下转运。血，火一样的血，把谢子长的眼睛烧红了，把他的头烧焦了。他把身子靠在一个土坎上，“嗒嗒嗒 ——”端起机枪扫射着。

这时，马佩勋跑了过来，气咻咻地说：“这么个鬼地方，我们几百人，

对付不了一个营？趁下雨，咱们再攻一次，不信打不下！”

谢子长抬头一看，天已经下雨了。细细的雨丝，开始觉察不到，一会比一会大，一会比一会紧，绵绵的秋雨在这时候凑热闹了。

派出去的侦察员这时也回来了，说是敌人援兵已经出发，两三个小时就可能赶到河口。谢子长又望了一眼敌人的碉堡，咬了咬牙，吩咐马佩勋把各支队领导找来，就地召开动员会。他坚定地说：“从半夜到现在，我们连个河口也没拿下，还损失了好多人。现在，敌人援兵快到了，我的意思，咱们再发起一次冲锋，看能不能攻克！”

正在火头上的支队领导无疑都同意子长的意见，表示坚决要拿下敌人碉堡。

“好，各就各位，准备——”谢子长下达命令，首先站起来，准备到前沿去。可是，还没站稳，身子剧烈地摇晃了几下，差点跌倒。几个人上前一看，才发现他负了伤，胸部上的血已浸湿了夹袄。

“老谢，你负伤了。”

“老谢，你怎么不早说。”

因为他穿了件紫色夹袄，又下着雨，血迹被冲散，大家未注意。

子长摆摆手，不让大家声张出去，仍要继续指挥战斗。

又一次冲锋开始了。

红军以强大的火力，压得敌人抬不起头。但是，敌人的工事是坚固的，攻上去的人很难坚持住，结果又退了回来。

已经到了下午，一时很难取胜了。王世泰请示子长后，决定暂时撤出战斗。因为敌人援兵已接近了，再打下去，弄不好会腹背受敌，难以收拾。部队刚一转移，董营长也带着队伍跑了，他也尝到了红军的厉害。

三

刘志丹与谢子长分手后，赶回部队。

4月30日，敌八十四师五〇二团一个营，直插我苏区杨家园子，妄图

切断我秀延县与清涧县、延川县的联系。在杨家园子设立据点，修寨筑堡，实行稳扎稳打的战术，就像钉在木板上的一根铁钉。

为了拔掉这根钉子，打好这一仗，为陕北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打开局面，前总命令：5月7日拂晓，红军主力分三路向敌开进。义勇军为主攻部队，从蜜蜂峪出发，攻占玉皇峁制高点；红二十七军红一团为一路，由魏家岔出发直奔杨家园子西街，攻占敌营地野战工事；红二十七军红二团为另一路，从冯家岔出发，经过单头直插杨家园子东街，攻占临时营房；并命令九支队率领赤卫军、少先队在杨家园子南山设伏，捕捉溃逃之敌。

5月8日8时许，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我军立即发起冲锋，迎头痛击来敌，歼敌前卫排全部。敌其余部掉头便向瓦窑堡方向溃逃。我红一团乘胜追击，在张家卵子全歼敌余部，活捉敌团长李少堂老婆等人，并救出了共产党员赵通儒。正在打扫战场时，忽又接到杨家园子追击我军的另一路敌人已到吴家寨子后山，并已占领了寨子的情报。我红一团乘敌未站稳脚跟，立即返回向敌发起猛攻，迫敌退到白家园子的后山老虎塙园峁高地。

敌人构筑工事，企图与青皮梁之敌成互援之势，负隅顽抗。

贺晋年团长立即将此情况报告刘志丹，请求歼灭这股敌人。刘志丹经过周密的思索、分析后，同意贺团长的请求，决定迅速组织攻击部队，全歼该敌。命令步兵三团和抗日义勇军攻占入天山、大小塙山制高点。得手后，分左、右两路向老虎塙高地夹击，夺取制高点。要夺取这一目标，抗日义勇军必要通过一条深山崾岬。此时，敌人组织了一道火墙死守。战斗空前激烈残酷。在付出重大伤亡的情况下，我军终于突破敌人火墙防线，胜利通过崾岬占领了前沿阵地，逼敌只好退守孤立的园峁高地。我红一、二团则从敌侧背包抄迂回，将敌又挤压到泥泞的山沟。这时，我军犹如瓮中捉鳖，歼敌全部，战斗即告结束。

此次战斗击毙敌营长以下官兵50余人，俘敌副营长以下官兵450余人；缴获步枪350余支，轻机枪27挺等军用物资。

这一仗首战告捷，取得了歼敌一个整营又一个整连的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苏区的广大军民，使敌人“围剿”首次受挫，狠狠打击了其嚣张

气焰。

4月21日，红二团在南梁地区完成阻击敌三十五师的任务后，按原定作战方案，迅速向陕甘边西北、东北地区移动，向敌人发动进攻，在杨清川伏击敌警三团骑兵连获胜。

5月1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会师。

5月2日，西北军委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地动员条例以及处决土豪劣绅等一系列规定。

5月3日，在玉家湾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5月9日，西北主力红军及数千游击队、赤卫军在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在马家坪全歼敌八十四师五百团一个营和一个机炮连。

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举行会议，刘志丹代表前敌总指挥部作了军事形势报告，并对下一阶段作战的方针、计划提出建议。

5月中旬，刘志丹率红军主力，进至清涧无定河边。

5月20日，红军与张家圪台歼敌八十四师四九九团一个连。

5月29日，红军对延长县城发起突然攻击，守敌猝不及防全部被歼，县城迅速被我占领。

.....

陕北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从1935年5月1日起至8月底止，历经4个月。我军民共歼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等3000余人；缴获各种武器7000余件，及其大量军用物资等。

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北苏区的进攻，狠狠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苏区军民。我军连克6座县城及各据点，解放了东至黄河，南至临镇、金盆湾，西至永宁山，北至长城边的800里广大地区，巩固和扩大了苏区，壮大了红军力量，使我陕北红军主力部队，由第二次反“围剿”的战争初的2100余人发展到4000余人，游击队由400余人也发展到4000余人。

秀延河畔，雪花飞舞。

刘志丹正带领部队清扫战场，押解俘虏。一位通信员骑马前来，下马后，立正报告，将一封信递给了刘志丹，刘志丹展开信一看，不禁潸然泪下。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同志不幸逝世。

四

谢子长在阳道崙住了一个多月后，敌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不知敌人通过什么途径，探知了子长负伤，正在农村养伤的消息。便派出人马到处搜查，妄图杀害他。为了躲避敌人的追踪搜查，同志们便抬着子长不断地转移。

一日，谢子长离开阳道崙，转移到周家崙。

子长好久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了，百姓们挂念极了，他们到处打问，到处寻找。后来，一些群众终于在周家崙见到子长。那些心里老谢怀着深深敬意和无限爱戴的群众，带着家中能够拿得出的最好吃的东西，纷纷前来看望子长。开始一个、两个地来，渐渐地，来看望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为子长带来挂面、鸡蛋、肉食、白面、荞面和瓜果。护理他的白盛英看见这么多东西，高兴极了。子长自受伤以来几乎没吃过什么好东西。那时日，红军和百姓的生活都十分困苦，常常是吃了这顿没那顿，有时设法搞一点羊肉，熬一些汤，煮上面条，这便是最好的食品了。眼下，有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盛英真恨不得让子长一下子都吃到肚子里去。她一天三四顿换着花样儿给子长改善伙食。谁知，一天谢子长发现了问题，严肃地问：“为啥吃得这样好？这些东西都是从哪里弄来的？”

盛英说：“是群众送来的呀。”

“给人家钱了没有？”子长问。

盛英一愣。她不愿意告诉子长早已没钱了的实情，可不告诉他也不行，她只好说：“没有。”

子长的眉头皱起来了，他说：“我怎能白吃人家的东西呢？我没给穷苦

百姓办多少事。再说，穷人的东西来的不容易，咱不能要啊！”

盛英望着已经骨瘦如柴的子长，心中一阵痛楚。她强忍着眼泪，说：“三大，凡是来看你的人也不是外人，人家带点东西，也是一片心意嘛！如果咱硬不要，会伤人家的心的。我看只要你吃了，早日养好伤，带上红军把白军消灭了，给老百姓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也报答了他们对你的一片心。”

谢子长摇摇头，“消灭白军、分地、分粮，这是我们革命者应做的事，不能因为做了这些事，就吃人家的东西。”

盛英为难地说：“那你说今后咋个办？”

子长想了想，说：“你就对群众说我有吃的。群众一定坚持要留下，就付给钱；如果人家不要钱，就少留一点东西。如果是面，就留一两，是鸡蛋，留一个，是肉，就割一小点，亲朋的心意我留下。”

时节已进入隆冬，刺骨的寒风不停地呼啸着，严寒凝结在天地之间。大家抬着子长，踏着夜色，在崎岖的山路上转移着。快到小界鄢村了。大家见子长冻得直打哆嗦，便走进村子来到贫农续殿革家。

续殿革一家见子长病成这样子，一边招呼他喝点水，一边偷偷抹眼泪，他拉着子长的手，哭泣着说：“老谢呀，你是为穷人过上好光景，才把自己弄到这种田地的呀。”

谢子长靠坐在炕上，强打精神一边与续殿革拉话，一边扫视着这个一贫如洗的家。整个窑洞里，除了几件破破烂烂的灶具外，几乎一无所有。铺着烂席片的炕上光溜溜的，连一床被子都没有。他心里一阵难过，对警卫员白盛武说：“把我的被子给他们留下。”

白盛武为难地说：“你就这么一条被子，留下了……”

子长抬头瞪了白盛武一眼：“你们只晓得我。”他停了一会儿喘口气又说：“他们一家人没有一条被子，我盖上被子心里能安稳吗？把被子留下，我有件皮袄就行了。”

“使不得，使不得啊！老谢，老百姓都指望着你哩，养好伤最要紧。我帮不了什么忙，心里就很不安了，怎能再把你的被子留下来呢？”

子长动情地说：“老续，不要这么说，留给娃娃们盖吧。将来的世界是娃娃们的，我们要爱惜娃娃！”

续家人流着眼泪把子长送出村口。

转移途中连续不断地颠簸，使谢子长伤势越来越重，身体越来越虚弱，再也经受不了折腾了。

可是，敌人仍到处搜捕。

大家为找不到一个合适地方伤脑筋。子长睡着了，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起来，子长睁开眼说：“我看灯盏湾可以。”

人们都很吃惊。“灯盏湾离水晶沟只有几里路，而水晶沟是地主窝子，敌人常来常往，那里太危险了。”

“正是因为离敌人近了，所以才安全。”子长说：“这叫出其不意。”

到了灯盏湾不久，就要过春节了。

子长问保卫队长薛兰岗：“战士们怎么过年？”

薛兰岗说：“已经准备好了，有肉，还有白面。”

子长点点头：“有好东西，就应该叫同志们吃好吃点。可以做八大碗叫大家吃嘛。”他停了一会儿，又说：“兰岗啊，你现在已经是个带兵的人了，一定要关心士兵的生活。战士们是最辛苦的，如果有条件，要尽量让他们吃好吃点。一个指挥员，不仅要会带兵打仗，还要学会做战士的思想工作，学会关心他们。”

除夕之夜，谢子长用双手支撑着不能仰卧的身体，闭着眼睛疲惫地靠在炕墙上。突然，“劈劈啪啪”的鞭炮声从村里响起来。子长仿佛听到了战场上的枪炮声，仿佛看到了硝烟滚滚的战斗场面，他顿时来了精神。睁开眼，坐直了身子，微笑着听了一会儿，突然，提高声音叫道：“双玉，你来。”

正在院子里放鞭炮的谢绍明跑进来：“大大，你叫我。”

子长兴奋地说：“我有几个月没有打仗了，想闻闻火药味，你把鞭炮掰开，将火药倒在炕愣上点着。”

绍明把鞭炮掰开后，用香烟头点了几次都没点着。

子长说：“你先把纸捻埋在火药里，再用香火把纸捻点着。”

绍明照做了，火药立即燃烧起来，腾空飞起的火花带着浓烈的硝烟直冲窑顶，吓得谢绍明朝后退了两步。

子长说：“你连这点火药都怕，以后怎么掂枪打仗呢！”绍明不好意思地对父亲笑笑。

火药味很快就在窑洞内弥漫开来，子长深深地嗅着，神情完全沉浸在他熟悉的战斗生活中。过了好一阵儿，他才睁开眼，说：“这火药味真好闻哪！”

谢子长的生命到了垂危之际，红军战士干部，陕北的穷苦百姓心头沉重极了。

他们去柏山寺求神，去石宫寺求神，他们虔诚地说：“天上神灵显灵，地上老谢显威。只要老谢伤好了，给神灵修桥、盖庙、塑金像……”

可惜子长已听不到他们的话了。

鹅毛大雪，漫天飞舞。

雪压枝头，雪盖山川。一片白色的世界，尚未全部解冻的秀延河水呜咽着。

十来名红军战士、游击队、赤卫队员、农会干部、群众代表站在河畔上，有的啜泣，有的趴在地上呜咽。

就这样，大家悲泣泣、静悄悄地埋葬了谢子长。为了斗争的需要，谢子长的大名依然要写在我军所到之处的传单、布告、公文上。因为他的名字足以让敌人闻风丧胆。

第十章 十五军团

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的会合，使西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西北，西北红军成为整个红军的一部分。

刀抹脖子枪崩身

这辈子跟上你铁定了心

一

位于陕西北部和甘肃东路，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从 1927 年 9 月清涧起义开始，陕甘地区的人民群众，在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高举革命的旗帜，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创建了红军，坚持了长期的游击战争。到 1935 年 7 月，先后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成立了陕甘边、陕北两地区的工农民主政府和许多县区级革命政权，建成了人口七八十万，面积三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

我们不妨把他们走过的路，用最简便的方式作以回顾和总结。

早在 1931 年 10 月，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南梁游击队和以晋西游击队为骨干的陕北游击队，在甘肃合水县会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1932 年 2 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至 5 月发展到 1000 人。12 月，陕北游击队在陕西宜君县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1933 年 5 月，陕军 4 个团和 6 个县的民团，“进剿”耀县西北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陕甘边特委以游击队在内线坚持斗争，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转向外线。5 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错误地决定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的渭华地区创建根据地，结果在优势敌军的围堵下失利。刘志丹率几十个人分散回到照金。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红军主力，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11 月，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辖第三团和骑兵团。从 1934 年 3 月 6 日，红四十二师在游击队、赤卫队的支援下，经过大小三十多次战斗，歼敌 3000 余人，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随后

红四十二师扩大为 4 个团，游击队发展到 2000 人。

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红军也有很大发展，相继成立了几支游击队。1934 年 7 月，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治委员。接着，陕北游击队南下陕甘边与红二十六军会合。随后陕北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在谢子长领导下返回陕北，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九、十月份，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分别扩编为陕北红军第一、第二、第三团。次年 1 月，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

1935 年 2 月 5 日，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苏区的斗争。5 月成立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军委主席兼总指挥的刘志丹统一率领下，先后在吴家寨，马家坪歼灭敌第八十四师两个营又一个连。接着红军昼夜兼程南下，先后攻占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 6 座县城，共歼国民党及民团约 5000 余人，粉碎了敌人对西北红军的又一次“围剿”，使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在 20 余县建立了革命政权。

7 月，蒋介石又调集东北军和陕、甘、宁、晋、绥 5 省地方部队 10 万人，对西北红军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在吴堡县慕家原和绥德县定仙塬地区首战告捷，歼晋军一个多团，俘敌 1800 人，迫使晋绥军主力撤回黄河以东。随后，西北红军一部南下鄜县、甘泉，主力北上袭击横山之敌。此战虽未得手，但迫使敌军收缩兵力，达到了巩固后方的目的。

1935 年的 7 月，对于陕甘边、陕北红军来说，是历史性转折的时期。当然，对于中央红军来说也是可载史册的纪念意义的时期。红二十五军的到来，是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的会合，西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西北，西北红军成为整个红军的一部分；中央红军回到了自己的家园，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无疑，是这黄山坳中，涂抹了一片红色的风景。

红二十五军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一支红军劲旅，属红四方面军建制，被称之为最小的一支长征大军。早在 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

鄂豫皖根据地后，鄂豫皖省委将留下的几个团集中起来，于 11 月重新组建起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为军长，王平章为政委，下辖两个师和一个特务营，共约 7000 人。徐海东为第七十四师师长。后来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程子华同志，在其《回忆录》中介绍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及红二十五军长征前的简况：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三省交界处，南濒长江，北抵淮水，东接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大别山脉雄峙于中央，俯瞰武汉、信阳、安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就在这里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开展了农民运动。1927 年，这里举行了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建立了工农红军和革命政权。1931 年成立了红四方面军。革命根据地最盛时期，曾拥有 6 座县城，26 个县政权，人口达 350 多万，面积 4 万多平方公里。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曾发展到 4 万多人，各种地方武装人数有 20 多万。但是，由于王明错误路线以及军事作战指导方针上的错误，没有能粉碎敌人‘围剿’。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鄂豫皖边区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20 多万敌军乘机大举进攻，同时，进行划区‘清剿’，在其占领区推行保甲制度，对残存的苏区农村一方面实行经济封锁，另一方面烧房屋、抢粮食、杀群众。当时边区军民对红军主力的撤离，缺乏思想和组织准备，陷入混乱，根据地只剩下鄂东北的黄、麻、光、罗 4 县边界毗连的小块苏区，以及檀树岗、天台山、西高山和皖西北的葛藤山、熊家河等几个山区。地方党、政组织遭到破坏，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1932 年底到 1933 年初，红二十五军抓住敌军调动、兵力减少的战机，积极歼敌，连续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边区革命形势出现转机，鄂东北根据地由几小块连成一片，皖西北根据地也部分得到恢复，红二十五军由重建时的 7000 人，发展到 3 个师、9 个团，10000 多人。皖西北的几个团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地方武装扩编为 10 个游击师，各县、区还成立了战斗营、战斗连、党组织恢复，人民群众恢复生产，革命热情重新高涨。这以后的半年时间，王明‘左’倾路线又在鄂豫皖边区造成了严重恶果，1933 年 5 月，红二十五军奉命去夺取敌重兵扼守，工事坚固的七里坪，苦战 43 天，久攻不下，部队减员几千人。鄂东北、皖西北

两个根据地又缩小了。敌动用了 14 个师又 4 个独立旅的兵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采用了增筑碉堡，扩建和封锁公路，切断两个根据地的联系等手段来企图消灭红军。可是省委却根据王明错误路线，以消极防御方针为指导的中心区保卫战方针。于是两个根据地的中心区相继丢失，红二十五军大幅度减员，部队再次缩小。”

到 1933 年 11 月中旬，部队作战又连连失利，剩下的人数不足一千，鄂东北地区县以下党政组织全部遭到破坏，群众生活极度艰难。皖西北情况也大致相似。正当鄂东北遭到严重的挫折时，省委开会讨论了转变斗争方针等问题，决定派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去中央汇报情况，要求派干部加强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成仿吾进入中央苏区，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听取了成仿吾的汇报。1934 年 1 月 27 日，中央军委的一个同志写了《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建议》认为，当前主要目的是保存战斗骨干，在适宜的时候，实行有计划战略退却。可以从罗山地区退到豫南的桐柏山区建立新的苏区。这个建议的主张和当时教条主义者的所谓“不放弃一寸土地”的口号是不同的。2 月 25 日，中央将《建议》转发给鄂豫皖的省委，所加的按语说：“只作你们执行中央军事指示时一个参考的材料。”

通过史料记载和详细的采访，我们知道了也就是这个时候，蒋介石正在调整和部署进攻鄂豫皖，到 4 月中旬，敌总兵力达到 16 个师又 4 个独立旅。6 月下旬，制定了一个从 7 月 1 日到 10 月 10 日的“围剿”计划，采取的方针是“一面划区驻剿，一面用竭泽而渔的方法，作一网打尽之图。”具体部署是把兵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驻剿”部队，划区占领我几小块根据地周围的所有城镇和重要村庄，每个点驻一个连到一个团的兵力，并在黄麻公路两侧部署了四道封锁线，又从信阳到广水的平汉铁路之间，配置近一个师兵力护路。另外一部分均 2 个师又 6 个团组成 4 个“追剿”队，跟踪追击我主力。同时，每隔 5 里、10 里筑一个碉堡，扼制住重要的公路线，构成纵横交错的封锁网。敌扬言要在 3 个月内，把我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

那么，红二十五军是在原地坚持，还是实行战略转移，就成为当时急需作出决定的首要问题。

番委在接到军委一个同志的《建议》后，曾设法在根据地边缘创建新的根据地，但因敌军强大和碉堡封锁而未能成功。可是要到远地去，既不了解情况又没有把握。省委在给中央报告中说：红军主力6个团要通过几千里地的白区，即使战争中不受损失，但疾病、掉队也会造成很大减员，建议暂不远离。

当时，中央和军委在指示中一方面说，当前任务是保全队伍，去创建新的根据地，但又说，原则上同意仍留在原苏区继续行动。

省委讨论后，决定留在原地，牵制敌兵力，使之无法增援江西。这样，就由徐宝珊、吴焕先率领红军二十五军转战到皖西北与红二十八军会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

窑工出身的徐海东，一向以骁勇善战而著称，他先后经历过百余次战斗，仅在鄂豫皖的10年中就负伤8次，身上留下十几处伤痕。在陕南庾家河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左眼下射进脑袋，又从颈后穿出。1933年5月在围困七里坪的战斗中，身为副军长兼师长的徐海东，听说敌两个师夹击过来，一个旅已经突然临近，便命令身边的两个团从侧翼包抄。他自己则脱下军装，只穿一条短裤头，手执一把大刀，带领直属队从正面迎敌冲杀上去，直冲得敌人落荒而逃，还抓回来近500名俘虏。他平时由于身体不好常常躺倒，但打起仗来却虎虎有生气。指战员们亲昵地称他为“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他不仅在鄂豫皖苏区出了名，就连中央苏区的领导干部中，也知道鄂豫皖有一个“徐老虎”。毛泽东则称赞他是“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而蒋介石则把他称之为“文明的一大害。”据说，南京的飞机飞到红军前线的上空，散发了传单，除了其他诱惑（红军战士携枪投奔国民党，每人可获100元奖金）以外，还有下列保证：

“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投诚我军，当赏洋10万，凡击毙其他匪酋，当予适当奖励。”

就是这位满身是伤痕的“徐大害”的脑袋在南京的悬赏中并不下于彭德怀的了。……

其实，徐海东之所以认定了跟党革命到底，也像其他革命者一样有着

他的历史缘由的。

徐海东于 1900 年生于汉口附近的黄陂县。他的家庭世代都是做窑工的。

徐海东曾回忆说：“我的同学几乎全是地主或商人子弟。我同他们一起在一张桌子上念书，但是他们很多人都讨厌我，因为我很少有鞋穿，衣服又破烂。他们骂我时，我忍不住要同他们打架。如果我跑到先生那里告状，他总是打我。如果是地主子弟打输了，他们去先生那里告状，打的又是我。我上学第四年，也就是 11 岁那年，参加了一场‘富人打穷人’的斗殴，一群富家子弟把我逼到墙角，我当时扔着棍棒和石头。我扔出去的一块石头打破了一个姓黄的孩子的脑袋，他是地主的儿子。他们便对我拳打脚踢后，他的父亲和先生又打了我一顿。我就逃学不肯再去了。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我从此相信，穷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的。”

他又回忆了他当窑工时一伙人和民团斗争的一件事。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装。

徐海东 21 岁时因家庭纠纷一怒离家出走。他步行到了汉口，接着又到了江西，做了一年窑工，攒了钱，打算回去。谁知得了霍乱，养病好了钱也花光了。他觉着空手回家不好看，便参加了军队，他们答应他每月 10 元军饷，可得到的却是“挨打”。

看来，“挨打”给徐海东带来的教育和感触也最丰富。

这时，国民革命已经在南方开始，共产党在徐海东所属军队中进行宣传。有好些被发觉了的人都砍了头。可他却不怕，反而对革命党人更感兴趣了。他对军阀的军队感到厌恶。便和一个军官一起开小差，逃到广州，参加了张发奎将军的国民党第四军，一直呆到 1927 年，他当了排长。

1927 年春，国民党军队分成左翼和右翼两派，这个冲突在张发奎的部队里特别尖锐。这时，这支部队已到了长江流域。徐海东站在激进派一边，不得不逃之，偷偷回到了老家黄陂。他这时已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他在黄陂就立即开始建立党支部。

1927 年 4 月发生右派政变，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但徐海东却没有，他觉得采取独立行动的时机已成熟。他把窑下的工人几乎都组织起来，还

有一些当地农民。从这些人中，他组织起湖北省的第一支“工农军队。”他们开始时只有 17 个人，1 支手枪，8 发子弹——那都是徐海东自己的。

政治委员吴焕先，湖北黄安县箭河区人。1923 年考入麻城蚕业学校。同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在家乡领导农民斗争。1927 年春利用建立和改造红学的办法，在箭河地区组织农民自卫军。同年秋参加领导黄麻起义。后在黄安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自卫队党代表。1928 年参加开辟豫南光山柴山堡革命根据地和建设红军的工作。1929 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土地委员会主席。1930 年任鄂豫皖特委委员、苏维埃党团书记和黄安县委书记。1931 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西移后，留根据地坚持斗争。同年 11 月重建红二十五军，任军长。次年 4 月与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八军会师，合编为二十五军任政治委员。

二十五军合编后，在军事上改变了以前那种内线分兵防御的打法，采用积极向外线抓捉战机，乘隙击虚的方针，连续取得了长岭岗、郝集、太湖等战斗的胜利。尤其是长岭一战，歼灭东北军 5 个营，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士气，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期间，几个小块根据地也有所恢复和扩大，党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小的胜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趋不利的形势。面临的问题仍是：在老苏区边缘开辟新根据地行不通，如果走出去，兵力不足四千，能不能打破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到新区站不站得住脚？最伤脑筋的是不知道到哪里去好？省委举棋不定。

就在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举棋不定之时，中央军委派红九军团十四师师长程子华同志前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加强那里的领导。

程子华是山西解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入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 12 月参加广州起义。1929 年参加领导湖北大冶兵暴。后任红八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团长、师长兼政委。1934 年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鄂豫皖苏区，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形的一一

“1934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和我谈话，他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用碉堡、封锁线，以‘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把我根据地压缩分割成小块。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如果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

程子华先绕道上海，于1934年9月首先进入了鄂东北根据地，与省委委员、鄂东北地委书记郑位三同志见了面，并就下步的行动问题，与郑位三、程坦、刘华清同志交换了意见。

而正当省委和徐海东军长率领红二十五军在皖西的六安、霍山一带休整时，突然接到郑位三同志来信，信上说：“中央派程子华送来了重要指示，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当时，红二十五军刚和敌人四十七师打了一仗，部队伤亡甚大，供给困难，对下一步行动也还没决定。因此，接信后非常高兴，部署完皖西的工作后，当晚就率部队出发了。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踏上了艰难的长征之路。

经过两个月跋涉走了6000余里，又多次遇险，激战终于到了陕南。然而，由于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都不理想，省委决定继续西进。12月8日，部队在豫陕边境的铁锁关击溃一个反动民团，随即进入陕西境内。

其实，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开始长征后，便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在近一年的艰苦转战期间，他们多么盼望能够得到党中央的指示，能够与其他兄弟部队会合和并肩作战啊！

1935年7月中旬，红二十五军浴血奋战的将士们的拳拳赤子心和同手足情，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了。他们怎能不激动，多少人流下了再见曙光的泪水。有人竟一屁股坐下去，半天爬不起来。

二

1935年7月15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烈日炎炎。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勇敢地冲破敌封锁，从西安带来了中央文件和报纸，他们才了解到：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举行了“遵义会议”。6月中旬，中央红军在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已向青海、甘肃边境北上了；他们还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向华北扩张，国民党政府与日签订了《何梅协定》，华北形势岌岌可危，民族危机严重。

石健民到的当天，省委就在丰裕口召开了紧急会议。

就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后期，为了把敌人调出根据地，以及补充物资、兵员和扩大政治影响，省委决定：部队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前峰直抵西安以南20余里的杜曲、子午镇一带，将配合党中央和友军北上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因此，可以说从1935年7月中旬开始，红二十五军踏上了更加光荣的里程——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

7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约4000人，从长安县沣峪口出发，经鄠县，沿秦岭北麓向西挺进，接连两次打退陕军骑兵团的尾追，于27日到达留坝县江口镇，进行了西进北上的准备工作。

7月30日，红二十五军离开江口镇向西北前进。8月1日，占领宝汉公路要点双石铺，歼敌一部，并俘敌少将参议员1名，缴获文件，报纸甚多。根据7月22日的《大公报》报道：红军主力“已越过6000公尺的巴朗山、向北行进，……似进窥甘青交界之洲河、岷县、西固等处。”敌人的口供、文件、报纸证实红军主力正在北上。而敌第一师胡宗南部、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第三军王钧部、新编第一军邓宝珊部及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等位于川甘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兰公路上，堵截红军主力北上。据此，红二十五军决定立即进入甘肃，袭击天水县城，以威胁敌人后方，策应红军主力北上。

8月3日，红二十五军攻占甘肃省两当县城，歼守敌一部，接着转向西北，翻越麦积山。9日晚，攻占天水县城北关，歼敌一部，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红二十五军的西进，使蒋介石大为不安。最初连电国民党部队加强西安、宝鸡、汉中碉堡封锁线，防止红军进入甘肃，后又命令陕军各部“不分省界，跟踪追击”；命令第五十一军，“派一部向凤县徽县方向轻装堵截。”当红二十五军到达天水附近时，蒋介石电令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

各抽一部兵力，归朱绍良统一指挥，“围剿”红二十五军。未待敌军部署就绪，红二十五军已离开天水北上。

8月11日，红二十五军北渡渭河，进占秦安县城。接着，经魏店北进，威逼静宁县城，切断了敌人西兰公路交通。17日，攻占隆德县城，歼守敌一个营大部。尔后，继续向东挺进，翻越六盘山，在瓦豪附近击破敌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旅一部的截击，占领瓦亭、三关口、高店。19日，逼近平凉县城。20日，由平凉县城以东四十里铺附近南渡泾河，沿公路进至白水镇。此时，敌第一〇五旅一部尾追而来，红二十五军冒着大雨返回到马莲铺以东，抢占打虎沟高地，歼其一个多营，将追敌全部打垮。21日，红二十五军由白水镇东进，经泾川县四坡村，南渡汭河，部队刚过一半，山洪暴发，河水陡涨，红二十五军直属队与担任后卫任务的部队被阻于河北岸。此时，敌人第三十五师二〇八团千余人突然袭击，红军后卫部队与敌展开激战，全歼该敌。在四坡村战斗中，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

四坡村战斗的胜利，使敌人暂时不敢向红二十五军逼近。红二十五军为继续牵制敌人，即在崇信、灵台之间积极活动。敌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由凤翔、清水向北推进到陇县、马鹿镇一带。敌第三军一部由武山、甘谷向华亭开动。中共鄂豫陕省委考虑一时难以获知红军主力的消息，而敌军又步步紧逼，红军无后方依托，行动异常困难，便决定立即北上进入陕甘苏区，同西北红军会师。

8月30日，红二十五军经华亭县安口镇北上，由平凉县城东的四十里铺再渡泾河，向东北前进。

9月3日，进抵合水县板桥镇，途中两次打败敌人骑兵的尾追。4日晨，红二十五军离开板桥镇时，后卫部队又遭敌骑兵袭击，损失200余人。此后，红二十五军沿陕甘边境人烟稀少的山区继续北进，于7日到达陕北苏区的保安县豹子川。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代理省委书记。

红二十五军及其指挥官程子华和徐海东的艰难历程不啻是主力红军长征之前的一首序诗。

红二十五军之所以能取得不断的胜利，有如此光辉的功绩，其中很重

要的一条便是有一个坚强的党政军集中统一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成员大都是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留下的领导骨干。

哈里森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文中，对红二十五军是这样介绍的。

“红二十五军，即周恩来早在 1934 年春派程子华去的那个军，经过 10 个月的颠沛流离，终于来到了陕北。”

“程子华坐着担架来到陕北，他的同事徐海东司令员也是坐着担架来的，两人都坐了几个月的担架了。”

“可他们毕竟来了。”

1935 年早春，红二十五军转移到了附近的陕西。一天，当他们正在庾家河开会的时候，国民党六十师——蒋介石最神速的一个师，从朱阳关席卷而下，从背后袭击了他们。程子华 1930 年时左臂曾受过伤，他习惯于右手托着左臂。现在，一颗子弹再次击中他左臂并穿透了右手，使他落下了残疾。副军长徐海东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子弹从右边穿过，从后脑穿出。他昏迷了一个多月。

当时，24 岁的钱信忠医生站在两位指挥员身旁。他也负了伤，但不严重。他是上海德国人办的同济大学毕业生，他用磺胺桐衣定为两人治病，这是一种德国早期制造的磺胺类药品。哈里森说：“他说，如果没有这种药，要挽救他俩的生命是不可想像的。”

后来，程子华的伤口严重感染。吴焕先政委接任指挥。正当他们向陕北运动的时候，吴焕先牺牲了。程子华和徐海东从担架上又接任指挥，程任政委，徐任军长。

9 月 9 日，红二十五军进至永宁山和陕甘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在沿途受到陕北人民的热烈欢迎。15 日，到达延川县和永坪镇。

9 月 16 日，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二十七军来到永坪镇，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1935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召集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原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中

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并改组了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将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9月18日，永坪镇广场上，举行盛大的联欢大会，庆祝胜利会师和纪念“九·一八”4周年。周围几十里的赤卫军和群众纷纷赶来参加。会场四周张贴着“欢迎红二十五军”、“庆祝红军胜利会师”、“团结起来，坚决抗日”等标语。

会场内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人人兴高采烈，洋溢着两支兄弟红军亲如手足的战斗友谊和根据地人民对子弟兵的炽热感情。

会上，刘志丹、徐海东、郭述申、聂洪钧、朱理治先后讲话。分别代表陕北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红二十五军、西北军委、中共西北工委祝贺胜利会师。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而奋斗。

会后，在中共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的支持下，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

要说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大会师的前奏，那么，红十五军团的建立，对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巩固和扩大陕北根据地，迎接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北上，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蒋介石已到了登峰造极地关注陕北的程度了。他为实现其摧毁陕北革命根据地，使北上红军主力无立足之地，进而达到全歼红军的目的，于7月中旬就开始部署了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9月，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指挥东北军的于学忠第五十一军，董英斌第五十七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及何柱国骑兵军第四军11个师，晋军孙楚部5个旅以及陕北军阀高桂滋、高双成的第八十四师、第八十六师等部，采取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妄图将红军围歼于保安、安塞地区。

根据情况，红十五军团商议了一个“围城打援”的作战计划。第一仗

便指向劳山。

刘志丹无疑被称为陕北的“活地图”。而程子华和徐海东又是红军的军中之花。正如徐向前所说：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都是我所熟悉的红军将领。在那血与火的战争岁月，我们曾并肩战斗，出生入死，休戚与共。革命之情，莫此为甚。他还讲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二十五军经历了极其艰难，曲折而又光辉的战斗历程，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然而，就在红十五军团进行劳山战役时，陕甘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使一批同志遭受到了无辜的迫害，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三

王明“左”倾路线所制造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在红十五军团中也严重地存在。

一孔大窑洞里，20多名军人、地方干部正在开会。

有人站起来了：“目前，革命形势大发展，我们要攻打大城市了……”

刘志丹忧郁地摇摇头。

“嗯？”那人问道：“刘志丹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吗？”

刘志丹为难地站起来，看看大家，然后，诚恳地说道：“我看革命还处在低潮。您刚才讲的那一套，过去我们听得多了。它是空想，不实际，已经对革命造成过严重的损失……”

“住口！”报告者火了：“刘志丹同志，你要注意，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散布反革命言论！”

会场气氛异常紧张。

戴季英已经掏出了手枪。“不把刘志丹等人除掉，我们的路线就无法贯彻。”他不止一次地说过。

看来，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三位中央委员会代表朱理治等流落到陕北。当年和刘志丹有过分歧，他们都对刘志丹怀有敌意，试图把他赶下台。他们声称，刘志丹与国民党

有秘密接触。实际是，刘志丹同打进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共产党秘密党员保持联系。

那是 10 月 5 日，西北代表团、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西北军委、陕西省工农兵民主政府，由永坪镇迁改瓦窑堡镇，组建瓦窑堡市党政机关，崔田夫同志兼任市委书记和市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一日，眼见山路上扬起一股黄尘。

刘志丹和路四骑马回来。一个通信员骑马迎面而来，见是志丹，忙下马敬礼：“刘副军团长，我正要到军团部去送信呢。就不用去了，给你吧。”

刘志丹打开信一看，顿时愕然。

信中附有逮捕西北红军领导人的黑名单。第一个就是刘志丹。

通信员见状，问道：“刘副军团长，你怎么了？”

“没有什么。”刘志丹说着，把信折起来交回通信员，“请你把信直接交给军团长。说我去瓦窑堡了。”

通信员接过信。“是！”立正行礼后，又搔搔脑袋，最后迟疑了一会儿，上马走了。

路四问：“老刘，那是什么信？”

“关于肃反的信。”刘志丹轻描淡写地说。

“路四，前方打仗用人，你回前线去吧。”志丹说。

路四见刘志丹紧皱着眉头，心事重重的样子，知道情况有变。“不行，你一个人怎么去呢？”他说。

“最近听说瓦窑堡搞肃反，冤枉了好多人。你在红军里，谁也不敢动你一根寒毛。可你去了那边，太危险！”路四说。

“正因为危险，正因为事关大局，所以我要去。要去说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同志，迷途知返，改弦更张……”刘志丹越说越激动。

“你这是向火坑里跳啊！”路四说。

“老刘啊，听我一句话，千万别去瓦窑堡。算我求你了。”路四说。

刘志丹一笑：“你别怕！”他说：“多少次走南闯北，不都是我一个人，怕什么。”

“你回去告诉大家，一定要搞好和红二十五军的团结，坚决拥护服从徐海东军团长的领导。全力粉碎敌人的‘围剿’这才是大事！”他看着远方。

“那，我跟你一起去。”路四说。

志丹又笑了。“不用了。你快回前线，告诉同志们。去吧。”志丹催他道。

“可你……”

“快回部队，”刘志丹说罢，挥鞭催马赶往瓦窑堡。

街道上，不断碰上乡亲们。刘志丹跳下马神态自若地打着招呼。

“啊，老刘回来了！”

“老刘回来了！”

人们高兴地纷纷跟着来看老刘。

到了西北保卫局门口，戴季英一见刘志丹，忙上前迎接：

“老刘啊！回来啦！……一路辛苦。啊……会议要开始了……来了就好。”伸手接马缰。

刘志丹没理碴儿，边向树上拴马边说：“戴局长，你这里的气味不对呀！”

“没有什么。没什么。”戴季英忙掩饰地说：“因为军事会议，事关机密，所以得有点警惕性。”

“可不能神经太过敏了。”刘志丹拴好马，转过身来，“听说你们在后方搞肃反，乱捕人，冤枉了不少好同志。”他说。

戴季英忙解释：“哪里，哪里，没有的事。请！”说着，伸手示意：“会议室在里边。”

刘志丹迈步进了门，穿过前院，来到客厅。见里边静悄悄的，空无一人，转身问道：“人哪？”

戴季英只是阴笑着不回答。

“戴局长，你们搞什么鬼名堂？”刘志丹说。

戴季英见他如此镇静，镇定得近乎狂妄，他顿时恼羞成怒，当场变脸：“刘志丹，你可知罪？”

刘志丹严肃地问道：“领导通知开会，我来报到，何罪之有？你们设圈套，诬陷干部，分裂红军，是何居心？前方在打仗呀。而且，战斗又异常艰苦，我们……”

戴季英不耐烦地打断他：“别再唱高调了。刘志丹，你同国民党军队相勾结，要干什么？老实交代！”

刘志丹气得说不出话，过了很久，他才问道：“交代什么？我刘志丹是中央军委任命的干部，你凭什么审查！走，咱们找省委领导……”

“哼！”戴季英一挥手，从后面上来两个大汉，用一个大麻袋，把刘志丹从头上套了下去……

这时，大门口一群百姓有的拿着红枣，有的拿着鸡蛋来看望老刘。

警卫员说：“刘志丹没来。”不让进门。

有一老汉说：“我明明看见他进来门嘛。”

“没来。”哨兵说。

突然一声马嘶鸣。

“这是老刘的马，我认识。”

“快，把那匹马关起来。”有人指示哨兵。哨兵牵马。一群人围了上来。“怎么？老刘……”

“我们要见老刘！”

“老刘！”

“老刘！”

整个院子乱成一团。

米粮山监狱里已经关起了很多人，其中有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瑞、杨森、张仲良、黄罗斌、王据德等人。

刘志丹万万没想到，他自己亲自去“报到”，以为会消除他们的疑心。然而，这些保卫人员竟把他就这样关进了牢房。他们怎么不想一想，真是国民党特务早就逃跑了。哪会自己送上门来。真是疑心病迷住了人，他想。他望着黑沉沉的天不仅担忧着牢里的战友，更操心着前方的战火。这一黑一红非把他的心给熬煎烂了不可……

1984年时，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已经是个56岁的老人了。她身材纤细，有着她父亲那双炯炯的大眼睛和高高的颧骨的一张圆圆的小脸，口才也像他父亲一样很好。她讲了当时她知道的情景。

1935年时小力贞仅5岁，但没有忘却那年的9月和10月。她和母亲到关押刘志丹的地方，站在外边，希望能看他一眼。但失望而归。

主持肃反的人是不愿人们知道抓起了谁。连马也关了起来。当囚犯押解过街时，犯人头上都套上一个布罩。

一天，这位5岁的小女孩和她的妈妈从一队蒙着布罩的犯人身边走过，听见其中一个人咳嗽了几声，她们觉得咳嗽的人就是刘志丹。

又一天，小力贞和她的母亲一道去看瓦窑堡城门附近挖好的大坑。听人们说，犯人将会活埋在这里。还有的人说把他们枪毙或砍头之后，这个大坑将成为他们的集体墓穴。

这是在封闭的阴谋政治圈里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又一个例子。

父亲从监狱里被释放之后，刘力贞只见过他一面。她回忆说：“我觉得陌生，过了好长时间才敢走近他。”

“那时他脚上曾带过镣铐，所以行走很困难。”

是啊，刘志丹当然想不到。因为他与他们没想到同一条思路上去。他们把他的赤胆忠心、大义凛然的革命行动，反诬为“看了逮捕名单而不逃跑，是以狡猾的手段、骗取党对他的信任。”

更可恶的是西北代表团的成员及其保卫机关进一步的诬蔑刘志丹同志，“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整营整团地歼灭敌人，解放6座县城、纯属反革命欺骗党和群众耍的花招。”……

这真是古今中外荒谬绝伦的奇谈怪论。

刘志丹同志及数百名军政指挥员和党政干部蒙受着不白之冤，带上手铐脚镣，在牢狱里忍受着肉刑拷打，百般折磨。他们指名硬逼，要受难者们招供刘志丹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

就在这时，红十五军团在强攻套通镇土围子。7月5日郭述申同志率领八十一师，由关家沟、雷家沟、高家哨一带出发，急行军赶到富县套通原上。部队没有来得及吃饭、休息，敌情不明，地形没有勘察，就命令强攻套通镇土围子。镇周围是平原开阔地，秋庄稼收割完毕，毫无隐蔽接近敌人条件。部队没有做任何战前准备，就命令二四三团向土围子进攻。结果再三受挫，毫无进展。团长李仲英负伤，部队攻不上去溃退下来，伤亡很大。师部无可奈何地又命令二四一团政委李赤然（因团长刘明山在劳山之战中被诬陷撤了职）带队进入交战。以很大的伤亡代价，才攻到距敌土围子二三百米的开阔地。李赤然也负伤，昏厥于阵地上。部队反复进攻。屡攻不下，才被迫撤出战斗。

红八十一师在这次无准备的战斗中伤亡比劳山之战要大一倍多。

打套通镇后第一天（10月9日）晚上，郭述申把贺晋年、张达志、任浪花叫去汇报后，将参谋长任浪花留下逮捕审讯。

这场强攻土围子战斗，就是为了能够顺利逮捕刘志丹，逮捕红七十八师营以上军政指挥员，逮捕陕甘边县以上革命干部，才把八十一师拉开，去打毫无所得、伤亡极大的战争的……

也有人后来说：瓦窑堡城门附近挖好的那个大坑，差点成了他们的集体墓穴。那次是毛泽东挽救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人员的性命。要不是他在关键时刻赶到，并亲自派人到瓦窑堡营救，刘志丹和他的同志们当时就厄运难逃，人头落地了。

第十一章 毛泽东 刘志丹

毛泽东的出现是历史的巧合吗？如果没有西北红军和陕甘苏区，如果没有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出现，历史将会怎样演绎她后来的壮丽。

毛泽东在陕北出现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救了一个刘志丹。

听见崖畔上马蹄子响

扫炕铺毯换衣裳

—

1935 年秋。

甘肃哈达铺。

傍晚时分。

长征途中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刚刚宿营。拄着拐杖的老人谢觉哉睡不着，他心里有事。他来到一个小摊前买烟叶。

摊主称好烟，撕下半张报纸包好，递给他。谢老付了钱，坐在一边打开纸包，取出烟斗，装了斗烟，抽了起来。无意中看那报纸，看着、看着，老人突然一震，急忙站起来奔向烟摊。

他向摊主求要另半张报纸。

“你老人家买这旧报做甚？”摊主不解地问他。

“自用。”谢老说着，付了钱，接过报纸，细细地看起来，像要把每个字吃进肚子。

这是一张民国 24 年 7 月的一张《晋阳日报》。

显然报纸的吸引力太大了。谢老边看边走，越走越快。

窑洞里。

林伯渠和几位老人正在商谈着。

“在过了大雪山以后，毛泽东同志给咱们说了，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我们年纪大的人，行动不便，到甘肃以后，可以自找掩

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林伯渠说。

另一位老同志忧虑地说：“我们的事好办。可长征没有落脚点，伤病员没有休息的地方，部队得不到给养，这该怎么办？总不能永远走下去。”

又一位说：“是啊，这可是大难题了。”

谢觉哉一把推开门：“你们看，陕北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还在啊！”

“什么根据地？”林伯渠一时糊涂地问。

谢觉哉拿出那张旧报纸。“这是国民党送来的礼物呀。”他激动地念报：“陕北赤匪刘志丹部已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2万余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

“咱们只顾长征，没有听说，陕北红军的力量那么大呀！”林伯渠高兴得要挥拳头了。

“我猜想，这也许是阎锡山的自卫破蒋计！”谢觉哉若有所思地说。

“什么自卫破蒋计？”林伯渠又摸不到老谢葫芦里的瓜子了。

“最近，蒋介石用调虎离山计，要消除阎锡山的军事实力，调阎锡山到南京当行政院长，把他架空。阎锡山则在他的报上登载陕北红军势力，显示他不能离开山西。这张报，造舆论，岂不是阎锡山的自己破蒋计吗？”谢觉哉一眼一板地分析着。

“对，对！”林伯渠说：“有道理。可你对刘志丹红军怎么看法？”

“陕北的红军根据地不但存在，而且正在发展……”

几个老红军高兴地站起来：“来，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率领红军到了哈达铺，下一步要去哪？他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是的，他们还要北上，去甘肃、去陕西，甚至去宁夏，他们要去打日本。但这些都只是笼统的方向，不是确定了目的地。长征以来，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自己只大略地知道他要去的方向，但缺乏具体的目标，此时也是如此。

不过，在距江西的出发点成千上万里之遥的哈达铺，长征确切的目标已在日渐明确了。

红军先头部队在攻占哈达铺时果断地拿下了邮局，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占领的第一个邮局。

毛泽东也在看报。周恩来、彭德怀，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国民党的报纸。就这样，毛泽东和他的指挥官们兴致勃勃，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报纸。

证明他们早些时候在两河口会见张国焘时所听到的传说居然是真的：陕北不但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片苏维埃根据地，而且毛泽东的朋友，著名的群众领袖、英勇无畏的红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仍然活着，统帅着他的部队。红二十五军的徐海东也在这里。

毛泽东高兴地说：“看起来，刘志丹在陕北开辟的根据地，现在依然存在哟！”

周恩来和彭德怀边看《山西日报》边议论，看得出来，他们都很兴奋，乃至亢奋着，谈兴也愈浓。

林伯渠、谢觉哉闯了进来。谢老手里拿着那半张《晋阳日报》，嚷嚷着：“快看。你们快来看。”

周恩来拿起《山西日报》，“看到了，大喜讯嘛！”

“是啊！”毛泽东笑着看他们，然后眼望窗外，说道：“转战万里的红军，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可真不容易！”

谢觉哉则说：“主席，那让我们几个老头子离队的设想……？”

“哈哈——”毛泽东笑了，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谢老哟，有了落脚点，不仅用不着你们离队，有许多事情，都得重新考虑了！这样吧，明天，开个团以上的干部会。也请你们参加啰！”

红军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终于获得了解决。

10天之后，毛泽东在榜罗镇公布了他与陕北红军会师的计划。部队集中起来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及高级指挥员的会议。然后，政工干部分别向所在地部队讲话作宣传。毛泽东也讲了话。他讲了抵抗日本侵略和陕北根据地的问题，讲了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从根据地加强纪律等问题。各级政委们当天就向部队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讲话。

根据各种回忆录和采访资料看，这时的毛泽东开始越来越强调抗日的

路线了。

就要到家了，红军已踏上了家乡的土地，正朝着自己的同志和根据地前进。他们面前只剩下 1000 里的路程了。他们心里有多么激动，他们的情绪又是多么亢奋！诚然，在同四方面军张国焘发生冲突之前，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希望。但是，他们感到这次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毕竟经受住了在与张国焘分裂问题上发生的危机，证明红军仍然是一支活跃的有生力量。他们虽然只剩下了 6000 人——可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一年多来，他们征战南北，含辛茹苦，做出了重大牺牲。他们克服了重重障碍，种种苦难，在大半个中国传播了红军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他们不再是一伙在蒋介石的精锐部队面前衣衫褴褛，争吵不休和狼狈逃命的人。他们将把长征转变为胜利。他们已找到了家园。长征已不再是退却，不再是连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东躲西藏。家园——为 6000 饥肠点燃的灶火，崖畔上掘出的窑洞，一群扎白羊肚子手巾的汉子，唱着信天游的毛眼眼婆姨们——将是他们最温暖的家！

这一切变化都发生在他们渡过金沙江之后，战斗的主动权已不在国民党一边了。毛泽东领导的部队组织严密，上下团结，能征善战，有共同的精神和目标。

这一切变化都因陕北有个刘志丹，刘志丹领导的陕北。它是中国革命的一颗红色的火星，毛泽东将让这星星之火，燎原整个中华大地。

此时，毛泽东的队伍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干部，普通战士幸存无几。这些干部深信中国必须进行一场革命，他们就是这场革命的核心力量。

其时，这种想法在最后 1000 里的长征途中举行的集会和毛泽东的讲话中已见端倪。正如毛泽东在哈达铺所说的，我相信所有的“指挥员们、战斗员们在经过了兩万多里的长征的洗礼和战火的考验之后，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将会以你们的勇敢无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我们的目标——完成长征北上，打击日本侵略者。”

第二天，照例是早晨 6 点钟，这支红军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下，向北进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通渭。

在那里，那天晚上，在通渭城的中心广场举行集合。毛泽东又进一步

进行了政治宣传鼓动工作。

广场事先搭好了一个讲台，四周红旗飘扬。驻扎在城里的所有部队都集合在这里，杨尚昆、保卫局局长邓发和参谋长叶剑英分别讲了话。他们高唱《马赛曲》。会后，举行了这个城镇空前盛大的宴会——大小盘子中盛满了猪肉、牛肉、鸡肉；还演出了文艺节目。李克农和袁欣为大家唱了歌，表演了魔术。

红军向北疾进，他们遭到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马家军骑兵的骚扰，但他们克服了。一天下午，他们越过西（安）兰（州）公路，翻过高达 11000 英尺的六盘山，然后，在山的另一边宿营。毛泽东曾写下这样不朽的伟大的诗句把此次壮举和抱负描述一

清平乐·六盘山

一九三五年十月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10 月 14 日或 15 日，正当他们即将离开环县的羊肠小道，到达陕西边界的时候，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看到了 5 个人骑着马朝他们奔驰而来。

那 5 个人个个身强力壮，年纪不大。身挎驳壳枪，头缠白头巾。

到了面前，5 人急忙翻身下马，开口便问：“毛主席在哪里？”

陈昌奉问他们是谁。

其中一个人说：“老刘派我们来给毛泽东递交一封信。”

另一个人问：“他在哪？”

据陈昌奉说，他们是红军二十六军军长、毛泽东的朋友刘志丹派来的代表。

毛泽东会见了这几位代表，然后，走到一些正在休息的红军连队前，大声地告诉他们，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的代表来欢迎我们了。我们即将进入陕甘苏区了。

一片沉寂后。

一片沸腾。

二

1935年10月19日傍晚，毛泽东的队伍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地处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吴起。

他们的北面是万里长城、南面是华夏祖先黄帝的陵墓。在黄河以南的这片黄土高原上，在这场中华民族发祥的土地上，红军找到了自己的家——

他们在贫瘠的吴起，在黄土窑洞里，找到了自己的家——

在未来的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将越来越习惯于窑洞生活——

他们将终生吟唱信天游，惦念小米饭。

是时，马家军骑兵东闯西窜，仍不断骚扰红军后续部队。

彭德怀命令战士们加快前进。他不愿让落在后面的部队死在凶残的国民党骑兵手里。他们翻越了老爷山、子午岭，进入了陕西。在这里，再次与马家军骑兵交火。这一带的地势比较平缓，利于骑兵活动。红军被搅得不得安宁。彭德怀快刀斩乱麻，指挥部队临阵不乱。顽强无畏，击溃了马家军。毛泽东曾当时赠一诗与他。

给彭德怀同志

一九三五年十月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惟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到达吴起镇的当天晚上，就亲自召集指挥员开会。他建议彻底“砍掉这条尾巴，即马家军骑兵，结束几周来红军所受的骚扰。”

10月20日，毛泽东对红军和吴起地区游击队进行了部署。这里有三条河流穿过吴起，毛泽东将他的部队部署成半月形，引诱马家军骑兵进入中间的洛河河谷地带。

10月21日凌晨，毛泽东进入大马梁山顶上的观察位置（山顶至今仍有一棵孤零零的树作为标志）。

马家军骑兵共4个团，每团约1000个，他们首先发起进攻，进入了河谷。毛泽东的部队人数不比他们多多少。

上午7时，红军向马家军骑兵主力团开了火。不到两小时，马家军骑兵主力团及其他3个团都从战场上落荒而逃。

那天战斗后的下午，毛泽东会见了两位地方领导人，听完他们的汇报后，毛泽东立即叫来两名可靠的干部——贾拓夫和王首道。派他们带一连行动迅速的战士，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瓦窑堡。他们的任务是：救出二十六军领袖刘志丹及其同志们（数目不详）。他们正坐待被枪毙或活埋的命运。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后，阵容大振。坐镇南京的蒋介石闻讯后惊恐万分，急忙增调兵力，加紧了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会师后的红军，首先需要巩固住陕甘根据地，否则长途跋涉一年之久的中央红军，便无法在陕北站稳脚。所以，毛泽东一到陕北，即首先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计划，这就是记载于史册的直罗镇战役。

11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率红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来到甘泉左铺红十五军团团部，与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研究作战问题。之后，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又亲临前线，指挥了这次战役。徐海东将

军这样回忆道：

“1935年11月下旬，陕北已经进入了寒冬。红十五军团在‘打胜仗迎接中央红军’的口号下，一鼓作气，攻下了张村驿，打开了东村，接着扫清了附近的两个小据点。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率中央红军来到了东村一带。从此，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会师了。红十五军团的全体同志，都为这个光荣的会师欢欣鼓舞。大家日日夜夜盼望着的中央红军现在来到我们身边了。”他接着说道：“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消灭红军计划的破产，预示着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为了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大西北，毛泽东一到陕北即首先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计划，这就是直罗镇战役。”

陕北的战局当时是：陕北红军取得劳山榆林桥胜利后，敌人以5个师组织新的进攻，东边1个师沿路川、邠县大道北上；西边这4个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邠县方向前进。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第三天下午，敌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带着部队在6架飞机掩护下，果然来到了直罗镇。

“神了！真神了！”红军战士们情绪高涨。

“把敌人放进直罗镇，再消灭它。”这是事先毛泽东布置的。为了防止敌人利用镇东头的寨子做固守的据点，大家商讨后，决定把它预先拆掉。布置确定后，当天晚上，红十五军团派出一个营，连夜拆那个小寨子。这时战斗命令虽然还没有下达，但战士们凭着自己的经验猜测到，将会在这里打仗。有的战士悄悄地问：“敌人真的会来吗？”老战士回答说：“会来的，这是毛主席算好了的。”

晚上，夜似乎刚静下，人的心却奔腾着。毛泽东下达了命令：按照已经确定的部署，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连夜急行军，在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毛泽东的指挥所设立在距直罗镇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战斗打响之前，主席就特别指示各部队负责同志，一定要打歼灭战。战斗发起后，主席又一再嘱咐说：“要的是歼灭战！”

天刚亮，两路红军像两只铁拳，从直罗镇南北高山上砸了下去。敌人虽有防备，却没有想到我军会如此迅速。乃至发觉被包围后，直罗镇两边

的山岭已被我军占领。南面一响枪，敌人立刻向北撤，北边一响枪，他们又反过来向南扑。敌一〇九师是东北军的部队，是红军的老“运输队”了。有不少的士兵和军官曾经做过红军的俘虏，有的还不止一次地交过枪。现在，一〇九师被夹击在两山之中一条川里，山谷中到处是枪声和喊杀声。在我军猛攻之下，纷纷瓦解，交枪投降。一些拼命顽抗的，丧身于刀枪之下。

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军两路会攻，占领了敌人的指挥部所在地直罗镇。最后牛元峰逃到镇东头的小寨里，指挥着一个多营的人负隅顽抗，死不投降。

这个小寨虽然被我军事先拆毁，但敌人昨天下午到达后又连夜改修，加上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我们派了一支小部队攻了一次，没能打上去。正组织第二次猛攻，通信员报告说，“周副主席来了。”

周恩来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枪声渐渐地平息下来。

两边的山坡上、镇子里，到处堆积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到处聚集着俘虏兵。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个红军战士心里。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在讲述着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来自鄂豫皖根据地的战士，都倾吐着渴望会见老大哥的心情。欢乐和友情，笼罩着战场。

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这时候正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要求董英斌解围。他哪里知道，董英斌派的一〇六师还没有到直罗镇，就被红军击溃了，并且在黑水寺被红军消灭了一整团。

晚上，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领残部突围向西逃跑，我七十五师的战士，随即跟踪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追回来。”

一气追了 25 里，追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上，牛元峰和他率领的残部一个多营最后覆灭了。

“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于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

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直罗镇战役，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伟大的、正确的军事思想。一〇九师全师和一〇六师的一个团覆灭，彻底打击了敌人进攻陕北的部署。迫使敌一〇八、一一一师不得不退回了甘肃境内；东路侵入杨泉源的一一七师也退出鄜县。陕北根据地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携带着胜利品，押解着俘虏，撤离了战场。晚上，当战士们路过毛泽东主席住的村庄时，只见主席住的窑洞里还点着灯。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从而使得中央红军在陕北初步站住了脚跟，并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奠基礼。

三

夜晚的街道上静悄悄的。

几个百姓边走边商议。

“有些人为了争权，什么事儿也敢干！大家都说，有人要害志丹哩。”

“天大大，这该怎的办？”

“我找过王书记了，他叫我再找贺团长、张团长……我看，咱拼上命，也不能让他们害死咕老刘啊！”

……

突然，一声叫喊：“抓住这几个反革命！”

几个人见势就跑了。

还有一个据理力争。一条黑毛口袋，从这人的头上套了下来，抓上走了。

吴起镇后山上，“割尾巴”战斗的硝烟未散。

打完直罗镇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

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日，街道上，同样行人稀少。

一孔窑洞前，挂着工农民主政府的牌子。

一队中央红军的战士见了牌子，高兴地跳着：“到家了！到家了！”

有人流着眼泪摸牌子。

有人高兴地唱歌跳舞：

长征找到了落脚点，

红军个个笑开颜……

谢觉哉说：“找到了落脚点，心里踏实了。昨夜睡在麦草里，也觉得温暖。偶得一诗……”

“念念，念念。”林伯渠怂恿道。

露天麦地覆棉裳，

铁杖为桩系马缰。

稳睡恰如春夜暖，

天明始觉满身霜。

中央红军来到陕北，并非处处都是危机，有时也有人间趣闻逸事。毛泽东越来越爱开洛甫和刘英的玩笑，并动员他们结婚。

刘英和洛甫一起到达瓦窑堡后，就决定结婚。“从渡金沙江以来，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刘英后来回忆说：“但到了陕北之后，我们才生活在一起。”

他们本来不举行婚礼。“我们太穷了。”刘英说。由于毛泽东对他们的婚事感到非常高兴，并要他们举行一个招待会。“这样才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但未设盛宴。”

当然，陕北也有悲剧。

红军刚刚到达吴起镇（也叫吴旗镇），赫赫有名的突击团——一军二师四团的指挥员杨成武和王开湘就患起伤寒。王比杨更严重。仅仅几天之后，王开湘在持续高烧（温度高达摄氏 40 度）、神志昏迷的情况下，从枕下抓

起手枪，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脑袋。

吴起镇后山的监门口，几百人的红军干部、战士和乡亲们要见老刘。

“刘志丹是反革命，不能见！”

“你才是反革命！老刘不顾死活，领着大家，打土豪、分田地，哪一天不在为穷人老百姓谋利益？”

“国民党军阀抄了他的家，到处悬赏捉拿他，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国民党奸细？”

“有人想当西北王，把老刘当成眼中钉！”

“不行，我们要见老刘！”

……

吵着、嚷着，众人拥着铁门，迎着刺刀往里挤，人越来越多……

毛泽东虽找到了家，但斗争并未完成，同敌人的斗争，红军队伍内部那种随意发动，有悖常理的斗争都不会完结。但是，就在这片沟壑遍布、河流干涸、狂风怒号、红沙飞扬的黄土高原上，毛泽东和共产党将深深地扎下根来。他们在陕北安了家。不是只呆一周、一月或一年，而是住许多年，那时恐怕连毛泽东本人也不知道会住多少年。

毛泽东尚未完成聚集力量的任务。但是，他预料队伍将迅速扩大。他想，不久，由贺龙和肖克率领的红二方面军，由难驾御的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以及编入红四方面军的毛泽东自己的那些部队，还有朱德和刘伯承等指挥员都将来会合。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

12月的一天上午，阳光明媚。

毛泽东的砖窑院，整洁安静地罩在如洗的阳光里。

周恩来领着刘志丹走进大门时，毛泽东迈着大步，从窑门里迎了出来。

周恩来紧前一步，介绍道：“这是毛主席。他是刘志丹同志。”

刘志丹上前，立正敬礼。

毛泽东拉住刘志丹的手，热情地说：“志丹同志，我们找你可费劲啰！”

刘志丹热泪盈眶。他说：“主席，你好啊！我们终于盼来了主席！盼来了党中央！我们真高兴！党中央和毛主席救了我们，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啊！”

毛泽东说：“志丹同志，感谢你们！是你们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有了落脚点。是我们回到了家嘛！”

刘志丹笑了。“这是谢子长和我们一起创建的。他……”志丹说。

“知道。我们这立足之地瓦窑堡，就是谢子长的家乡嘛。可惜，他过早地去见马克思了。”毛泽东说；说着，主席看了看志丹那消瘦的身体，“外面冷，快回窑里坐，里面有火。”

进了窑，毛泽东又诙谐地说：“革命道路是曲折的，对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锻炼啰！说着，爽朗地笑了。

刘志丹也笑了。他红着脸诚实地说：“主席，我已经坐过两次国民党的牢，对我来说，坐牢不算什么。”

周恩来看了看志丹身上的伤痕，风趣地说，“你看看，‘左’字号的监狱，也厉害嘛！”

刘志丹笑了：“也没什了不起，我不是好好的吗？”

“不，还是吃了亏的。”周恩来指着刘志丹脚上被铁镣磨破的伤痕说。

刘志丹掩饰地盖住伤痕，转移视线。说：“我年轻，吃点亏，没什。主席、副主席经过万里长征，身体都吃了大亏。陕北的条件不好……”

毛泽东插话说：“陕北地方穷，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儿闹起农民革命的嘛！……”你们搞得很不错了。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也好，搞革命，是块好地方……”

毛泽东的窑洞里温暖如春，不时传来浓重的南方口音和北方汉子爽朗的笑声。

炉火越烧越旺，把他的脸膛照映得红扑扑的。

这难道不是黄山坳中最亮丽的一片红色风景吗？！

毛泽东的出现是历史的巧合吗？

如果没有西北红军和陕甘苏区，如果没有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出现，历史将会怎样演绎她后来的壮丽？

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也不承认预测的，她是天衣无缝的。

当然，毛泽东在陕北出现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救了一个刘志丹。

第十二章 东征

志丹在东征中牺牲了。他不该死得这么年轻，他率领的队伍正长着羽毛。

他咋走得这么匆匆，就一去不再回头……

黄河啊，不向东流向西流

老刘啊，你咋就一去不回头

—

夜。

冷目西斜。

同桂荣坐在灯下做棉鞋。一针一线，专注极了。5岁的刘力贞站在门口等爸爸。

“贞贞，快进来，门口冷哩。”

“不。”力贞摇着羊角辫，“我要等爸爸一搭进去。”

“你爸整天价不沾家，等也白等！”同桂荣下了炕！“你看看，月儿都乏啦，脑袋袋都快枕到山头头上啦！”

小力贞望着天空出神。“星星还眨眼睛哩！”

这时，刘志丹悄悄地进了门。他抱起女儿：“好女儿。等着了。”说着用胡子扎她。

“爸，你的眉毛胡子上全是冰碴碴，冷死人咧。”

“看把你冻成啥样了，快到炕上去，暖和暖和。”同桂荣说。

刘志丹上了热炕，抱着女儿。心里满足地笑着。

同桂荣见他那身子骨越来越瘦弱了，就嗔爱道：“看把你累成什么了，好好呆在家里，歇上几日嘛。”

“我没什。”刘志丹卷着烟叶：“毛主席他们长征了二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的。可一到咱陕北，又日夜操劳。到现在，还穿着单鞋哩。哎，

你给毛主席的棉窝窝做好了没？”

同桂荣递给刘志丹一只棉鞋：“你看看，这一只已经好了，这一只差几针了。哎，不瞒你说，为做这双鞋子，我已经拆了好几回了。怕针码子不匀，主席笑话哩。”说着竟腼腆地羞红了脸。

志丹心里一热。“嗨！千层底子新毡垫，厚帮高鼻羊绒棉。好啊，好啊。”他不住夸口。

“对了，这些材料，你是从哪搭弄来的？”志丹问。

“乡亲们听说俺给毛主席做棉窝窝，可高兴了。他们夸我有福气。大家送来棉花，有的送来羊毛毡，还有的送来新鞋面。这可是咱陕北乡亲们对毛主席的心意啊。我只怕手笨，没做好，毛主席嫌弃……”同桂荣动情地说着。

刘志丹激动地安慰着她：“你放心，毛主席不会嫌弃的。”

二

1936年2月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东征宣言》。接着，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挥戈东征。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兼任总政治委员，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红三十军，开始了浩浩荡荡的东征。

刘志丹任二十八军军长。他率领部队将于罗峪口过黄河。

执行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向东求发展，当然也不是很容易的。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他从清朝末年在山西当都督到民国当省主席和绥靖主任，统治山西几十年，他有他的社会基础。阎锡山当时有部队8万人，有自己的兵工厂。他一听说红军到了陕北，他就沿黄河东岸10多个县，构筑了高碉暗堡，在山西普遍推行保甲制度。

1936年3月31日拂晓前，刘志丹、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渡河东征了。

第一个胜利传到后方时，根据地的军民沸腾了。

“咱们老刘又打胜仗了！”

“咱二十八军过河后没停脚就从罗峪口打到黑峪口，向东打到兴县，回头又南下打下康宁镇、北文镇了。”

“听说咱们志丹过河时把被子掉到河里去了。”

同桂荣挤过来：“那可盖啥呀？”

“哈哈——”一位老大爷一抹胡子，笑着说：“盖周副主席送他的那件灰棉大衣呀。人们都说那是火龙衣，咱们志丹穿上不但暖和，还刀枪不入哩！”

同桂荣也笑了。

另一个人说：“毛泽东从南向北打，咱老刘从北往南打，还要在河东，来个大会师哩。”

群众欢呼着，刘志丹的女儿小力贞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有人又唱起了信天游。

正月里来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一心闹共产。

二月里来刮春风，

江西上来了毛泽东，

毛泽东来势力重，

他坐上飞机在空中

后带百万兵。

.....

其实，就在 1935 年 12 月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的党中央，正在酝酿着重大军事行动——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的时候，张浩接受共产国际的委派，带着密电码，从苏联回国来到陕北。

当时，敌人对根据地进行了严密封锁，密电码不能随身携带。阎红彦以惊人的毅力，硬是将用英文组编的密电码背了下来，刻在脑子里。在瓦窑堡，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报告了带回来的密电码。

阎红彦到陕北后，中央考虑到他是陕北人，曾转战陕甘边，对黄河两岸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熟悉，便交给他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组建黄河游击师。

严冬的陕北，朔风怒吼，大雪纷飞。阎红彦领受任务后，日夜奔波于清涧、延长等地，联络分散在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和游击小组，把他们集中起来。中央任命阎红彦为师长，蔡树藩为政委，游击师的主要任务是：警戒清涧、延川一线黄河沿岸，保卫党中央和陕北省委；协助周恩来同志为红军东征准备过河的船只和器材。

阎锡山为了阻止红军东征，把所有的船只都抢到了河东。红军要出征，必须首先解决渡河的船只。阎红彦和地方党的负责同志一起，动员组织群众，砍伐树木，打制铁钉，日夜赶造船只。阎红彦对船工们进行政治动员说：

“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卖国，不许我们东进抗日，要把我们阻止在黄河以西。我们就是要打过黄河去，讨伐阎锡山……”

船工们在他的鼓动下，情绪高昂，表示一定要把红军送过黄河去。

1936年2月20日，红军抗日先锋军强渡黄河，突破敌人的防线，进入山西。

第二天，阎红彦率领黄河游击师也渡过了黄河，有力地配合兄弟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保障了东征红军与陕北苏区后方的通道。

不久，黄河游击师奉命改编为红三十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

黄河口。刘志丹在枪林炮火中站在队伍最前面。

诗人贺敬之写下这样诗句歌颂道：

刘志丹啊刘志丹！

千军万马过了河，

先锋部队爬上山。

白军的哨兵消灭掉，

问“口令”：

“——抗日救国英雄汉。”

“哪部分？”

“——工农红军刘志丹！”

刘志丹啊刘志丹，

黄河挡不住，

高山防不严；

刘志丹啊刘志丹，

英雄挺胸站，

西北红半边；

刘志丹啊刘志丹，

过黄河，马加鞭，

军号响，炮声喧；

——从今后，踏破河东千里地，

红旗飞过万重山！

.....

三

渡河中必须进军神府，这一段路约有五六百里，从未打通过。特别是自打去年9月闹“肃反”之后，阎锡山又进来捡便宜。井岳秀、高桂滋都活跃起来，把红区又变成了白区。这一路的敌人据点，还密如蚁穴鼠洞，到处都有。

红二十八军是一支新军，要长驱直入神府，就得挥戈征战，开辟新区。

警卫员用盆打来一盆小米饭，刘志丹和宋任穷政委边吃边谈。突然，走进来个通信员：“发现敌人！”

宋任穷忙问：“在哪里？”

“西马家川。阎锡山的骑兵，还有史老咥的人，跟独立营已接了火。”

刘志丹果断命令道：“红二团压住红山庙，红三团压住李家寨子……”

不一会儿，那战士又闯了进来：“独立营和敌人争夺山头，敌人已接近红山庙。出门就能看见。”

“出发！”刘志丹带头冲了出来。

一团长黄志民听到命令，急往回赶。一团，二团，都急速往山上运动。

刘志丹喊道：“这个庙一定要夺下来！庙上住的全是婆姨娃娃，不打下来，这些婆姨娃娃不得了！”

红一团大都是绥德本地人，他们的婆姨娃娃、亲戚朋友，也有在庙上的，夺取庙的劲头很足。志丹话音刚落，矮小精干的一团政委王子新就带着部队拼命往庙上冲。

红军冲，敌人也冲，双方正争夺得激烈。

只见三团长杨剑骑着白马，挥起马鞭，踢土扬尘，冲上山坡。口中还喊着：“上！上！红三团好似猛虎扑食，奔向敌人。敌人也发了疯拼命射击，有几颗子弹飞到志丹脚下，“噗哧” 钻进雪窝。

刘志丹叫司号员：“吹冲锋号！”

刘志丹命令：“重机枪扫射！”

宋任穷：“迫击炮上山！”

迫击炮正在出沟，三团长杨剑冲劲儿过猛，迎上了枪林弹雨，被战士们抬了下来，藏在沟里，怕志丹看见。宋任穷望着对面山说：“红军的反冲锋被敌人压下来了。”

刘志丹：“史老咥是井岳秀收编的土匪，狡猾得很！”命令：“用迫击炮

射击！”

“噔！”炮手一推。

“迫击炮再射击！”

炮手又用尽力气发出第二颗炮弹。这一炮还真打得准，恰好打到庙旁，炸了！”

“第三颗！”

一声巨响。

“第四颗！”

全炸了。

敌人乱了阵脚。“红军打炮了！”“红军打炮了！”蚂蚁般乱了阵脚。

这里的敌人，还没挨过红军的炮。敌人急忙用骑兵掩护撤退。

“噔！”又飞去一炮。

马群里开了花。

马群乱蹿，把队伍冲得七零八散。

红军喊声连天，奋勇急追。

刘志丹走下山头。

“报告！”三团长杨剑同志牺牲了。”

志丹几步雨点子般扑向担架，蹲下身伸手摸杨剑，刚触到杨剑的额角，像触了电，手一哆嗦，立时泪如泉涌。志丹心里一酸，往事幕幕在眼前掠来晃去……

“二十八军又要打沙峁镇和高家堡了！”

人们奔走相告。

志丹坐在窑里和张武轩拉话，田耕等人也过来了。他心里不是滋味，舍不得志丹走。

志丹看出了他的心思：“这一段，你们受了累，做了很多工作，二十八

军的同志们都感谢你们。现在中央来电报，要二十八军配合一军团和十五军团行动……”

田耕只是嘟着嘴。

“我们不能把干部都带走，你们可是神府的顶梁柱呀。”志丹给全生使了眼色。

全生拿来1条“哈德门”烟，3双布鞋。

志丹说：“你的鞋袜那么烂，把这东西留下，留个纪念吧！我东征回来后一定来看你。还要吃你们的‘红豆钱钱饭’哩！”

山岭上，刘志丹和张武轩观察着苏区的景色。

风吹起了他们的衣角。

武轩说了后方的情况：“你走后，中央又通知徐一知，留他在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工作。徐一知说，他太年轻了，还是到下边好。中央只得维持原决定，仍派他到关中当特委书记去了。杨伟林已经到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上任。力坚调中央警卫部队当了政委，宝魁回二十六军骑兵团……”

1936年3月，将要进入“春风裂石”的季节。

在西北高原的老西北角上，黄水连着沙漠，春天来得和蒙古一样晚，连天的黄风飞舞，黄沙扑脸。刘志丹、宋任穷等冒着飕风，不分昼夜，率部东进。一路展开激战，横扫罗峪山，攻下兴县。回头又南下，打罢康宁镇，又继续南下，又打到北文镇。

根据各方面情报，战局又发生着急骤变化：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抗日，从河套又调来傅作义的六七万人，沿河南下。从南边调来嫡系李仙舟、汤恩伯、关麟征等的9个师，从晋军调出七八万人，企图对红军造成合围形势。这几路敌人，约有30万。

一切均在意料之中，红军早已发出宣言，要回师西渡。

如今敌人节节相逼，中央军委又发出急令：命二十八军从离石城向西南，到中阳县袭击三交、转角、辛关、义牒一带之敌，打通和陕北苏区的联系。保证背靠苏区，配合主力红军，向汾阳、太原迂回，然后回师。

太阳照着滚滚黄河，水花冲打着岸边的崖石，初春的早晨，仍然很冷。刘志丹到三交镇以南的东山上指挥部队。宋任穷留在指挥所坐镇。

突然，一个通信员发疯似的跑进指挥所，用他来不及喘息的音调喊道：“政委，军长——军长他——”

宋任穷跳起来，一把抓住他的前胸，“快说，刘军长他怎么了？”

“他，他……他牺牲了！”

“什么？别胡说八道了，带我去看看！”宋任穷一步冲出了指挥所。

宋任穷政委带着医生和担架赶到前沿时，所有的人正一齐脱下帽子，就像石雕一样，定在那里，动不得了。

宋任穷噙着泪，俯身跪地，解开刘志丹军长的棉袄，露出一件破烂得不能看的衬衣，那衬衣沾满了血渍。宋任穷的心头顿时发酸胀痛。掩上志丹的胸膛，摸摸衣袋，一把抓净，只有半截铅笔、半盒火柴、几根揉碎的烟头。一只怀表，是借参谋长的。

宋任穷脱下大衣覆盖在刘志丹身上！战士们纷纷脱下外衣；覆盖在军长身上！

整个阵地，沉痛无比，无声无息。

宋任穷一把抹在脸上：“继续总攻！”

……

这年5月，红军胜利结束东征，宣布回师陕北。

四

黄河岸边。

在两排战士护卫下，一副担架在缓缓地从陕北山村中走过。战士们无比沉痛的表情。

那位老艄公喊着：“我不相信是咱的老刘。我老汉不信哪！”

他扑过去，揭开粗布白布单，便立即跪倒在地，痛哭着。

当电报传到毛泽东手中时，毛泽东沉痛的表情一下子在脸上凝固了。

五

像一副不动的画卷。

陕北高原萧瑟的冬景显得更为萧条。

一切都沉寂无声。仿佛巨大的悲痛把整个高原震呆了。

山山洼洼上，沟沟壕壕里，都是饮泣的群众，人山人海。

突然间，百支唢呐悲壮地朝天吹奏。曲子是哀乐的雏形曲子。陕北最著名的唢呐曲牌《凤凤铃》。

按陕北乡俗，披麻戴孝的送葬队伍出现了。前列是披麻戴孝的同桂荣、刘力贞等刘志丹的亲属，后面是庞大的党政军送葬队。

送葬的人群中，传出了悲天撼地的信天游——

东征死了好老刘，

人人哭得不抬头。

细面长来白馍软，

端来碗就想起刘志丹。

眼泪顺着饭碗流，

世代代代想老刘。

.....

“你看看，刘志丹还是那一样一样的。”一位大娘挤到跟前，摸着志丹的相片。旁边的人经她这一说哭得更加悲伤。

是啊，刘志丹殉身以求的，就是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生活的改善，现在边区人民大众不仅有了政治自由，生活也比过去不知提高几倍了。他们当然不愿让他走，他们要他也过上几天好日子。他不该这么年轻就走了，他领导的队伍才长起了羽毛，毛泽东的队伍刚过来。他们要一同去打天下，使全中国的人民都解放，还要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为了纪念刘志丹、谢子长两位民族英雄，西北工委于 1935 年决定将陕

西省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1936年将陕西省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全国解放后，国务院、省政府拨款修建，扩建了两位先烈的陵园。

毛泽东为刘志丹题词：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

毛泽东为谢子长题词：民族英雄 虽死犹生。

现在刘志丹和谢子长大理石像正并排坐落在陵园中央。将激励后来人，用刘志丹的女儿的话说：她父亲生前没什么嗜好，只喜欢抽烟。刘志丹留下的惟一遗产是他的梢神。

而民族英雄刘志丹和谢子长，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缔造和捍卫了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这块当时全国惟一幸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毛泽东在这块土地上住了13年，这13年是中国革命的酝酿时期，也是孕育成熟的13年。延安——陕北，她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在这块黄山坳中，有一片永远壮丽的红风景。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一日北京

附录:

刘志丹年谱

刘志丹，名景桂，字志丹，陕西省保安（今志丹）县金汤镇芦子沟人。

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其父刘培基在金汤小学教书。

1908年，随母亲回到金汤镇北30里的山村老家芦子沟。

1909年，入本村私塾学习。

1919年至1921年，就读于永宁山本县县立高等小学堂。

1922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当时陕北23县惟一的一所中学）。此期间，深受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老师的熏陶和影响，阅读了《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接受“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

1923年，在魏野畴的帮助下，榆林中学组织起学生自治会，刘志丹当选为会长。

1924年，进步教师李子洲在陕北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刘志丹等成为榆林中学第一批团员。

1925年，榆林地区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刘志丹随即转为共产党员。

1925年6月上旬，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陕北，刘志丹立即组织榆林中学学生积极响应，上街游行示威，开展援沪募捐，宣传抵制日货，进行街头讲演，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

1925年7月，刘志丹被选为陕北学生联合会代表，赴三原，参加全省学生会代表会议和旅京陕西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第二届代表大会。被共进社选为第一审查委员会委员。当时，满怀激情的刘志丹为大会题词：“共进！共进！同志引着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者进攻！不惜牺牲，杀开血路！前途自有光明与幸福！”

1925年秋，党组织决定选派刘志丹等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学习。于是年冬，刘志丹到达广州。

1926年初，刘志丹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学习。

1926 年秋，刘志丹奉命被派往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

1927 年，邓小平到陕西，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刘志丹被聘为军校教官。

1927 年夏，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实行“清党”，下令将刘志丹等 20 余名共产党员押送出境。党派刘志丹回陕工作。

1928 年 1 月上旬，陕西省委改组，潘自力任书记。刘志丹等被派往我党控制的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准备起义。

1928 年 4 月 27 日，西北工农革命军在高塘镇正式成立，刘志丹担任军委会主席，唐澍担任总司令，卢少亭担任政治部主任。

1928 年 5 月 1 日，刘志丹、唐澍等同志率领部队与渭（南）华（县）地区已经爆发的农民暴动相结合，正式宣布起义。即著名的渭华暴动。

1928 年秋，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回陕北工作，任命刘志丹为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8 年冬，刘志丹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参加特委工作。

1929 年春，志丹返回保安，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兵运活动，并担任了保安民团团总职务。

1929 年 7 月，中共陕西省委在渭南举行全体会议，刘志丹被选为省委候补委员。

1930 年春，刘志丹打入驻甘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任十六团副团长。

1930 年 8 月中旬，刘志丹到绥德参加了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之后，回陕甘边搞兵运。

1930 年 9 月，刘志丹回到保安。是月下旬，刘志丹与曹力如等组织革命武装，击毙甘肃省合水县太白镇民团团总黄毓麟以下 10 余人，收编了该部。

1931 年春，刘志丹与苏雨生合作，任该部团长，准备起义时被当地豪绅告发，刘志丹被捕。

1931年4—5月，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通过杨虎城关系营救，刘志丹获释。刘志丹出狱后，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利用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打进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在桥山的南端宁县成立了一个旅，号称十一旅，自任旅长。

1931年9月，南梁游击队建立，刘志丹任总指挥。

1931年10月下旬，刘志丹领导的队伍在甘肃合水县灵绵庙同杨仲远、阎红彦、师祝杰等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合，并到南梁一带休整。

1931年冬至1932年1月，他们在合水县柴桥子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

1932年春，根据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离部队赴省委汇报情况，随后在渭北搞了一段农运工作，返回陕甘边，在游击队任第三支队队长。

1932年5月10日，陕西省委改任刘志丹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15日夜，刘志丹指挥游击队奔袭旬邑马栏镇，一举歼灭敌五一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缴枪200余支。17日，又歼敌500余人，缴枪400余支。在半月之内，挺进数百里，大小九战八胜，共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支。

1932年，刘志丹率陕甘游击队在集义镇消灭民团一部后，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50人的赤卫队。

1932年6月底，陕甘游击队在韩城作战失利。队委会开会纠正悲观情绪，统一思想。决定免去刘志丹总指挥职务，刘志丹任二大队队长兼政委。

1932年7月，“左”倾错误泛滥，刘志丹、杨仲远、阎红彦遭受打击。刘志丹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2年8月底，陕西省委派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他们率部南下耀县取得照金战役胜利；打死民团总指挥党谢芳，生擒耀县团总蔡子发，歼敌400人。

1932年9月，陕甘游击队进攻保安失利。

1932年10月，再战失利，游击队撤至合水一带。谢子长、刘志丹在这里召开队委会，决定分散活动，筹集物资。

1932 年 12 月上旬，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地区会合，旋即南下淳化地区游击。

1932 年 12 月 22 日，军政委杜衡（后叛变）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召开党团员大会，对游击队一年来的活动横加指责，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的领导职务。

1932 年 12 月 24 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军二十六军二团，王世泰任团长，杜衡兼任军、团两级政委。刘志丹任红二团政治处处长。

1933 年 1 月 18 日，杜衡错误决定部队攻打庙湾夏玉山民团失利后，郑毅的参谋长撤销，刘志丹被任命为参谋长。

1933 年 5 月下旬，杜衡召开党政军干部临时联席会议，错误决定红二十六军主力二团南下，造成了极为痛心的损失。杜衡叛变，政委由汪锋担任，刘志丹任参谋长。

1933 年 10 月 4 日，刘志丹等人历尽艰难险阻，回到了照金根据地，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1933 年 11 月初，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莲花寺召开联席会议，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下辖第三团和骑兵团，人枪 500 余。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

1933 年 11 月 25 日，陕甘临时革命委员会组成，刘志丹兼任主席。

1933 年 12 月初，刘志丹撰写了《军事教育大纲》作为教材，对部队进行军事整训。

1934 年 1 月上旬，红四十二师返回合水廉家砭。因王泰吉请求到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师党委决定由刘志丹任师长，杨森任政委。

1934 年 2 月，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配合地方游击队和敌人连打九仗，均获胜利。

1934 年 4 月，刘志丹率军粉碎了敌人对甘陕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1933 年冬至 1934 年夏在陕甘边特委的正确领导下，刘志丹等率红二十

六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经过大小战斗 30 余次，歼敌 3000 余人，解放了陕甘地区 10 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敌人成百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建立了大片地区的工农兵政权和 14 个游击支（中）队。

1934 年秋，在梨园堡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为培训干部还办了军政干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等负责教学工作。

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孔原派巡视员黄翰到陕北，指示统一陕北、陕甘两个地区的武装力量及改编陕北游击队问题，决定调刘志丹负责西北军委工作。

1934 年 12 月底，刘志丹亲率红二团和陕甘五、六支队赴安定。

1935 年 1 月，刘志丹到水晶沟、柳沟、灯盏湾等地，多次看望辗转养伤的谢子长（1934 年 8 月 26 日，在清涧河口战役中负伤）。刘、谢两人就陕甘和陕北两地区统一领导、两支红军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935 年 2 月 5 日，刘志丹参加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峪（今属子洲县）举行的联席会议。刘志丹当选为西北工委委员和西北军委主要负责人。

1935 年 2 月，蒋介石调驻河南的高桂滋部八十四师及陕、甘、宁、晋四省军阀军队，总兵力约 4 万多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刘志丹据此情况与周家峪会议精神，亲自为西北军委起草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动员令分析了敌我形势，命令首先打击已深入陕北根据地，但对陕北人地生疏，又与陕北军阀井岳秀互有戒备的高桂滋部，尔后向南、向西发展，使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5 年 5 月 1 日，两支红军在赤原县白庙岔胜利会师，刘志丹在当日举行的盛大联欢会上讲话，会后兄弟部队亲密团结气氛更浓，配合作战士气更旺。

1935 年 5 月 30 日，首战延长告捷，此后连续解放延川，安塞、安定、靖边等六座县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5年8月，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达陕北之前，蒋介石又调集以东北军为主力的10多万军队，并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亲任总司令，又发动了对西北工农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块中国共产党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惟一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

1935年8月中下旬，在东线的绥德、吴堡一带，刘志丹根据敌我形势，首先打垮了刚渡过黄河的阎锡山部两个旅，迫使阎军退回山西。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敌人。

1935年9月上旬，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刘志丹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保安瓦子川热情迎接。

1935年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延川永坪镇胜利会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西北代表团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鄂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组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1935年10月2日，刘志丹等亲自部署和指挥的劳山战役取得胜利，全歼敌一一〇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击毙敌师长何立中。

1935年10月5日，根据地首府迁驻瓦窑堡。此时中央红军已进至甘肃通渭、静宁地区，敌“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一面急调大军阻击，一面电令董英斌、王以哲、孙楚等部，立即在陕北“聚歼”刘志丹、徐海东部，“不准与毛、周靠拢”反“围剿”斗争进入紧张阶段。

1935年10月初，“左”倾路线的推行者在陕北大搞错误肃反，将刘志丹等一大批同志投入监狱，使刘志丹蒙受了不白之冤。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围剿”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毛泽东等同志了解到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已被关押的情况，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代表党中央，奔赴瓦窑堡接管“左”倾错误领导控制的保卫局。

1935年11月7日，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刘志丹等受诬被捕人员全部释放。刘志丹出狱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1935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纠正陕北错误“肃反”的同时，亲自指挥红军粉碎了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此时，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将陕北与陕甘根据地重新划分为陕北、陕甘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委，并相应建立政府机构，同时，又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统一管辖西北的革命武装，并将陕甘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编成红二十八军。刘志丹先后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要职。

1935年1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合署名发表了《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指出亡国灭种的大祸已迫在眉睫，揭露蒋介石围攻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是要“把我们陕甘的土地人民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要使我们做亡国奴。”号召劳苦群众争当红军，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和万恶的敌人血战！”“来保卫我们神圣的苏区！”

1936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为适应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决定渡河东征，命令刘志丹和宋任穷率领红二十八军担任侧翼，从佳县以北渡黄河，插入晋西北地区，配合红军迅速打通抗日前线的道路。

1936年3月，刘志丹指挥的红二十八军打下神木沙峁镇后，住在贺家川一带，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经过昼夜不停的详细调查研究，进行紧张的渡河准备。

1936年4月1日，部队在刘志丹指挥下，从山坡头胜利渡过了黄河。

1936年4月13日，刘志丹为贯彻执行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下达的要消灭山西省中阳县重要渡口——三交镇敌军的命令，昼夜不眠，亲自观察地形，仔细研究敌情，严密部署这次战斗方案。

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亲临前线指挥攻占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时，不幸左胸中弹牺牲，时年33岁。

1936年，党中央将保安县改名志丹县。

1936年4月23日，刘志丹同志的遗体运到瓦窑堡市。

1936年4月24日，驻瓦窑堡市的各机关团体、红军部队3000人在南

门戏台举行壮烈的追悼大会，悼念刘志丹同志的光辉业绩，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央政府办事处主席博古等领导同志参加了刘志丹追悼会。随后，刘志丹同志的遗体，葬于瓦窑堡南门城外二三里处。

1941 年，开始兴建刘志丹陵园。

1942 年，在纪念刘志丹牺牲六周年时，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1943 年，各界人士近万人参加在延安专署广场举行的公祭刘志丹大会。

1943 年 5 月，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举行隆重的公葬典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云、林伯渠、李富春、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徐向前、蔡畅等党政军领导人以及李鼎铭先生等均为志丹陵题词，续范亭因病未能参加葬礼，也遥寄哀诗：“有志竟成千古业，丹心一片付工农。未多痛能亲执紼，西望云天吊将军。”刘志丹为人民解放事业赴汤蹈火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炳耀千古，传颂万世。毛泽东题词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的题词是：“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的题词是：“红军模范”。这些都深切地表达了领导和同志对刘志丹的真挚感情。

谢子长年谱

1896 年，谢子长生于陕西省安定县凤凰山村。

1919 年，谢子长小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

1920 年，谢子长转到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上学。

1921 年，榆林中学未毕业，回到安定小学当老师。

1923 年，谢子长赴海南考察社会结束后到北平。

1923 年，谢子长结识陕西绥德县出生、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李子洲，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1924 年 2 月，谢子长从北平回到陕北。

1925 年秋，谢子长又一次到北平，结识了陕西早期共产党员魏野畴以及中共北平地委书记刘伯庄。

1924—1925 年，谢子长兴办民团，后来民团与石谦团合并，谢子长担任石团十二连连长。’

1927 年 2 月，谢子长以合法身份同伪县长一起召开了安定县地方行政会议。为达到为贫苦农民传话的目的，他组织农民协会，还筹划办了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全县 14 个行政区内的 36 名学员参加了为期 6 个月的学习。

1927 年，陕西省决定成立陕北军事委员会，任命唐澍为书记，谢子长，李象九为委员。

1927 年 10 月 12 日，以唐澍、谢子长、李象九为领导的清涧起义开始，即在驻陕北清涧的国民党井岳秀部石谦旅发动了武装暴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1928 年 7 月 12 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决议，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游击队编为四个分队，共计 200 人。在之前的 5 月 16 日，中共党员许权中率起义部队在高塘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全军共 1000 多人，五六百支枪，编成四个大队，谢子长

兼任二大队队长。

1930年春，驻守宁夏的军阀苏雨生乘蒋、冯、阎大战之机扩军，谢子长、刘志丹迅速带领一批共产党员打入苏雨生部，谢子长被苏雨生任命为第十旅旅长，与刘志丹继续开展兵运工作。

1931年10月下旬，谢子长等人前往南梁，加强游击队的领导，并成立了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任委员。

1932年1月初，谢子长主持召开军人大会。会上，省委代表荣子卿宣布“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同盟军党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荣子卿任委员。

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简称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重远。

1932年4月下旬，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撤销了谢子长总指挥的职务，将他派往甘肃靖远国民党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

1932年6月，谢子长在靖远县兵变失败后，返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1932年12月22日，谢子长与阎红彦被迫离开部队去上海。

1933年底，谢子长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负责领导西北革命武装斗争。

1934年7月初，经陕北特委决定将一、二、五支队300余人组建成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

1934年7月28日，在中共陕西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及陕北特委代表、陕北游击队队委会，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谢子长被任命为红四十二师政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由贺晋年接任。

1934年8月，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在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的清涧河口战斗中负重伤。

1934年10月，谢子长因伤势严重离开部队，转移到安定、安塞边界一

带养伤。

1935年1月，刘志丹探望谢子长的伤势，并交换了反“围剿”问题的建议。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谢子长、刘志丹关于反“围剿”的方针、计划的建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病情恶化逝世，年仅39岁。为纪念谢子长，1935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改为子长县。党中央到陕北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接见谢子长的亲属时，对谢子长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亲笔题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

二十六军大事记

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共八七会议及其指示之决策》，强调加强军事工作的重要性。

1927年10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人在驻陕北清涧的国民党井岳秀部石谦旅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是我党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1928年5月1日至4日，渭南、华县等集镇分别举行群众暴动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

1928年5月10日，在陕军李虎臣部任旅长的中共党员许权中率部在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

1928年5月6日，共产党员许才升召集清水源等地农民以抗粮“交农”为口号发动了起义，起义队伍由140多人扩大到400多人。

1928年5月12日，由清水源发展起来的起义队伍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许才升任政府主席，程永盛任红军总指挥，并将起义队伍编为3个连。

1928年5月16日，华县瓜坡镇起义部队在高塘与暴动农民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会，会上宣布中共陕西省委的命令，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军委下设总司令部，唐澍任总司令，刘继曾任政委，王泰吉任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总顾问许权中。

1928年5月31日，许才升、程永盛等七位领导人惨遭杀害。

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清算陈独秀右倾错误，同时批判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

192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致信陕西省委，指出：“过去的党的暴动政策犯了极深的盲动倾向，必须严厉的纠正。”于是，中共陕西省委把开展兵运工作、瓦解敌人，发动革命兵变作为当时中心任务，并逐步把兵运工作的重点逐步转向陕甘边地区。同时派谢子长、刘志丹等到陕西、甘肃、宁夏一带从事兵运工作。

1929年春，刘志丹与保安县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曹力如、王子宜等一起发动群众，夺取了保安民团的领导权。刘志丹任团总，曹力如任副团总。

1929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西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结合起来”。“同时可打入农村中现有的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内（如民团、红枪会、哥老会等）抓取下层群众，领导其参加农村斗争，渐渐使之变成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根据中央的决议，中共陕西省委把瓦解敌人，组织革命兵变，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

1930年春，谢子长、刘志丹前往陕、甘两省交界地区积极开展兵运工作。

1930年8月，刘志丹在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主动辞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的职务，集中精力组织和领导陕甘边的武装斗争。

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带领一部革命武装，在甘肃合水县太白镇袭击了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击毙敌正、副营长，缴获长短枪50多支，骡马10余匹。并组建起一支四五十人的革命武装，活动在保安、安塞一带。

1931年2月中旬，为摆脱敌重兵“围剿”，刘志丹率部向甘肃陇东一带转移，一路上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使赵连璧、唐青山、贾生财三股绿林武装300余人投向革命。部队在合水县固城川麻义村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

1931年4月下旬，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山西孝义县楼底村成立。拓克宽任大队长，黄子文任政委，阎红彦任副大队长，一中队队长阎红彦（兼），二中队队长白锡林，全队共计40余人。

1931年6月，刘志丹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与甘肃军阀陈珪章谈判，收编土匪李培霄武装获得成功，刘志丹被任命为陈部第十一旅旅长。

1931年7月，刘志丹认真总结兵运工作，到陕甘边地区桥山山脉子午岭山区，准备建立革命武装。

1931年8月10日，陕西省委在《接受中央来信与陕西党目前中心政

治任务及中心工作决议案》中，再次强调：“组织革命兵变与农民斗争相结合，以开展革命的游击战争。”“加强士兵工作，党必须加紧发动士兵群众的辅助组织（如弟兄团），组织革命士兵委员会，积极准备和组织革命兵变，对于自发的兵变更要一刻不放松的去领导，以开展游击战争。”

1931年9月，刘志丹、马锡五在甘肃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集合旧部杨培胜、赵连璧、贾生财三支队伍进行整编。组织起陕甘边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辖三个大队。

1931年9月4日，晋西游击队一部30余人西渡黄河进入陕北。部队到达安定县南沟岔进行休整，选举阎红彦任大队长，杨重远任政委，吴岱峰任副大队长。

1931年9月10日，晋西游击队首战安塞县平桥之敌告捷。

1931年9月11日，晋西游击队在安条岭击溃军阀井岳秀部高雨亭营及民团300余人，随后收编了师储杰、杨琪、杨鼎三股绿林武装，改编为一个支队，共计300余人，师储杰任队长。

1931年10月底，晋西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在南梁林锦庙胜利会合。成立新的游击队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任委员。

1931年11月，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到南梁，领导会师部队。

1931年12月，陕西省委派荣子卿到游击队传达了省委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的指示，要求部队整顿后南下，并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2年1月初，“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村正式成立。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部队编为两个支部。第一支队队长师储杰，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队长杨鼎，副大队长吴岱峰；第三大队队长雷恩钧，副大队长陈玉清；警卫队队长白锡林。第二支队队长刘志丹（兼），参谋长朱理凯，军需马锡五，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队长杨培胜，副大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队长贾生财，副大队长谷聚山；警卫队队长刘丕杰。共计700余人。

1932年2月12日，根据陕西省委的决定，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锦章村召开军人大会。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了改编命令。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简称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替卫大队队长白锡林。

1932年2月13日，陕甘游击队攻占职田镇。

1932年2月15日，陕甘游击队在旬邑县阳坡头设伏，歼敌300余人。

1932年3月19日，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南塬群众的配合下，攻打山河镇，因向导迷路，联络失误，未果。

1932年3月20日，陕甘游击队进至寺村塬，将群众武装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

1932年3月21日，陕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游击队逐渐壮大情况及准备成立正式红军的请示》中提出：陕甘边武装斗争在“军事上必须准备成立正式红军”，要求中央给予正式番号。

1932年4月20日，中央作出了《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新苏区的决议》，批准了陕西省委的请示报告，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1932年4月21日，陕甘游击队奔袭旬邑县城，一举突入城内，歼敌300余人。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攻占的第一座县城。

1932年4月下旬，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到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并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部队编成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第三支队队长，吴岱峰任参谋长；阎红彦任第五支队队长，杨重远任参谋长。

1932年5月10日，根据敌人调集重兵对游击队实行分路“进剿”的情况，陕西省委急令游击队北撤，在旬邑县清水塬集结，根据斗争需要，恢复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李杰夫为政委。

1932年5月15日，陕甘游击队奔袭旬邑马栏镇，歼敌五一一团两个连。

1932年5月17日，陕甘游击队在旬邑杨家店凤凰山再歼敌五一团两个连，之后奔袭焦家坪，一举将守敌全歼。

1932年5月27日，陕甘游击队与尾追之敌孙友仁警卫团和冯钦哉部在富县吉子峁展开激战，突出重围。

1932年6月初，陕甘游击队转至郿县宁武镇，歼敌一个团指挥所。之后，攻打临阵未克，部队转入韩城，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自卫军。

1932年6月底，陕甘游击队在韩城作战失利。部队转移到甘肃宁县麻子掌、梁掌堡一带。队委会召开会议，纠正了悲观失望情绪，统一了思想。决定免去刘志丹总指挥职务，推选阎红彦担任总指挥。同时，将三、五支队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一大队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志丹；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

1932年7月8日，在共产党员高鹏飞、曹胜荣、杨林等组织领导下，在甘肃合水县西华池成功地发动了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特务营两个连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队长，阎润品任政委。西华池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兵运史上的首次胜利。

1932年7月23日，陕西省委派李艮来到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传达了省委关于“为实现创建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彻底转变陕甘边新苏区和游击队的工作”的指示，并担任陕甘游击队政委。由于李艮不顾大敌当前，在五顷塬强行分配土地，命令部队打阵地战，攻坚战，致使游击队遭受严重损失。

1932年8月31日，谢子长再次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1932年9月12日，陕甘游击队奔袭照金，一举歼灭富平、同官、耀县民团400余人。

1932年9月下旬，陕甘游击队到达南梁、二将川一带活动。后北上攻打保安，未克。

1932年12月初，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陕甘游击队开往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准备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1932年12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

常委中选派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的指示，派杜衡到陕甘游击队，着手进行二十六军的筹建工作。

1932年12月22日，陕甘游击队在杨家店子召开党员大会及战士代表会，会议由杜衡主持，他在讲话中诬蔑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领导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的错误，并撤销了他们四人的职务。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刘志丹被留在游击队继续工作。谢子长、阎红彦离队去上海受训。

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现归旬邑县）召开军人大会，举行改编授旗典礼。杜衡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二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郑燕清）任团参谋长，刘志丹任团政治处处长，杨重远任团参谋处处长，刘约三任团经理处处长，杨棋任团管理处处长，师克寿任共青团团委书记。全团200余人。

1932年12月27日，红二团攻打焦家坪，消灭宜君县民团60余人，缴枪60余支。

1933年1月初，红二团在耀县香山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思想，并将香山寺院的粮食分给了饥民。由杜衡提议，焚毁了香山寺。

1933年1月18日，杜衡错误决定部队攻打庙湾夏玉山民团。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未能熟悉地形，致使战斗失利。战后杜衡撤销了郑毅的参谋长职务，任命刘志丹为参谋长。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

1933年3月中旬，部队转入外线作战。首先，攻打铜川县的金锁关，消灭民团30余人。尔后，进入三原县武字区，歼敌一个骑兵排。

1933年4月5日，在红二十六军配合下，由特委主持，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

1933年5月下旬，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党委在耀县北梁召开

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杜衡、刘志丹、习仲勋、李妙斋、李杰夫、汪锋、秦武山等。会议重点是讨论边区工作和下步的行动计划。李杰夫提出向北发展；刘志丹提出在陕甘边建立根据地；杜衡提出南下渭华，建立根据地。最后杜衡凭借职权，强制会议通过了部队南下渭华的错误决定。

1933年5月29日，全军在北梁召开南下动员大会，部队开始南下，当天下午，行至淳化县桃渠塬遭敌袭击。经过激烈战斗，歼敌8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

1933年5月30日，部队到三原县二台子，同渭北游击队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杜衡、汪锋、刘志丹、王世泰、黄子祥等。会上，杜衡强令部队尽快南渡渭河。

1933年5月31日，拂晓，部队离开了二台子，行至三原长坳，配合渭北游击队击败当地豪绅请来的敌富平张德润民团，于黄昏时撤出战斗。杜衡提出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指任汪锋代理政委，他只身离队，部队继续南下。

1933年6月1日，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阻止红二团南下。袁到三原后同杜衡相遇，遂在该县民教馆召开紧急会议，对杜衡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决定由赵伯平通知高陵县党支部阻止部队渡河，并派黄子文在高陵境内拦截部队。当黄子文到达高陵后，部队已渡过渭河，无法挽回。同时红二团部队到达渭河边，因智取渡口，缴敌枪10余支，并俘敌民团团总薛兆兰。

1933年6月4日，红二团进入箭峪沟，遭到敌人猛烈袭击，由于寡不敌众，部队被敌冲散，失去联络。

1933年6月7日，红二团进至青岗坪休整。

1933年6月15日，红二团到达张家坪村。

1933年6月16日，红二团党委在张家坪村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决策。会议尚未结束，遭敌一个旅和地方民团偷袭。刘志丹带领一部向蓝桥一带突围；汪锋带领部分战士向野竹坪、葛牌等地突围；王世泰带领部分战士向两岔河一带突围。

1933年7月，陕西省委决定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

1933年7月21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驻耀县骑兵团，在团长王泰吉率领下宣布起义，被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指挥，杨声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五个大队，一大队队长郑子明，二大队队长任建民，三大队队长张龙韞，四大队队长周德民，五大队队长谈国帆，每个大队辖一个民团中队。共计1000人。

1933年7月24日，根据陕西省委的决定，红四团正式成立，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李天保任参谋长，下辖三个连，共120余人。

1933年7月28日，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在西安被捕，随即叛变。杜衡带领特务到处捉捕地下党员。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

1933年8月上旬，红四团撤离渭北根据地中心区域心字区、武字区，北上照金。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系会议。会议对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进行了认真分析和讨论。通过了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决议，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

1933年8月下旬，红四团向东出击，先后在庙湾消灭民团一部，在高山槐消灭耀县雷天盖民团100余人，缴获武器一部，在让牛村消灭耀县民团一部，在柳林消灭民团数十人。

1933年9月初，红四团向西出击，在彬县龙马、高村、柏子坡一带消灭民团100余人。尔后转入正宁金村庙一带，消灭地主武装一部，缴获长短枪10支及部分物资。

1933年9月中旬，临时总指挥部率部队南下攻打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歼敌县长以下160余人。

1933年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曹士荣回到照金。刘志丹任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王世泰任红四团二连连长，黄子文被派到照金

游击队总指挥部工作。

1933年10月16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孙友仁团及民团数千人，配属炮兵，向照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照金游击队撤离薛家寨。

1933年10月18日，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攻克合水县城，毙伤俘敌2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

1933年10月28日，陕甘边红军进至庆阳县毛家沟门地区，重创敌赵文治团，共毙俘敌200余人，缴枪200支（挺）。

1933年11月3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特委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会期三天。会议作出决议，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十二师，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1933年11月8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莲花寺正式成立。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辖红三团、红四团、政治部、供给处和直属警卫连。共计300余人。红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红四团少年先锋队改编组成。团长王世泰，政委李映南，下辖三个连，一连连长赵国卿，二连连长陈学鼎、指导员张邦英，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全团共计200余人。红四团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李志柏，二连连长高占胜，共计100余人，战马60余匹。同时师、团成立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杨森兼任师党委书记。

1933年11月中旬，红四十二师进入宜君县杨家店子，一举歼灭敌一个整连，毙俘敌120余人，缴获枪械120余支（挺）。

1933年12月初，在红四十二师的配合下，地方党组织先后在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村将农民、手工业者、妇女组织起来，组建了农民联合会。同时，新组建了南梁、小河沟、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5个赤卫队，共计1000余人。

1934年1月上旬，红四十二师南下，帮助三路游击队扩建游击区。师长王泰吉经党组织批准，前往敌区店开展兵运工作。红四十二师师长由刘志丹接任。不久，王泰吉在淳化县通润镇被旧部出卖被捕，押往西安，在敌人面前视死如归，英勇就义。是月，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廉家砭召开师

党委会。会议对高岗破坏群众纪律，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和处理，决定撤销其师政委职务，调到第二路游击队任政委。同时任命杨森接任红四十二师政委。

1934年2月，国民党反动当局调集8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1934年3月上旬，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由南梁出发，从宁县、正宁南下，迅速进入照金以北地区。

1934年3月29日，红四十二师袭击了国民党庆阳县第四自治区驻地高桥，俘敌区长以下30余人，缴获枪30余支和大批给养物资。嗣后，对元城发起攻击，红三团一举攻占元城街道，消灭谭世麟民团一个连，毙俘守敌100余人，缴获枪100余支和一部分军用物资。然后师主力直扑李家梁子，又歼谭世麟一个骑兵连，缴获枪50余支、战马50余匹。

1934年4月2日，红四十二师在西华池全歼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子恒部王子义团两个营另一机炮连，共计600余人，缴获步枪600余支、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弹药数十箱、战马50余匹。

1934年5月初，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进至三里塬歼敌两个连，缴获枪100余支（挺）。战斗中师政委杨森负伤，张秀山继任师政委，骑兵团团长由赵国卿继任，政委由高锦纯继任。之后，又在高凤坡、和尚塬、瓦子川连续作战，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荔园堡召开会议，会议总结了反“围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调整加强了红四十二师和游击队的各级领导，决定加强陕甘边区特委的工作，成立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

1934年7月初，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正式成立，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

1934年7月18日，总指挥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和200余名赤卫军南下陕甘边，同红四十二师在南梁会合。

1934年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陕北特委代表

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在阎家洼子举行联席会议。师长杨森代表红四十二师党委汇报了建师以来部队的发展、根据地的建设和红四十二师今后的发展方针等情况，同时对根据地建设应制定的政策提出了建议。与会多数同志肯定了红四十二师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认为红四十二师提出的战略方针符合实际，并得到会议的通过。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派红三团北上，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会议决定撤销高岗红四十二师政委的职务，任命谢子长为红四十二师政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由贺晋年接任。

1934年8月18日，师政委谢子长指挥红三团和游击队攻打进犯金吴塌守敌。红三团在团长王世泰的率领下，一举攻入村内，经激烈战斗，共歼敌两个整连，缴获枪100余支及物资一部。

1934年9月19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湫头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红四十二师第一团，作为南区坚持斗争的核心力量。红一团是以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所属的四支队、直属特务队为基础，并从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抽调一部组成。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下辖两个连，共计200余人。步兵第一连连长寇金财，指导员郭秉坤；步兵第二连连长张治怀，指导员张嘉伯。

1934年10月10日，第二路游击队开辟了以甘泉县下寺沟为中心的大片红色区域。成为南梁根据地东区，拥有八支游击队。为充分发挥该游击区的作用，扩大正规军，特委和边区军委决定抽调庆阳、保安游击队各一部在南梁阎家洼子组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副团长孔令甫，参谋长王生荣，政治处主任朱奎。下辖两个步兵连、一个少年先锋队，共计200余人。

1934年10月20日，国民党集结大量兵力，向黄龙山进剿，郭宝珊营随敌向甘肃庆阳进发。在红三团的配合下，该部在庆阳毅然宣布起义，接受改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4年11月4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等领导机关。并通过了关于扩大红军、创造

新苏区、深入土地革命和武装群众等问题的决议案。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刘志丹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志清当选为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总指挥。

1934年11月10日，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在荔园堡召开欢迎大会，欢迎10月20日在庆阳宣布起义的部队，将该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任命郭宝珊为司令员，任浪花为政委。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队长陶荣启；二大队队长王东来；三大队队长杨茂堂。

1935年1月，红四十二师骑兵团越过子午岭，过正宁、宁县，强行通过封锁线，截断西兰公路，一举攻入西兰公路重镇长武县城。歼敌近百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筹款数万元、棉布数百匹，极大地震动了敌人，迫使国民党当局为了保护其西北交通要道，调兵遣将，加强防务。

1935年1月上旬，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二团北上陕北，探望谢子长的伤情，交换意见，并就反“围剿”问题与陕北特委进行商讨，对统一两个特委、两支红军的领导和指挥等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与会者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谢子长、刘志丹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方针、计划的建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会后，西北军委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

1935年3月下旬，红三团、抗日义勇军在游击队的配合下，偷袭田峪岷守敌三十五师一〇五旅马殿邦团一个营，歼敌100余人，拔掉敌人据点。

1935年4月21日，红二团在南梁地区完成阻击敌三十五师的任务后，按原定作战方案，迅速向陕甘边西北、东北地区移动，向敌人发动进攻，在杨清川伏击敌警三团骑兵连获胜。

1935年5月1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会师。

1935年5月2日，西北军委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地动员条

例以及处决土豪劣绅等一系列规定。

1935年5月3日，在玉家湾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1935年5月9日，西北主力红军及数千游击队，赤卫军在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在马家坪全歼敌八十四师五〇〇团一个营和一个机炮连。

1935年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举行会议，刘志丹代表前敌总指挥部作了军事形势报告，并对下一阶段作战方针、计划提出了建议。

1935年5月中旬，刘志丹率红军主力，进至清涧无定河边。

1935年5月20日，红军于张家圪台歼敌八十四师四九九团一个连。

1935年5月29日，红军对延长县城发起突然攻击，守敌猝不及防全部被歼，县城迅速被我占领。

1935年6月17日，刘志丹与红八十四师师长杨棋、政委张达志共同指挥其一、二团攻打李家塌据点。在红四十二师第三团配合下，至27日将这个坚固点拔掉，歼敌100余人。安塞全境解放。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5年6月28日，红军到达靖边县城，拂晓开始总攻，至中午全歼守敌的600余人，县城解放。

1935年6月30日，保安守敌弃城逃跑，县城宣布解放。

1935年7月初，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第二、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八十四师，在绥德三皇峁歼敌一个工兵营100多人。

1935年7月中旬，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在郿县羊泉与红四十二师第一团会合，消灭中部县龙坊塬杨相之民团；在郿县、宜君、中部县一带活动，消灭小股敌人，摧毁反动政权，开辟洛川、宜君游击区，控制咸榆公路西侧，给敌人造成运输上的极大困难；在白水、澄城、韩城一带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后，骑兵团返回下寺湾，红一团返回照金地区。

1935年7月17日，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第二、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八十四师在陕西绥德县高家塌袭击敌五〇一团一营、五〇二团三营和张廷芝骑兵营，毙伤俘敌3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机枪18挺，五

○一团团长艾杰负伤逃跑。

1935年8月11日，红四十二师对慕家守敌发起进攻，歼敌600余人。战斗中红三团团长王世泰负重伤。

1935年8月21日，前敌总指挥命令西北主力红军南下，主动打击冒进而战斗力不强的晋军。选择定仙塬为战场，围点打援。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将敌全部歼灭，毙伤敌副团长以下200余人，俘虏1000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6门、重机枪12挺、机枪50余挺、长短枪10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战斗中阎锡山派一架战斗机前来助战，被红军击伤迫降在绥德县薛家峁一带，两名飞行员被俘。

1935年9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经陕甘苏区庆阳、合水县抵达保安县永宁山，受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热烈欢迎。中共西北工委当即发出《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并命令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开往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刘志丹接到通知后，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

1935年9月17日，中央驻北方代表团在永坪镇召开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分别改编为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下辖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

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组成十五军团大事记

1931年10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五军在安徽六安麻埠正式建立，下设七十三师（辖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3个团）、七十四师（辖二二〇、二二一、二二二3个团）、七十五师（辖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3个团）和1个特务营。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开始暂辖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吴焕先。

1932年10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七军在湖北英金家铺组成。下设七十九师（辖一、三团）、八十一师（辖二、五团）。军长刘士奇，政治委员郭述申，全军4个团，4500余人。

1932年11月24日，红二十七军由皖西转到黄安七里坪附近，与中共鄂豫皖省委、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及留在根据地的红军三个主力团会合。

1932年1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重新组成，辖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共五个团另两个特务营，约7000人。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第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戴季英；第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政治委员高敬亭。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由陕甘游击队改编而正式建成，下辖红二团，200余人。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二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详见“红二十六军大事记”）。

1933年4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麻城大畈会合。中共鄂豫省委决定将红二十八军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兼），后为周希远，政治委员王少卿；另将罗山独立第六师十六团编为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全军12000余人，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戴季英。同时，决定以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及皖西北武装，再组建第八十二师，坚持皖西北地区的斗争。这样红二十五军扩编后，设有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军医院等军事行政管理机构，同时部队设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3个师和1个特务营。

1933年7月，陕西省委决定将1931年5月成立的渭北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称红四团）。此时，红二十六军下辖红四团

（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王泰吉、政治部主任杨声）、耀县游击队三支队（队长陈学鼎、政治指导员张邦英）。

1933年7月中旬，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撤销第七十三师建制，辖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共6个团，约6000人。

1933年10月7日，中共鄂豫皖省委于9月5日率二十五军转移到皖西北，在高城南溪和红八十二师会合后，中共鄂东北道委将第七十四师二二二团三营（大小斛山战斗后因被敌隔绝而留在鄂东北），以及独立第七师的大部合编为第七十三师，师长夏如银，政委王少卿。下辖第二一七、第二一九团。

1933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为期三天的会议作出决议，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十二师，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11月8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莲花寺正式成立。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杨森任师党委书记。下辖红三团、红四团团分别由王世泰（兼）、黄子祥，政委分别为李映南、杨森。1934年9月至10月成立的红一团、红二团及骑兵团也属该师所辖。团长分别为陈国栋、刘景范、黄子祥，政委分别为张仲良、胡彦英、杨森。还有11月成立的西北抗日义勇军（起义），也属该师所辖，义勇军司令员郭宝珊，政委任浪花。这次会议和红四十二师成立了党对军队工作的领导。

1933年11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缩编，将在鄂东北的部队缩编为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共1000余人。

1934年4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高城豹子岩会师。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辖第七十四（三个营）、第七十五师（两个团），共3000余人。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兼），第七十四师师长梁从学。政治委员姚志修，第七十五师师长丁少卿、政治委员高敬亭。同时以红二十八军二二四团一个营、军特务营和皖西北第三路游击师为基础，编成第八十二师（一个团）坚持皖西北革命根据地斗争。

1934年9月至11月，1934年9月成立的红一团，1934年10月成立的红二团，1934年11月成立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和1934年9月成立的骑兵团

均由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六军红四十二师所辖。

1934年11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五军整编补充。军直辖第二二三、第二二四、第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共2980余人，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

1934年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五军在雒南蔡家川进行整编，将第二二四团编入第二二三、第二二五团。

1935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整编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中辖二三二团（红三团）、二三四团（红二团一部、西北抗日义勇军一部）、骑兵团。团长分别为王富贵、郭宝珊、康建民，政委分别是黄罗斌、马沛维、高锦纯。另外还有一个少共青年营。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川永坪镇胜利结束长征。

1935年9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1935年9月17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央鄂豫陕省委在永坪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和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

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军同西北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永坪镇召开胜利会师庆祝大会。会后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分别改编为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师长分别为张绍东、杨森和贺晋年，同级政委分别为赵凌波、张明先、张达志。另外还设一手枪团和补充团。全军团共7000余人。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大事记

1935年9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成立。

193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在直罗镇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率陕甘支队进至陕北，会合当地红军，“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陕甘支队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常委会议精神，部署与陕甘红军会合。

1935年9月30日，张国焘截获了任弼时29日给周恩来的电报，并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与朱德致电任弼时，沟通了红二、红六军团的无线电通讯联络。

1935年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劳山地区设伏，歼敌第一一〇师大部，俘其2000余人，缴获战马3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击毙敌师长何立中，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

1935年10月2日，陕甘支队右路纵队在静宁以西击溃敌人一部，缴获汽车10余辆，控制了西（安）兰（州）公路10余里。3日，中央机关到达静宁县的界石铺。5日，陕甘支队到达德隆县的单家集，击溃敌人一个营，开始翻越六盘山。

1935年10月7日，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主峰，第一纵队在固原的青石嘴消灭敌人骑兵两个连，继向环县与庆阳间前进。

1935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红四方面军主力分两个纵队，沿大金川两岸南进，抢占绥靖、丹巴、崇化、懋功；以第三十三军及第二十七师1个团驻守马塘、梦笔地区，掩护后方。

1935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右纵队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在绥靖西北强渡观音菩萨河受阻，方面军遂以左纵队第四军由绥靖以北强渡大金川。之后，红四方面军克服艰难险阻，攻克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等地，击溃川军第二十、第二十四军共6个旅，歼敌3000余人。

193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保安与定边县交界的铁角城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与陕甘红军会师，以及巩固扩大陕甘苏区等问题。

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的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至此，中央红军历时一年，途经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万里长征胜利结束，开始了实现党中央新的战略任务的斗争。21日，陕甘支队在吴起镇附近将尾追敌骑兵2000余人击溃。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1935年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进攻甘泉县的榆林桥，全歼守敌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等部，俘团长高福元以下1800余人，再次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

1935年11月2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经保安到达甘泉县的下寺湾。

1935年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后增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委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十五军团，共10000多人。原第一、第三军团合编为第一方面军序列，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

1935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通知他们红一、红三军团已与陕北红军会合，要求红四方面军随时报告情况。

1935年11月21日，红一方面军对进至直罗镇的敌第一〇九师发起进攻，战至下午两时歼其大部。随后，红一方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第一〇九师残部，主力向西迎击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之敌第五十七军另两个师。23日，在张家湾歼灭援敌第一〇六师一个团。24日，攻占直罗镇，残敌全歼。这次战役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5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愿

与任何抗日反蒋的派别、团体共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提出政府的施政纲领。

1935年12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在陕北苏区组成，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红军第二十九军在陕甘边开始组建。

1936年1月8日，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在陕西省洛川县洛生镇地区，击溃向陕甘苏区进犯之东北军两个团。次日，红二十八军、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及军委骑兵团组成的北路军，开赴陕西省横山地区，打击向陕甘苏区北部袭扰之敌。

1936年2月21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关于召集全国抗日代表大会通电》，提出了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

1936年4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即沿玉龙雪山西麓金沙江东岸北进，5月初到达中游地区。部队在此休整，同时进行了翻越雪山的准备和民族政策的教育。

1936年5月18日，中央军委发布西征战役计划，决定以第一、第十五军团及第八十一师等部，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向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发展；以第二十九、第三十军等部，保卫陕北苏区，牵制“进剿”陕北敌军。西方野战军于19日、20日分左右两路军由延川、延长地区出发，向吴起镇地区集中。

193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研究争取张学良东北军反蒋抗日，以及争取张国焘转变错误立场，争取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进甘南等问题。

1936年5月29日，中央军委电示陕甘地区红军，6、7、8月份的越本任务是：西边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争取东北军等部走上抗日道路。

1936年6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红六军团到达理化以南的甲洼地区，同前来迎接的红二十二军会师。22日到达甘孜蒲玉隆，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会合。

1936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九军1个团参加西征。西方野战军首长命令以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和军委骑兵团组成中路军，担负发展巩固三边（靖边、安边、定边）苏区的任务。同时，张国焘、朱德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党中央，提出拟于6月底北上，向夏、洮西北行动。

1936年6月19日，党中央复电张国焘等，指出红四方面军同红二、红六团会师后，“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

1936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机关安全撤出瓦窑堡，向西转移，于7月10日前后相继到达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等地。同日，红十五军团主力袭占宁夏盐池县城后，又于27日袭占宁夏省豫旺县城（今下马关），并于7月5日在该县红城水地区击溃马鸿逵部新七师骑兵三个团又两个营的进攻。

1936年7月1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红二军团到达甘孜甘海子，会见了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2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68人和红一方面军等10个单位致电朱德、张国焘等并红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两个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6年7月5日，红二、红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所属第二、第六军团番号不变，另将第三十二军编入红二方面军。上旬，中革军委决定在陕甘宁地区充实扩大组成3个骑兵团，并组建陕甘宁独立师。红二方面军在甘孜地区，受到红四方面军的热烈欢迎，两个方面军指战员欢欣鼓舞，并希望迅速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但张国焘却继续分裂活动，欺骗拉拢红二方面军支持其反党分裂活动。两军一会师，他就派出所谓“工作团”，以迎接红二、红六军团为名，散布流言飞语，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遭到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坚决抵制和反对。任弼时多次与张国焘单独谈话，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随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开始北上。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于3日、2日、10日从甘孜、炉霍、绥靖地区出发，向甘南前进。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开进。

1936年7月13日，毛泽东等电示红二、红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县，并指出此举将使红军在“战略上大占优势”。

1936年7月22日，毛泽东等致电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并指出：“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而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局面。”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及红二军团分别于23日、26日到达阿坝。

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1936年8月1日，西方野战军结束西征战役，准备9月份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合。西征战役中，红军共俘获敌人2000余，缴枪2000余支，解放了盐池、定边、环县、曲子、豫旺、同心城等城镇，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区。同时，红四方面军第三次通过莽莽数百里的草地，到达包座地区。中共中央致电祝贺红四方面军胜利到达包座，并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

1936年8月8日，红二方面军胜利到达包座地区。

1936年8月9日，红四方面军第一纵队抢占天险腊子口。10日攻占大草滩、哈达铺，歼敌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包围岷县。19日克漳县。26日攻占渭源；第二纵队于20日攻占洮州旧城，歼敌1个营，接着击退敌人马步芳部1个旅的进攻。9月7日攻克通渭；第三纵队经救济寺、腊子口，于9月1日进抵哈达铺。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基本完成岷洮西战役计划。

1936年8月12日，党中央通过同张学良协商后，制定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把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新阶段。

1936年8月25日，西北军委发布训令，指示西方野战军9月至11月间占领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作战，并不失时机地向周围敌军开展统战工作。

1936年8月30日，党中央和军委对红军作战部署作了调整：红一方面

军以一部兵力保卫苏区，主力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建立并发展甘南苏区；红二方面军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建立苏区，东与陕南苏区、西同甘南苏区相联系。

1936年9月1日，红二方面军到达哈达铺。

1936年9月9日，红一方面军以一军团第一师主力及骑兵第二团一部组成特别支队，由军团政委聂荣臻率领，经硝河城向南挺进，于14日占领将台堡，策应红四方面军。

1936年9月11日，红一方面军以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1个步兵团及骑兵第三团组成特别支队，由第七十三师政委陈漫远率领，向靖远挺进，以调动马鸿逵部西进，支援红四方面军北上。14日，该支队占领打拉池。

1936年9月16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以西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并根据中央指示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准备在静、会地区歼击胡宗南部。

1936年9月1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布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同时，红二方面军占领了两当、徽县、康县，歼敌一部，并以部分兵力围攻凤县、略阳等地，形成了同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有利态势。

1936年9月28日，红军总部发出《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指出：红四方面军应迅速进入通渭、庄浪、静宁、会宁、界石铺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的西进先头部队，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接通外蒙、苏联为目的。

1936年10月1日，党中央采纳了红二方面军首长向中央建议：部队渡过渭水北进，同红一、红四方面军靠近。

1936年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同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在会宁以东的青江驿、界石铺会师。9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指挥到达会宁城，受到红一方面军部队热烈欢迎。

1936年10月10日，在会宁城召开庆祝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大

会。会宁会师，胜利结束了红四方面军历尽艰辛，三过草地，转战川、康、甘等省，历时一年多的长征。这是党中央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以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顽强奋战，不畏艰险，打破优势敌人围追堵截的结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通电》，热烈祝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至此，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陕北）红军所创建的陕甘苏区，成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军以及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的落脚点和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陕北红军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兄弟部队以崭新的姿态走上了新的征程。